

CONG GONGZIZHEN DAO SITULEIDENG

傅国涌·著

龚自珍

到司徒雷登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

集人
卷八

他们为当代注入灵魂

胡适和毛泽东关系不错，却为何跟蒋介石去了台湾？

竺可桢为何被称为书傻子？邵飘萍怎样为言论自由而死？

龚自珍为何要告别衰世？司徒雷登如何成为杭州荣誉市民？

“我们应该尊敬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
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



龚自珍

傅国涌·著



司徒雷登

CONG GONGZIZHEN DAO SITULEIDENG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 傅国涌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399-3738-0

I. ①从… II. ①傅…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69964号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作 者: 傅国涌

责任编辑: 刘 霁

特约编辑: 康 慨

版式设计: 风 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3738-0

定 价: 34.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增量历史观：重读百年中国史 / 002

第一篇 龚自珍、魏源：告别“衰世” / 015

第二篇 “维新公子”陈三立 / 032

第三篇 不悔与悔：“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 / 045

第四篇 “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汤寿潜与晚清立宪运动 / 063

第五篇 宋教仁登南高峰 / 074

第六篇 火一样燃尽自己的师复 / 090

第七篇 烟霞洞中日月短——“新思潮”的代言人胡适 / 103

第八篇 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 / 118

第九篇 “应笑书生不自量”：——“中间势力”代言人张东荪 / 131

第十篇 “昌明教育平生愿”——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 149

第十一篇 “拨伊铜钱”：一代银行家蒋抑卮 / 167

第十二篇 “棉纱大王”穆藕初筑庐西湖 / 183

第十三篇 胡氏三兄弟的科学报国梦——兼说“中国科学社” / 197

第十四篇 登临吴山：邵飘萍的不归路 / 219

第十五篇 “纸头敌不过弹头”——史量才为守护“报格”而死 / 234

第十六篇 陈布雷为何“悔之晚矣”？ / 246

第十七篇 “我们的校长”——经亨颐与浙一师风潮 / 261

第十八篇 “书傻子”校长——竺可桢与浙江大学 / 272

第十九篇 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司徒雷登与我比邻而居 / 285

后记

增量历史观：重读百年中国史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
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

——龚自珍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中国民谚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胡适最喜欢题写的话之一



18 世纪，伏尔泰如此说：

“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 10 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至于政治家和征服

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该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

20世纪中叶，波普尔在传世之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人们平常所说的人类史往往就是指政治权力史，“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无数的历史。政治权力的历史是其中之一，而它被提高至世界历史”。在他看来，“这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再也没有比把贪污史、抢劫史或放毒史当作人类史更糟糕的事。因为权力政治学的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它当然包括某些掩盖它们的企图）的历史。这就是在学校中讲授的历史，有些最大的罪犯被颂扬为历史的英雄”。为什么人们会把权力史看作是人类史，而不是选择宗教史或诗歌史？他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权力影

响每一个人，其他的东西比如诗歌只影响一部分人。第二，人们有权力崇拜的倾向。第三，是掌权者喜欢受人崇拜，并且能将他们的意愿强加于人，许多历史书本来就是按掌权者的意志书写的，是在皇帝、将军和独裁者的监督下写作的。权力崇拜往往导致对恶的崇拜，这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是牢狱和奴役时代的一种遗迹，这种崇拜产生于恐惧。这种根源于恐惧的心理，导致我们长期以来只以成败论是非，只以成败论英雄，也就是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从而将文明史简化、畸化为争夺权力的历史。

文明的过程是一个从神到人的过程，古老的专制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神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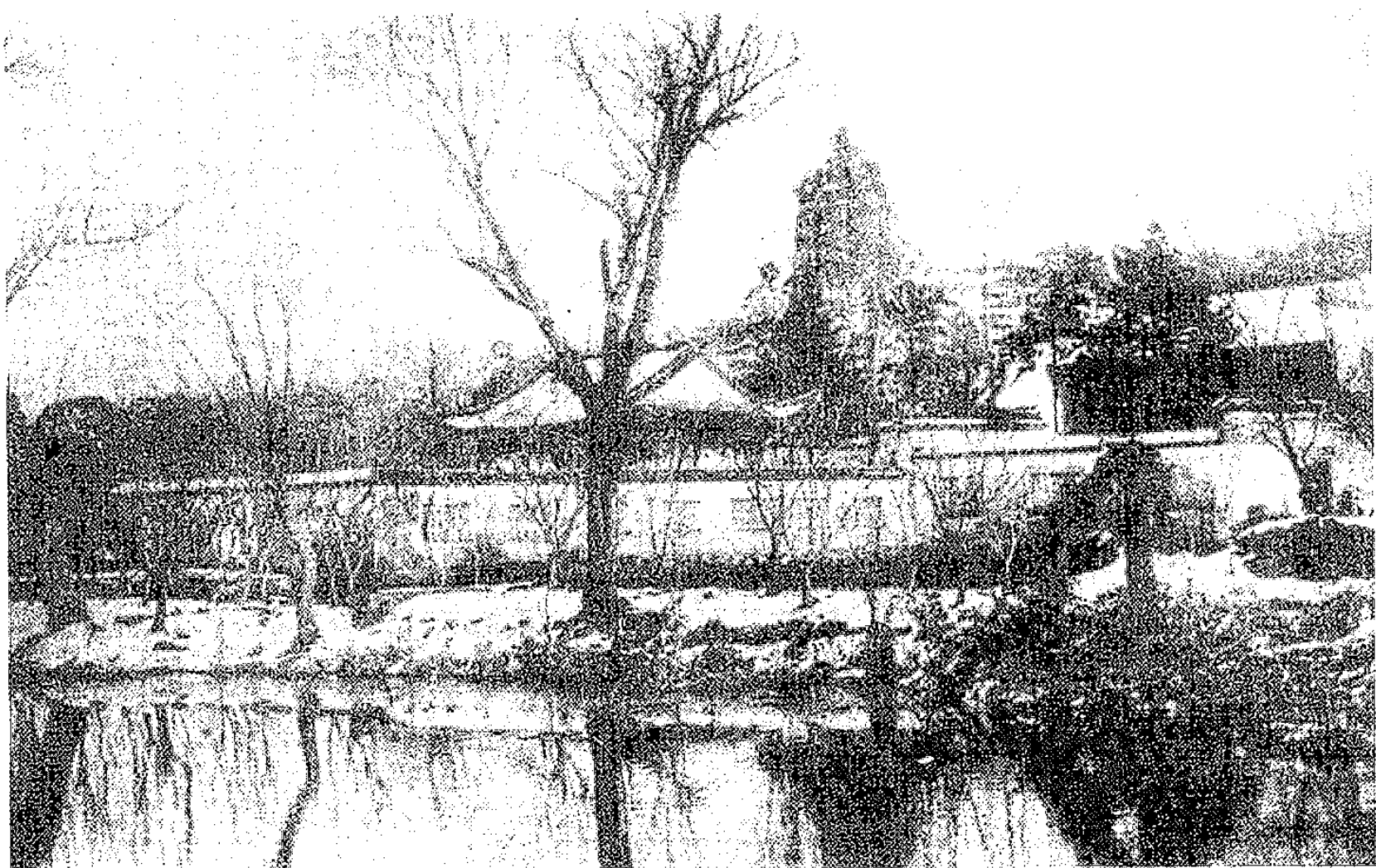
文明的过程是人不断自我确认、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的过程。

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消除恐惧、超越恐惧的过程。

在本质的意义上，文明不是超人的大脑在密室中设计、策划出来的，

要怎麼收穫
先那
麼栽
胡適

●胡适笔迹



●西湖雷峰塔下秋瑾等革命党人出没的白云庵

而是在千百万个人的努力中生长出来的。文明是常人（而不是救世主、超人）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文明进程是靠更多的常人推进的，文明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文明之路就是人类免于恐惧、通向自由的道路。一部文明史是由一代代的伏尔泰和他的读者们一起书写的，而不是路易十六书写的。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我总是想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这么收获，先那么栽”这些谚语和格言。

波普尔还写过一本《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他深知，那些被遗忘的、不知名的个人，他们的忧伤和快乐、痛苦和死亡，才是迄今为止人类体验的真实内容，但这样的历史往往不存在。“一切现存的历史，伟人的历史和权力的历史，至多是一场肤浅的喜剧，是一场在现实之后的权力所表演的小丑歌剧（就像荷马的小丑歌剧，奥林匹斯诸神的权力存在于人类斗争的场景背后）。我们最坏的本能就是对权力、对成功的偶像崇拜，它使我们相信这就是实在。”对于历史唯一理性的态度，就是我们自己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承担起创造我们生活的责任，惟有我们的良心才能对我们加以裁决，而不是世俗的成功。”

“我的观点是，成功不应该受到崇拜，它不能是我们的审判者，而我們也不应该被它所迷惑。……对权力、荣耀和财富这些所谓世俗成功采取一种极度的冷漠，甚至蔑视的态度，完全可能与这种态度相结合，这种企图就是尽力在这个世界上朝人们已经确定的目标前进，而且具有明确的创造成功的目的，这不是为了历史的成功或通过历史来证明，而是就成功论成功。”

他认为历史本身（主要指的是权力政治学的历史，而不是指不存在的人类发展史）“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但我们可以将意义和目的赋予历史，因为我们能够选择我们生活的目的。进步就是朝着人之所以为人的目的，人类中的个体生命、由个体生命构成的一个个不同群体可以做到这一点，文明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当我们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进步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警醒、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目标概念的清晰、取决于现实主义的目标选择，那么，我们就将做得更好。”



在中国，近代与古代的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不再是一切都笼罩在绝对王权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与社会合一，混沌不可分割，自秦始皇统一宇内的那一天起，皇帝、朝廷凌驾在一切之上，什么都能管，任何社会阶层都只有依附朝廷这一条路，没有独立生存的可能性。但是，从晚清开始，进入民国，历经袁氏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到国民党1927年在南京建立起政权，骄横的权杖并未能击碎社会拥有的一切，国家机器没有能完

全凌驾在全社会之上，自主的社会空间虽然脆弱，但一直存在。

在单一农业经济之上建立起来的王朝政治除了不断循环、重复之外，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近代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经济方式开始多样化，相对独立的工商业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农耕方式。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的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其实那只是一种未开化状态或者说蒙昧状态下的自由，一袋马铃薯式或一盘散沙式的自由，说到底无非是一种“帝力于我何所有”的古代散漫，是汪洋大海一般的小农分散的自由，是刀俎之间随时都为鱼肉的自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在那样的时代，实际上没有社会，只有覆盖一切的王朝，民不过是跪着的子民，一切秩序、名分都界定得清清楚楚。在科举时代，教育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就是为帝王服务，所有的文化也是为帝王服务的文化，不需要另外的思考、创造，自由的种子在这样的土壤中是长不出来的。

龚自珍为旧的农业文明社会唱出了一曲凄婉的挽歌，“衰世”中国，连才盗、才工都不可得，更无良医、良相。旧有的文明模式如果不是遭遇外来的冲击，发展到后来可能也会自然地出现变化，但不会来得这么快。钱穆曾说过，“实际上自从乾隆末年以后，社会状况已经坏极，就是外国人不来，中国内部的腐败，也逐渐会暴露出来的。”惯性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我们楞是在鸦片战争后再躺了半个多世纪，不思变化。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感叹，晚清最后15年的变化超过了以往的150年，其实何止150年，简直是1500年，那是古代向近代的全方位跨越。

报馆、书局、银行、大学、新式工厂都是舶来品，并不是从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自行生长出来的，各个文明圈之间可以相互模仿、相互启发，到了近代节奏日益加快，这也是与古代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当然中间还要经过一个消化、融合的过程，有些民族甚至很漫长。

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没有这样、那样的传统。何谓传统？传统总是从一个人、一些人、从某个时间开始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这些人出现了，我们的出版业就有了传统；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出现了，我们的大学就有了传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出现了，报业就有了传统；蒋抑卮、陈光甫出现了，金融业就有了传统。

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没有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近代文明，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考察了少年期的美国之后对此感触尤深。人类的有限性注定了我们的生活本身才是目标，如何让大地上的众生过得更体面、更自信、更自由、更有尊严一些，是近代文明的首要追求，这也是与古代的重大差异。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不是反过来人为物役，这是近代的发现，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最基本的两个发现，就是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正是自文艺复兴开始，文明的航船向近代起锚了。近代文明的内涵之一，就是人类更加关心自身处境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不仅在物质层面，也在精神层面，关心每个人对生活的不同梦想，当然这需要制度性的保障。近代文明的内涵之二，社会要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建立在独立个体基础上的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长期以来先辈们依赖的血缘、家族、宗族纽带让位于契约、权利形成的规范，这个社会才会出现更多的可能性，合乎人性本身的多元变化。这样的内涵还有很多。从古代进入近代，不是单纯的时间演化，而是文明形态的转换，一个以个人为主体的文明社会渐渐浮出历史的水平面。

由胜利者单独书写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它很容易忽略胜利以外的东西，无视其他人和事的存在。没有悲壮的失败者，没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人，没有那些怀抱灼热理想、贴着地面行事的人们，这样的历史至少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一部只有拿破仑、希特勒，没有贝多芬、莎士比亚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托尔斯泰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止是几百年一遇的个别大人物的历史，他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揭示了这样一点，在拿破仑、亚历山大、库图佐夫他们之外，那些参加战争、焚烧莫斯科、发明游击战的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们往往被忽略，而他们恰恰都是极其重要的。《世界史纲》以专门章节介绍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何兆武先生盛赞韦尔斯的历史眼光——“难道像贝多芬这样光辉的名字在历史上的地位竟然比不上同时代的塔勒兰（法国外交部长）和卡斯勒累（英国外交部长）之流的政客们的地位吗？”我很喜欢这句话。

这就牵涉到历史的坐标系问题，如果以文明为轴心，以人为本位，而不是以成王败寇为准绳，这一切乃是不言而喻的。在这样的天平上，王侯将相、盖世枭雄、达官贵人的分量远不如一个有良知、有创造力的诗人、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西湖

作家、学者、科学家、实业家，占据优势资源的强者和无权无势的弱者，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公平可言，在历史天平上应该可以找到公平。以往的历史书中充满了宏大叙事，我们只能看到血肉横飞的战争、你死我活的权争，一切都以权力宝座、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史书的版面总是慷慨地提供给英明神武、能以超级暴力击败所有对手的几个人身上，关注军阀也只是关注他的武力大小，似乎他们在创造历史。一部中国近代史好像就是打打杀杀，主导历史的人物总是军阀、枭雄、造反者，也就是拿枪的人，他们被当成了绝对的主角。拉长历史的镜头，从长程来看，他们的厮杀、权谋，他们的翻手云、覆手雨，王朝的更迭，流血和不流血的政变，铺天盖地的大规模风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壮阔战场，一浪接一浪的动荡，张献忠式的无情杀戮、“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南京大屠杀……这一切固然都要载入史册，但这些历史记录，作为事实发生了，这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汇合，是历史三峡中的急流险滩，更多的只是提供历史的背景。这些历史本身并没有意义。

反对历史主义或者说历史决定论的波普尔反复阐明历史没有意义、没

有目的，当然他同时也指出，“尽管历史没有目的，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的赋予其上；而且，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换言之，正因为历史没有意义，所以才需要我们赋予它意义。他说，自古以来，只有英雄、“主角”有资格进入历史教科书，“而无数的、和那些少数人一样有价值的人，总是被历史遗忘，或许他们才更有价值。”

放在文明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以胜败论英雄者，以暴力和计谋受到欢呼 and 膜拜者，给历史提供的往往是负数，而不是增量。我更关注那些真正推动了文明进步和社会转型的开创性人物，他们散布在各个领域，未必是强势者，但他们的出现是为历史做加法，不是做减法的，他们才是历史的增量。我把这一思考称为“历史的增量观”。

在这一尺度下，谁是历史的主角？光是说人民，太抽象了，人民毕竟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我相信，真正的主角是那些默默耕耘、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如果说王朝的兴衰、战争的胜负、权力的消长进退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那么在大地上不倦耕耘、种瓜种豆的人，相对而言，他们能收获什么，有着更大的确定性和必然性，他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把握自己，尽管大的历史环境影响着他们，甚至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包括虐杀他们的生命，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面对自己的生活时，更为从容而镇定，他们所耿耿于怀的不再是水泊梁山的交椅，也不是指向金銮宝殿，他们是创造文明、推动文明的基本力量。一句话，他们是有思想的芦苇，他们通过自己的生活、思想获得人生的意义。

他们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知其可为而为之，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们做的是播种的工作。在近代中国转型期，他们在多个层面付诸了实践，政治制度层面，从维新变法梦到君主立宪梦，再到宪政民主梦，一个接一个的梦都破灭了。思想精神层面，他们引进不同的思潮、学说、主义，在千年不变的儒、道、法等话语之外，他们引入了陌生的新因子，尝试和实践，喜悦和欢欣，失败和无奈萦回至今，烟云不散，是金子最终还是会发光的。在社会、经济层面，他们拓展出了教育、科学、出版、新闻、实业、金融、企业等一个个全新的领域，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实绩。这些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之间相互交叉、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着千丝万缕

的关系。

古代向近代的转型，不光是一种制度的转换，而且是思维方式、语言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转变，千年不动的以农村、农业为基础的旧有社会结构，开始转向以城市、工商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结构，这中间带来的变化、痛苦都是古人难以想象的，转型的艰难更是无法预言的，据说能预知王朝兴衰循环、刀兵浩劫的“推背图”、“烧饼歌”正在失灵。



1841年，杭州这方水土养育的一代才人龚自珍猝然离世，他生前已呼吸领会到旧文明的衰亡气息，直接提出了“衰世”的概念。

1949年，“时间开始了”，生在杭州、长在杭州的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黯然告别他热爱的中国。

西湖真是浓缩了一部激荡的百年史，我很想把这本书叫做“西湖版”百年中国史，就是试图以西湖为平台，围绕着西湖边走过的、与西湖有关的人事重新认识这段风雨苍黄的历史，这一百多年的中国正处于摆脱“衰世”的进程中，怀抱各种梦想，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播种的民族精英们，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文明转型，使老中国早日步出“衰世”，迈入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文明时代。他们做的一切，无论成败都已在西湖边定格，他们身后的墓址、故居和一切文字都已成为百年见证。湖山虽好，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先人的足迹、眼泪和欢笑，他们的热血、智慧和辛劳，那也不过是我们闲来休憩之所，不会有兴亡之慨，不会有物是人非之叹。

西子湖头，曾来过多少权倾一时的公侯，叱咤风云的军阀，从卢永祥到孙传芳，从张静江到蒋介石，还有类似杜月笙、王晓籁等流氓大亨都曾在西湖边圈地建别墅，南山路到北山路到处是摩肩接踵的别墅，“澄庐”、“静逸别墅”、“青白山居”、“九芝小筑”……我更有兴趣的不是这些人，在文



● 雷峰塔倒塌前的西湖

明史的视野中，在增量历史观下，我注视的是生前并无显赫权势的龚自珍、胡适、竺可桢，一笔在手的邵飘萍、史量才……正是他们才把一个老大民族带入了近代文明社会。他们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人。一部通向希望之门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他们书写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的转型是从张元济、蔡元培、张謇、汪康年等人开始的，这一代读书人都是自科举之路走上来的，他们是进士、翰林甚至状元及第，但他们在 20 世纪前夜告别朝廷，转向社会，成为出版家、教育家、实业家、报人，这是一个全新的变化。在他们之后，随着 1905 年废科举、兴新学、派留学，一个新型的知识阶层在中国破土而出，他们各走各的道路，拓展出了新的社会自主空间，建立起新的尺度。

那些怀抱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新闻救国、教育救国、思想文艺救国等梦想的人们，他们的努力，在相当一个时期，确是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有些已在茁壮的成长之中，受到世人的瞩目，比如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学府（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大、浙大、燕京，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学），那些报纸（《申报》、《大公报》、《新民报》等），那些出版社（商务、中华、开明、世界……），那些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如果不是有人为“工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的破灭而兴奋，如果它们不是被一次次地连根拔起，或者永远消失了，它们早已是遮天蔽日的大树，



●20世纪30年代的澄庐

而我们已经可以在文明的树荫下享受。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这么收获，先那么栽”，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这是胡适喜欢的谚语、格言，他最后一次来到西湖，还在浙大演讲自由主义，耿耿此心，就是要将陌生的文明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所以他才会那么用力、用心地在中国传统中寻找自由主义的因子，寻找可以与近代文明接轨的东西，一首诗，一篇文章，一个小故事，哪怕是片言只语。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见解，却否定不了他的诚意、真挚和热忱，他确是一个播种者，在底线意义上为古老民族提供了基本价值。

一部近代中国史或者说文明转型的历史，说到底，是他们书写的，比起那些或打打杀杀，或权谋诡计，你方唱罢我登场，争舞台、争交椅的皇室贵胄、军阀政客，怀抱各种梦想埋头苦干、拼命苦干、得寸进寸、咬定青山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的结局虽然悲壮、伤怀，但回过头来，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在思想文化等领域耕耘的胡适们，他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而大大小小的权势人物都已如烟而去。1936年1月9日，胡适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在他们身上已有公民意识的萌芽，在主角意识和配角意识之外，他们在紧贴地面的生活实践中确立了群角意识，不再把目光锁定在单一的权力舞台，他们选择了社会而不是庙堂，不再陷在主角之争的泥潭中，挣

扎一辈子，他们的人生理想与古代有了本质的区别，他们带来了近代，也代表了近代，他们通过知识获得了解放，而且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无论是实业报国、科学报国、新闻报国，还是教育报国，报国的前提首先就是把自己铸造成器，那就是先要成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有可能扮演合格的社会角色，成为自己期待的那个角色，做一块文明的基石。我在西子湖头写下的这本书，就敬献给他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 (英) 卡尔·波普尔，郑一明、陆衡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2. (英) 卡尔·波普，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 年版。
3. (英) H·G·韦尔斯，曼叶平、李敏译，《世界史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年版。

龚自珍与魏源，一个生在杭州，一个葬在杭州，毫无疑问，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中国人，然而他们一生的命运、全部的遭遇足以证明，古老的农业文明时代已处于无可救药的末世，龚自珍称之为“衰世”，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古老民族遭逢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是来自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的挑战，一个陌生、全新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并没有惊惶失措，龚自珍主张“自改革”，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内心无比焦灼、忧虑，姿态却是镇定而从容的。他们位不居庙堂，仕途坎坷，命运多舛，可他们目光远大，心怀天下，与同时代出类拔萃的大臣林则徐辈相比，他们更为超前，更不必说道光帝及其他庸庸碌碌的达官贵人、公卿大臣。龚自珍预感到暴风雨的来临，预感到地层下的山呼海啸，魏源以老迈之身直接看到了鸦片战争的一幕。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龚自珍、魏源，还可以包括编撰《瀛寰志略》的徐继畲等人，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的隐忧，要到19世纪末，也就是过了近60年后，经历甲午战败的惨痛挫折，才真正引起举国上下读书人的震动，逐渐将告别“衰世”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此前大家都还在老办法中打转，在什么都貌似“盛世”的“衰世”中混日子。换句话说，在龚、魏谢世半个世纪后，告别“衰世”的努力才真正开始，或者说找到了方向感。在此之前，朝廷内外还沉浸在削平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同治中兴”的梦幻中，王朝仿佛出现了一种回光返照，洋务运动虽然是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落实，然而只停留在表面的器物这一层，在制度、观念层面的认识上，掌握权柄的人们和醉心于八股的人们完全是一片空白，压根还没明白西方在“长技”背后，支撑着“长技”的那种制度文明。近代文明转型的进程至少耽误、延缓了半个多世纪。

◆◆◆◆◆

第一篇

龚自珍、魏源：告别“衰世”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今天很多人知道龚自珍和他的诗，大概都是因为这首熟悉的青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的这些名句也都传诵不衰，不过人们想起这些诗句时并不一定联想到龚自珍。当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还是他在杂文、时论中所透露的光和影，那些不见容于那个时代的思想，那些洞若观火的判断。尽管他还想象不出新、旧文明碰撞的浪花，没有看到更大、更辽阔的世界，没有预见新文明的模样，但他知道“衰世”已走到尽头，他要为不死不活、无良医、无良相、连合格的小偷也产生不出的衰迈文明画一个句号。

青年梁启超说，19世纪末，当时代变革之际，向往新学的读书人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一个崇拜龚自珍的时期，他自述在南国花城初读龚自珍文集，“若受电然”。这种内心深处的强烈震撼，如同一百年后我初读哈维尔文集的体验。龚自珍的表述方式、概括力，对时代的穿透力，他提出深刻命题时的举重若轻，他的敏锐，他的风流洒脱的精神气质，他鹰隼般锐利的目光，使他穿越了那个时代花团锦簇的表象，看到了本质上的糜烂、平庸和无聊。他要唱出自己的歌，尽管歌声里依然弥漫着农业文明的气息，这是他无法超脱的宿命。但他郑重而明白地提出了告别“衰世”和“自改革”

等至为重要的题目。如何告别？如何改革？他还来不及思考。在这一点上，和他同时代的魏源（只比他小2岁，但活到了1857年）向前跨了一步，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时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最先知的见解，可以说直接影响了洋务运动乃至维新运动。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上奏皇帝，将《海国图志》“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也就是希望清廷将这本书当作救国良方。22岁的康有为对西方发生兴趣，就是从阅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这些书开始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林则徐译西报、魏源编《海国图志》“实为变法之萌芽”。龚自珍和魏源，确是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波，虽未构成一个澎湃的浪潮，却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它使中国人第一次对世界有了新的、较为全面的认识，传统的“天下观”打破了，中国居世界中心的虚妄感幻灭了。近代的帷幕就是由这两个科场不得志的读书人揭开的。他们有限的思想资源，电光火石，尽管照不亮幽暗的专制长空，却留下了极为可贵的火种。

龚自珍慷慨论天下事，开一代风气，隔代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戊戌一代最优秀的人物，而且影响了更晚的苏曼殊、柳亚子、鲁迅等人。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还不是自成一家文章、诗词，而是思想上的震撼和启迪。表面上一切貌似盛世，举国上下醉生梦死，又有几个人像青年龚自珍那样感受到大厦将倾的“衰世”气息，有几个人察觉了“将萎之花，惨于槁木”，那个时代，也许只有他的笔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句子：“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

从龚自珍到苏曼殊，承接他们前面纳兰容若的词和黄仲则的诗，一样敏感地呼吸到了末世的空气，一个庞大的专制王朝呼啦啦即将倒塌，所以，他们唱出的乃是末世的挽歌。1816年，龚自珍只有25岁，他的文章议论放在整个近世思想史的平台之上却足以光芒四射。康有为推许龚自珍的散文“清朝第一”，恐怕主要不是指文采。年轻的谭嗣同对龚自珍和魏源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千年暗室，龚、魏诸人才算得上是真才。龚自珍有诗：“五十



● 龚自珍纪念馆

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在他身后 50 多年，果然发生了甲午之战，泱泱大国被邻邦小国击败，举国震惊，由此引发维新变法的热潮。



杭州是龚自珍的故乡，他的先人随宋室南渡，先到余姚，再迁杭州，到他这一代在杭州定居已有 400 年，他的《己亥杂诗》中有“家住钱塘四百春，匪将门阀傲江滨”的诗句。龚家至少从六世祖起，世代为官，从他祖父、父亲到他这三代，居京官百年之久。杭州马坡巷是他的出生地，1839 年回乡时他曾写下“马坡巷外立斜阳”一句。斯人已去，如今的“龚自珍纪念馆”并不是他当年住过的老屋，只是他家附近幸存下来的一处清

代旧宅。

马坡巷离西湖近在咫尺，西湖是龚自珍儿时熟悉的地方。在他童年时，月朗星稀的春夜，梳着双丫髻、穿着淡黄衫的他，在西湖六桥凭阑吹笛，唱起苏东坡的《洞仙歌》，观者无不惊讶，有人还写出了《湖楼吹笛图》记其事。那时他不过十来岁。1812年，他21岁，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并作词一阕《湘月·天风吹我》，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等句子，既有满腹的抱负，也传达出幽怨的气质。箫、剑是他一生的爱物，富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是他抒情的中心词之一，之后不断出现在他的诗词中，成为他传达内心世界的精神道具。

1814年春天，年仅23岁的他就经历了丧妻之痛，他把亡妻的灵柩归葬于西湖茅家埠。春夏之交，他泛舟湖上，忆及前年和妻子同游情景，伤怀不已，用相同的词牌写下《湘月·湖云如梦》。他的诗词总是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和忧患，即使是想传达内心的豪情，也总是与隐痛、不平纠缠在一起。“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这样的句子在他的诗词中伸手可摘，随处可见。

他就是踏着末世的挽歌声而来的。1792年，当他出生之时，盛世实际上已开始滑坡。那一年，天下大旱，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等地旱情尤其严重，表面上的“康乾盛世”潜伏着末世的因子，繁华如同泡沫，一个以农业文明支撑起来、盛极一时的皇权专制时代，隐隐可以听到挽歌声。就在他出世的第二年，1793年，远来的英国使节到达北京，傲慢无知、诗书风流、糟蹋了历代无数珍贵书画的爱新觉罗·弘历试图以一纸敕书拒人于万里之外。远在元朝时，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来华，曾惊叹于东方的繁华鼎盛，仰慕东方农业文明社会流淌着黄金般的富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极尽渲染之能事。明代起陆续来华的传教士也未能丝毫触动这个古老民族的神经。然而时隔数百年，当英国的船只载来马嘎尔尼一行时，一切都发生了悄悄的变化，无论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还是垂着辫子的大臣，

竟然没有人意识到，没有人捕捉到这一信号。

比魏源早生两年的龚自珍注定要成为近代思想界的第一声号角。当他在西湖写下《湘月·湖云如梦》这一年，他也写出了《尊隐》等文，在“山中”和“京师”的对比中，他已敏感到“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大音声”正在地底下运行。他自己对此文很是得意，直到晚年的《己亥杂诗》中还有“少年《尊隐》有高文”一句。

1823年，龚自珍的母亲去世，他将母亲的遗骸送回杭州安葬，在墓边种了5株梅花。他一生中手种梅花无数，常以“梅花”自况，但他的体验远远超越了林和靖“梅妻鹤子”、独善其身的隐士情怀，而是从梅花中体悟到了新的东西，深刻地看到了科举制的弊端，专制对英才的扼杀，强烈地感到了八股取士以一种僵化的模式将天下人才一网打尽的痛苦。他在1839年写出了著名的《病梅馆记》，痛击“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从而造成病梅的时代病根。由他的《病梅馆记》我想起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用大剪刀修剪灌木，将高矮不平、错落有致统统修剪得一样整齐。我还想起了长城上的每一块砖，都是一样尺寸大小。梅花也是如此。这仿佛是中国所有读书人的宿命，逃避不了被这个烂熟的登峰造极的皇权专制体制修剪的命运。

《病梅馆记》和后来的315首《己亥杂诗》一样，也是龚自珍本人一生命运的见证。早在1822年他就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其中恐怕就有自己的切肤之痛。他虽然出生在名门望族，仕途却是那么坎坷，三次乡试落第（1818年27岁那年才中举人），之后参加会试，屡试不第，1821年春就任职位卑微的礼部内阁中书。1829年，他38岁那年才好不容易在第六次参加会试时中了第



●龚自珍纪念馆内

95名。在殿试的策论中，他提出革新的主张，中了三甲第19名，赐同进士出身。接下来的朝考，他却未能入翰林，考军机处也不成，表面的原因是书法不中程式（“楷法不中程”），深层的原因还是他身上的棱角，他的思想与那个“衰世”的冲突。

1815年是乙亥年，1816年是丙子年，25岁的龚自珍曾以考史、论经、寓言形式写出《乙丙之际箸议》20多篇（“箸议”，就是私下的议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术、个性解放等方面。其中，他提出了“衰世”这个概念，把三世重新分为“治世”、“乱世”、“衰世”。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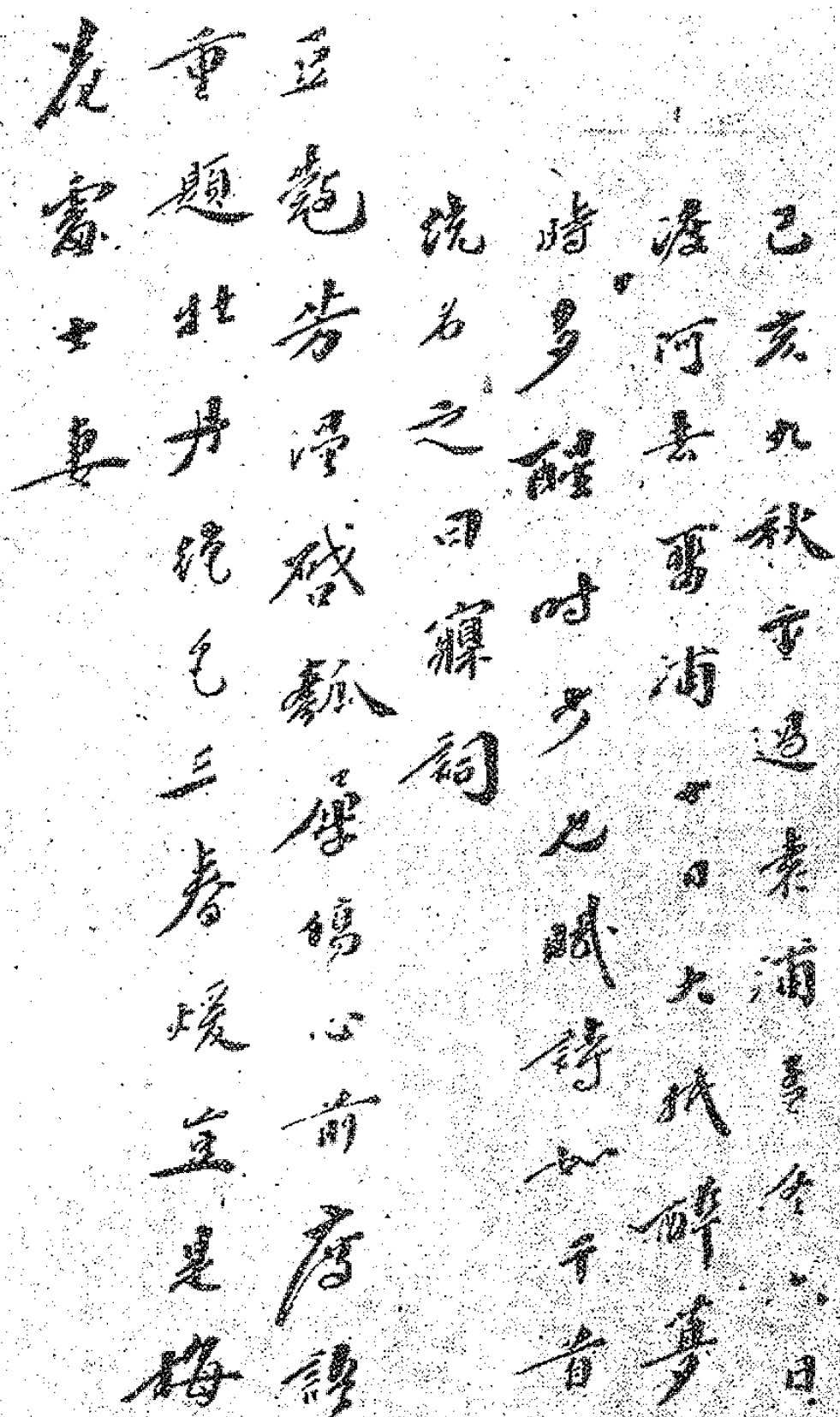
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阍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狙，藪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一片万马齐喑。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衰世”现象。敏感的龚自珍分明已感受到了“乱亦竟不远矣”。

告别“衰世”，走出万马齐喑的专制长夜，青年龚自珍在内心深处发出了呐喊。他批判摧残人性的软刀子，他相信“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的历史观，他知道“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变是正常的，不变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的。“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穷则变，变

则通，通则久”，他用《易经》的语言呼吁变法革新。1817年，他写下《平均篇》，提出调节君、臣、民之间财富关系的办法，主张遏止贫富两极急剧分化的趋势。那时清廷严刑峻法，文网严密，动辄得咎，但毕竟已到了“衰世”，像龚自珍这样叛逆的声音还能发出来，而且并没有遭到什么严厉的处置，专制的链条确实开始松动了。

1819年，龚自珍的朋友庄绶甲担心他以文惹祸，劝他删掉文章中锋芒毕露的观点，“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显然他没有接受。同样劝说他的朋友很多，到了1841年，甚至连他的同道、与他齐名的魏源也写信劝他：不要在酒酣耳热之际放言无忌，以免遭到不测之祸。言辞恳切，完全出于对老友安危的担忧。魏源深知老友的文章关怀现实，不是书斋中的无病呻吟，即使他的诗也多有忧患意识。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变动的前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前夜。英年早逝、富有史识的张荫麟说，龚自珍属于那种“先天下之忧”的志士，上下古今，经国纬民，痛哭流涕，“以开创风气为己任”。胡适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句。面对旧文明无可挽回的衰落，他感叹、他呼喊、他寻找，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时代转型的迹象，也并未作出全新的创造。但他知道，“纵使文章惊海内，纸



●龚自珍墨迹

上苍生而已”。

1838年，龚自珍曾经想随林则徐南下广东，参加禁烟行动，因“事势有难言者”而未成，他送给林则徐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及砚台一方，砚台为一紫端，背后刻摹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林则徐珍视这方平淡无奇的砚台，一直珍藏在身边，随同他风雪万里，并亲笔在背后草书两行：“定庵贻我时晴研，相随曾出玉门关。龙沙万里交游少，风雪天山共往还。”落款“林则徐”。这是林在陕甘与新疆途中所刻。龚自珍以“快雪时晴”作砚铭赠别林则徐，就是希望林能像“快雪时晴”一样雷厉风行地革除积弊，使中国早日出现“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局面。林则徐南下途中读了龚自珍赠别文章后写信给他：“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林则徐比龚自珍年长7岁，与龚父是同僚，他们早就认识。

1839年，在京城居住了近20年后，对宦海深为厌倦的龚自珍辞职南下。4月23日黄昏，他不带眷属，独自一人，雇车两辆，其中一辆载着他的百卷诗文，悄然离开北京。路经扬州时，他曾与魏源见面。船过镇江，在北固山下遇到乞求降雨的赛玉皇迎神大会，玉皇、风神、雷神俨然，祷词万数，朗诵声不绝。认识他的道士再三请求他作一首祈雨的青词，他推辞不过，写下了本文开头“九州生气恃风雷”那首著名的七绝。在镇江到江阴的船上，他读陶渊明的诗，有感而发，赋诗三首，其中一首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回到故乡杭州不久，他陪同父亲去看过八月十八日、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自1826年离开杭州北上，他已有14年未回家了，他感慨地写下了“踏遍中华窥两界，无双毕竟是家山”的诗句。世事沧桑，变化真大，亲朋中已有不少人离开人世。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已进入倒计时。

1794年，魏源在湖南邵阳出生的那年，正是乾隆禅位前一年，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的终点，也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起点，他生当其时，几乎亲眼目睹了“盛世”下滑的整个过程，对“衰世”有着铭心刻骨的体会。1825年，他32岁那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命编《皇朝经世文编》，到1826年冬天共编成120卷，成为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文献，不过那还是属于古代的范畴，是按照千年相续的传统思路编的。1826年，他与龚自珍同时参加会试，双双落第，欣赏他俩才学的考官、礼部主事刘逢禄惋惜不已，黯然题诗《伤湖南、浙江二遗卷》，“龚魏”齐名由此开始。直到1845年，龚自珍死后四年，魏源52岁那年才在补行殿试中恩科三甲第93名，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分发到江苏，先后做过东台、兴化等地的知县。“万行柳色万声莺，啼遍千门万户春。”魏源一直等到知天命之年才喜登“龙门”，难怪他要自我解嘲“中年老妇，再作新娘”。

1819年，魏源与龚自珍在北京初次见面，就气味相投（有人说他们1814年认识，但这一年龚自珍往返与徽州、杭州之间，没有到过北京）。1822年秋冬之交，龚自珍曾送魏源等到古北口长城，共赏塞上风光。1830年4月9日，魏源在北京，应龚自珍之召，参加了花之寺聚会。6月，他们又在龙树寺再聚，林则徐也在场，正是这次集会奠定了林则徐和龚自珍、魏源、张维屏等人的友谊。1832年春天，魏源应龚自珍之招，再次参加花之寺集会，到场的还有主张革新的包世臣等十四五人。这些聚会名为赏花，实际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研讨学问、议论时政的聚会。早在鸦片战争前十几年，他们就已预感到英国将可能以新加坡为基地，有侵华之举。他们主张先发制人，消除隐患，严禁鸦片，抵抗侵略。他们中有五个



●魏源画像



●林则徐画像

朋友被时人称为“薇园五名士”，龚自珍以才、魏源以学、宗稷辰以文、吴嵩梁以诗，端木国瑚以经术闻名。相同的是他们都主张“经世致用”，都赞同走革新之路。当然，龚自珍对现实要比魏源等人更敏感，对“衰世”的感受也更深，尽管他还不具备世界眼光，不知道别样的文明。

1834年，魏源应邀到江苏巡抚林则徐处，代林阅卷。1839年5月，当龚自珍南下路过扬州时，两人又有过一次愉快的见面。1840年，魏源从浙东到杭州。9月，林则徐被革职，他写了《寰海》诗一首，表示痛心。1841年春天，裕谦以钦差大臣到镇海筹办浙江防务，林则徐受命协防，魏源进入裕谦幕府，几个月即辞去。期间，他曾到钱塘江观潮，有感而作《钱塘观潮行》一诗。当年5月，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发配新疆伊犁。6月，魏源在浙江到扬州的途中，在京口与林则徐见面，对榻倾谈，思想上产生很大震动。也就是这一次，林则徐嘱他编一部《海国图志》。

当年8月，龚自珍应魏源来信邀请，到扬州相聚时，得知老友正在编《海国图志》，大为欣喜，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真学问。自京都相识以来，他们切磋学问，议论时政，特别是1826年双双在会试中落榜，“龚魏”齐名以来，关系更加密切，书信往来不断，而且时有见面，转眼已有20多个年头了。

8月5日，龚自珍回到当时栖身的丹阳书院。孰料仅仅7天后（8月12日）就在丹阳猝逝，终年50岁，那也正是英国大炮轰开国门、林则徐被流放新疆的一年。随着龚自珍的死，一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小农文明时代徐徐落下了帷幕。在龚自珍身后，自魏源等人开始，老大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开始告别“衰世”的各种具体努力。

关于龚自珍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但不同的版本都说他被人下毒，“丁香花公案”吸引了包括孟森在内的史家。（龚自珍死后，1843年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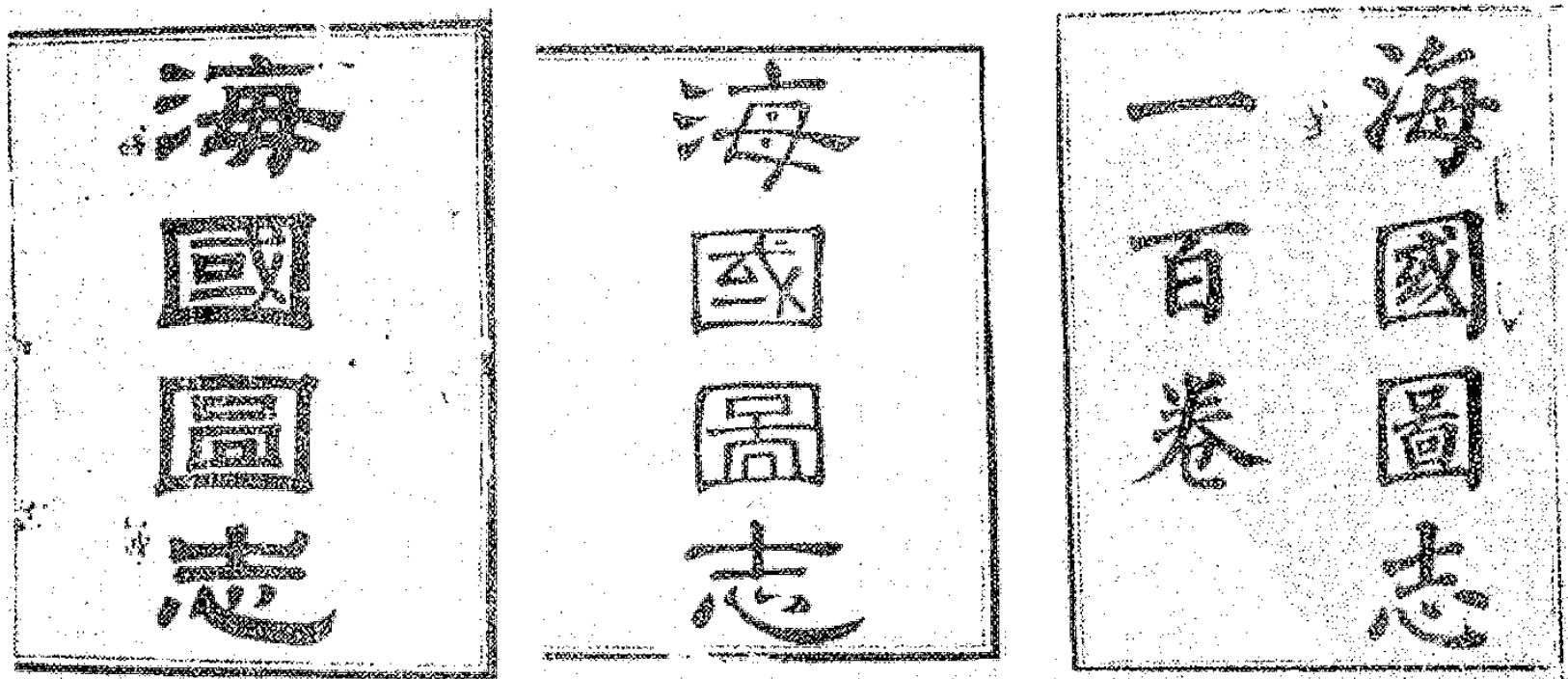
龚的儿子到扬州请魏源编定龚自珍遗作，这就是《定庵文录》12卷、《外录》12卷，序言也出自魏源手笔。）

1842年12月，魏源参考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历代史志、明代以来的岛志及一百多种中外书籍，终于辑成《海国图志》50卷。1847年，又补成60卷，刊于扬州。到1852年，参考徐继畲《瀛寰志略》等新出的一些著作，增补成100卷，在南京筹刊，成为一部有88万字的巨著。《海国图志》对五大洲大多数国家的沿革、现状都有记载，并明确提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知道靠这本书并不能驾驭外夷，“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他想到了天道、人心、人才。他认识到英国的优势不仅是船坚炮利，还包括养兵、练兵之法，“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他甚至已朦胧地觉察到了英国之所以强大的背后是制度原因，他在第50、51卷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

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即国会），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

国会分上、下两院：“其國中尊貴者曰五爵，如中國公侯伯子男，為公議之主，且城邑居民，各選忠義之士一二，赴京會議。國主欲徵稅餉，則

●海国图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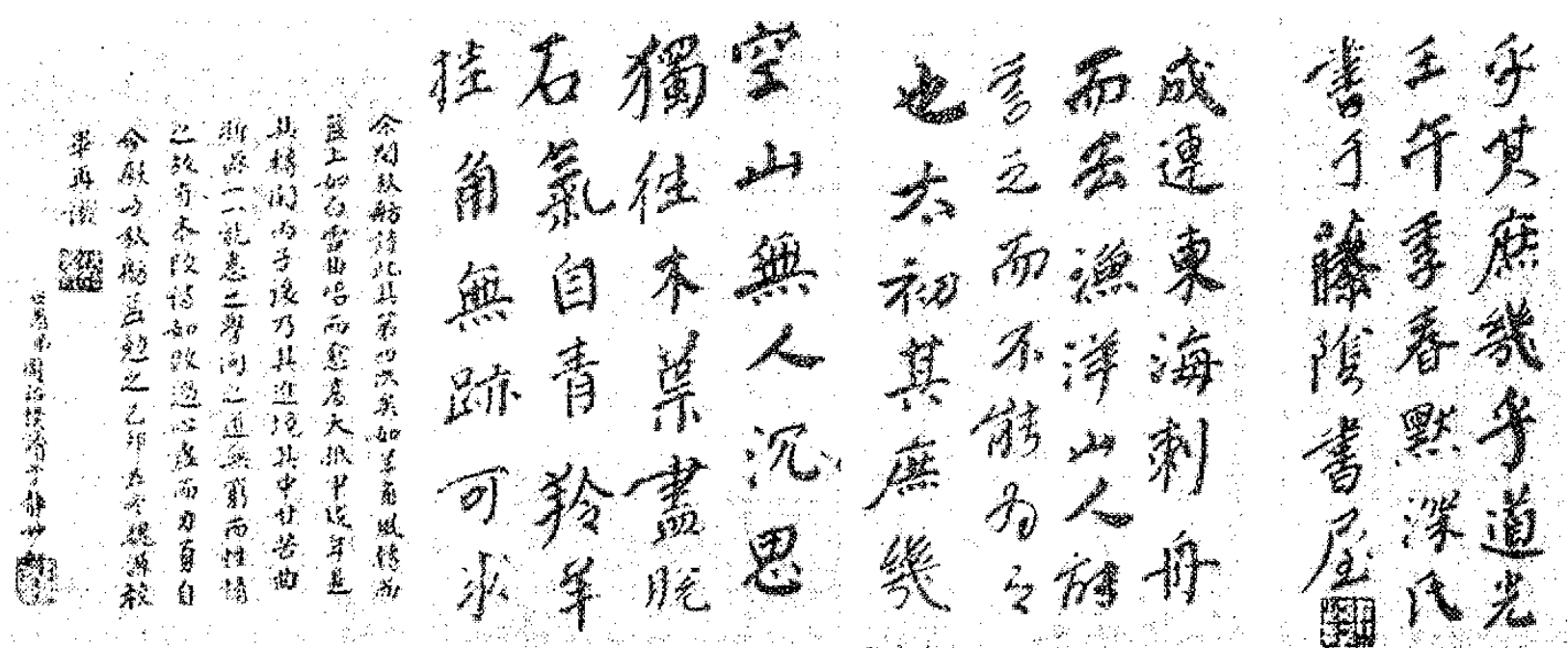
必绅士允从，倘绅士不允，即不得国民纳钱粮。”当国会与政府意见发生冲突，可以解散国会，重新选举，即使民众对国会也可施加影响：“如有按时变通之事，则庶民择其要者，敬禀五爵、乡绅之会，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

他介绍英国的报纸：“又刊印逐日报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对英国工业、贸易、交通的介绍也都很详尽。

对于美国，魏源在第59卷同意徐继畲的观点，肯定了总统制、国会制度等。华盛顿在独立战争后被公推为总统，“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不久任”。“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他在《后叙》中称赞美国的民主制：“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

多年后，梁启超如此评价《海国图志》：“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从张之洞等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魏源的影响。虽然《海国图志》还没有完全抛弃“华”、“夷”的思维定式，但魏源眼中的“夷”已迥然不是昔日迂儒心中的蛮夷，他开始意识到了中国之外不仅别有世界，而且有优先于我们的技术、制度、文明。在他之前，我们是天下绝对的中心，文明的中心，所谓夷就是野蛮、未开化的代名词。在经过了长夜漫漫之后，本民族终于有人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当然，这部书也不是没有缺陷的，比如魏源以中国炼丹术的取阴补阳等陈旧观念理解西方的天主教，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识。）

此前，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的书《坤輿图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初入中国，人们都视之为天方夜谭，不相信是真的。后来南怀仁等编印《地球全图》，人们依然不相信宇宙之大，地球上还有许多不同的文明，俨然以中国为最高的文明形态。乾隆帝驳英国使节的心态如此，到了道光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魏源、徐继畲这些人身上，情况才开始有了变化。



●魏源字迹

《海国图志》影响了近邻日本。1850年，三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马上就被封禁。1853年，又有一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到1854年，共有15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除了几部被留作御用，有8部出现在普通的市场上，以后年年都有输入，还出现了许多《海国图志》的翻刻本，有些是节选的，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深受欢迎，此后才逐渐被冷落，因为开放的日本社会有了更高的要求。

1828年，35岁的魏源初游杭州，西湖给他留下了美丽至极的印象，他曾写下十首纪游诗。他喜欢西湖，1856年秋天，当太平天国正如火如荼、江南一片狼藉时，他63岁那年最后一次来到杭州，寄宿在一处僧舍，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他闭门谢客，常常“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即使亲戚、门生前来求见，接谈二三语，“便寂对若忘”，惟独钟情于西湖的山水，曾与何绍基、金安清等各带金石书画，到西湖船舫共赏。“晴湖不及雨湖好，雨湖不及月湖窃。”“月华如水孤山孤，山影化云云化无。”他在西湖留下了许许多多早已被后人忘却的诗篇，好在历史还记得他的《海国图志》。

1857年3月26日，一个烂漫的春天，离龚自珍客死异乡16年后，魏源在龚自珍的故乡杭州一病不起，终年64岁，下葬于西湖南屏山的方家峪，他的墓至今已找不到踪迹了（新建的一个名人墓群中据说有魏源墓，但已不在原址）。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 1.(清)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 2.《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 3.魏源著,《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 4.徐继畲著,《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 5.郭延礼著,《龚自珍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
- 6.樊克政著,《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 7.黄丽镛,《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8.管林等著,《龚自珍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 9.龚自珍纪念馆编,《龚自珍研究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 10.李汉武著,《魏源传》,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离龚自珍死 50 多年，魏源死 30 多年后，经历了太平天国 14 年的动荡乱世，经历了英法联军进京、火烧圆明园，经历中法战争，直到 1894 年甲午海战，泱泱大国败于东邻的一个蕞尔岛国，被迫签定屈辱的城下之盟，又是赔款、又是割地。而当时北洋水师的实力从表面上看不仅不亚于日本海军，论吨位、装备甚至还有优势，从早期的曾国藩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致力于洋务运动已有 30 多年，最终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朝廷内外，举国上下，这才受到震动，这才有了有一种紧迫的危机感。

这个时代的年轻读书人如梁启超辈，读到龚自珍的文字，如受电击。也正是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张元济、谭嗣同……这一代读书人登上历史舞台，我们才开始真正踏上与“衰世”告别的道路。史家蒋廷黻说，鸦片战争没有惊醒中国，依然昏睡，现代化进程至少耽误了 20 年，我以为如不是从技术、器物层面看，而是着眼于制度文明的变革，至少耽误了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时间。康是 1858 年出生的，梁是 1873 年出生的，历史要等到他们出现才有了点新气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纵英才，有手挽狂澜的本领，关键还是他们生逢其时，至少他们一度报国有门，其时满、汉之分的观念已渐渐淡薄，经过满清几百年统治之后，满清皇族已汉化得差不多了。他们接受孔夫子以来的文化，康雍乾时代那样的文字狱也日渐远了。读书人的国家民族观念在鸦片战争后半半个多世纪日益高涨的危亡感中渐渐萌生。对清廷来说，甚至对中华民族来说，这都是千载难遇的改革良机。把握住了，我们的民族就可能很快摆脱“衰世”，顺利完成文明转型，闯过充满急流的历史峡谷。

在康有为们的奔走呼号之下，才有浮出水面的维新思潮，这其中也有李提摩太等异国传教士的推波助澜。《万国公报》对一代优秀中国人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一场空前的戊戌变法呼之欲出。

1898 年，而立之年的光绪帝确是历史上难得一现、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

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是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在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深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甚至慈禧太后一开始也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的变法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洵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都站到了这一边。因此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了失败。历史没有命定。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谋不臧”，康有为们急于求成，鲁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把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史事实。

发生在110年前的戊戌变法，我们以往了解的情形基本上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笔下来的，主要代表了他们这一派的说法。因为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殉难，康、梁亡命海外，继续举起维新、保皇的旗帜，赢得了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一边倒的同情。一句话，他们赢得了书写、解释那段历史的主导权。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拥有很强的宣传能力和天生懂权谋的康有为，加上“笔锋常带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放大。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获知的戊戌变法几乎就是以他们为绝对主角的，连主动变法的光绪帝都成了陪衬。其实，历史从来是合力构成的。

近些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作过许多努力，越来越多有关戊戌变法的历史细节被挖出来了。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证实，康有为确是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者，但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比如密诏不是写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伪造的，比如所谓1300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并非事实，尽管他起草的那份文稿还是所有上书中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动人心的。诸如此类的史实已变得清晰起来。

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百日维新虽昙花一现，但光绪帝下达的新政诏令就有100多件，几乎每天一件，雪片一般飞到全国各地，涉及经济、教育、工业、商业、农业、行政等各个方面，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就是要认真执行也来不及，何况多数地方还在观望中。（到9月22日，北京政变已发生，开缺回原籍江苏常熟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说：“自明发皆归电报后，络绎纷纭，新政焕然，目不暇接。”第二天，他读到21日的电传阁抄，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帘。）

当时全国18行省中，大概只有陈宝箴主持的湖南，变法诏令才真正得到了落实。其实，湖南新政的启动比百日维新还要早几年。这一变革求新的尝试局处一隅，意义却非同小可，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舆论等方方面面，从矿业、工商业到金融业，都有新的创举。这样的大手笔，在晚清中国，没有一个时期，没有一处可以与湖南相比。近代史家张朋园的《湖南早期的现代化》对此评价极高。也许后世的人们知道陈三立其人大抵是因为他的旧诗，确实，他后半生以诗名世，而追溯往事，1898年被革职之前的陈三立却是一个新人物，一个文采风流、推动新政的翩翩佳公子，与成仁取义的谭嗣同齐名。正是他辅佐其父陈宝箴将湖南新政搞得生气勃勃，到戊戌年已有一定的基础。

0309032

第二篇

“维新公子” 陈三立



湖南新政是整个 19 世纪末维新运动的重头戏之一。从某些方面看，要比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更扎实、更有望推进文明转型。史家张朋园对湖南早期现代化的研究表明，当时所开辟的途径，毫无疑问就是通向现代化之路，而且达到了一定高度。可惜一切努力都在一夜之间生生被折断了。张元济 1937 年为陈三立写的挽诗中有两句：“湘中新政萌芽日，钩党累累出汉廷。”

一代史家陈寅恪感怀身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涌上心头，晚年留下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一篇，忆及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在湖南推动改革、功败垂成的一幕，心头禁不住有无限的感慨：



●陈三立像

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

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文中，他说

得更清楚，当时参与推动变法的人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源流，不可混为一谈。其中一源以康有为为代表，“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另一源就是从郭嵩焘到他祖父、父亲这些人，“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当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他祖父正好在京，在一个酒楼饮酒，目睹火光冲天，拍桌号啕，旁边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于是悲愤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以后，在湖南与比他年长十几岁的郭嵩焘相识、结交，极为倾服。郭出使西方，因为推崇西方文明，而被守旧的士大夫视为汉奸国贼，人人欲杀之而后快。陈三立在一篇文章中对郭有过极高的评价：“痛言古今之变，得失之宜，数为夷务策讽议之，时不能用。”见过大世面、有世界眼光的郭评价陈宝箴“倜傥多才略”，在日记中称许“此公见解高出时流万万”。陈氏父子在思想上更接近郭嵩焘、冯桂芬和张之洞，早在1884年，陈宝箴就为冯桂芬倡议变法的著作《校邠庐抗议》撰序（百日维新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将此书印发1000部）。甲午消息传来，陈宝箴痛哭“无以为国矣”，屡次上疏痛陈利害得失。

陈三立一度对康有为五体投地，说“中国有此人，即亡如不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让陈三立刮目相看，神往不已，陈宝箴也“以才辩器重启超”。随着变革的展开，陈三立与谭嗣同、张通典等人的分歧日益加深，谭嗣同写给唐才常的信中抱怨陈三立和当初在武昌时“议论明通相反”，“判若两人，尤不可解”。他们的分歧有些是具体事务上的不同看法所致，最根本的还是谭嗣同更接近康有为的急变主张，谭嗣同在《湘报》上赞美过康有为。很明显，陈氏父子不认同康有为的激进态度，希望稳健地渐变，主张起用有经验而稳健的重臣主持变法，陈宝箴向光绪帝推荐杨锐，就是为了下一步推张之洞。在他心目中无所谓新旧，没有新党、旧党之见，只知道要应时势而变。

陈宝箴欣赏康有为的才，不同意康有为的学，尤其不赞成借孔子托故改制，这一点康有为也深知。所以他的挽陈宝箴诗中就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二句。1898年5月27日，对康有为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时，陈宝箴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臣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



●陈宝箴

多材，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之者。……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奏请给康有为降旨，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版本，“既因以正误息争，亦借可知非进德”，对康有为其实含有曲全之意。在附片中他表示自己与康有为素无一面之雅，只是读他的论说，认为是“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可见，陈虽对康的某些思想和冒进主张持不同看法，但

在推动变法这一点上仍视为同道，他的奏折主要还是保全康。

1898年的百日维新转瞬即逝，“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陈氏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湖南新政化为乌有，深受郭嵩焘影响的陈氏父子对康有为他们急躁冒进，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不无异议。陈氏父子也并不认同谭嗣同那种冲决网罗的思想，他们认为，不能以“宗教家心力的超度”来代替“政治家现实的变革”，在内心深处不赞同激进变革的思路。和康有为等人相比，他们的步子更务实、更稳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感叹的并不是一己的荣辱进退，耿耿于心的是渐进稳健的改革，终究因康有为代表的激进冒进路线而同时夭折，他们对康梁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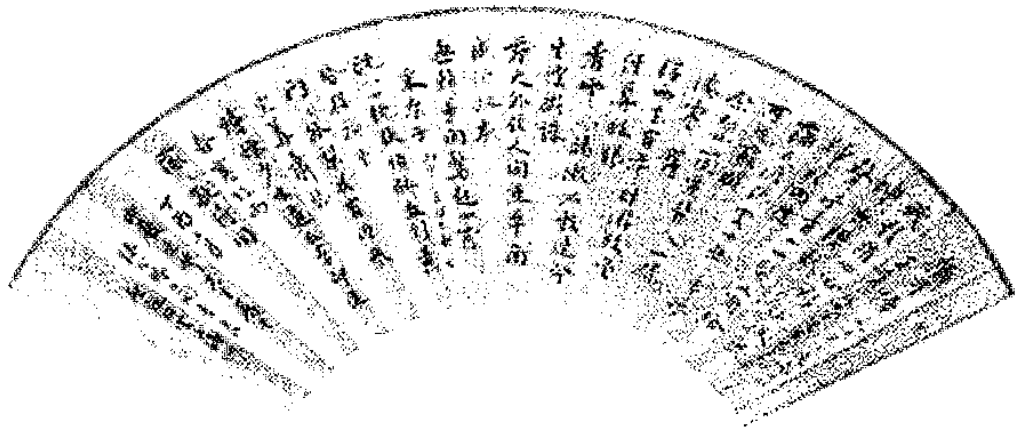
黄遵宪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说过：“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如有一般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问题在于一般老辈是不肯出来主持的，陈宝箴只是个异数，可惜偏居湖南一隅，扭转不了大局。

1900年，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试图发起勤王运动，电报密码“人名”类中有“333 三立”的字样，这个“三立”不知是否就是陈三立。据说陈三立与组织自立会、计划在长江起事的唐才常也有联系。这一年正好是他父亲陈宝箴猝然去世的年头。物换星移，当1914年夏天，陈三立与康有为在上海重逢时，清王朝已崩溃，回首往事，当年所有的分歧都已不再重要，在阅尽沧桑之后，把酒换盏，他们毕竟同为戊戌维新党人，都是“先帝旧臣”，新生的民国对他们而言是那么陌生和格格不入。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上海辛园、杭州丁家山都留下了他们叙旧的声音，徜徉湖山园林之间的身影。陈三立有诗《过康更生辛园寓所庐》，“重逢历十九年余”、“为世杀身宁有补”是其中的句子。几年后（1917年）康有为60寿辰他送去贺联，康有为70岁时他又写下寿诗。

不过，从刘成禺笔记还是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袁世凯称帝时，日本企图拥宣统复辟，在青岛的皇室旧人（包括康有为在内）一致赞同，而上海以遗老自居的陈三立等人多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是“置宣统于积薪上也”。张勋复辟，陈三立等也认为“此事宜大大谨慎，否则皇室待遇，必出奇变。段祺瑞自命开国元勋，北洋兵权尚有把握，安保无事”，所以对整个复辟“未多参与机密”。

自戊戌政变之后，直到1922年冬天梁启超到东南大学讲学，陈三立才和他在南京重逢。陈在“散原精舍”设下酒宴，特别“开五十年陈酒”，盛情款待梁启超。梁启超大开酒戒，开怀“相与痛饮”，“大醉而归”，追怀当年往事，禁不住“欷歔长叹”，伤心不已。长沙时务学堂学生蔡锷的早逝引起了他们无限的伤感，他们同声叹息“今不可复得矣”。

梁启超北还，他以“性情肝胆中人”作诗赠别，“旧游莫问长埋骨，大患依然有此身”，诗中有幸存者的苍凉意味。陈、梁晚年天各一方，互相思念对方，1926年梁启超给爱女的信中还提到“陈伯严老伯也患便



●梁启超送给陈三立的扇面

血病，但他很痛苦，比我差多了，年纪太大（72了），怕不容易好。十年以来，亲友们死亡疾病的消息，常常络绎不绝，（伯严的病由酒得来，我病后把酒根本戒绝，总是最好的事。）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溘然长逝，陈三立与张元济、陈叔通等在上海发起公祭。阅尽兴亡之后，陈三立超越了对康、梁的恩怨，他们毕竟都是维新梦中人。他们晚年的交往，凸显出内心深刻的无奈和时代的沧桑感。



陈三立最终是个诗人，是前清的守墓人，他曾致力于革新，而最后落花流水都成空，等来的是一个他不认识的新时代。在他送给梁启超的诗中，最有意思的是“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两句。戊戌政变击碎了他所有变革求新的梦想，他从此以“神州袖手人”自居，其中的痛苦难以言表，在漫长的后半生，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神州袖手人”。1904年是慈禧太后70大寿，为营造和谐气氛，清廷赦免了康、梁之外的戊戌党人，并多次有意起用陈三立，都被他一一拒绝。辛亥革命之后，面对改朝易代，陈三立一而再地哀叹“我辈今为亡国人”，“负手了今昔”、“负手视劫运”、“负手对残棋”，始终不认同新生的民国。

清朝垮台以后，在他生命的最后25年，陈三立是个旧诗人，虽然声誉很高，但终究有着浓厚的“遗老”气息，仿佛是个古董，已然是属于过去的人物。可是，在戊戌变法时代，他却是个新人物，浑身上下散发着新气息的新人，他与谭嗣同同为当时著名的“维新四公子”之一。“翩翩浊世佳公子，不学平原学太原”，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对他的嘲讽，也从某个侧面见证了他当年的事业和梦想。

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寅恪，陈家三代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义宁陈家”如今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中国近代以来，显赫一时的家族

也多矣，但多昙花一现，能绵延几代，为世人尊敬的，实在少之又少。与陈寅恪交情很深的吴宓有一番中肯的评价：“……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

陈三立生于1853年，他一生的主要功业是1895年到1898年辅佐父亲陈宝箴推行湖南新政。他是1889年的进士，曾担任吏部主事，不久辞职南下，先在两湖书院执教，受到张之洞的赏识。1895年8月，陈宝箴以花甲之年出任湖南巡抚，有了独当一面、一展抱负的机会。陈三立虽然没有职位，但在整个湖南新政中，他的功劳很大，他以公子身份协助父亲，出谋划策，网罗人才，并参与具体事务。当时很

重要的矿务总局，他虽不在其中任职，但“矿务一切为其主持”。“改革发原（源）于湘，散源（原）实主之”，这是欧阳竞无的说法。有人甚至说，湖南一省政事，“隐然握诸三立手，其父固信之坚也”。

湖南新政因时势而成，是一批有热情、有才干、有追求的人物因缘际会造成的，陈宝箴当然是中心人物，陈三立同样不可或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称陈三立为湖南新政运动的幕后主持人，不是凭空的想象。正是他和黄遵宪、江标、徐仁铸、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梁启超这“一班活活泼泼的壮年名士”，聚集于湖南一隅，成为新政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湖南学者邹代钧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盛赞陈宝箴“识

神理縣密光靈遠摩咀百家
而孤斟納怪變於蘊藉壇坫有
儒者氣象庶幾遇之戊辰四月
既望三立讀畢題記



●陈三立手迹



●徐悲鸿作陈三立画像

见为当今所无也”，他们当时的计划是以湖南为天下富强之先，并与湖北的张之洞、谭继洵联成一气，以撑东南大局。

在他们倡导下，“南学会”出现了，保卫局出现了，武备学堂出现了，算学堂、时务学堂出现了，《湘报》、《湘学新报》出现了。短短两年间，电线、铁路、轮船、电信、银行、矿务总局、银圆局、铸造钱局、官钱局、机器制造公司、电灯公司、火柴厂、煤油公司等新生事物不断冒出，而且疏通河道、建造港口，便利航运，种桑公社等农工商业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从改革书院到改革币制，从教育、新闻到实业建设，湖南新政兴盛一时，生气勃勃，开全国风气之先。

1897年成立的“南学会”，一方面培养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意识，一方面普及教育新知，常常用演讲的方式介绍新知识，内容涉及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听讲时可以发问，可以辩论，学会还有图书馆，人人可以借书。和民众接触最深的就是这个“南学会”，特别是那种通俗讲演，当时的少年范旭东（以后成为实业家）几十年后仍记得：“那时候年纪很小，住在乡下读书，只见到过一回。那天，上述各位，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讲演的时候，也不站起来，声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点不懂。我记得我只看见他们坐着摇扇子，仿佛还有一位抽着水烟，……不要笑他们腐旧，要知道那时候，凡是官府出门，就要鸣锣清道，排场十足。他们这样不同流俗，降格相从，和民众接近，的确下了最大决心。如果不是真正读通了书，而且有为国为民的心，决做不到。”

在“南学会”的示范、带动下，湖南各地各种学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除了“南学会”的分会，还有舆地学会、算术学会、公法学会、化

学会等等。很多年后，史家张朋园在《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中评价湖南新政运动：“在政治方面提倡参与，以群策群力来发挥团结一致的力量；在经济方面，力主开发富源，以提高人民生活，增强社会实力；在社会方面，提倡教育，发展人民知识，主张自由平等，期望人民皆能为国家效力。”

以开民智为宗旨的时务学堂受到光绪帝的关注，他曾夜读时务学堂章程，并特批以湖南部分盐税资助经费。1897年8月28日，第一次招生考试，录取学生40人，参加过那场考试的章士钊、杨树达等人回忆，陈宝箴亲自“监临收卷”，陈三立亲自“校阅文卷”。当年，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陈三立主张请梁启超，他说自己读过梁的文章，“其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最后请了梁。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陈三立说自己第一次读到《时务报》，“心气舒豁，顿为之喜”，认为“必能渐开风气”，此前他听说梁启超“乃旷代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事实证明，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对湖南影响很深。无论是选学生还是请先生，都显示了陈三立不寻常的见识。1922年，他和梁启超在南京重逢，谈及蔡锷，他告诉梁，当年蔡锷来考时务学堂时只有十四岁，文章不通，已经被排除在录取名单外，是他看蔡锷年少特别录取的，后来果然有大成。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阻力一直存在，1898年春天，左都御史、长沙人徐树铭在保守派的怂恿下，上疏弹劾陈宝箴、江标、徐仁铸等，要求责令撤换梁启超，另外请人主持时务学堂。6月22日，杨深秀上折（康有为代草）请褒扬陈宝箴，当天光绪称许陈“锐意整顿”。到7月29日，杨深秀再次上折（康有为代草）《请奖陈宝箴折》，同日光绪帝的上谕要求陈“务必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实际是督促陈不要有所退缩。

同年6月18日，陈宝箴保荐了“名位未显，而志行可称，才识殊众”的17人，其中包括杨锐、刘光弟、陈宝琛等，刘光弟与他素不相识，杨锐则是张之洞的门生。陈宝箴想不到，正是这次举荐将为他们父子带来灾难。当戊戌政变的消息传来，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还致电荣禄，希望能“息党祸，维元气”。9月24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谭嗣



●晚年陈三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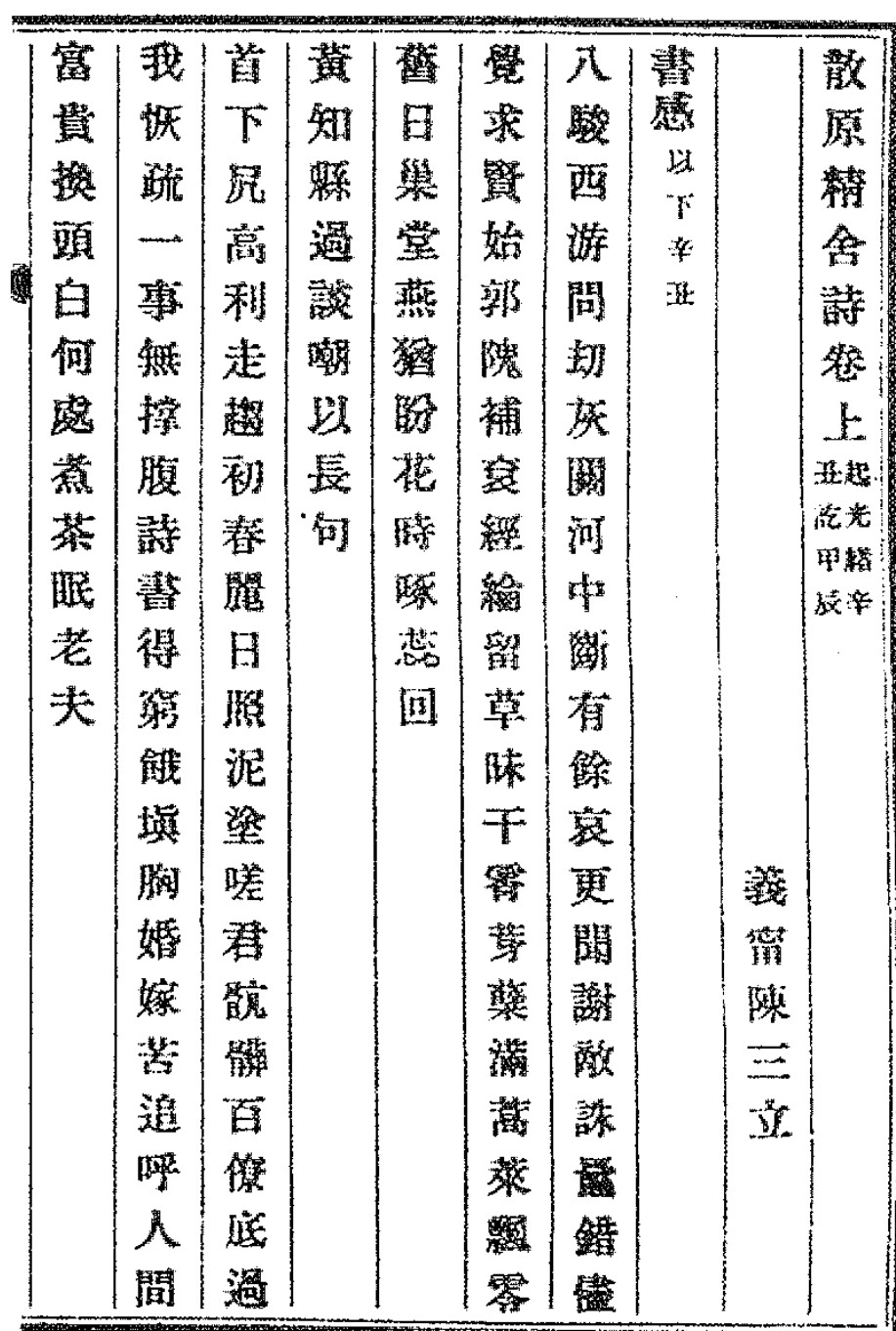
同、杨锐等“军机四卿”被革职拿办，28日“戊戌六君子”被杀。接着，张荫桓被发配新疆。御史黄桂鋆先后两次上折弹劾远在湖南的陈宝箴。10月6日上谕下达：“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同时被革职永不叙用的还有江标、熊希龄。据说这已是荣禄、王文韶在慈禧太后面前苦求的结果，否则他也有发配新疆的可能。

在移交完湖南巡抚印信后，陈宝箴一家踏上了返乡之路，父子“一生政治抱负，遂尽于此”。陈三立忧国之念虽未泯灭，从此“不再与闻政事”。当年陈寅恪只有9岁。1965年与1966年，离陈寅恪生命的终点已近，他写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对祖父和父亲亲历的维新事业和悲剧命运有过冷静的记述。湖南新政的实绩确是陈氏父子齐心协力造成，梁启超说陈宝箴在湖南的治绩“多其（指陈三立）所赞画”。他们父子被罢黜后，有人以为陈宝箴为儿子所误，王闿运叹息“江西人好听儿子说话”，并从宋、明历史中找出依据，说王安石变法时，遇事都由儿子主持，严嵩当国，也唯儿子世蕃之言是从。这不过是江西人的惯例，不值得奇怪。对陈氏父子的谣言从没有停止过，陈三立主持矿务，一位朋友谋职被拒，心怀怨望，在陈家落难后，写匿名信嘲讽：“翩翩浊世佳公子，不学平原学太原。”陈夫人俞明诗看了，微笑说：“此二句却佳。”陈三立被誉为“晚清四公子”之一，与谭嗣同齐名。戊戌变法失败对陈家的打击之沉重是外人难以体会的，陈三立再也未能恢复元气。但是，有了湖南新政的那一幕，他就将永远站立在历史中。



1900年夏初，70岁的陈宝箴猝然逝世（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历史公案，有人考证说他是被仓皇西逃的慈禧赐死的）。往事如烟，世局如棋，“乾坤泡幻局如棋，独立苍茫事可悲”，这位不以诗名的前湖南巡抚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湖南新政的进程不幸因戊戌政变而中断，但陈三立他们的努力已载入史册。在漫长的后半生中，陈三立时时回望橘子洲头，想起那段倾注了他们父子全部心血的历史。

陈三立30岁时就受到有世界眼光的郭嵩焘看重，日记中称他“年甫及冠，而所诣如此，真可畏”。郭嵩焘对他们父子的影响，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影响最为深远。1898年，世人都说守旧的荣禄还保举陈三立应经济特科，英国人濮兰德与白克浩司的《慈禧外纪》中说：戊戌4月23日，“荣禄力荐一维新人物于帝，乃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此事言之极有趣味，盖欧人皆谓荣禄始终反对变法也，观于此，则知荣禄初亦非坚持反对者，其后情势所迫，乃成势不两立之势。虽其前日所力荐者，亦不得不反而为仇矣。此非荣禄忽然变其政见，乃当前维新党人，自趋于危险之地，且其所行，太出人意料之外也”。陈寅恪说：“慈禧外纪所言，或非无因。”同年5月，内阁学士张百熙奏保17人应经济特科，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唐才常、杨锐、汤寿潜、宋育仁等都在名单上。江苏学政瞿鸿禨还将陈三立列为《保举经济特科片》首位人选，评语中称他“学有本原，宅心正大，于中国政治、外洋情势均能洞彻，识量宏通”。7年后，时势已变，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总监宋恕在《推荐国文学堂监督人选禀》，共推荐14人，称陈三立“学行之优，世所共信”，名单上其他人包括蔡元培、汤寿潜、孙诒让、严复、陈黻辰等。第二年，学部保举的33人中他又榜上有名。严复与熊纯如的私人通信，臧否人物往往不留情面，却多次推许陈三立“学问行



●宣统二年刊《散原精舍诗》书影

谊，性情识度，令人低首下心”，虽“具新学识”，然“游于旧法之中，行检一无可议。”民国元年，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请陈三立前往任职，他坚辞不去。

也许从后人的眼光来看，以陈三立的学识和名望，大半生都耗费在没有多少意义的旧体诗上，实在是一种浪费。他的诗是咏叹、是抒怀，是一曲正在逝去的农业文明的挽歌，他曾参与变革，试图把“衰世”中国带出旧日的农业社会，在湖南兴学、办报、开矿、建厂、组织保卫局，都是近代的产物，一旦这一切化为乌有，

他实际上有点自暴自弃，他的诗中弥漫着一种理想破灭后的悲哀与苍凉。他的思想停留在维新时代，甚至倒退了。但有两点不能忘记，第一，他曾亲身参与了文明转型的实践，正当年华作为举世有名的“维新公子”做了一番事业，他的作为已融入了整个现代化的进程。第二，他身上有一种不为利禄所动的人格力量，是古老文化传统中有价值的一面在转型时期的延续和传承。

自戊戌变法失败，惨遭变故以来，他的满腹抱负都化为流水，陈三立只能诗酒自娱。在晚清，他是新人物，在守旧派看来不合时宜；在民国，他是遗老，依然不合时宜。他的诗名越显赫，就越是显示出他内心的悲凉。欧阳渐评价他：“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抑郁发愤而一寄于诗，乃至丧命。彻终彻始，纯洁之质，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亦不可以诗人概也。”

1923年6月29日，陈三立的夫人俞明诗病故，接着，8月7日，他们的儿子、以绘画知名于世的陈衡恪（师曾）也撒手而去。接连的丧妻、丧子之痛，使70老翁不堪忧伤，三个女儿很为他担心，送他到杭州西湖边休养。1925年，他在杭州西湖畔的九溪十八涧、牌坊山下为夫人、儿子选定墓址，而且准备自己将来也葬在那里，他献给亡妻的挽联说：

一生一死，天使残年枯涕泪；何聚何散，誓将同穴保湖山。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拖着衰迈病体的陈三立正在北平，亡国的忧虑笼罩了他生命的终点，他日日关心战况，幻想着奇迹发生，捷报传来。8月8日，日军入城，他拒不服药，甚至拒不进食，支撑到9月14日，“忧愤不食而死”。临终之际，他还发出这样悲愤的疑问——中国人岂能猪狗不若，“终将帖然任人屠割耶”？物伤其类，1937年10月14日，远在上海的张元济给陈寅恪的电文说：“戊戌党人尽矣，怆痛何极。”

山河破碎，直到1948年陈三立才得以了却归葬西湖的心愿。从此，西湖牌坊山下成为陈家永远的托梦之地。

陈三立先后在杭州租房住了几年，他的诗集中，有很多与西湖有关的诗。1924年春天，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杭州登门拜访他，王统照在《晨报》发表文章记下了这次盛会：“（四月）十四（泰戈尔）赴杭，十六在杭讲演一次，十七号快车返沪。……在杭时，有人介绍陈三立与之相晤，合拍一照。对话时，由（徐）志摩口译，但所谈有限。陈氏七十余岁，与六十余岁之泰氏相较，其康健非泰氏可比，当泰氏索其诗册，陈甚谦逊，连言不可相比，终未相送。”两个语言不通的亚洲诗人在西湖边会晤，身后少年诗人侧立，一时被传为文坛佳话。第二年10月10日，上海《申报》推出“国庆纪念增刊”，还特意刊登他们两人的合影，题为“今代亚洲二诗人合影”。

陈三立留在杭州的痕迹，大概只剩下牌坊山下一片茶园中的墓穴，寂寞地守望着日起日落。在美丽的湖山之间，陈三立之墓并不是一个景点，如果不是他有个以学问人格为读书人追捧的儿子陈寅恪，他已差不多被遗忘了。陈寅恪生前也有归葬西湖父母、兄长之旁的想法，他女儿陈美延证

实，一代史家归葬杭州的宿愿，多年来虽屡经申请，终于未果。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
2. 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3. (清) 陈宝箴著，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中华书局，2003、2005 年版。
4. 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5. 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6.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7. 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
8. 叶绍荣，《陈寅恪家世》，花城出版社，2001 年版。
9. 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年版。
10. 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 年版。

第三篇

不悔与悔：“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

一 “徐徐云尔；陈陈相因”

“徐徐云尔；陈陈相因。”

“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徐氏父子，陈氏父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以这样的对联嘲讽被革职查办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徐致靖、徐仁铸父子。陈家几代人杰，徐家则被称为“父子三翰林”（徐致靖和儿子徐仁铸、徐仁镜都是翰林）。

自 1897 年徐仁铸于南下长沙，接替江标出任湖南学政，陈家与徐家的命运就已经呼吸相关，密不可分。徐仁铸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合力推动湖南新政。徐致靖与整个百日维新关系很深，他先后上折子保举的六个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袁世凯，他之所以获罪就是因为举荐了康有为等五人，差一点成了刀下鬼，但对此他终生不悔。对于保荐袁世凯，他一生痛悔不已。他的余年，就在这样的不悔与悔之间度过。

1898 年 9 月 28 日，谭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鲜为人知的是慈禧太后最初要处斩的不是 6 个人，而是 7 个人，第七位“君子”就是当时官至二品的礼部右侍郎徐致靖。因刀下仅存，所以他晚年在杭州，别字“仅叟”。

二 刀下何以仅存？

“戊戌七君子”怎么成了“戊戌六君子”？徐致靖何以能不死？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9月24日，九门提督署到徐府抓人时，正值徐致靖外出，一回家，他就自行到刑部投案，并无惊慌失措。

他的官职比“军机四卿”要高，又保举了康、梁、谭等人，还上过许多变法改制的奏折。入狱之后，他自以为必死，9月28日，他得知要处决一批犯人，穿好官服等候上路，几个子侄也准备带上棺材在菜市口等候。因为侄儿徐仁录去路上迎接从长沙北来的徐仁铸，徐仁镜呆了，不能说话，只有侄儿徐仁铨一人赶到菜市口：

看见人山人海，纷纷谈说：差使（按为当时口语，即处决人犯的官卒）出来，头一辆车一定是徐致靖。霎时间，听炮声，远望顺治门洞里，涌出一支人马，街上人喊道：差使来了。又听见有人喊道：很奇怪，怎么头一个新犯是谭大人呢？（许姬传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35页。本文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来自此书）



●外孙回忆徐致靖的书

只见第一辆囚车上是谭嗣同，第二辆是杨深秀，第三辆是杨锐，第四辆是林旭，第五辆是刘光弟，最后一辆是康广仁。

徐仁铨目睹大刀王五收了谭嗣同的尸。人散了，也没见伯父被绑出来，只好把棺材先寄存在原来的店中。回了家，见仁镜还瞪着眼呆立在门口，赶紧把他拉进家，告诉他今天没有事。

这一史无前例的惊天大案刑部不

敢审，奏请派大臣会审，结果突然下旨处斩，越过了当时所有的法律程序，刑部官员都很惊讶，连《大清律例》都不顾就要杀人。

徐致靖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原来是李鸿章“重托荣禄”，才保住性命。徐、李两家渊源很深，外人不知。他幸免在狱，读书养性，并没有后悔自己卷入维新运动，对前去探监的侄婿言谿博说：“我们主张变法改制，效法明治维新，可谓对症下药，虽然没有成功，但我相信，将来还要走此路，这是大势所趋，少数人阻挠不住的。”狱中，《祭六君子文》《续正气歌》的腹稿都打好了，等他到杭州住下，才默写出来。在狱两年，精通中医的他常为犯人治病，救活了不少人。八国联军进京，全部犯人释放，他不愿走，“我是大清国的犯官，判我绞监候，现在外国人开监放囚犯，我不能听他们的命令”。一直等到监狱的伙食都停了，他才肯出来，并请刑部尚书贵恒代奏请命，两个月后，得到西安来的赦旨，才经天津航海南下，在杭州姚园寺巷定居。这个房子是徐仁铸在戊戌事败母亲病故，扶柩南归后的定居之所。这年8月等到父亲出狱南下时，他已患肺病去世，“徐徐云尔”，父子终于未能见面。当时有人集一联：“不孝男徐仁铸，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昧死臣谭嗣同，末学新进，罔知忌讳，干冒宸严。”

徐致靖晚年常说：“我应该跟六君子一起走，留下我有什么意思？”

在他外孙许姬传的回忆录出版前，他何以不死长期都是个谜。戊戌事发，他被捕当天，李鸿章在院子里转圈子，最后决定找荣禄帮忙：“年侄徐子静，是个书呆子，好唱昆曲，并不懂新政，你给讲个人情。”荣禄表示为难，因为徐是要犯。李再三重托“保住他的性命”。第二天，荣禄面见慈禧太后，看到判罪名单，第一名就是徐，“斩立决”，下面是谭嗣同等六人。荣禄进言：“太后英明，这些人都是罪有应得，不过徐致靖听说是个书呆子，整天在家里唱昆曲，吹笛子，他并不懂新政，恐怕是上当受骗。”慈禧太后面带怒容说：“徐致靖不是好东西，他离间我母子，你为什么袒护他？”荣禄忙跪下说：“奴才不敢，不过据奴才知道，徐致靖升了礼部右侍郎后，皇上没有召见。”太监奉命去查档，果然，光绪帝三个月内都没有召见过徐，她这才辞色缓和下来，对荣禄说：“看你的面子，叫他老死狱底吧。”动笔把“斩立决”改为“斩监候”。荣禄为表示自己费了大力才保住徐的性命，

所以对李鸿章说得很详细。是李的后人亲口告诉徐的后人的。光绪帝为什么三个月没有召见过徐？其实是因为徐“耳朵重听”，身为皇帝，还不得不防隔墙有耳。这一点张元济应召时就感觉到了。

原来，李鸿章与徐致靖的父亲徐伟侯 1847 年同时在考棚应考，李得了疟疾，文章未完成，徐去隔壁探病，李叹息“今科无望，完了”。徐问：“你做了几篇？”李说只誊清一篇，还有两篇是草稿，来不及修改就病了，拿笔哆嗦，无力完篇。徐说给我，我代你整理抄写，递进去试试。结果李一举中了进士。日后李鸿章位极人臣，徐总是当个知县，但两家的渊源非同寻常，不为外人所知。至于荣禄为什么会买李鸿章的账，在当时波诡云谲的复杂时局中，他也离不开懂洋务、会办外交的李鸿章支持、帮助。我前面提及他对陈宝箴也曾力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任直隶总督，奉旨推荐人才，开列过一个 31 人的名单，其中就有陈三立、黄遵宪这样的维新派，还有袁世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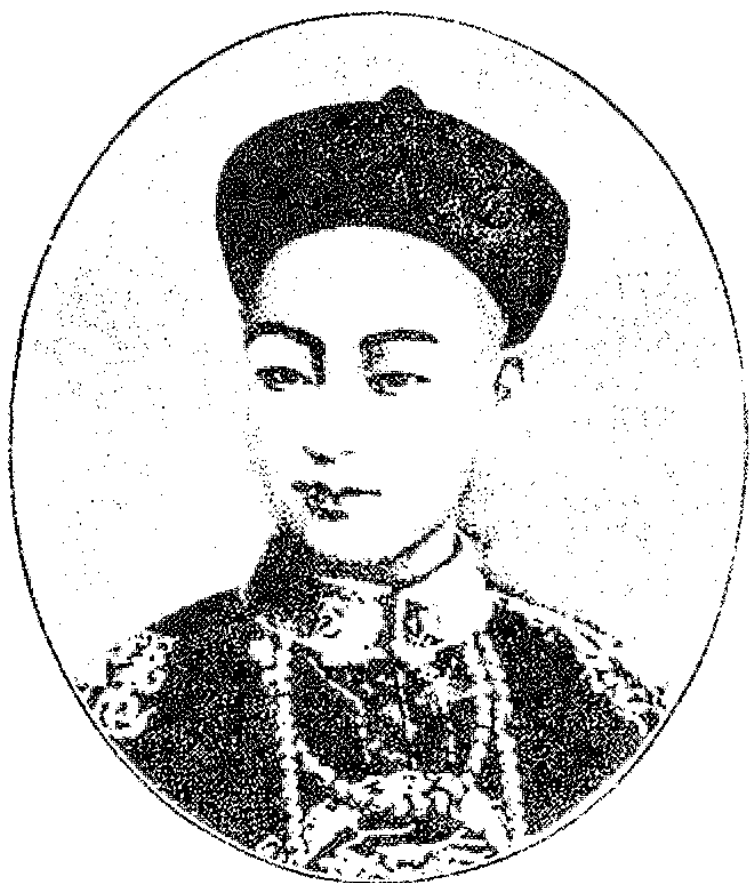
三 不悔的《密保人才折》

徐家杰（伟侯）与李鸿章同榜中进士，一直在山东等地做知县，晚年任北京金台书院山长，但因为受了洋务派影响，“主张开铁路、种牛痘，和李提摩太是朋友，向他打听英国何以能够富强的道理。他教育子弟，着重研究中国历史，还主张研究外国历史”。徐致靖从小受父亲教诲，“治经学、史学之外，留心洋务及经世之学”。1895 年，父亲病故，他回宜兴住了 27 个月，“看到外来侵略频繁，政府官吏贪贿成风，非常气愤，常说要出几个张江陵（居正）、海刚峰（瑞），才能扭转风气，不打算再做官”。急公好义、有乡望的叔叔徐憩泉劝他，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可以专折奏事，“当国家危急之秋，应该有所建树，岂可倦勤”。

年轻的光绪帝在甲午战后励精图治，试图有所作为，朝野内外志士主张变法维新、挽救危亡的呼声日益高涨。1898 年 6 月 8 日，徐致靖以翰林

院侍读学士（正四品）身份上《守旧开新请明示从违折》，提出“外侮方深，国是未定，开新守旧，两无依据，请乾断特申，以一众心而维持时局”。（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是百日维新前夕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的重要折片，史称“请定国是疏”。

三天后，即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在此后的103中，徐致靖至少还上过7个重要的折子，对变法进程有或大或小甚至关键的影响：6月22



●光绪帝

日的请废除八股折，7月7日的《请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折》，8月14日的《请开编书局折》，9月5日的《请酌置散卿折》，9月11日的保袁世凯折，9月14日保举人才折等。有人考证他的这些重要折子几乎都是康有为代草的，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他6月13日上的《密保人才折》，荐举了工部主事康有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主事张元济、广东举人梁启超共五人，建议光绪帝将他们“或置诸左右，以资顾问；或进诸政府，筹措新政”。

光绪帝当天下旨，预备三天后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据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日记，光绪帝5月26日曾向他索要康有为“所进书”，他回答自己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为何？他回答“此人居心叵测”。问他以前为何不说，他说最近看了康的《孔子改制考》才知。其实，6月15日，康、张还和已被开缺的翁同龢一起吃晚饭。16日，康有为第一次见到了光绪帝。同时，光绪帝下旨召黄遵宪、谭嗣同进京，安排梁启超在各国总理衙门。康、谭等能直接参与新政，徐致靖功不可没。也正是这一折子导致他人狱几乎丧命，“一门三翰林”统统革职。

政变发生后，徐仁铸请求代父坐牢，具折陈情：



●徐仁录、言赛博、徐仁铸

臣父一生忠厚笃实，与康有为素不相知。臣去岁入湘以来，与康有为之门人梁启超晤谈，盛称其师之品行才学。臣一时昏聩，慕其虚名，谬谓可以为国宣力，当于家信内附具节略，禀恳臣父保荐。臣父溺于舐犊之爱，不及博访，遂以上陈。兹康有

为获罪，臣父以牵连逮问，推原其故，皆臣妄听轻举之所致也。

徐仁铸为父开脱，要代父入狱，其情可嘉，他说的既有事实，又非全是事实。当时，他对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十分器重，认为梁的《幼学通议》“切实晓畅，实为蒙养之要”。徐仁铸与陈三立、黄遵宪、谭嗣同在湖南共同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徐仁铸的幕僚周善培回忆说他与谭嗣同、梁任公、黄公度“最为投契”。推荐康有为是因为谭嗣同在他面前称道。湖南新政因受保守势力的反对，阻力很大，他有“改变方针向中枢发展”的想法，他寄给父亲康、黄、谭、梁的简历，由此推动了这份《密保人才折》。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中说，徐仁铸“密疏梁、谭及康有为、黄遵宪”，“求父致靖荐达于朝”。但，徐致靖与康有为并非“素不相知”，而是早有所知。

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家汤志钧认为，徐致靖的“请定国是疏”很可能就是康有为草拟、经徐致靖修润的，除康有为自编年谱外，梁启超的《致夏曾佑书》也说到此事。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保国会，徐仁镜、徐仁录都参加了，参与其事的李盛铎也曾向徐致靖称道康的才识。徐致靖的保举人才折上去后，康有为住到徐家附近，一天三次到徐家谈维新变法的计划。当时他听康大谈《春秋》《公羊》，“非常投契”。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

吾以开会，由金顶庙迁至上斜街，与徐宅相望，日夕过从。徐君老而好学，乃至请吾说《春秋》，侧座听之，近古所无也。

徐仁镜对外甥许姬传说：“康主张君主立宪，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与你外祖的意见相同，所以很谈得来。”

9月4日，由于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受阻，引发光绪帝罢免六堂官，王照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第二天，徐致靖升礼部右侍郎（二品）。谭嗣同等四人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是百日维新的最高峰，也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举对旧大臣、慈禧太后的刺激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危机日迫之时，康有为、谭嗣同除了推动徐致靖上书光绪帝，保举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还建议光绪开懋勤殿，起用顾问官十人，请王照和徐致靖等具折保举，徐保的人以康有为为首，王保的人以康广仁为首。9月12日宋伯鲁上《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折》，9月13日，宋伯鲁上《选通才以备顾问折》，9月14日，徐上《遵保康有为等折》、王照上《遵保康广仁等折》，折子都是康有为起草的。当天，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革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172页）这才有了光绪帝向军机四章京等问计的那份密诏，其中并未提及康有为的名字。

新政风雨飘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矛盾开始激化。9月17日，光绪明发上谕命康有为迅速出京，去上海办报，不得迟延。（早在7月31日，光绪帝就命康到上海办《时务报》，康曾具折谢恩，却迟迟不愿离变法漩涡的中心北京。）当天，康到徐家吃饭，大家都劝他南行，癖好昆曲的徐致靖还唱了《长生殿·弹词》一折，苍凉动人，康说有“变徵之音”。很多年后，徐和少年外孙叙述往事，还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慨，“虽然知道新政已败，大祸将临，却都慷慨激昂，没有畏缩之态。但谈到光绪帝处境，则相对流涕，一筹莫展”。

1914年春天，徐致靖和康有为劫后余生，终于在杭州重逢，此时离戊

戊年已近 16 个年头。他外孙许姬传看到的康有为是一个头带方顶缎帽、红结子、身穿蓝宁绸袍子、方面大耳黑须的中年人。两人眼光一对，康自称小侄，抢先几步，跪倒在地，徐也跪下，两人抱头痛哭。康说杭州当道朱瑞是袁世凯的人，怕隔墙有耳，建议笔谈。康从戊戌年得到英国军舰保护安全抵达香港说起，再谈海外的流亡岁月。徐谈的是六君子被杀，刑场情况，并写道：“在狱中得年侄乔茂萱的照顾，可以读书养性，曾作《祭六君子文》《续正气歌》等，是腹稿，下次来时，抄给你看。”说到出狱抵杭州，仁铸已逝时，康写道：“研甫年兄是我党通达时务的杰出人才，与谭复生可称双杰，如他在京，当不致如此惨败。”康说，戊戌年海外误传年伯被害，曾遥为祭奠。庚子年，听说年伯获释，曾托人带银奉赠，并有几首怀念诗，回上海后，当抄寄。徐写道：“钱未收到，诗颇思一观。”

接下来，两人谈到光绪帝之死，在谈到辛亥革命时，两人渐有分歧，康留恋清室，徐则认为满人多昏庸贪贿，不亡何待。

一刀尺白纸，两人手谈了 80 多张。临睡前，康把纸全烧了，还怕烧不透，用铜尺检查全是黑灰才罢。是夜，康有为与少年许姬传同睡。以后，康从上海来信，用的是日本手卷式的信纸，每封信就像一个手卷，书和文都很精彩，平均每个月有四五封。有便人来，康还托人带些广东的盐鱼、香肠、鲜荔枝等土产。有一次，康派人送来四首诗，其中有徐还在狱中时写的：“愁云惨雾何时解，正气歌成壮更悲。”有徐获释“喜而泪下”时写的：“冤狱两年悲党锢，维新元老纪新猷。”另两首中有句：“黑劫飞灰历几年，当时同补女娲天。”“万年青史纪维新，功罪如何说党人。”徐要外孙送到店里去装裱，并一直挂在外孙的书房里。

1916 年夏天，袁世凯死后，浙江督军吕公望、警务处长夏超迎康有为到西湖避暑，住在刘庄，康邀徐同住。第二天在酒席上，康对吕、夏说徐老是度曲名家，今天大家可以一饱耳福。徐唱了《骂曹》，康欣赏唱腔，并琢磨徐文长原著的词意，不断地叫好。那天，徐兴致特别高，说：“坐在小划子（西湖的小船）里唱曲，更为清越好听。”于是大家分别上船，在湖心荡漾唱曲，盛夏之时，西湖游船很多，闻声纷纷靠拢，直到 11 点，才曲终人散，尽兴而归。康带了女儿和女婿，徐带了两个外孙，在刘庄住了一个

月，这是他晚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天旋地转沧桑变，世异时移流水悠。”徐作了一首七古长诗《七月既望夜宴刘庄酒后狂歌为南海寿》送给康有为，倾诉 19 年来的政变风云，壮怀激烈和流亡入狱之苦，其中有“贼臣卖主终卖国，甘心湛沉吾神州”之句，这个“贼臣”就是他曾密保、后半生耿耿于怀的袁世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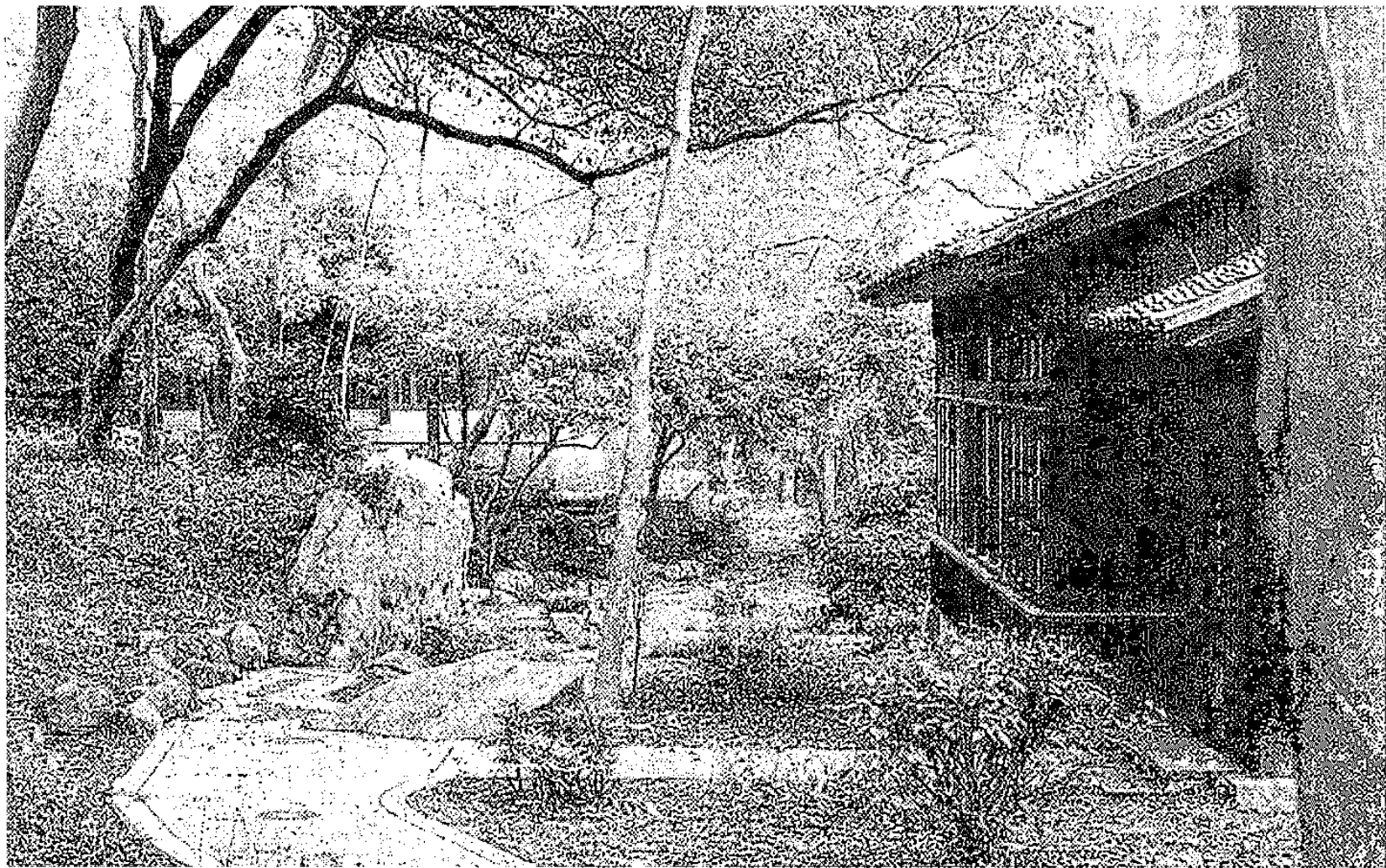
刘庄的夏天让康有为生出了住在杭州的念头，1917 年他买下西湖丁家山一带三十多亩地，耗银四五万两，历时四年，在 1921 年建成了“一天园”，杭州人习惯叫“康庄”。正是在这里，年过花甲的康有为娶 19 岁的农家女张阿翠为六姨太，成为茶楼酒肆的谈资。他自题“康庄”联曰：

割据湖山少许，操鸟兽草木之权，是亦为政；
游戏世界无量，极泉石烟云之胜，聊乐我魂。

附近的山崖上题词，现在看到的“蕉石鸣琴”等都是他的手笔。1927 年康在青岛去世后，“康庄”逐渐衰败。

徐致靖上折子保举谭嗣同，谭因病迟迟未能进京，徐去电催促，到农

●康庄



历七月才姗姗来迟，从那时起，谭几乎天天到徐家，或商量变法的事，或听昆曲，常请徐唱《长生殿》的《酒楼》一折，康有为则喜欢听《单刀赴会》中的“大江东去浪千叠”。

变法事败，康有为出走，谭嗣同和梁启超、徐仁录乘一辆骡车到了日本使馆，谭与日本参赞笔谈：“梁启超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自己则“义不应避死”。

“与谭最投契”的徐仁录说，“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豪杰，联袁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被捕前一天，谭嗣同去看林旭，林问：“你走不走？”谭回答：“我不走。”林说：“我亦不走。”谭到徐家，徐致靖留他吃饭、喝酒，谭说：“变法维新失败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贼党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问：“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

徐后来告诉外孙许姬传：“谭先生在临危时，谈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杰之士。”并自责：“我对不住谭浏阳，如不保他内调，不致被害。”

垂老之年，徐致靖向外孙许姬传解释谭嗣同的绝命诗时，还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因为他的保荐，1898年8月11日，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候补出使日本（此前曾任驻日使馆参赞）。光绪帝被幽禁，黄在上海被捕，因日本的抗议两天后获释，从此隐居著书写诗，留下了《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对他当年的举荐，黄始终难以忘怀。《人境庐诗草》中有十四首《己亥怀人诗》，第一首是陈宝箴，第二首即是徐致靖：

纷纭国是定维新，一疏惊人泣鬼



●康有为手书

神。寻遍东林南北部，一家钩党古无人。

第十一首是写徐仁铸，前两句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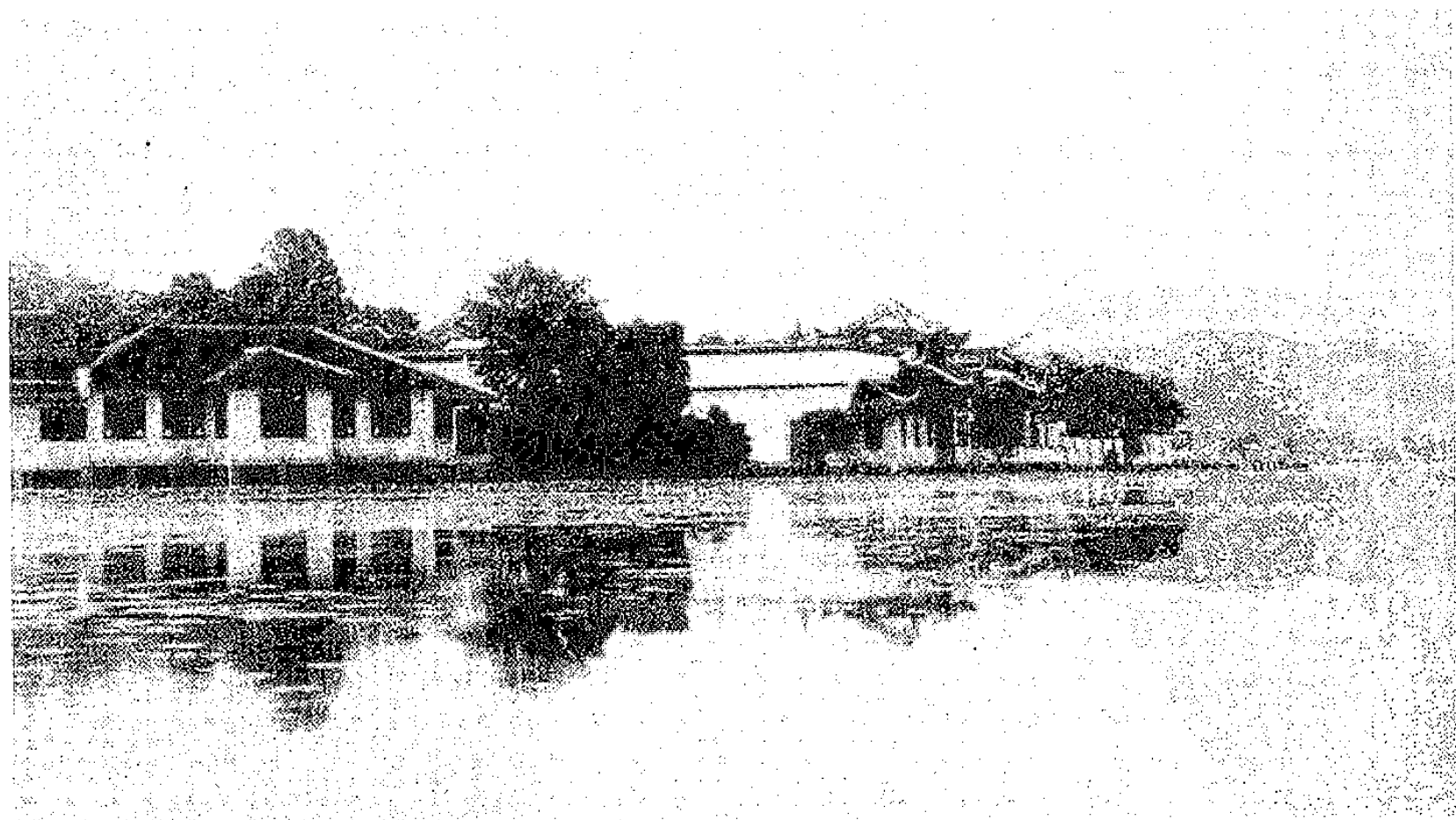
臣罪当诛父罪微，呼天呼父血沾衣。

说的是徐仁铸上书愿代父入狱的事。

在徐致靖保荐的5人中，与梁启超关系最远。光绪帝也没有召见过梁，他后来解释其中的原因是由于梁“粤音太重”。徐仁铸与梁启超关系则要密切得多，请梁到时务学堂就是在他任湖南学政时。

许姬传回忆，进入民国，继康有为到杭州之后，梁启超也来了，身穿黑缎团花马褂，蓝缎团花袍子，头戴美式呢帽，手拿文明棍，坐的是四人抬的绿呢大轿，还有四个警察保护。那天外公也不在家，等外公一进门，梁就下跪。他们的谈话从徐仁铸说起，当梁问及他有没有回故乡宜兴，看看亲友，他的声音提高了，很激动地说：“戊戌变法我们失败了，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梁说：“年伯何必如此，我们都是为国家，不能以成败论。”语气中有点窘。梁启超临走前，拿出一把扇子，请他写字留作纪念。

●西湖刘庄



送走了梁，他还自言自语：“梁卓如前呼后拥，跑到这里来摆架子，刚才我一句话说得他脸都涨红了。”第二天他作了一首七律写在扇子上，后面还有跋：“任公年世兄自京来杭，别十余年矣，不胜沧桑之感，因赋俚句，留作纪念。”

1915年梁启超有一次杭州行，在刘庄停留了10日，当地官僚殷勤招待，热情甚至超过了广东故乡。6月11日，他在杭州给女儿梁令娴写信，说自己在西湖边不忍离开，甚至想在西湖边买十多亩地，种茶、种乌桕，躬耕自得，做个“千户侯”。当时袁世凯称帝在即，他还要挥动如椽大笔去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雄文，躬耕西湖的梦终究做不成，没能像他的老师康有为那样在西湖“割据湖山少许”。

四 悔之晚矣的密保袁世凯折

1898年9月，百日维新朝夕不保之际，康有为、谭嗣同等曾想依赖小站练兵、手握新建陆军，对新政表示支持的武人袁世凯，先让康门弟子徐仁录去小站看操（因为其哥哥仁铸与袁是盟兄弟）。由仁铸推荐在袁幕府的言敦源回忆，徐仁录到天津后，袁盛宴招待，看操时就坐在袁的身边，“词锋甚利，口若悬河”。仁录回京后，盛赞袁的治军才能，康、谭主张由徐致靖上密折保袁，这就是9月11日上的《密保练兵大员疏》：

臣窃见督办新建陆军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各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臣闻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举，一举枪则万枪同声。……

这才有光绪帝两次召见袁，赏侍郎候补的事。调袁进京，招慈禧太后

之忌，一也。袁不可靠，二也。徐致靖谈起此事，“非常悔恨，似乎是终身遗憾”。当时，徐仁镜曾劝他们慎重，“交浅言深，是一种轻举妄动。因为袁是荣禄的部下，虽小站所练新军，博得称誉，但人数不过七千。袁是个看风使舵的人，他曾赞成办新政，那是趋时。”徐仁录后来也承认，“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绪、诛荣禄，乃谭浏阳、康南海与我合谋，诚为孤注一掷”。可惜徐仁铸当时远在湖南，他如果在京，也许会力阻，毕竟他“深知袁之为人”，他是青年翰林中熟悉时务的后起之秀，受到李鸿章的欣赏，也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他被革职后曾说：“保袁最为失策，此人居心叵测，如不保袁则维新变法虽失败，六君子或不致全部被害，一着错，满盘输。”他说林旭有见识，林有诗：“本初健者莫轻言”，对袁是有警觉的。

1916年6月7日一早，远在杭州的徐致靖得知袁世凯的死讯，脸上露出了戊戌以来18年从未有过的笑容，前来姚园寺巷报信的人络绎不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气氛，他说：“我垂暮之年居然赶上这一天。”他预备酒菜，对亲友说出了自己从未说过的心里话：

戊戌政变，屈指算来，已经十九年了。维新派在中国积弱的局面中，想要变法图强，可是没有清楚当时的局势，操之过急，以致昙花一现，终于失败。我们觉得光绪帝在甲午战败后，有变法图强的意思，想依靠他实行君主立宪。而慈禧是一个阴狠毒辣的暴君，光绪四岁登基，是她的傀儡，后来表面上归政，实际大权还在她手里，在这种恶劣环境中，我们的想法是太天真了。至于想借用袁世凯的兵力保护光绪，扭转垂危的局面，则是病急乱投医的举动。我是密折保袁世凯的人，徒然给他一个出卖维新，扶摇直上的机会。

他还说，“戊戌变法，因袁世凯告密，而慈禧再垂帘，囚光绪，捕杀维新党人，成为千古奇冤。”（《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114—115页）好在打倒袁世凯家天下的蔡锷，是当年徐仁铸办的长沙时务学堂学生，梁启超的得意门人，戊戌党人不仅参与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报仇雪恨，终于吐出了多年郁积于胸的怨气。他希望中国从此能上下一心，建立起名副其

实的共和政体。

1917年，他得知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愤怒地写了一封长信力劝康离京。原信未保存下来，他外孙记忆的要点有：“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我们变法维新的主张是对的。我们对清政府的腐败贪污，表示不满，所以要除旧布新，这一点也是站得住脚的。”“我们对光绪皇帝有知遇之感，是因为他能够听我们的条陈，进行变法，而不是因为他是清朝皇帝，所以捧他。”“我们主张君主立宪，并不赞成专制，宣统我们毫无所知，岂可跟着别人胡闹。”（《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119页）他听说康即将出任弼德院副院长，院长是袁的死党徐世昌，“你做他的姨太太，我替你难受。”复辟虽然12天就完蛋了，他却为此痛心不已，认为康有为此举有损维新派声誉，心中愤懑，经此刺激，第二年春天，他在杭州一病不起，以75岁而终。病中他还在打听康有为的下落，为这位曾共患难的老友而惋惜。

开吊之日，康有为寄来挽联，沉痛亲切。多年后康女同壁对他外孙说，她父亲一生最敬重徐致靖，“有知己之感”，还告诉他一件事，当年慈禧太后派兵舰飞鹰号追重庆轮，追捕康有为，中途油不够，开回天津，舰长以办事不力被监禁。后来才知是这位舰长刘冠雄（做过民国海军总长）故意放走康有为的。当时有识之士赞成变法，对康有为抱有同情。

史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戊戌政变的发生起源于袁世凯的“告密”。也有史家根据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袁乃至荣禄都是想保全光绪帝的。这一日记直到袁死后10年（1926年）才公布于世，其可靠性受到质疑。袁的告密也许从时间上晚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但无疑告密扩大了政变的残酷性。无论从毕永年日记《诡谋直记》，还是徐家后人许姬传的《戊戌变法侧记》来看，袁都难逃告密的嫌疑。前者是当事人当时的记录，后者是当事人的口述回忆，可以相互参证。

五 “我不是遗老”

1900年，徐致靖出狱后去见李鸿章，李的第一句话“你是忠厚之报啊。”他答以“国事如此，万念俱灰。”李问他有何打算？他回答“劫后余生，并无打算。”

辛亥革命后，徐致靖不仅让外孙、孙子剪了辫子，自己也剪了辫子。上海租界的遗老见他剪辫，很是惊讶。一位军机大臣的儿子问：“年伯世受皇恩，是遗老，何以剪辫？”他回答：“我不是遗老，也不拥护清朝廷，但我非常怀念光绪皇帝。因为他和我们志同道合，主张维新变法，可惜被慈禧和狡猾昏庸的大臣折磨致死。我认为慈禧是中国的罪人，也是满洲的罪人。请你们以后再不要称我为遗老。”

李鸿章说他整天唱昆曲，他的性命可以说是昆曲保住的。他晚年在杭州以课孙读书、唱昆曲为乐，下午常到茶馆，与茶友唱昆曲、下围棋（或象棋）。慈禧太后从西安回京后，天津的严修打算邀集顺天、直隶的同乡京官，为他谋开复，他写信婉拒。他当年曾在河南任乡试主考，河南的士绅酝酿为他官复原职，他也谢绝了。他说：“我不能伺候那拉氏，虎口余生，等死而已。”

前些年，有人在杭州的收藏品市场找到过“谭嗣同赠徐致靖”的墨宝扇面，南山公墓有徐致靖女儿和女婿的墓，墓志出自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手笔。徐致靖于1901年南下，一直住在杭州姚园寺巷，改名徐仅叟，可惜这位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戊戌第七君子”的故居，在修建城站火车站时被拆毁，早已无处寻觅。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 许姬传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 汤志钧，《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4.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5.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
6. 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7.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自陈三立、徐致靖们梦断河山，维新变革的壮志成空，归宿西湖之后，无论是晚清立宪派的代表之一汤寿潜，还是站在南高峰上对江赋诗、踌躇满志的宋教仁，都曾为从制度层面告别“衰世”，将中国从古代带入近代，而苦心焦虑过，拼命苦干过，热血澎湃过，甚至不惜送一颗头颅（黄花冈起义前夕宋教仁对于右任说的话）。徐致靖郁郁而终，陈三立后半生以诗酒自娱。戊戌之后，政局黑暗，民气消沉，万象凋零，直到庚子惨变，慈禧太后被迫推行新政，拾起染满谭嗣同等志士热血的戊戌变革纲领，试图挽救气数将尽的王朝命运，社会才重新出现一点生机，立宪运动就是在这一气候下展开的。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中心的江南立宪派在当时负有社会重望，他们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立宪与革命的这场赛跑，因为权贵集团始终难以割舍既得的庞大利益，背上因袭的包袱太重，私欲太深，最后输给了革命。

国会没来得及召开，武昌的枪响了，就连立宪派的中心人物张、汤也给他们曾寄予希望的这个王朝投了有力的反对票。辛亥前后，西子湖头，那些把热血洒在自己土地上的仁人志士，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还有铜像巍然的章太炎，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出现，那个时代也许不会令后人不断怀想。

湖南新政勃兴之际，宋教仁只是一个湖南桃源乡间的孩子，混沌未开，但自少年时代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求学时代起，他就选择了一条与上一辈陈三立等读书人不同的道路。在日本的那些岁月，宪政共和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从主持《民立报》到组织国民党，他从论坛到政坛大显身手，所向披靡，他是新一代的新人物，受到举世的注目，他要把中国带入一个洒满阳光的共和时代，他身上有一种阳光般的因子，他是透明的政治人物，用的是阳光手段，他的宪政理想诚然不是中国古老传统中固有的，他的性格放在民族的政治史上也是罕有的，你可以说他天真，不够世故，为自己考虑得太少，对自身的生命安全毫无顾忌等。然而，这正是那个龙旗落地的时代的特征。他在

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迅速成长起来，生吞活剥地大量学习西方宪政成果、制度文明知识。这是龚自珍、魏源们无法想象的，也是陈三立、康有为们在戊戌年想不到的。魏源在他的书中赞美了英、美的政制，只是对相隔遥远的异邦政治文明的一种朦胧、模糊的向往，宋教仁脑子中的宪政蓝图却是清晰的，民国初生，时代的浪潮终于把年轻的他推到风险莫测的浪尖上。宋教仁横遭暗杀，宪政民主的曙光在民国的天空一闪即逝，依然是长夜难明的赤县天。南高峰上松涛依旧，而他1913年初春在杭州的演讲已成人间的绝唱。

维新梦破了，君主立宪梦破了，民主宪政梦也破了，在失败的浩歌中，我们看到了古老文明在制度层面转型的艰难。

第四篇

“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

——汤寿潜与晚清立宪运动

上距戊戌变法不足10年，又有立宪运动勃兴。在享有全国声望的立宪派领袖中，江苏南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和浙江争路权、办铁路而受到普遍敬重的汤寿潜以“张、汤”并称。

汤寿潜（1856—1917）是杭州萧山（当时还属于绍兴山阴）人，原名汤震，字蛰先（或叫蛰仙），早在1890年他就写出了著名的《危言》，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早了4年，提出过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维新变法思想，包括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官，提倡采用西法，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废除捐官制度，迁都长安，刷新吏治，严惩贪官，废除武举，设立武备院，加强海军等，更值得重视的是广造铁路、兴修水利、改革税制、开发矿藏、整治道路、改善环境卫生、实行晚婚等主张，他在《议院》一篇中倡议设立议院，其中对西方议院赞美有加，认为可以仿效并且变通，第一步先以王公大臣、四品以上翰林组成上院，由军机处主持，以其他官员组成下院，由都察院主持，地方上则由绅士、贡生、监生、农工商代表人物组成议院，每有大事，进行集议。同时他提出兴新学、植人才作为议院之本，以开议院作为开



●汤寿潜

风气之先。这是他立宪思想的初次表达，他设想的议院本身还有很多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与西方的议会制度相去甚远，但他提出的议院这个思路本身仍是超前的。《危言》的出版使年轻的汤寿潜赢得了维新思想家之名，当时人们将他和唐甄、冯桂芬等相提并论。可以说，他的思想在甲午战争之前已基本成熟，后来他的办铁路、参与立宪运动，都可从这里找到思想的起点。

1892年，汤寿潜中进士，在翰林院待了三年，1895年3月到安徽青阳县上任，离京前夕，读过《危言》的翁同龢召见他，二人促膝长谈一番，翁在日记中评价他“于时事极有识”，在私下以为他“必为好官”，然而不过三个月他就辞官回乡了。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两次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召他进京，以备任用，他因为母亲有病，请求缓行，躲过了戊戌一劫。谭嗣同写给汪康年的信里惋惜，汤是自己素来欣慕之人，“而不曾一见”。

汤寿潜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应该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时，他和张謇等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发起“东南互保”运动，确保了江南的秩序和经济繁荣。张謇说汤是最初的倡议人，当年6月18日是他率先到南京与张謇等合力游说推动此事。然后，他们奔走于武汉、南京之间，说服了张之洞、刘坤一两位封疆大吏。也就是在这一年12月，他在南京和张謇等人初次议论立宪之事。1901年7月7日，他应张謇的邀请，到南京与刘坤一共商立宪之事，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当年9月，他写出了《宪法古义》三卷，对元首的权利、议院的权力、行政大臣及法院的权利作了区分，对大臣责任、法院独立、法官选任、刑官终身、陪审制度等都有论述，已有三权分立的初步认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第三卷“国民之权利”，列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尊信自由、产业自由、家宅自由、书函秘密权、赴诉权、鸣愿权等十几种自由权。在《宪法古义叙》中，他在《尚书》《周官》等古书中寻找立宪的依据，认为宪法不仅在西方实行，也是中国所固有的，其实是想把立宪的理想与古老传统嫁接在一起。这是他立宪思想的一次集中表达。这些思想、言论、行动上接1890年《危言》中的开议院主张，而有了很大的突破，下启1906年成立立宪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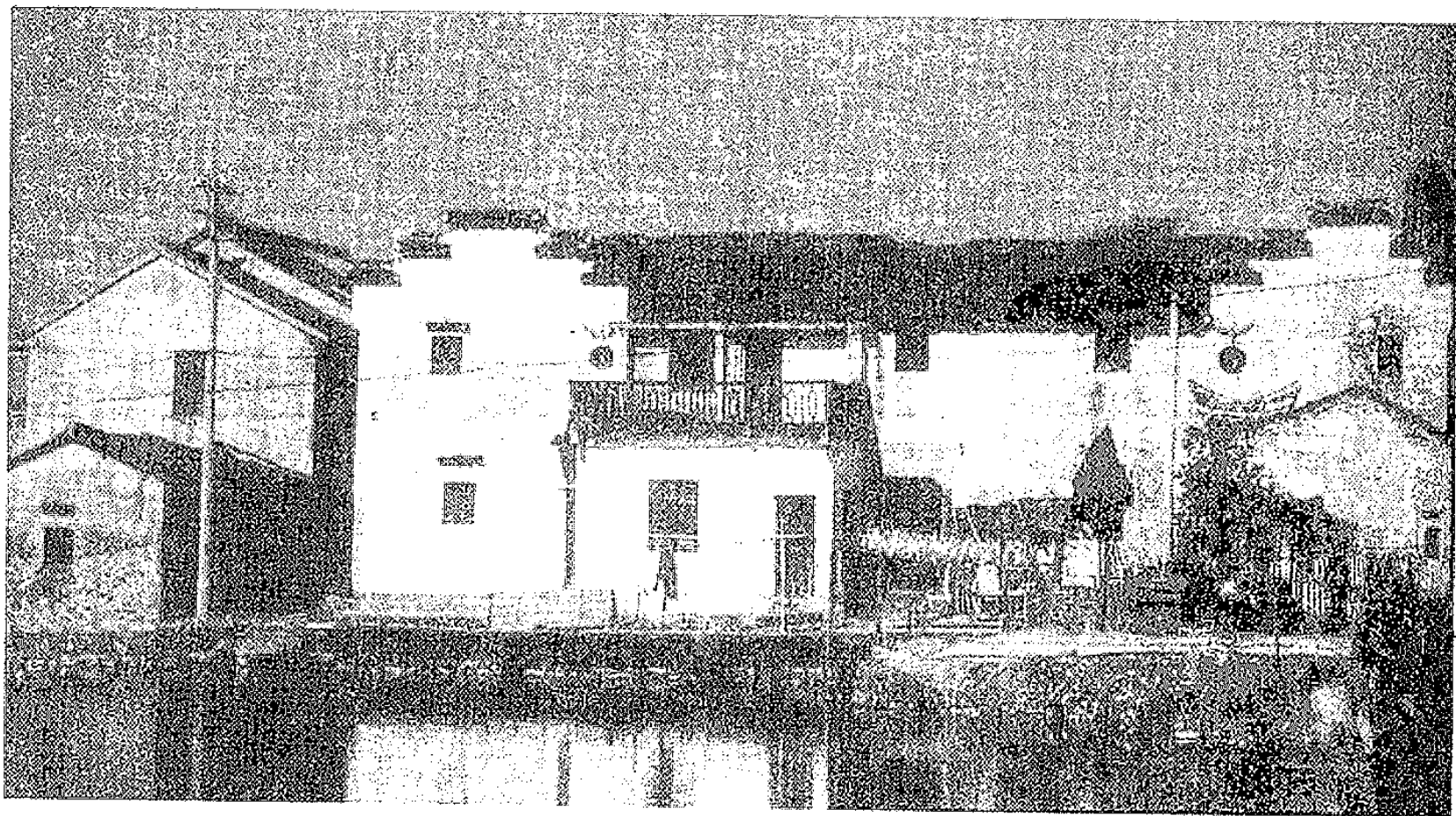
体，直接推进立宪的行动。

1903年，清廷任用汤寿潜为两淮盐运使，这是一个肥缺，他竟托词辞谢。从1895年到1904年，他先后出任金华丽正书院、上海龙门书院（龙门师范学堂）的山长，他相信“教育为文明之导师”。在民智未开的中国，他想以教育事业来启迪民智，作为立宪的先导。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他就极力赞成。这是他写作《危言》以来一贯的看法。但是，教育的推动毕竟是缓慢的，要真正推动立宪，还得有赖于实际的政治行动。

自从留日学生出版的《浙江潮》上首次出现“立宪派”这个新名词以后，“维新派”一词渐被“立宪派”所取代。立宪运动的呼声从体制外渐渐蔓延到体制内。当时声势最大、最用力的无疑是江浙的立宪派，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就是在他们着力推动下成行的，其中汤寿潜的作用不可忽略。从那时以来，他持续地通过游说、上书等方式，呼吁清廷走上立宪之路。

1904年5月起，张謇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燾等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还为他们代拟了立宪奏稿，汤寿潜也参与了包括拟稿在内的这些活动，张之洞没有应承，而是要他们去探询袁世凯的意思。张謇一方面写信给袁世凯请其赞助立宪，同时和汤寿潜、张元济等连日会谈，决定

●汤寿潜祖宅外景



游说军机大臣瞿鸿禨及其他达官显贵。6月，他们通过张美翊给瞿鸿禨转呈了一个说帖。9月，汤又通过章梈接连带两封信给瞿，第一封信鼓动瞿挺身倡导立宪，“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如果事成，后世将为其树铜像，即使不成，也可以奉身而退，此举光明正大。他在第二封信中建议，考求宪法和保卫主权有“一笔两用之策”，可作为出国考察宪法的主题。他恳切希望瞿以一片愚公、精卫之心，“独为其难”。瞿为之心动。当时深受慈禧信任的瞿鸿禨，其态度直接影响慈禧的决策。他不断地写信给瞿推动此事，瞿除了面奏派员出洋，甚至希望自己亲到欧美去考察政治。有瞿鸿禨这样的军机重臣受到立宪派的影响，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其他封疆大吏、王公大臣的态度也都发生了变化，各种因素终于促成了1905年冬天的五大臣出洋。

1906年7月，戴鸿慈、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从日本、美国到欧洲考察，一回到上海，张謇、汤寿潜等就四次谒见，竭力劝说他们迅速奏请立宪，不可再延宕。就是在这一年，汤寿潜向朝廷递了一份《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要求维持舆论，制定报律是用来保障而不是摧残报纸，以合乎宪政之名。在当时推动立宪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端方等抵达天津时，有8万名学生上书要求颁布宪法、更改官制、重定法律。可以说，这年9月1日颁布的“仿行宪政”上谕只是顺应了这一时代的呼声，其中确立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商学各界一片叫好声，到处奔走相告，认为这是千古未有的盛举，有人甚至喜极而泪下。“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的就是当时普遍的心声。预备立宪诏书在全国许多省份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商界、学界、报界，纷纷开会庆祝。这一切完全都是自发的，不是官方组织的。在晚清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自治组织和新兴的学校、报纸，成为宪政最坚定的支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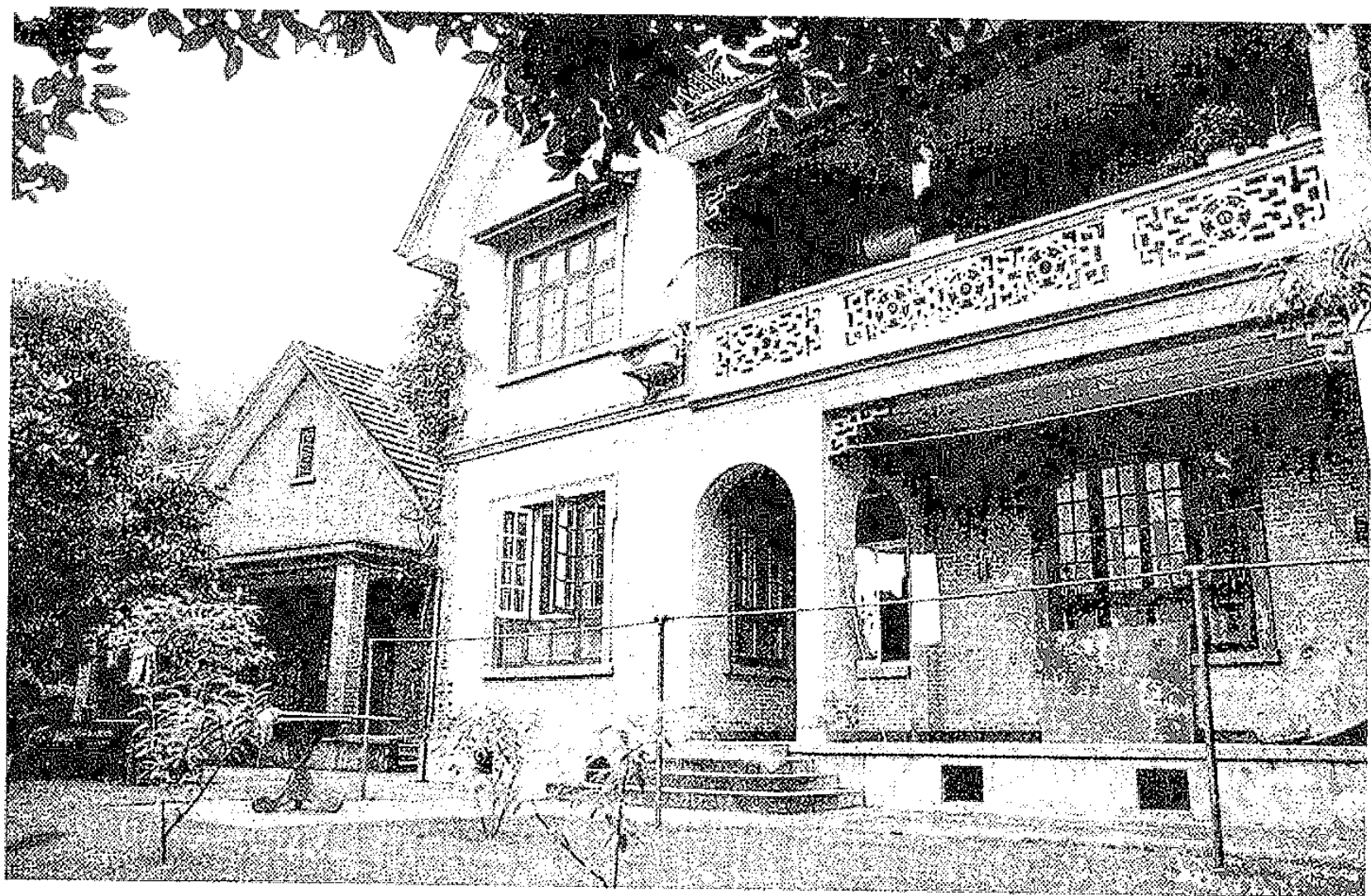
汤寿潜写信给瞿鸿禨：“以五千年相延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他内心的欣喜毕露无遗。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善良的人们，在专制暗夜中生活了多少个

世代，真的以为清朝要踏上宪政轨道了，从此可以过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不能嘲笑他们的愿望是天真的、可怜的，谁又能想到这一切都只是空头的许诺，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1906年的预备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设立了专门机构——编制馆，只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中央体制的改革，实际上的改动幅度很有限，仅以满、汉之分来说，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门大臣都是满、汉各半，改革以后名义上说满汉不分，实际上11个部的13名大臣、尚书中，满族占了7人，蒙古族1人，汉族只有5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宪派由此感到失望。

中央体制大致上确立以后，当年11月5日厘定官制大臣通电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体制的方案，计划将地方分为府、州、县三级，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议员，公议应办之事，设立董事会，由人民选举会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议决之事，逐步推广，设立下级自治机关，另外设立地方审判厅，受理诉讼。现在来看，以“地方自治”为内核的这一方案，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大约到1907年2月17日以前，各地封疆大吏虽众说纷纭，看法不一，但都表示推行难度很大。

●汤寿潜住宅



最重要的还是民间宪政派的自发组织应运而起，它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这是1906年慈禧接受宪政改革主张的最大成果，以铁铸的事实证明了国人对宪政的热忱。最具影响力的立宪派团体就是“预备立宪公会”，从1906年9月上旬开始密商、讨论，12月15日在上海愚园正式开成立大会，投票选出15名董事，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成员以江、浙、闽为主，逐渐拓展到国内十多个省及港、澳、海参崴、南洋各地，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后来也都加入进来，特别是在上海，大致上囊括了工商界、新闻界、教育界的精英，比如李平书、荣氏兄弟等实业家，《时报》的狄平子、《中外日报》的叶瀚、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等报人和出版家，创办浦东中学堂的黄炎培、杨斯盛，以及孟森、孟昭常、雷奋、杨廷栋等年轻才俊。“预备立宪公会”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活动，做了大量推动宪政的工作，首先是出版书刊、普及宪政知识，仅孟昭常编的《公民必读》就发行了13万册，其次是开办法政讲习所，第三是推动地方自治及咨议局的成立，第四是编订商法。这个重要的立宪团体，每年选举一次，汤寿潜多次当选为副会长，他在1908年、1909年力辞，1910年还是当选了。

其他各省的各种立宪、自治团体也相继诞生。在海外，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留学生杨度在日本组织了“宪政公会”，梁启超组织了“政闻社”。从上海到日本东京，民间立宪团体的破土而出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是在1895年甲午战败的泪水和屈辱中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那么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代表则从1906年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身手，在这一波推动宪政变革的浪潮中，他们的声光盖过了康、梁一辈，这已经是他们的时代。他们与江南新型工商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士绅、读书人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汤寿潜和张謇一样，在立宪派中属于温和派，他认识到立宪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民权的伸张，二是法律的制订，三是舆论的监督，法律不仅约束人民而且约束君臣，凡事取决于公论，“尤为宪政之本”。1906年，他们两次联名发出请速开国会电，要求以两年为限，在他加上去的文字中有“时不可失，敌不我待”二语。结果当然都是被搁

置了。他已看出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在《拟上摄政王书》中指出“今则预备立宪，形式是而精神非”，但他还是没有放弃立宪的立场。

在投身立宪运动之时，汤寿潜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了铁路上面。“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这是张謇为他作传时的概括，他在晚清之所以赢得很高的声望，就是因为全身心地投入保卫路权、兴建铁路的实践中，并取得显著成效。早在1898年，英国银公司与清政府就有《苏杭甬铁路草约》，此后便一直没有动静，连勘测都没有做过。20世纪初，江浙民间要求收回路权的呼声很高。1903年，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新生的商部准许各地设立路矿公司，1905年春天，正好有美商到上海活动，试图得到浙赣铁路的修建权。年近半百、素怀实业兴邦之志的汤寿潜就在这时站了出来，当年7月，他和张元济、夏曾佑等浙江籍名流在上海发起“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他被推为总理，决议向全省人民集资办铁路，获清廷批准，授予他四品卿衔，总理全浙铁路事宜，责成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交涉收回苏杭甬路权。

从1906年到1909年，浙江境内修成铁路328.2华里，沿路筑桥144座，平均每里铁路的造价只有13400银元（不计建桥及车辆），当时浙江旅沪学会评价“中国商办铁路，其成效以我浙为最速，其经费以我浙为最省”。这与汤寿潜芒鞋徒步、风尘仆仆、不计劳苦奔走于杭、沪之间，而且不受薪金、不支公费的作风是分不开的。期间，他还创办了浙江高等工业学堂（铁路学堂），为管理大笔集资款，还于1907创立了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然而当铁路开工之后，英国银公司不肯废约，通过驻华使馆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向英方借款，实际上就是将铁路抵押给他们。消息传来，浙江铁路公司于1907年10月发起“浙江国民拒款会”，汤寿潜多次致电军机处抗争，路潮汹涌，清廷一度想动用武力，军队都已集结。为了把他支走，1909年，清廷先后几次任命他为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每一次他都再三辞谢，坚持留下修路，到1910年8月他还致电军机处反对盛宣怀为邮传部侍郎。清廷指责他“狂悖已极”，将他革职，不准干预路事。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浙江各界、浙江旅居外地的同乡纷纷请愿、集会、抗议，电文雪片般飞向北京，甚至有一个工程师、一个工头以身殉路。一



●汤寿潜捐资的浙江图书馆

时舆论汹汹，上海《天铎报》《申报》《文汇报》《民呼日报》及各英文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报道，浙江咨议局乃至浙江巡抚都出面请求朝廷收回成命。8月25日，当清廷下令严禁上海、浙江、江苏各地为汤寿

潜革职而集会，他在两天后只身前往山东，登泰山、谒孔林，放松身心。而杭州商务总会于8月28日、9月5日两次举行集会，9月9日旅沪同乡几千人乘专列到杭州，冒雨前往巡抚衙门请愿，秩序井然。至10月1日杭州还在举行集会声援。汤寿潜为了争路权弹劾大臣，顶撞朝廷，不惜冒杀头危险，因此而成为维护主权、艰苦创业的代名词。

在一波又一波捍卫路权的声浪中，混合着要求速行立宪、召开国会的呼喊。1908年颁布的《结社集会律》，毕竟在法律上确立了老百姓结社集会的权利。

1907年12月，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公会、政闻社、宪政研究会等团体决定成立“国会期成会”，作为领导全国请愿运动的临时团体，派人到浙、苏、皖、湘、赣、粤、豫等省活动串联。当年12月、1908年1月，张謇、汤寿潜两度和人讨论国会问题，1908年2月，在预备立宪公会一次会员常会上，讨论了创办私立法政大学（即上海政法学院前身）、请求开国会、设立“宣讲研习所”等事项，张、汤等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同年4月，他们决定派代表到北京请愿。6月7日，他们以“预备立宪公会”的名义邀请全国各省的立宪团体，共同赴京请愿，敦促召开国会，7月12日，“国会期成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目标是速开国会，拉开了晚清国会请愿运动的大幕。浙江的运动就是在汤寿潜直接促动下开展起来的。借助办铁路赢得的社会声望，在推动立宪运动中，他起到了旁人难以起到的作用。这

年6月，他在上海电促浙江各团体行动起来，8月10日推出代表，会上通过了由他执笔起草的《代拟浙人国会请愿书》，再次阐述了他的立宪思想，其中指出：“汲汲需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得以增长其智力。”他认为，国民程度不是实行立宪、民权的必要前提，而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可以让人民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水平，议员应是“有才能者，有学识者，多额纳税者”，要给予“天下通才参政的机会”。这些思路即便今天读来还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这份请愿书由前礼部侍郎朱祖谋领衔，8千人签名，包括了不少旗人，还有500多名天主教徒。8月20日，由三名代表到都察院递，呼吁“国会迅速成立”。此次国会请愿有18省参与，8个立宪团体还有留学生、海外华侨，签名人数可查的达15万人，各省人民集体向朝廷要权利，“极千古未有之奇观”。清廷的回应是查禁“政闻社”，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立宪，一年内各省先成立咨议局，再成立资政院。在接下来的咨议局议员选举中，各地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纷纷当选。

1909年3月，汤寿潜在杭州发起“自治筹备处”，受他影响，商业繁荣的湖州南浔小镇也成立了自治局。1910年，在立宪派的推动下，以各省咨议局为中心，接连掀起了几波国会请愿浪潮。先是1909年10月，张謇决定出面联合各省咨议局要求召开国会。11月，汤寿潜在杭州与张謇会面，他同意张的意见。当月28日，他给朝廷上了一份《为国势危迫敬陈存亡大计》，提出治标之策4条：提早开国会、急筹公债、联盟美国以分日本之势、锐意断发以易短便之服。同时有治本之策4条：注重典学，以培植经国的基本；事必独断，要有真正负责的内阁；统筹财政，以解燃眉之急；议决币制，以定国币之价。1910年，他



●任浙江军政府都督时的汤寿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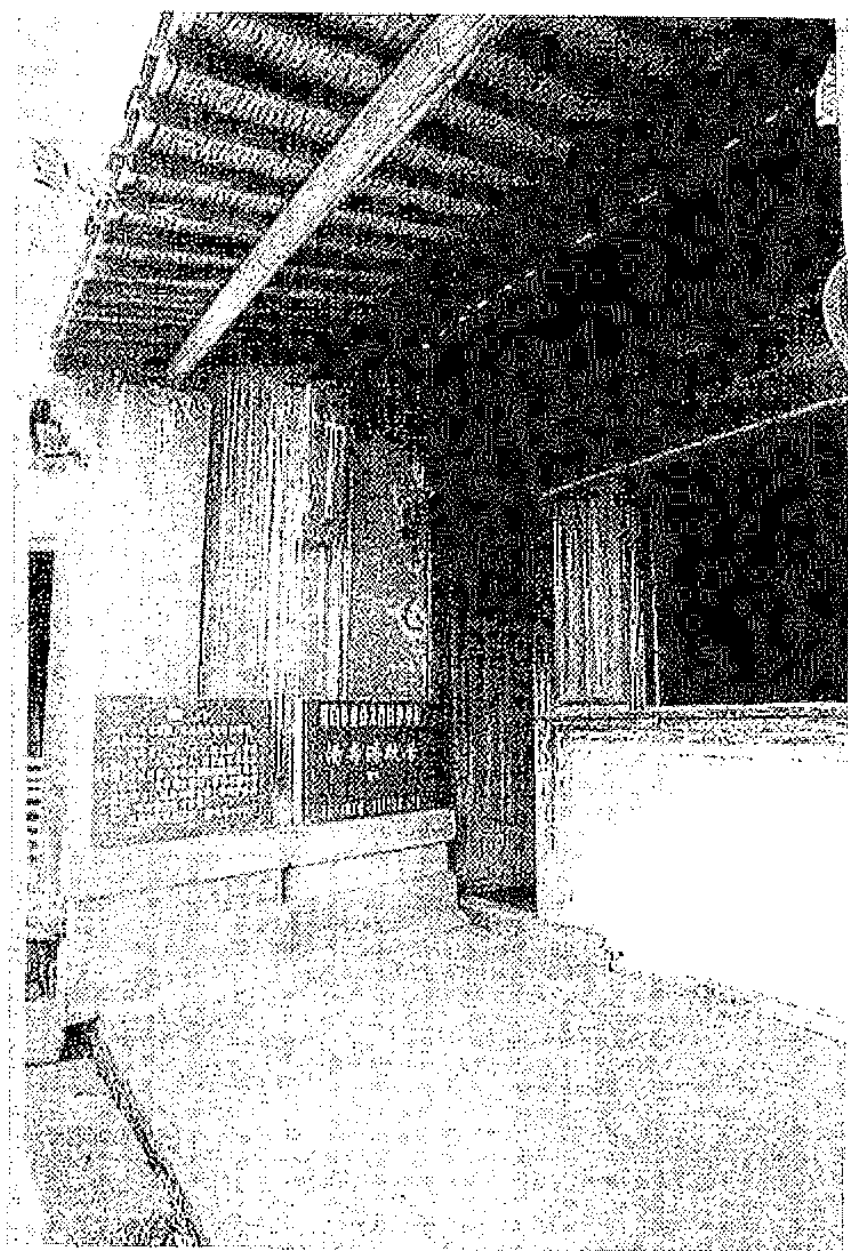
到广州等地活动，发起集资自办东南铁路，上海《时报》4月25日发表了他在广东向各界呼吁“请开国会”的演讲全文。1910年1月21日，王公大臣在请愿代表见面时，庆亲王向代表问及汤寿潜、张謇对此事的意见如何。各代表回答，汤、张都极力主张。这次对话，上海的《申报》有详细报道。可见他们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分量。

1911年5月，“皇族内阁”出笼，汤寿潜等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遭到拒绝，至此，立宪运动走到了尽头。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包括张、汤在内有影响的立宪派头面人物最终都对清廷投了反对票，汤被推为浙江都督，随后他和张謇一起成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总长。浙江革命党人黄元秀回忆，辛亥之前，他“常与民党中人往还，虽未参加革命，行动早有默契”。正是立宪派和革命派联手把绵延数千年的王朝政治送进了历史博物馆。汤的理想本来是君主立宪，为立宪奔走多年，然而当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面对清廷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赞同以美国制度

为模范。他在写给赵凤昌的信中，要赵运动法国政府承认中国的民主共和制，“法亦民主，能与美同时承认，他国宜不至为梗，庶中国从此不亡。”从他给张謇、张元济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已超越君主立宪的信仰，皈依共和。几年后袁世凯称帝，他就坚决反对。

当他出任交通总长，辞去浙江都督时，陈布雷在上海发表评论说，“求浙江都督于今日，汤氏外实难其选”，认为只有他的“德望足以震慑异议”。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

汤寿潜一生对于做官、敛财毫无兴趣，曾一再辞官。1903年4



●汤寿潜故居

月瞿鸿禨保举他应经济特科，他不去。同年，清廷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不干。1904年，他坚辞两淮盐运使。1906年，学部任用他为头等咨议官，他不受。1909年，他连辞浙江署财政议绅、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等多项任命。在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一职被革除前，他至少十几次提出辞职。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论辞官次数之多，也许无第二人。

1917年6月6日，他在杭州萧山临浦牛场头的家中谢世，终年61岁，葬于桐庐的青山绿水之间。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 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1993年印。
2. 陈志放主编，政协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研究》，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3. 《汤寿潜档案史料选》，《浙江档案》，1991年第1期。
4. 侯宜杰著，《20世纪初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 王遂今著，《汤寿潜和浙江铁路》，《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 曹聚仁著，《我和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第五篇

宋教仁登南高峰

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
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登南高峰》



●宋教仁

一首《登南高峰》把宋教仁当时的心迹演绎得淋漓尽致。近百年过去了，南高峰上的栎松依然，脚下的西湖依然，远处的钱塘江滚滚东去，只是多了些污染、变得更浑浊了些。“村市沉云底”依旧，“江帆走树中”已变得奢侈。南高峰与北高峰，在西子湖畔遥遥相对，合称“双峰插云”，早就被患有“十景病”的文人、王侯称为“西湖十景”之一。晋代就有人在山顶建造了七级砖塔，内藏高僧舍利子，夜夜燃灯，可指示江面的航向，直到明代毁于雷击。南高峰离产茶的龙井村、产桂的满觉陇都近在咫尺，山上有山，有烟霞洞等洞穴，春花烂漫，秋桂飘

香，虽然宋教仁来的不是时候，春寒时分，雪后初晴，山道上还有残留的积雪，天冷路滑，树枝上尚未长出新叶。不过一旦登上峰顶，视野开阔，俯瞰西湖，美得让人不忍下山，远望钱塘江，水波浩淼，帆影点点。如此景致，他自然会心有所动。1913年即民国二年，当年轻的宋教仁站在这里时，正是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时，其时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两院选举已近尾声，他代表的国民党胜局已定。

出生于湖南桃源的宋教仁大概是第一次来到杭州，看到了被多少世代数不清的诗人墨客赞美过的妩媚西子。当他登上南高峰，听松涛阵阵，看竹林摇曳、茶园隐约、江波起伏。他内心有许多与他人不同的感受，这才有了上面这首诗。

这年年初，身为国民党实际领袖的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出发，从长沙到武汉，顺江东下，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到处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这个早春，长江流域刮起的“宋教仁旋风”是中国史上明亮的一刹那。3月，选举揭晓，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在这次选举中获胜，如不考虑跨党因素，国民党在参议院获132席，占48.2%，在众议院269人，占45.1%，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在参、众两院相加都不及国民党的2/3，选出的议员平均年龄36岁，其中2/3以上在国内或国外受过新式教育。

此次选举，虽然有选举资格的一些限制（受教育程度和财产等），全国确认具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只有4000多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10（真正参加投票的人数更少，有些研究说只有400万人左右，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而且有贿选等不正常的现象，但大体上不失公平，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公开、直接的国会选举。国民党的获胜固然与当时的时势有紧密关系，但离不开青年宋教仁的运筹帷幄、苦心经营。

当年2月21日，当宋教仁与于右任等一起到杭州时，选举结果即将揭晓，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已没有问题，作为党魁，他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务总理，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这是他一贯的政治理想，他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当天，他曾主持笔政的上海《民立报》发表来自浙江、署名“崇拜英雄”的一篇稿件，对国民党三大领袖孙中山、黄兴和他作了比较：

听孙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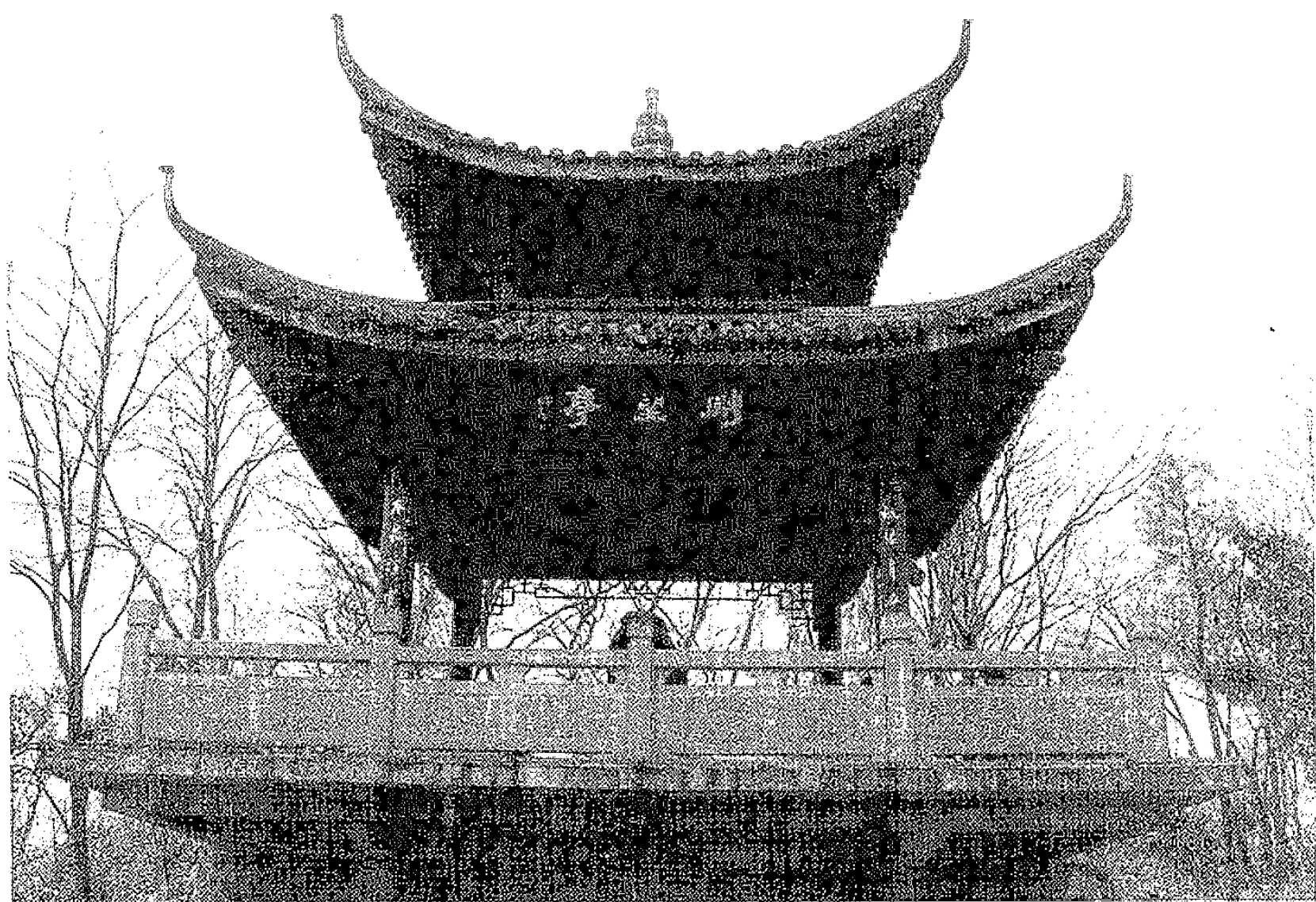
此前，徐血儿在1月26日的《民立报》发表《当今之政治家》一文，认为宋教仁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直言他是“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

2月22日，宋教仁一行抽空游览了西湖名胜，登临南高峰，同行的还有南社诗人、他的老朋友陈去病。23日，他和于右任出席国民党浙江支部的欢迎会，他在演讲中着重提出建设问题，强调“责任心”，并区分国民的责任、政党的责任和党员的责任：

民国虽已底定，然百事不能满意，缘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即守成亦不易，即政府虽立而邦基未巩，尚不能高枕无忧；况目下大局岌岌，除三五报纸外，无一人顾问其事。如此次政府奖赏功位勋章，皆属不应为而为，而窥其用意，仅求表面。今中华民国政策，无非除旧更新，前年革命起义，仿佛推倒一间腐败房屋，此后之事岂不更难？然房屋拆而重建，责在工人，而政治改革，则责在国民也。

前岁九月至今忽焉半岁，其于财政外交国民生计丝毫未有端倪，凡为国民，能不赧然？总之，政策不良，国民以建设政府为入手，建设政府全藉政党才识。若其他政党有建树之能力，则本党乐观成局，倘或放弃，则本党当尽力图维，此皆吾国民党员所应共负。试问国民党员不救国民，国民尚有噍类乎？愿天下同志同胞时时存责任心也。

两天后，也就是他从杭州返回上海当天，这篇演说词刊登在《民立报》上。3月2日，《民立报》又公开发表他的《登南高峰》诗，一句“我欲挽强弓”，将他当时的心态毕露无遗，可见他内心的坦荡。确实，根据民国的《临时约法》，由他组成责任内阁，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刻就要到了。今天南高峰顶上有一个“骋望亭”，极目远眺，钱塘江就在眼底，柱子上镌刻着对联：“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乃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诗



●驰望亭

句。在宋教仁之后很多年，“红军之父”朱德登南高峰时吟诵的就是这两句诗。这和宋教仁当时向往的境界完全不同。宋教仁生处转型之际，已摆脱古代的传统型人格，具备了万里无云的阳光性格，他对政治、对权力的理解也都是近代化的，他选择的是阳光下的政治，所以他的内心才会那么坦然，他的灵魂才会那么透明。他深信，他的地位只能通过合法的选举取得，只能采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不可能依靠策划于密室之中的阴谋，更不可能仰仗铁与血的暴力。此前，他在2月1日国民党湖北支部欢迎会上演讲时说得清楚：

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此后，3月18日他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上演说时进一步表示，革命党与政党虽然都是过政治的生活，牺牲进取的精神也始终一贯，但从事政治的方式毕竟大为不同。“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和平手段谋建设。”他解释说，“建设”就是要排除原有的恶习惯，呼吸文明的新空气，最终达到真正共和的目的。他当时力主“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和袁世凯“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如意算盘针锋相对。他认为自己的主张光明正大，“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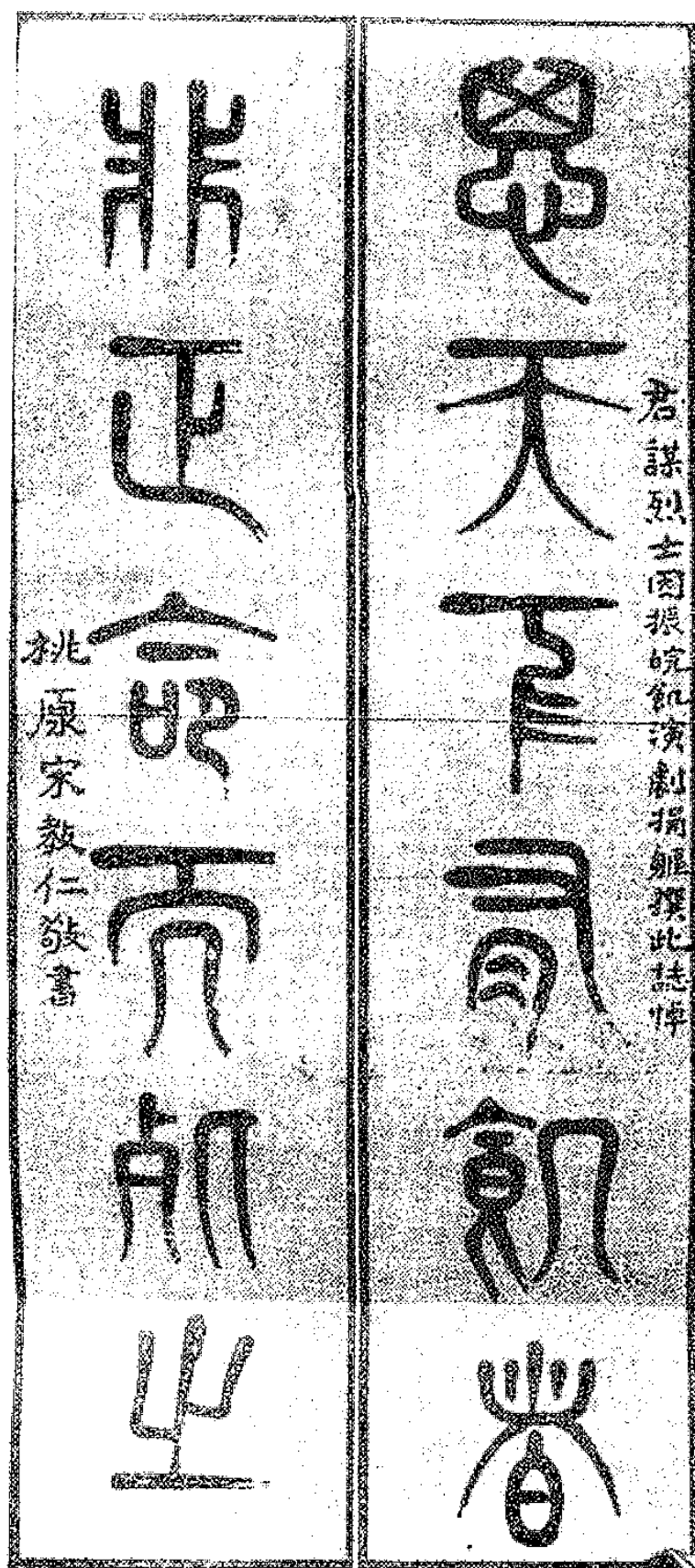
在辛亥一代革命党人中，宋教仁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男儿，曾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他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有莫大关系。（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中策为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在辛亥革命到来的前夜，他在上海《民立报》主持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不涉及，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所钦服。了解他的挚友于右任在1912年如此评价：“如渔父者，才、学、识三者俱备，昔日为国南走粤而北走辽，无时或息。”称许他对国不可谓不忠。黄花岗起义前夕，他应黄兴之召奔赴香港，参与筹划。在上海登船前，于右任对他说：“以大义言，何敢阻君？以私交言，则甚不愿君行也。”他回答：“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个头颅已矣！”两人在码头含泪而别。

宋教仁从来都不是畏缩不前的懦夫，但他有的不是匹夫之勇，在同盟会领导层中他是最重视建设的。初到日本，他本来想学陆军，后来还是选择了法政。他之“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就是“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当时的革命者还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日本留学6年，他研究各

国的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翻译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他的日记有详细的记录。在日本留学生当中，每次讨论这些问题，只有他能“本末悉举”，大家都很服气。在这方面他确实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在《罪案》中回忆，宋教仁在回国前夕说过：“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工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你以为如何？”宋死后，景梅九想起往事，痛心不已，挽联中有“破坏易，建设难，勉为其难，遂死于难”句。

辛亥革命之时，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发表宣言评点当世人物，认为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1911年12月1日）这不只是章氏一家之言，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中也如此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还有一句：“南京临时政府之议起，章炳麟君以国务总理许先生，先生亦以此自许。”

众口悠悠，几乎都说宋教仁以总理“自许”。一时舆论对他误会很深，以为他主张内阁制就是想自己当总理，乃是出于私心。经过数千年的君主专制高压，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片乡愿气息，似乎特别看重谦让，凡事都不



●宋教仁手书

能出自本人的口中，惺惺作态，假意退避，流弊所及，一时难以纠正，所以当时人们对宋教仁以建国大任自许，嫉妒、讽刺远多于赞助支持。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半月没能产生一个领导全国的中心机构，就与这些因素有关。他固然自信可以施展经世的长才，但他自知在年龄、声望、资历等方面，当时还不是担任总理的合适人选，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黄兴。一年后，时势变化，他才有总理自任的念头，这一点他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相告。

自辛亥革命以来，有关宋教仁想当总理的说法一直没有断过。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他曾两次公开在报纸上驳斥这样的攻击。一次是1913年3月12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驳某当局者》，针对外间谣传他之所以批评袁世凯政府，是因为当不成总理之故，他说：“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统或总理或国务员，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退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甚乎？”第二次是3月15日，他在《民立报》发表《答匿名氏驳词》：“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辨（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实不解。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各国政党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

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到武汉时，这样的谣言已甚嚣尘上，时为长江巡阅使的谭人凤劝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希望他留下来载酒同游，饱览长江风景。他的回答是：“总理我无冀望之心，载酒游江亦诚乐事，惟责任内阁实应时势之必要，未便变其主张也。”

对宋教仁而言，权位金钱不能淫，政见则不可牺牲，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骨。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总长、总理的位置，而是政见能否得到实施。当初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因临时参议院中有人反对，宋教仁没当成内政总长，只做了法制局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回答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说白了，他的从政实在是因为怀有一种责任心，建设这个生养他的祖国的责任心，这不是做官、抓权者所能理解的。阳光人物在一片缺乏阳光制度、阳光规则的土地上，注定了被黑暗的力量吞噬，这也是宋教仁的热血给予历史的启示。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 32 岁的阳光生命淹没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挚友于右任于万般悲痛之中，想起的正是一个月前他们同游杭州南高峰的这首诗，感慨海门之潮正汹涌而来，而“才、学、识”兼备的宋教仁已被生生地夺去了生命。然而，这决不止是他家人、朋友、同伴们的悲伤，也不止是与他同时代的国人的隐痛，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伤痛，是整部近代中国史不能弥合的创伤。因为宋教仁，我的心中总是想着南高峰，想着他留下的诗句，这位近代的阳光型政治家，有了他，西湖就有了别样的意义，西湖就有了近代的气息，不再是古典的山水，只活在苏东坡、杨万里们柔媚的诗行里，只活在张爱玲“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式的散句里，只活在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壮怀激烈、于谦的“石灰吟”和张苍水浩气长存的一声“好山色”里，也同样活在宋教仁的笔底，活在他心无旁骛为共和奔走的脚印里。

登南高峰，有几人还会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诗？要说悲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离登临南高峰不到一个月，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就响了，他被小小的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之中，枪声震颤了晨光熹微的民国。上海火车站记住了这一时刻：1913 年 3 月 20 日，3 天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一代人杰，



●南高峰上

中国近代史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一心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的转型，从暴力革命到民主宪政的转型，最终带着未竟的理想撒手而去。

举国同悲，普天共愤，眼泪和愤怒铺天盖地，从上海到北京，整个中国都为他的死感到悲痛，包括嫉恨他的人那一刻甚至也感到了失去对手的痛苦。对世事似懂非懂的小学生都在班上传观他被刺的照片印本。当时只有11岁，在常州冠英高等小学读书的程沧波回忆，国文教员给他们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就是《祭宋渔父先生》。多年以后他还觉得老师真荒唐，怎么叫小学生作祭文，他根本无法体会老师那一刻内心的怆痛。

宋教仁之死，引起一浪高一浪的抗议，从民间到国会，从报纸到集会，最后孙中山、黄兴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反对袁世凯，就连流连于水光山色的和尚苏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头愤然写下《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后称《讨袁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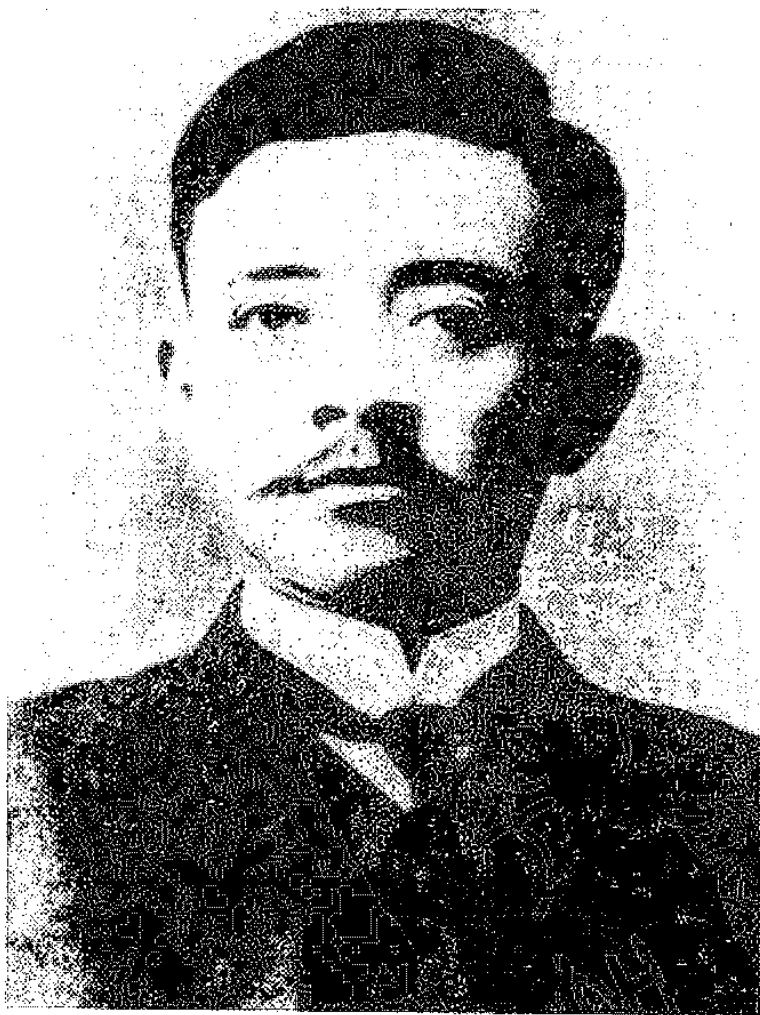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我之喜欢苏曼殊，先是这位“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诗句，以后看到他那些感怀身世的小说，在新旧文学的交汇点上，他哀怨动人的伤感文字，他悲剧的故事，无疑吸引并影响了年轻的一代。我把他的诗和小说都看成农业文明走向衰落时的挽歌，它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优美如画，也不是革命的高歌猛进、慷慨激昂，他的调子常常是忧郁的，仿佛有着无尽的惆怅，以后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依稀能找到一点苏曼殊的影子。作为过渡时代的人物，苏曼殊在文学史上、乃至辛亥革命史上都留下了富有个性的痕迹。

1898年，苏曼殊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求学，先后进过横滨的大同学校、东京的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等学校，过着清苦生活。为了节省火油费，他晚上不点灯。在日本，他参加过“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踏上了反清革命的路。为此他不惜与资助自己的表兄闹翻。1903年9月，他回到上海，写信给表兄，表示“今日黄浦投江死”，实际上是与表兄决裂。此时正是“苏报案”发不久，他在苏州吴中公学教书，给章士钊等人办的《国民日报》写稿，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成为最早将雨果作品译成中文的中国人。他一直有两面，一面是“芒鞋破钵何处去”的自我流放的心态，一面又敢于反抗社会黑暗、向强权说不，留下了“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的诗句。他不断地流浪、自伤，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出路，与他同时代的好友陈独秀、冯自由、柳亚子他们不同。当苏曼殊死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已大放异彩，其本人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成为举国青年的偶像。

这当中诚然有苏曼殊自身的性格原因，比如敏感、脆弱、自卑等，这



●宋教仁

些都与他童年的遭遇有关。坎坷的身世、后娘的苛待、畸形的家庭环境对他的伤害太深，他摆脱不了那种阴影。

1903年冬天《国民日报》停刊，苏曼殊带着好友到香港找《中国日报》的陈少白，受到冷遇，生计无着，愤而削发为僧，从此以和尚自称。其实，他的血未冷，1904年春他还曾决心用手枪暗杀康有为，表达对保皇派的强烈不满。因陈少白等人力劝，才没有实施。也是这年秋天，他在长沙参加华兴会，起义流产后，他在上海还参加过华兴会的秘密会议。毫无疑问，他也是那个时代的热血少年。

苏曼殊身上的病态显示了一个转型尚未完成的非常态社会特征，时代之病通过一个诗人、僧侣的人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五四”前夜的中国，他四处飘零的短暂人生，不幸的身世，让人羡慕的才华，处处都能打动人心。他写的是旧体诗、文言文，但他的诗文清新可读，有了“一脉清新的近代味”，字缝当中已是晨光熹微，长出了近代意识的几瓣嫩芽，预示了新文学黎明期的到来。

1918年5月2日，当苏曼殊在上海离世时，只有35岁。这位诗僧对杭州怀有独特的情感，他在灵隐寺、凤林寺边上的陶庄住过，一度在西湖雷峰塔下的白云庵昼伏夜出。他在西湖写过许多美丽的诗篇，其中有一首《住西湖白云禅院》：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

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始建于宋代的白云庵，清末民初的主持意周和尚是个革命志士，因此小小的白云庵成为秋瑾、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出没的地方。意周和尚说苏曼殊在五、六月间，白天老是睡觉，到夜里则披了短褂子，赤足，拖着木屐，在苏堤、白堤上到处跑，尽享湖山夜色，不到天亮不肯回去。他以酒当茶，诗画自娱，风流洒脱，手头窘迫，常常向庵里借钱，然后汇到上海的一个妓院。过不了几天，就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的糖果、香烟，他则躲在楼上吃糖、抽烟，饭也不吃了。

直到1924年6月，由孙中山出资，柳亚子等友人将苏曼殊葬在西湖的孤山北麓、西泠桥畔，还建了“曼殊塔”，与其遥遥相对的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苏姓美女苏小小之墓。生也匆匆的诗僧若有知，也许感到欣慰吧。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浪漫、颓废，在诗书画酒中将青春消磨殆尽的诗僧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1913年，面对宋教仁的血，苏曼殊写下的《讨袁宣言》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昔者，希腊独立战争时，英吉利诗人拜伦投身戎行以助之，为诗以励之，复从而吊之曰：

（希腊！改换了你的主人，你的情况仍旧这般！

你的光荣日子过去了，但你的耻辱岁月还是存在。）

呜呼！衲等临瞻故园，可胜恻恻！

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杀人如草；幽、薊冤鬼，无帝可诉。……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昏；新造共和，固不知今安在也？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

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

宋教仁遭暗杀，文人苏和尚持钵而起，书生任鸿年悲痛绝望，选择了在西湖边投井自杀。1947年10月25日，一个阴霾的日子，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和“中国科学社”的老友任鸿隽步行来到白云庵即月下老人祠遗址。他当天的日记中说，任鸿年就是任鸿隽的弟弟，当年只有24岁，因宋教仁之死，“觉中国之无望，于烟霞洞旁投井而死，革命同志为之葬于白云庵旁。此卅年前事，迄今墓地旁野草丛生。月下老人寺既废，寺僧亦不能照顾矣……”（在任鸿隽的记忆中，他弟弟“发愤投葛洪井死”。）

又是两个30年过去了，任鸿年之墓早已无处寻觅。中国有重官的传统，西湖边上那些达官贵人乃至红粉佳人的墓都纷纷重建，比如王文韶、



● 苏曼殊之墓

陈夔龙等明清做过大官的故居、墓穴都成了新景点，“慕才亭”中虚拟的苏小小墓更是成了芸芸游客“摸财”的去处。而像任鸿年这样的志士注定了被淡忘，甚至被彻底遗忘。宋教仁是谁？今天的许多红男绿女尚且一无所知，何况任鸿年、苏曼殊。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 《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
2. 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 年版。
3. 徐血儿等，《宋渔父》，民立报馆，1913 年版影印本，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三编之 84
4. 吴相湘，《宋教仁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
5. 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影印本），中国书店，1985 年版。
6. 《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1898年的春天，19岁的安徽秀才陈独秀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功课有英文、法文、天文学、造船学。没有多久，他即因反清言论受到追捕，逃往南京。1909年底，他再到杭州，在浙江陆军小学当了两年国文、史地教员，与马一浮、谢无量、沈尹默、刘季平等徜徉山水，诗酒往还。几年以后，他在上海手创《青年》（《新青年》）杂志，或许包括他本人在内都没有想到一本民刊竟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改写了历史。在摆脱“衰世”的努力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可以把那个时代叫做“五四时代”，或者干脆叫做“《新青年》时代”。陈独秀唱的不是独角戏，他也不是这方小小舞台上的唯一主角；《新青年》更不是一花独放，但他无疑是当时引领潮流的人物；《新青年》无疑是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杂志，许多新人物都在这个小杂志上破土而出，进入历史的视野：胡适、鲁迅、周作人、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吴虞、傅斯年、钱玄同、刘半农……他们的名字是读者所熟悉的。

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是一个引领风潮、造成时势的新人物，从《时务报》到《清议报》《新民丛报》，他以带有感情的笔锋风靡了一个古老民族，直到“五四”之前无人可以代替，辛亥革命后围绕在他身边的张君勱、张东荪、蒋百里、蓝公武等一批知识分子，也都代表了当时最优秀的一群人。这个群体在“五四”时代仍非常活跃，他们主办的《时事新报》《晨报》等报刊，永远留在那一代读者的心中。

梁启超故后，杭州人张东荪坚持书生议政，试图走出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两极对峙的夹缝之中的“中间势力”。时代的洪流浩浩荡荡，已非晚清民初的大势和格局。张东荪构想的民主政治、计划经济蓝图，曾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许多中间知识分子的共识，即中间偏左，与胡适走的路不一样。生死成败转头空，是非功过却不能不认真，也许今天还不到从头细说的时候。

“五四”成就了年轻的胡适，作为新思潮的代表、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一生以思想、言论、学术影响社会，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学冠中西的优秀知识分子，包括丁文江、傅斯年、梁实秋、徐志摩、王

世杰、叶公超、丁西林、蒋廷黻、任鸿隽、陈衡哲等（一度也包括罗隆基、王造时、闻一多等人），他们的思想容或有分歧，但在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上，在民族前途等问题上他们有着基本的共识，以胡适为中心的这个知识分子集团曾先后通过《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以及《大公报》等平台发出他们清醒、理智、独立的声音。（胡绳晚年也承认胡适“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胡适反复强调，要在思想文艺上面努力，为新社会造一个基础，1948年冬天离开大陆之前还含泪对司徒雷登说，自己战后回国把精力耗费在《水经注》等考据上，没有尽到应尽的思想言论方面的责任，深为愧疚。

从梁启超到胡适（这中间也包括了许多其他人的努力），晚清、民国当然是个动荡的乱世，却是王纲解纽、思想开放的半个世纪，中华民族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在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和民初军阀的刺刀，乃至蒋介石的一党制下，文化思想的多元化进程从来没有停止，其开放程度是我们今天不容易想象的，虽然其中也伴随着杀戮和流血。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梁启超、胡适这些公认的思想领袖。思想领袖只能建立在人们内心的广泛认同之上，和千千万万普通人同命运、共呼吸，他生活在普通人当中，而不是游离在社会之外；他的力量是一种和风细雨，是空气，阳光，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而不是雷霆，不是暴风骤雨，不具有任何外在的束缚。他们在权力格局之外对青年、对世道人心产生某种内在的影响，哪怕不能左右时局的变迁，王朝的更迭。

胡适曾在西湖烟霞洞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三个月，寂寞的烟霞洞旁边埋葬着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师复的遗骸，火一样的理想燃尽了师复年轻的生命。师复追求的无政府主义梦和中国固有的古老“桃花源”之梦并不一样，这个梦不是出世的、宁静的，悠然见南山的，而是入世的、灼热的，带着强烈的改造世界的冲动，与胡适信奉的自由主义强调点滴、渐进等原则不同，他寻求一种彻底的解放，一种纯粹的理想境界，他的梦注定了在现实世界中碰得粉碎，他依然无所反顾、毫不犹豫地前行，不怕任何的阻力，宁折不弯，平静地面向死

亡。他要以道德的自我完善、整个生命的奉献去为理想殉道。我们可以不认同他的主义，却难以否认他身上的那股子气，那种理想的情怀。当我的目光落在永远年轻的师复身上，我想到了活过100岁的巴金，他们是精神上的同道，我也想到了许多与师复不是同道的早凋者或长寿者。在历史的天平上，生命的长短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无论他们最后选择了怎样不同的道路，在他们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异质的光，那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光，一旦汇入我们的心中、汇入我们的梦中，这光也就属于了我们。如果说中国缺乏自由主义的传统，胡适出现了，傅斯年出现了，这就是传统。确实，传统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

■

第六篇

火一样燃尽自己的师复

离西湖烟霞洞不远，有一个“师复墓”，墓志铭就刻在摩崖上，字迹依稀可辨：

师复为人道主义者，生平谋炸悍将，厉行革命，被锢三年，出而组织东方暗杀团。辛亥而来，舍其单纯破坏，转而为自由社会主义宣传，创晦鸣学会、世界语研究会及心社。旋发刊《民声》杂志，淬厉自刻，尽瘁其主义，呕血而死。死年才三十有一，不终其纪。痛矣！君于公历 1884 年 6

月 27 日生于东亚之广东香山县，以 1915 年 3 月 27 日歿于上海，同年葬于浙江西湖之烟霞洞，越八年而修其墓，以志不忘。



师复本名刘绍彬，因立志反清，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信仰无政府主义之后，他连姓氏都废弃不要，改名师复。三个名字代表了他短暂一生的三个不同阶段。1923 年，他的生前好友重修其墓，将郑佩刚撰文、王思翁书写的这个墓表镌刻在崖石上。

● 师复墓

一 安那其主义思潮在中国

“无政府主义”本是日本的译法，高一涵主张译为“无治主义”，辜鸿铭主张译为“无王主义”，师复的墓志铭称为“自由社会主义”，巴金等人干脆用译音“安那其主义”。无论叫什么，都不能否认那曾是19世纪的一股世界性思潮，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慷慨悲歌，伴随着他们流放西伯利亚路上的漫漫风雪，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理想曾激动过几代青年，《面包与自由》等都成了传世的经典，也是几代年轻理想主义者的口号，活了104岁的小说家巴金就是他们在东方的传人。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亲口对斯诺说，他年轻时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20世纪这一思潮初传中国，打动了一些正在寻找精神出路和民族出路的读书人，李石曾、吴稚晖、张继、刘师培、张静江等一度都热衷于此，《天义报》《新世纪》《衡报》《人道》等中文期刊先后在日本和巴黎问世，那时无政府主义思潮和“驱除达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浪潮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包括蔡元培、马君武、马叙伦、杨笃生等人都曾写过一些介绍文章。（直到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中，还包含了许多无政府主义式的梦想。）

民国初创，多元格局出现，各种政党、报刊蜂起，中国社会党以太虚等人代表的一派就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出版过《社会世界》《良心》月刊等，并另组社会党，很快被袁世凯取缔。师复创立“晦鸣学社”与《民声》周刊，系统介绍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被看作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奠基人。

“五四”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各种刊物应运而起，《进化》《劳动》《自由录》《民风》《新生命》《闽星》《奋斗》《劳动者》《自由》，等等。《民国日报》著名的“觉悟”副刊也发表过太朴等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毛泽东等人热衷过的新村运动、匡互生在上海创立的立达学园都带有无政

府主义实践的痕迹。就是在那个时候，少年巴金在四川皈依这一主义的。（他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办了《半月》，1921年4月1日，当他在这个杂志17号发表《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时，他只有17岁。杂志被军阀查封，是他第一次尝味到专制的滋味，但他没有丧气。当年9月1日，他的《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又在新办的《警群》上发表，开篇提出“现在中国的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一般的青年人处在这种势力下面，被他弄得全无生气，力量薄弱的只能顺世堕落，不敢稍有反抗，稍有血气的也只有忍气吞声，听天于命”。他说这个主义最令他满意的就是“重视个人自由，而又没有一种正式的、严密的组织”。他远去巴黎就是要去取安拿其主义的真经，他的《爱情三部曲》贯穿着安拿其主义追求与幻灭的淡淡忧伤，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不时怀念早年的那些同伴。在《我的幼年》中有深情而无奈的回忆，这是他百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影。）

师复虽然早逝，但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们一直忘不了他，他的筚路蓝缕之功，他的坚忍不拔的意志，他的苦行僧作风，他的大刀阔斧、冲锋陷阵的勇气，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都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闯开了一条路。虽然这一思潮最终在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洪流中渐渐枯竭了，但我们否定不了包括师复在内那些青年的热情、热血和理想情怀。那一激动过无数热血青年的思潮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更不是见不得阳光，而毋宁带有更多理想主义色彩，其核心其实是人道主义，尽管其中包含了很多幻想成分。今天，我们可以不认同他当年的信仰，却也不能不佩服他身上那种人格力量。《民声》周刊上有师复的大量文章，可见其战斗的豪情，他为主义牺牲生命的那股子劲。他生前的文章，有1927年出版的《师复文存》。在整个安拿其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中，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回溯这股思潮，就不能回避这个人物。

二 也曾热血侠少年

刘家在广东香山是个大家族，被称为“水楼刘家”，师复的父亲就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在维新运动期间创办了当地第一所新式学校，组织了“天足会”，允许其女儿留天足，带头下河游泳，还每年印赠小册子，宣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筑路，被看作香山县第一个新派人物。

师复15岁中秀才，名列全县第一，到广州应乡试，亲眼目睹科场黑暗，产生厌恶心理，后来他对弟弟刘石心说：“看到考场的黑暗情景，才使我认识到政治非改革不可。”

从此，他开始独自研究小学和诸子，作了大量的笔记，对中国古代的数学，如天元、八线等，尤其有深入研究。1904年，他先赴香港，再到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和汪精卫成为好友，两人结识了一位俄国的虚无党员，学会了造炸弹，并相约从事暗杀活动，汪北上暗杀摄政王，他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凶狠残暴的李准当时成了广东革命的一个大障碍，1907年，他在广州等待暗杀李准的机会，不料在一次制造炸弹时发生了意外的爆炸，他的头、胸、手到处是伤，血流如注。幸亏隔壁的医生、也是革命党人的伍汉持赶来，他请伍医生将两颗制成的炸弹扔进屋后的水井里，并在警察赶到前烧毁了违禁的物品。他被送进医院后，没有吐露真实姓名，自称“三水李德山”，做化学实验不慎爆炸，却被原在他家乡香山做知县、时为广东营务署总办的郑荣认出。他回国之初，在香山创设演说社、阅书报社，暗中提倡革命。那时风气未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盛行，不准女子读书，他借助清廷鼓励兴新学的机会，不顾种种反对和非议（包括知县郑荣和人称“何老虎”的大乡绅何玉铭在内），私人集资在香山创办了第一所女学校——隽德女校，使当地女子有上学的机会，因此与郑荣发生过冲突。他曾在公堂上大骂郑荣反动。他左手伤势虽重，本来是可以保下的，但郑荣令医生锯掉了他的左手，使他终身残疾。（可别小看他一只手，以后办《民声》印刷部，他一只手排字、印刷、摇机，什么都能干。有人担心他做事不便，



● 师复编的书刊

想帮他，他总是婉拒。有朋友作了一联：“稚晖五体投地，师复只手回天。”前一句，是吴稚晖写给师复信中的话。）故乡香山的绅士父老上千人联名保他，朋友郑彼岸（原名云鹗）只身上北京告御状，结识了京师的一些达官贵人，为刘师复说话，最后他被以嫌疑犯身份而移往故乡香山县监狱监管。

这个敢于暗杀清廷大员的热血少年，在狱两年多，始终不屈，以读书自娱，写了《粤语解》《佛学大意》《狱中笔记》等文章，有些曾在郑彼岸主办的《香山旬报》上发表。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起草了《改良监狱议》，呈给正在筹划改良狱政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受到赞赏。闻他的事迹而怀仰慕之心的香港安怀女子学校教师丁湘田（他后来的女友），赶到香山探监，在他家住了五十多天，他始终不同意见面，只愿书信往来。为救他出狱，上下疏通，他家因此破产。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即位后大赦天下，香山绅士上千人联名保释，他才于1909年底获释。

他出狱后，即到香港结合有志于单独行动的个人，组织暗杀团，以反

抗暴政，成员中包括陈炯明、谢英伯、高剑父、林冠慈、丁湘田等。这个时候他主张单纯的破坏主义，认为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波兰亡国记》一书对他影响很大。1911年，暗杀团团员林冠慈在广州双门底炸李准，李沛基在大南门炸死广东将军凤山的行动，都是他精心策划的，炸死凤山的炸弹还是他亲手制造的。这都是当时轰动视听的大新闻。

三 心社 · 晦鸣学舍 · 世界语研究会

辛亥革命爆发，他与刘兆槐在靠近香港的新安组织革命军，名为“兆军”，和他一同发起和赞成“心社”的莫纪彭、郑彼岸、林君复等则策反驻扎香山与澳门交界处的一支清军，组织“香军”，有咨议局议员身份的陈炯明由惠州起兵，称“惠军”，纷纷进驻广州。当他领军进城时，莫纪彭还不认识他，“却看见前头一个马上人，高提青天白日旗，一只手提得高高的，另一只手垂在马背，垂得低低，又套上雪白的丝手套。旁的朋友告诉我：‘这一位就是炸李准不死的刘思复了！’”因为陈炯明要他们主持协调各路民军而成立的“军团协会”，二人从此成为好友。不过，师复没有像其他革命党人那样从此踏上从政之路，而是踏上了另一条永远看不到尽头的不归路。

师复的弟弟、受他影响参加过无政府主义活动的刘石心说，从思想上来说，他哥哥是受托尔斯泰、《新世纪》的影响。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内部争权夺利，一片乌烟瘴气。为寻找出路、探求未来，他从热烈的民族主义急先锋转向无政府主义信仰。广州独立之后，胡汉民与陈炯明之间，以及其他错综复杂的矛盾都开始凸现，他与莫纪彭等居间调停无效，深为失望。他把军队交给陈炯明，准备北上去刺杀摄政王载沣（后来改变计划想杀袁世凯）。到达上海，师复正遇到汪精卫出狱南下，汪告诉他南北和议即将实现，他们的暗杀计划就此作罢。一路上，他耳闻目睹湘、浙、赣、皖等地同样争权夺利的事实，包括湖南独立后的第一任都督焦达峰、陈作新等的

惨死，都让他深为失望。

他和丁湘田、郑彼岸等人到了杭州，游览西湖之胜，在白云庵一住一个月。在美丽宁静的西湖边，他思考辛亥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认为任何官府和官吏都是不好的，要从根本入手，也就是从个人品德的修养做起，而解决这些弊病的良方就是无政府主义，“心社”之约由此萌发。他以为民国已经告成，单纯的破坏时期已经过去，从此可以一门心思传播无政府主义。这是师复初次与西湖结缘，他怎么也不会想到3年后自己将归葬在西湖。

1912年5月，他在广州发起成立“晦鸣学舍”，加入者多为他的朋友和亲属。他有兄弟姐妹13人，受他的影响，或多或少几乎都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的活动。陈炯明对他的选择表示同情。7月，他将自己的姓名“刘思复”易名为“师复”，从此废姓，并与郑彼岸、莫纪彭联名发表“心社”社约十二条：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做官吏；九，不做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做陆海军人；十二，不奉宗教。同年2月，李石曾、张继、汪精卫、吴稚晖等发起“进德会”会约，也是相约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这些“会约”曾在上海影响很大的《民立报》上公开发表。哪怕其中有许多空想、不切实际的成分，却都折射出社会大转型时期部分中国人对个人操守德行的一种追求，旨在为社会树立新风气，为新世界创造前提。

严格地说，“心社”和“晦鸣学舍”不一样，那只是个人道德修养与精神上的结合，不是一个有形的团体。1913年8月，在《晦鸣录》第二期发表的《师复启事》说：“师复去年与同志发起心社，取绝对自由主义，无章程，无规则，亦无一切组织，各凭一己良心以相集合。”师复自己清心寡欲，淡薄名利，很仰慕托尔斯泰的为人。“心社”的十二戒条，他无不躬身实践，丝毫不肯放松。他只肯与丁湘田恋爱，却不愿有婚姻，他们有一个女儿，也不知后来情况如何。即使病重时，医生多次劝他吃肉，补充营养，他也迂执地不破戒。与他来往的亲朋无不受他感化。他反对抽烟，有一天朋友们在广州东园聚会，有个朋友正在吸烟，听说他到会，马上把香烟藏在衣袋里。有一政客乘轿来拜访他，到了离“晦鸣学舍”还有一截地的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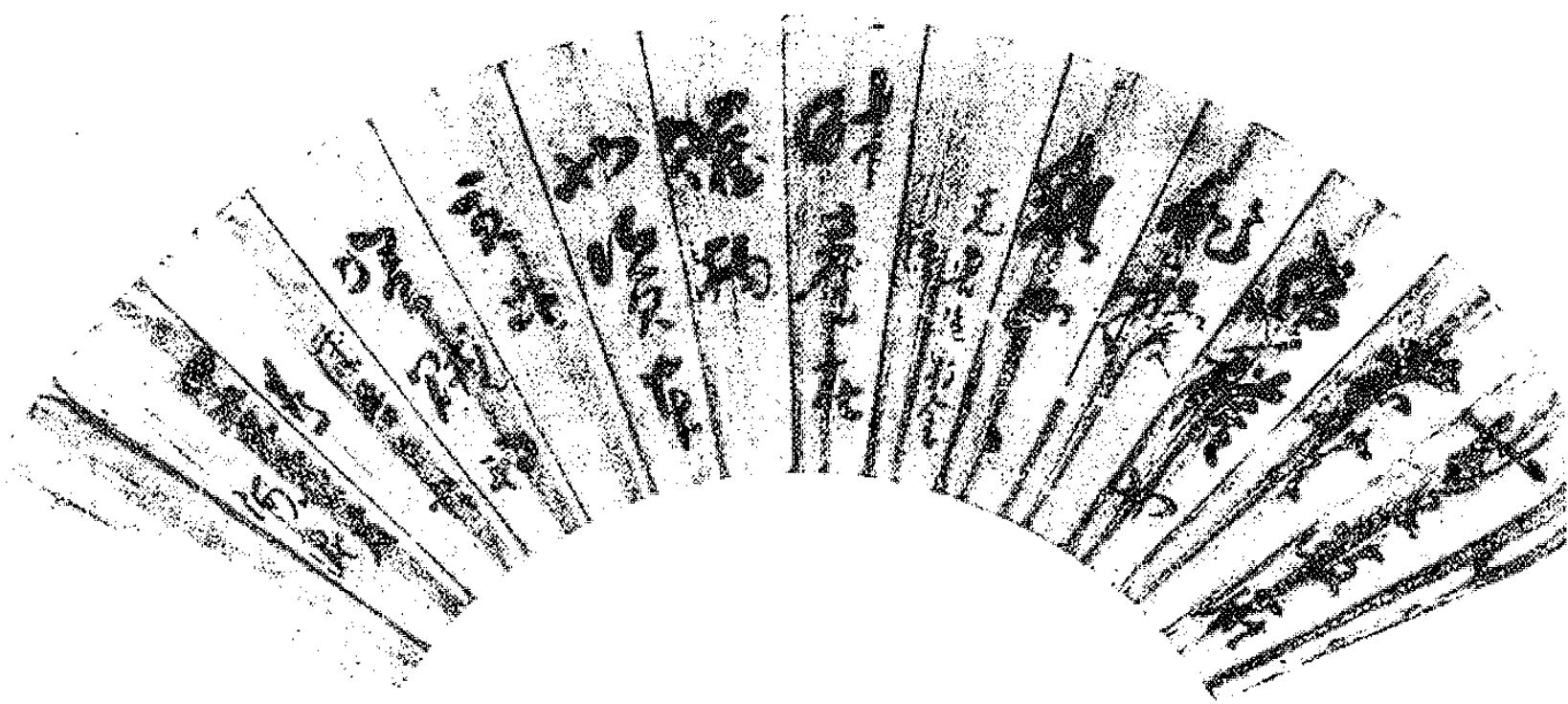
即自觉地下轿步行。他绝不强求别人，但他自身的行为在无形中对周围的人起了些感化作用，使不拘小节的人们在良心上会感到一种不安。

他认为都市太繁扰，想约同志去乡村居住，半耕半读，建立一个大同村。他们在广东新安县的赤湾找到了一块地方，由香港航行2小时可到，面临文天祥叹息过的零汀洋，挨着宋帝陵，枕山面海，风景天然，有水田近百亩，能结果的荔枝四五百株。莫纪彭回忆，1913年春天，他们第一次找到这里，归程时回望，“早熟的荔枝，已垂垂如大小红紫玻璃球，弥漫悬空。”他们就叫做“红荔湾”，试图在这里开辟一小块无政府主义的实验基地，推行新村计划，郑彼岸提议取名为“红荔山庄”，但终因“二次革命”爆发、政局骤变而未成。

在“晦鸣学舍”，大家一起劳动、学习、生活，相互帮助，人人平等，把这个学舍看作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经费来源则是当初为暗杀团募集的。师复经常给他们讲无政府主义理论，有时出题目让大家作文章。丁湘田教语文，圣约翰毕业的李希斌教数理化 and 英语。“晦鸣学舍”的藏书中有英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节本，有法文版的《傅立叶传》等。当时他们的主要劳动是排字和印刷，他们选印《新世纪》上的文章，发行《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刻》等小册子，重印了《新世纪丛书》，每种都印了5千册，免费赠送读者，邮寄到国内各报馆、会社、各省议会、县议会，“无政府主义”这个名词才渐渐广为人知。此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对国内影响甚微，虽然李石曾、吴稚晖早在1907年就在巴黎编辑《新世纪》周报，介绍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但很少传入国内。直到“晦鸣学舍”创立，无政府主义的种子才开始在国内撒播。

“心社”十二条社约也是这个时候才正式对外公布的。莫纪彭回忆，“知识分子，看见十二条条文，多数是莫逆于心。短时间广州市上，茶座酒楼，有闲谈必谈心社。谈心社十二条条文，有闲的人们，谈心社是最新鲜、最时髦，又最好不过的谈话资料了！”

期间，他偶尔接触到刚刚传到中国的世界语，认为世界大同，应该以语言统一为先导，所以对提倡世界语非常热心，发起“广州世界语学会”，曾被推选为“环球世界语会广州分会”会长。每天他从西关步行到东堤会所，



●师复手书扇面

到夜深二三时才回家，即使刮风下雨也是如此。短期内，广东参加世界语会的有三四百人，世界语学会成立大会有上千人参加。这与他的努力号召是分不开的。

四 《晦鸣录》到《民声》

1913年8月20日，正值干戈不息、扰攘不安的袁氏当国之时，“晦鸣学舍”创办的《晦鸣录》周刊问世，20开本，16页，标举反抗强权、实行社会革命、谋取平民自由幸福的宗旨。只出版了两期，他们就被袁氏在广东的死党龙济光查禁，“晦鸣学舍”也被封闭，袁世凯政府通电全国各省缉捕师复。他举家迁到澳门，将《晦鸣录》改为《民声》继续出版，也只出了两期，袁世凯下令外交部照会葡萄牙公使、广东当局照会驻澳门的葡领事，禁止《民声》出版。广东当局甚至派人要将他从澳门劫持，幸得他闻讯有了戒备。他在勉同志文中说：“杀戮囚辱，固无政府主义党之乐乡。”

1914年元宵节后，他们几经周折，转往上海（后安顿在法租界），以“世界语传习所”为掩护，恢复出版《民声》。《民声》成为传播无政府主义

最有力的刊物之一，包括克鲁泡特金、格拉佛、大衫荣等在内的世界各国无政府主义先驱都给予鼓励。吴稚晖曾劝师复去法国留学，但他认为，中国只有他最熟悉安那其理论，又有决心传播，还能筹款维持刊物，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他，终于没有出国。（他故后，刊物勉强坚持到1916年，出到第29期就停刊了。1921年区声白等又在广州复刊，出至第34期停刊。）

他在《晦鸣录》的编辑序言中指出，办刊就是要传达“平民之声”，不限于一家之学说，不囿于一党之见解，独立不倚，表达自己良心上的是非，说出人人心中想说的话，以真理为目标。他理解的无政府主义首先就是反抗强权，反对军国主义等许多形形色色束缚人类自由、妨碍人类幸福的教条，出路是万国大同、语言统一，人道主义、人类自治是核心。为此，他写了大量文章，阐明无政府主义的正确和可行性，苦口婆心地进行解释，有时同一期刊物上就有他的多篇文章。1914年4月18日，他在《民声》六号发表《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文，从学理角度认为孙、江所言只是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之后，他还发表过《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等文，对“中国社会党”创立者江亢虎的观点多有驳斥。

师复离世12年后，1927年5月30日，郑佩刚等在上海出版《师复文存》，梅定成执笔的序言中说：“师复本无政府主义党健全分子，为同志中前辈后生所共倾服，以其有毅力，有勇气，有热情，有道德，有品格，所谓‘一点不留余渣十分成全自身’者，是固一模范实行家。”他虽不以文字知名，但读他的文字，无不深入浅出，语重心长，“说高尚之主义，如数家珍，能令阅者忘疲，听者兴奋。”他的文章能破、能立，三寸铁管，洞察幽微，有缚马伏虎的笔力，对某些主义、信仰之祸害尤有先见之明，赞同他的人称其文字为“降妖伏魔之法宝”，“足令举世妖孽，望影惊避”。

1914年6月，师复致函无政府主义万国大会，报告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的历史和现状，并向大会提议：1. 组织万国机关；2. 注意东亚的传播；3. 与工团党联络一致进行；4. 万国总罢工；5. 采用世界语。此前，他就在《民声》特设了一个世界语部作为通讯机关，与世界各团体、同志相互联系，交换杂志，讨论问题。

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纠结在一起，所以又称为“无

政府社会主义”或“无政府共产主义”。这年7月，师复在上海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起草成立宣言，发表《无政府共产党目的与手段》等文，主张经济上、政治上的“完全自由”，一切生产要件归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权，废除钱币，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废除一切宗教，人人劳动，不要政府、军队、警察、监狱，不要一切法律规条，人人受平等的教育，自由组织各种公会，“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等等。这些主张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他的主张中比如世界大同，重视人道，反对强权，废止家族，反对迷信等，即使今天看来也都还有价值。与此同时，师复在广州的弟弟刘石心与黄凌霜、区声白等一起成立了“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常熟等地也有人成立类似的社团，他们相互联系，讨论学理。

师复的《无政府浅说》讲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无私产，无家族，……人人为社会尽力工作，所获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已与人共享受之，所作所为，无一非为己，亦无一非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表述几乎一致，可以说，这股无政府主义思潮为后来社会主义的传播埋下了伏笔。

《民声》的编辑几乎由师复一个人负责，从写稿、校对、处理来信到排字、印刷等，工作繁忙，结果把身体拖垮了，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无钱医治，友人多劝他把唯一值钱的印刷机器卖了，他坚决不干。好不容易有朋友借钱送他进了医院，医生说他身体衰弱，须补充营养，要多吃肉类、蛋类和牛奶等，但他要恪守“心社”社约，宁死不破戒。病重之时，他还写了《上海之罢工风潮》的评论，对社会民生耿耿不忘。1915年3月27日，他在铁道医院病亡，临终之前留下一封给友人的信：“文明科学本为富人之专利品，托尔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绝之也。现在《民声》垂危，几将易箴，余之忧《民声》，比忧病为更甚。倘《民声》呜呼，余又真成为不治之痼病，则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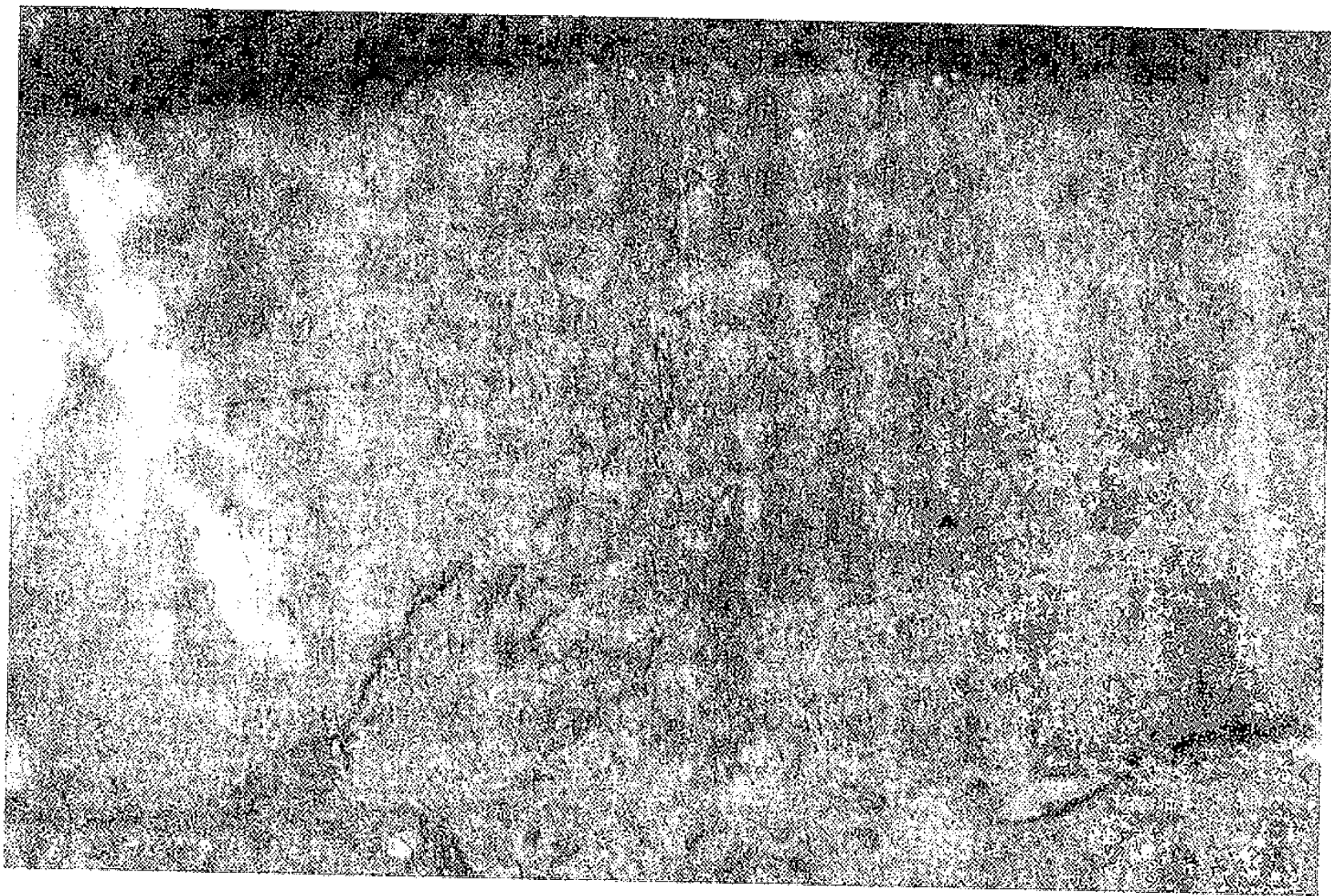
师复之死，大大削弱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像他这样坚韧卓绝，知行合一，既有探索学理的热忱，又有实践能力的人物可谓后继无人。从“心社”、“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到“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从《晦

鸣录》到《民声》，短短三、四年间，他的生命如同火一般熊熊燃烧，最终燃尽了自己。他编印《民声》，劳神竭虑，每出一期，就要卧病几日，但病稍好，他又照常风风火火地干开了。在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中，他确实只手撑起了一片天空，在他的努力下，无政府主义的种子开始播在古老的大地上。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书中说，师复因为目标的严肃性并致力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而受到广泛的尊敬，他去世后，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楷模。“师复之所以闻名不是因为思想的独创性而是因为宣传这些思想时的热情。”在他弟弟石心看来，他短短的一生不妥协、生活严肃、求知专一、有雅量、爱美。莫纪彭在《回忆师复》长文中称，这五点正是他建立安那其信仰的个人人格，以人格感召，是和平革命一条最稳健的路线。

1927年3月，《民钟》杂志继1923年的“克鲁泡特金”专号之后推出“师复”专号，吴稚晖等许多重要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纷纷撰文纪念。毕修勺如此缅怀师复：“如果信仰主义的人有大无畏，百折不挠，以主义为第二生

●师复墓志铭



命，甚至于列主义于生命之前，于主义有益的事，虽粉身碎骨亦所不却”，“说到这层，我就想到师复，想到我所敬爱的师复的精明，以身殉道，以主义为第二生命的可羨可慕，尤其是在乌烟瘴气的中国，有这样纯洁的人格。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在中国只有他可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他无时无地不以主义为自己人生的目的，殚精竭力，使之实现于世。”1930年，巴金从法国回来，第一次到杭州，即上烟霞洞为师复扫墓，相隔70多年，这一幕仍留在93岁高龄的巴金记忆中。

师复去世的噩耗传到美国，挚友郑彼岸曾写下两副沉痛的挽联，概括其生平和他们理想无成的悲怆：

春梦断江南，红荔湾头虚宿约；
夜盟记湖上，白云庵里痛前尘。

继秋璇卿女士分占湖上青山，他年三竺重经，感旧应添一付泪；
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黄土，此日重洋怅望，哭君宁为十年交。

主要参考书目：

1. 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
4. 莫纪彭，《回忆师复》，《莫纪彭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
5. (美)阿里夫·德里克著、孙宜学译，《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 李喜所，《略论民国初年的社会主义思潮》，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方论丛》1983年第6期。

第七篇

烟霞洞中日月短

——“新思潮”的代言人胡适

山门外摆摊的老头子，
拿着两大杆密密累累的桂花，
一大早来敲我的房门，
喊道：“胡先生，桂花开了！”

我接过这样热诚地送来的礼物，
我感谢他带来这样可喜的消息。

前天出门还没留意到那些细小的
花苞，

想不到今天便满山都是桂花香了！

……

1923年9月29日，胡适写下了这首《烟霞洞杂诗之一》。每次到烟霞洞，我总是会想起胡适，想起他的《山中日记》，那段“神仙”生涯已永留在他飘逝的梦中。那年10月3日，在离开烟霞洞的前夜，胡适辗转难眠，在日记中说：



● 胡适



●今日烟霞洞

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

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10月6日，他在上海忆及杭州的日子，写诗一首，记下了游玩花坞、西溪路上看到的“竹叶青”（靛青花）之美。当月19日，他在离开2周后又重回杭州，住在里西湖边上的新新旅馆，尽情地玩了半个月，荡舟湖中，爬葛岭，登初阳台，吃“楼外楼”，重游西溪，看西湖日出，到湖心亭看月，枕在徐志摩身上唱诗高谈。他说，湖上，自己最爱的是平湖秋月，湖边最爱的是葛岭。10月30日，他在日记中说：“今日离去杭州，重来不知何日，未免有离别之感。”

之后的二十几年中，他有很多重来杭州的机会，直到1948年10月20日，他最后一次来杭州，到浙大演讲，这才是真正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来去匆匆，他竟没有为永别而感慨一番。

胡适在西子湖畔留下的身影、声音已如晨雾暮霭般远去，但他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播撒的种子，如同他喜欢的《圣经》中的这句话：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胡适其人，历史将留下怎样的一段空白，将会有怎样的一种遗憾。胡适生前温文尔雅，即使是批评北洋军阀、国民党当局的尖锐言论，也不是怒目金刚式的，他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生平教书、演讲、做学术、写时评、钻故纸堆，但他留下的影响在20世纪却只有少数几人可以与他比肩。

1953年1月17日，举国上下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郭沫若、周扬、艾思奇、胡绳、王若水等纷纷操笔上阵，批胡文章漫天飞舞。有记者在美国访问胡适本人：“你对这个批判运动怎么看？为什么中国大陆把你

定为反动思想？你这个敌对思想是什么思想？”胡适想了一下回答说：“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怀疑，我一生就反对独断，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些话就是他所理解和倡导的新思潮，他曾经是“五四”新思潮最重要的代言人、解释者。1923年6月22日，他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写《一师毒案感言》中说得明白：

“新思潮”是什么东西？在我个人看来，新思潮并不是几种生吞活剥的主义；新思潮所以能自别于旧思想，只靠一点：只靠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叫他做“评判的态度”。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信仰，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须要用冷静的眼光，搜求证据，搜求立论的根据，搜求解决的方法：这便是评判的态度。

胡适一度收集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曾拿出来给叶公超看，说自己想写一篇总答复，叶公超劝他不必，“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

A piece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black ink on a light background.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It consists of four vertical columns of characters.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olumns read: '學者所以學為人也。' (Scholars study to become like people), '已非有他也。' (It is not that there is anyone else), '丙午夏月適。' (In the summer of Bingwu, Hu Shi), and '錄陸子語以自警。' (Recording Mr. Lu's words to warn myself).

●日记内封胡适自题

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1948年，在南京的一个私人场合，钱昌照当面问胡适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这样回答：“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他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1949年，钱到北京，曾把这些话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周恩来说：“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对他并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会转变的。”

这些对话记在《钱昌照回忆录》当中。

大陆发起批评胡适的运动，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响，其实毛泽东也很清楚胡适不是一无是处。唐弢在《春天的怀念》中回忆，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转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页）

用不着等到21世纪，胡适的形象就开始恢复，“胡学”也渐成显学，李慎之生前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



●永远在微笑的胡适

胡适常常感叹自己书生的“天真”。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我常望胡适能够像他30年前一样，成功卓越地领导一场在自由与民主基础上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胡也表示，战后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才华回归到与他相宜的学术领域，对此他后悔莫及。”时间已经不等胡适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但他播下的那些小小的种子没有在大地上灭绝，春风吹过，又会复活。

多少年后，人们蓦然回首，胡适还微笑着，站在历史中。

一 养病烟霞洞

胡适第一次来杭州是在1907年3月，他和中国公学的全体同学到西湖旅行，写过一首《西湖钱王祠》：“步出涌金门，买舟钱祠去。潋潋西湖水，惨淡前朝树。江潮尚依然，盛业归何处？”发表在1908年6月9日的《竞业旬报》上。多年以后，他在《四十自述》中还为自己当时全不懂“诗韵”，只依故乡安徽的方言顺口而写不无惭愧。

1922年底，胡适身体不太好，北京的政治气候也很坏，包括丁文江等朋友在内，都劝他到南方休息一些日子，银行家徐新六还帮他借了西湖金沙港一个吴姓的庄园。1923年4月21日，他终于下决心离开北京，暂时告别北大的讲台和他自办的《努力周报》。4月29日夜，他从上海抵达杭州，住在开窗即是西湖的新新旅馆，一直住到5月3日，期间任鸿隽夫妇、朱经农来杭州，也都是住在新新旅馆，杨杏佛、唐肇黄等来，住在环湖，他在西湖游玩时，还加上他表妹曹珮声、诗人汪静之等。有两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杨杏佛曾

又

意者，则弃望菲食。然此时今之，船头无岸。
 雪裡红桃细花生，真耐味。灯边白薯六焦
 醉透味。糖前蔗色艳，逼人。蜜汁樱桃一瓶，
 僅存底裝。然媚兒猶嘆：苦口不保嘗新味，姑
 割！
 眼梅當已吐黃，紅梅六墨結蕊。眉六自道
 如花，尤堪梅，奈何屋具大俗態，即此冷香客
 來，慮不排適。想：一枝疏影，一窗寒月，一
 領清新，一條板櫓，竟。境何嘗不美妙？然眉
 兒怕冷，寧懸在繡花被中重睡入夢也！

●胡适手迹

送他一首《西湖纪痛》诗。他自己在5月3日写的一首白话诗《西湖》（发表他自己办的《努力周报》）中有这样几句：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得更利害了！

……

我没有气力去爬山，
只能天天在小船上荡来荡去，
静瞧那湖山诸峰从容地移前退后。

也就是这一天，他的脚痛稍好，感到走路不很吃力，动身去了上海。6月8日，他再次来到杭州，下榻在新新旅馆，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也在，还有晚清杭州知府林启的儿女。那天是个阵雨天气，午饭后，雨停了，他们一行坐船出游；到过三潭印月等处，天又下起了雨，只好回到旅馆，和高梦旦聊天。等雨停了，他们一起到“楼外楼”吃晚饭。15日，他与蔡元培、高梦旦一行游了龙井、九溪等处，在烟霞洞吃午饭，那里的风景竟打动了他的心，他说：“我爱其地风景很好，房屋也清洁，有久住之意。”蔡、高两位前辈于是力劝他在烟霞洞避暑，此时北京军警罢岗，时局乱哄哄的，他也不愿回去。5天后，蔡元培去了故乡绍兴，他再次到烟霞洞，定下移居的日期，高梦旦已与管洞的居士金复三商定价钱。22日，他先让侄儿把行李搬上山，23日蔡元培回杭州，在平湖秋月的大杨树下他们拟定了蔡先生与军阀政府不合作主义的几个宣言。24日，蔡前往上海，他搬上烟霞洞来，从此一住三个多月，烟霞洞成为他一生中难得清闲的一段休息时间，可惜他的《山中日记》是从9月9日开始的，6月9日起有三个月的空缺，没有留下记录，好在还有《山中杂记》《我的年谱（1923）》可以稍微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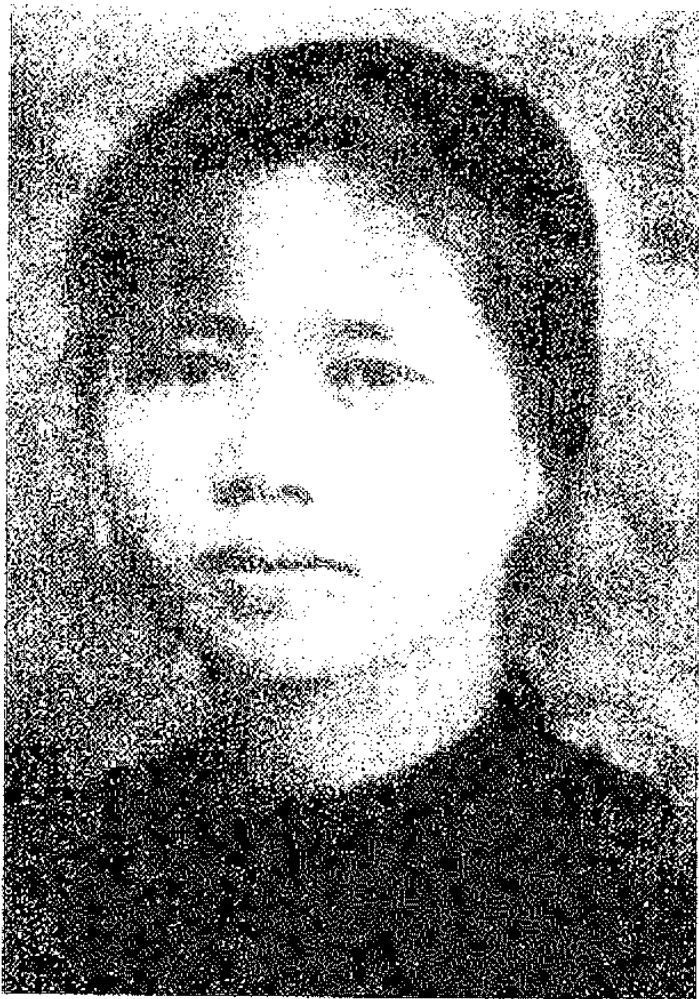
6月24日，胡适移居烟霞洞的当天就和同来的客人上了南高峰，登顶俯瞰西湖全景，还能远远地看见钱塘江，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望见海，

他认为西湖的风景以此最为壮美。当时，他正患着严重的痔疮，出脓、出血、肿痛，但山中的生活还是过得有滋有味。7月29日早晨，他曾和任伯济、曹表妹爬南高峰看日出，两天后写了白话诗《南高峰看日出》。9月11日，“桂花开了，秋风吹来，到处都是香气。窗外栏杆下有一株小桂树，花开得很繁盛。昨天今天的早上，门外摆摊的老头子折了两大枝成球的桂花来，我们插在瓶中，芬香扑人”。9月13日是个好天气，他和曹表妹下午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花盛开，桂香迎人，他们到龙井喝茶，在一个亭子里，还借了象棋，下了一局，然后讲莫泊桑的故事给曹表妹听，到黄昏渐近，循着原路走回烟霞洞。当夜，他写了一首白话诗《龙井》。9月14日的上午、下午，他都和曹表妹到山中最高的那个亭子闲坐，讲莫泊桑的小说《遗产》给她听。9月18日，“夜间月色甚好，在月下坐，甚久。”19日，他与曹表妹出门，坐在树下的石头上，讲莫泊桑的故事给她听，夜间月色不好，他俩下棋消遣。9月22日，他们坐轿去云栖，出山后就是钱塘江，“我十七年不来江上了，今年见了，如见故人，精神为之一爽。此时无潮，江滨沙泥地平软可行，轿子沿江行了好几里，风景很好。”他们在云栖寺吃了饭，下山沿江步行，过之江大学，到了六和塔，登临塔顶，极目远眺，心情愉悦。

9月23日，他见烟霞洞前梅树憔悴，在《烟霞洞杂诗之一》发出感叹。26日，他和高梦旦、陶行知、曹表妹等一行游花坞，先乘船到松木场，再雇人把船抬到河里，继续上船，两岸有着动人风致的靛青花开得正盛。走进花坞，路边全是大竹林，不止几万株竹，“风过处，萧萧作声，雄壮不如松涛，而秀逸过之。杭州



●胡适与曹珮声等人的合影



●曹珮声

名胜，多竹之地，韬光不如云栖，云栖不如花坞。我游此三处，一处胜于一处，可谓渐入佳境。”花坞出来，他们又乘船到西溪，在秋雪庵上岸，四望都是芦花，他想象芦花盛开时，一片飞花满空的“秋雪”奇观，不无向往。28日，他们应徐志摩之约前往海宁看潮，当天回杭州，晚上在湖上荡舟看月。这就是胡适一生中最快乐的“神仙”日子。

当然，他仍时时关注着山外世界的脉动，他在日记本上贴剪报的习惯没有改变，对于方方面面的变化，经济、政治、外交等消息他都很注意，对学术、文学更是没有放下。在烟霞洞，他曾写过几篇序，译过契诃夫的小说，校阅过张慰慈的《政治概论》书稿，还有两册中学历史教科书，他还想和徐志摩一起翻译曼殊斐儿，不过只开了个头，就放弃了。

从1907年到1923年，转眼17年过去了，33岁的胡适已是名满天下，誉满天下，他的身体也牵动着无数关心他的知识界朋友。他在西湖烟霞洞休养，交游并没有中断，不仅书信往还不绝，还有不少人登山造访，各方面的人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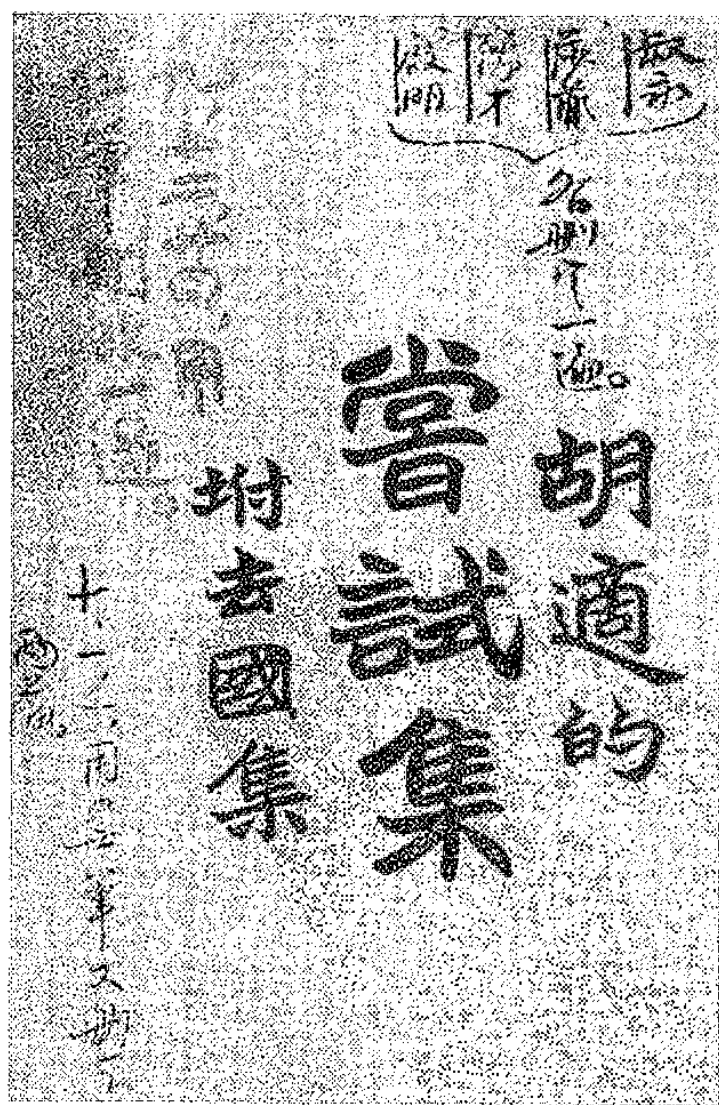
瞿秋白曾远道从广州来看他，谈及广东和陈独秀的近况。9月20日上午，浙江第二师的军官祝绍周等带士兵上山野习，知道胡适在这里，特地来访问。胡适在日记中说：“这几个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颇有思想。他们问我他们应该怎样做，我说，组织同志，做个中坚，做个参谋本部。他们问应以什么为目标，我说，抽象一点就是‘替社会造一种顺从民意，适应时代潮流的实力；具体一点就是‘要使浙江真做到自治的省分’。”9月23日，高梦旦从上海来，著有《天乎帝乎》（胡适为此书写序）的越南人潘是汉和四个同胞到烟霞洞造访，胡适劝他们提倡越南白话，造成国语文学，作为新国家的基础。9月24日，报人陈景韩（冷血）游山，说自己

和狄平子都想请胡适去主办《时报》，希望把《时报》办成一个全新的报纸。那张老报纸曾深刻地影响过胡适的少年时代，但他还是婉辞谢绝了。25日是中秋节，陶行知、高梦旦等上山，陪他一起过节。

他一度想永远脱离教育生活，从事著书的事业，但终于没有成真。在烟霞洞住了三个多月，他内心很是不安：“一来因为我在大学的功课无人担任，二来因为《努力》久累朋友，三来因为离家日久，所以我决计‘下山’来了。”10月4日，天也凉了，病也好了；他决定下山，5日夜到达上海，“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总统了。”7日晚，他与任鸿隽夫妇、徐新六等商量，决定暂时停办共出了75期的《努力周报》。10月9日，他在写给高一涵、陶孟和等四人的信中说：“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他以烟霞洞写的梅花诗来祝福新《努力》的生命，有一天，他看见憔悴的梅树在秋风中苦撑，曾写下这样几句诗：

我们不敢笑他们早凋；
让他们早早休息好了，
明年仍赶在百花之先开放罢！

在《一年半的回顾》文中，他说：“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拜金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了。……但我们并不悲观。我在《努力》第53期上曾说：我们深信，有意识的努力是决不会白白地费掉的。”《努力周报》最终没能复刊，但后来的《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我们依稀能看见《努力》当年的影子。胡适说，将来的新《努力》要多做思想文学上的事业，“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



●胡适《尝试集》删定本书影

化”。他这样想，大致上也是这样做的。

小住烟霞洞时，胡适曾送了一首《烟霞洞》的诗给善于烹饪的金复三居士，金烧的素菜在西湖一带有名，竺可桢说烟霞洞“以素肴清洁闻名湖上”。十多年后，竺可桢等16人来为胡明复扫墓时，亲眼看到堂中挂着胡适当年养病烟霞洞时这首白话诗的手书。胡适的这幅手迹，在抗战期间好不容易保存下来了。1947年，已是80高龄的金复三思念胡适，希望能亲手烧几样素菜给胡适吃，托阮毅成转告，胡适很是感动，给金写了一封长信，说要到杭州看他。可惜，等到1948年10月胡适再到杭州时，他已离世。

今天我们到烟霞洞，胡适住过的老屋仍在，却再也看不到胡适的白话诗手迹了，只有廊柱上的对联：“四大空中独留云住，一峰缺处还看潮来。”

二 讲演浙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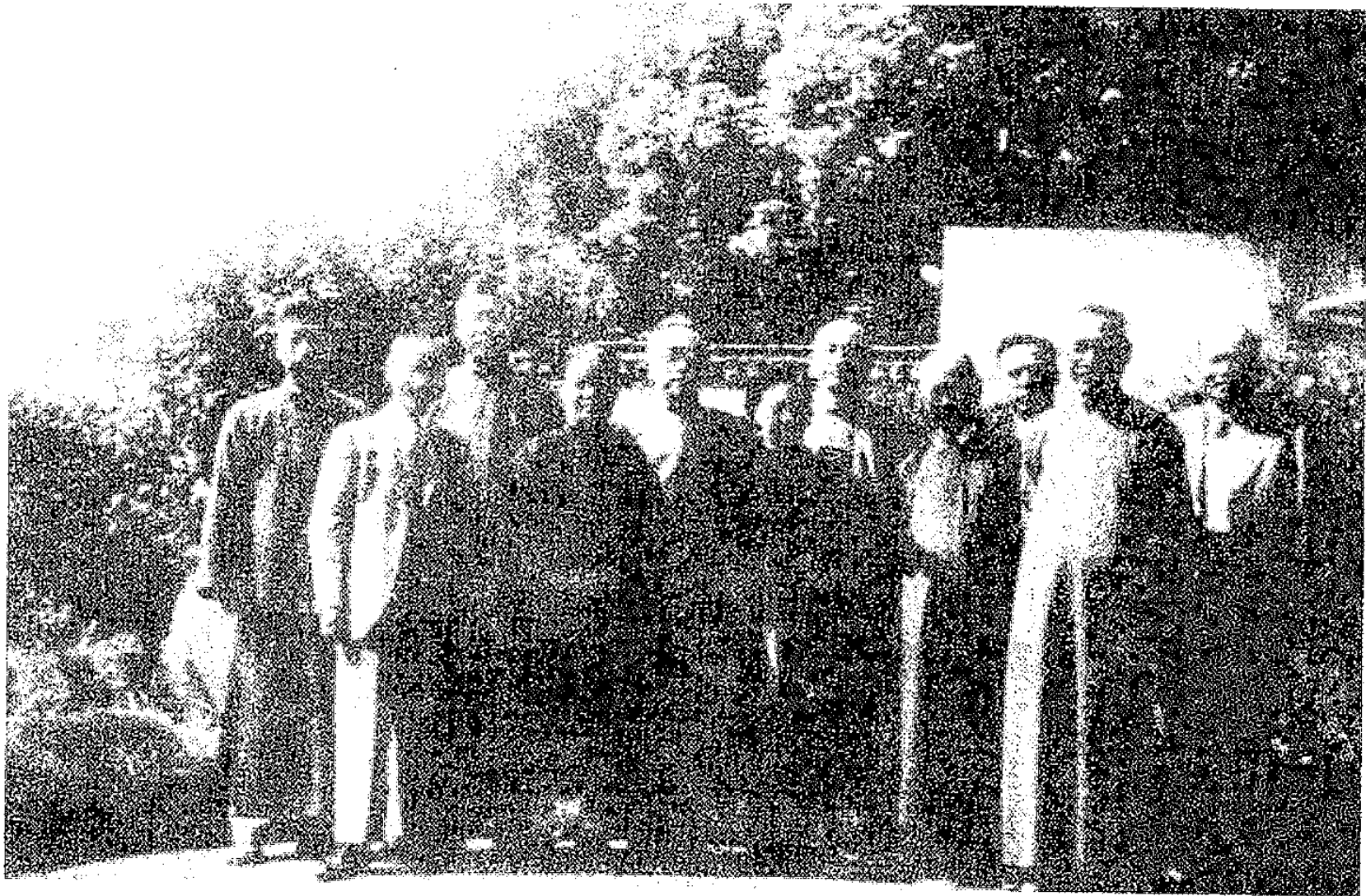
1948年10月18日，胡适在离开大陆之前应竺可桢之邀到了杭州，下榻在里西湖边的新新旅馆。他俩同为庚子赔款余额的留美学生，分别做了南北两个大学的校长。胡适此来杭州，故地重游，也许他没想到这是最后的一次。19日是个雨天，他在雨中游西湖，然后到浙大访竺可桢，见到竺夫人陈汲等人。竺可桢约他20日中午在家里吃饭，因为其夫人多次说要在家里招待胡适。

10月20日上午，杭州天晴，胡适雇小船在西湖上荡了一会儿，再到孤山纪念林启的“林社”，去看辅佐林启办学的高啸桐遗像。在竺可桢家吃中饭时作陪的还有苏步青、阮毅成等人。下午二点钟，他在浙大体育馆讲“自由主义”。这是他自己在日记中记的。虽有浙大学生唐为根后来回忆，胡适在浙大大礼堂讲话，由于讲话“不得人心”，“台下学生不断地出现哄声四起”。但第二天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报道：“胡先生谈笑风生，记取古今中外诗文史事，如数家珍，杂以诙谑，亦谐亦庄，听之如饮醇醪。

凡历一时有半，掌鸣有如春雷声中而毕。”（转引自段怀清《胡适 1948 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及其他》，《社会科学论坛》2008 年 8 月上半月期，75 页）如果说校刊说的是客气话，不可完全采信，那么竺可桢当天的私人日记则是可信的，那天听讲的浙大师生八九百人，大部分都是站着听讲的，“但终一小时二十分，鲜有退者，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适之小余一岁，近来人甚肥硕，但演讲时已汗流浹背矣，因下午相当热也。”他从二点一直讲到三点廿分，演讲结束，回到校长办公室稍坐，即由竺夫人陈汲亲自送往车站，乘四点的快车回上海。胡适对此次演讲印象深刻，直到 1961 年 12 月 30 日，离世前不久，吃晚饭时他还和秘书胡颂平说起竺可桢的第二个太太是陈源的妹妹，“这位陈小姐，面孔圆圆的，长得很甜。我的太太对我说，如果她死了，她劝我娶这位陈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对她的喜欢。胜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

这次讲演没有发现完整的记录稿，竺可桢日记只记下大致的内容，胡适说自由主义为中国固有产物，明代浙江余姚出生的三位大师王阳明、黄

●1948年10月胡适在浙大留影



宗羲、朱舜水都提倡自由主义，东汉王充也是自由主义。但他明确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缺乏政治的自由，而且缺少容忍的精神，所以自由终不能达到，人民也没能得到解放。

好在10月21日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留下了较为详细的报道，确切的讲题是《自由主义与中国》，胡适说：

……本人向所提倡，皆在解决问题，非讲主义，今此虽道主义，仍在问题索解。自由为义，在于由自，我国盖有悠久之传统。在希腊为自由为字，亦同中国，兼有名词动词两用。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自衣食住行以至思想信仰，皆求自由作主，不须仰人。浙大三馆，纪念阳明、黎洲、舜水三先生。阳明之反朱子，黎洲明夷待访之录，与舜水去国，老死日本，皆争自由之表现。东汉，上虞王充（仲任）当神权之世，撰《论衡》八十余篇，一言以蔽之曰：“疾虚妄”，亦皆在求自由。综之，中国史中，自老庄孔墨，中经阮籍、嵇康、范缜、韩愈，以逮宋明诸儒，为争自由而仗义执言，虽一人而往矣，精神皆至伟大。所惜者已往贤哲，过于漠视政治自由，遂致虽倡君主无为之治，而无术以致之。西洋史中，有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者，去今不过百年，为政治自由，树之范畴，于今世界受其利，一曰代议制度，一曰成文而可修宪法，一曰不记名投票。此虽浅近之论，而古今中外之人，忽之久矣。得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而明之，自由之义，得以大彰。抑即在美，访即夙昔尝著自由历史之教师者，行年八八十，谓除自由之外，近更得一字，其重要相若，斯曰容忍 (tolerance)。而当今之世，实自由与不自由之争，容忍与不容忍之争。浙大于阳明、黎洲、舜水争自由传统之精神下，对此当前重大问题，应三思之……（转引同上，75页）

10月22日的《申报》也有《胡适在浙大演讲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报道：

胡氏首先解释自由主义为当今世界一种最伟大的运动，继则详述中国古代儒者之自由主义思想，自孔孟以下如王充、王安石、朱舜水、黄梨洲等先贤，其遗著中无不富有自由主义思想，故今之所谓“自由主义”者，

实为中国之“土产而非舶来品”，惟虽有“自主思想”或“自由主义哲学”，而无政治环境上之自由，则社会仍无自由可言，中国即缺乏此种政治上之自由也。然而欲求得政治上之自由，则必须有一种容忍的精神与之相配合。然后自由主义始能有最完美的发挥。故今天中国要求自由主义之胜利，主要在争取政治上之自由，与培养一般社会之容忍精神。（转引同上，75—76页）

综合竺可桢日记、《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和《申报》的报道，胡适这次演讲的内容大体上就清晰了。此后1949年3月27日，他在台湾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或《中国文化传统的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古代就有的，史官制度、谏官制度都是批评自由、思想自由的一种标志，老子、孔子都是自由主义者，孟子二三千前提出的“民为贵”，更是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传统。秦始皇之后思想一尊，自由受到限制，但仍然有人在万难中不断追求，王充、范缜、韩愈等身上都有自由主义精神，王阳明批评朱熹，颜李学派反对帝王推崇的朱子学派，都是在争取思想自由。结论就是中国有自由思想的传统。他之所以一再将自由主义解释为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用意无非是想在中国的传统老树上嫁接自由主义的新枝丫，将他信奉了大半生的自由主义本土化，希望更多的人都能接受这一理念。

此前1948年9月4日，他在北平电台演说《自由主义》，在讲了“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后，他话锋一转：“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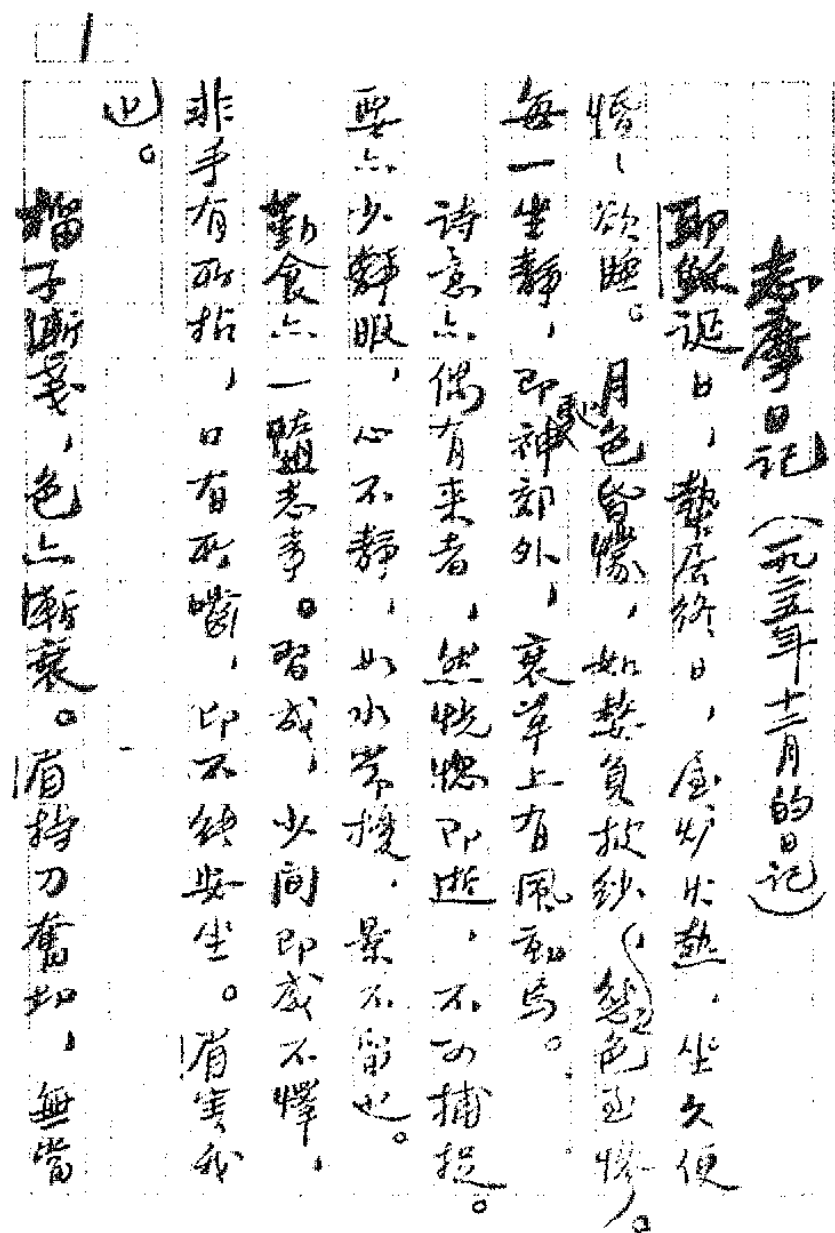
有幾分證據，說我
分話，有七分證據，不
能說八分話。

胡適

●胡适手书

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他列举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中国古代虽也有“民为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思想，有文官考试制度，但始终没有解决君主专制问题，没有建立起一个能限制无限权力、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来。为什么会如此？胡适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号，但他概括了自由主义的四个基本内涵：一是自由，二是民主，三是容忍，四是和平、渐进地改革。他强调指出西方自由主义包含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反对派的容忍，对少数人权利的保障，从而养成容忍异己的度量和风气，这才是近代自由主义当中“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内容。他进一步说明，自由主义到了近代以后还有和平改革的意思，可以和平地转移政权，以立法手段，达到一点一滴地渐进改革的目的。而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容许不同声音、反对党派的存在，人民拥有选择的权利和机会，这一切不仅是和平改革的前提，也正是自由主义的生命所在。接下来，他在浙大和台湾的几次演讲，都以自由主义为主题，如此密集地讲述同一主题，在他一生中罕见。他一辈子致力于将自由主义引入中国的努力，至此已接近尾声，即将失去的痛苦已萦绕在他的生命周围。

胡适这次到浙大演讲，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杭州，几个月后，他就将与大陆永远告别，开始“根株浮沧海”的最后余生。



●胡适抄徐志摩日记

当年胡适养病西湖畔，与他交往密切的朋友有诗人徐志摩，他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一脉，在古老的土地上植下的是新种子，并不像胡适说的是中国传统中固有的，恰恰是传统中所缺乏的。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个更年轻的身影，就是几年后在西湖边寄一袋桃花给诗人的储安平，若干年后，他成为自由主义的重要传人，《观察》周刊的创办人，继《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之后赓续了这一新的传统。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同属于自由主义，胡适与储安平也很不相同。他们的书生论政并不一样，胡适不同意储安平对国民党彻底否定的姿态，他始终没有在《观察》周刊发表过一篇文章。另一个也属于自由主义这一边、与他们差距更大的杭州人张东荪，属于中间偏左，或自由的左翼。胡适走了，储安平和张东荪选择了留下。在变幻莫测的 20 世纪前半叶，他们都曾参与创造摆脱“衰世”的历史，他们的肉身却一个接一个被历史的阴云吞噬了。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2. 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3.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年版。
4.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年版。
5. 《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年版。
6. 《竺可桢全集》第 11 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7. 段怀清，《胡适 1948 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及其他》，《社会科学论坛》，2008 年 8 月上半月期。
8.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电教新闻中心编，《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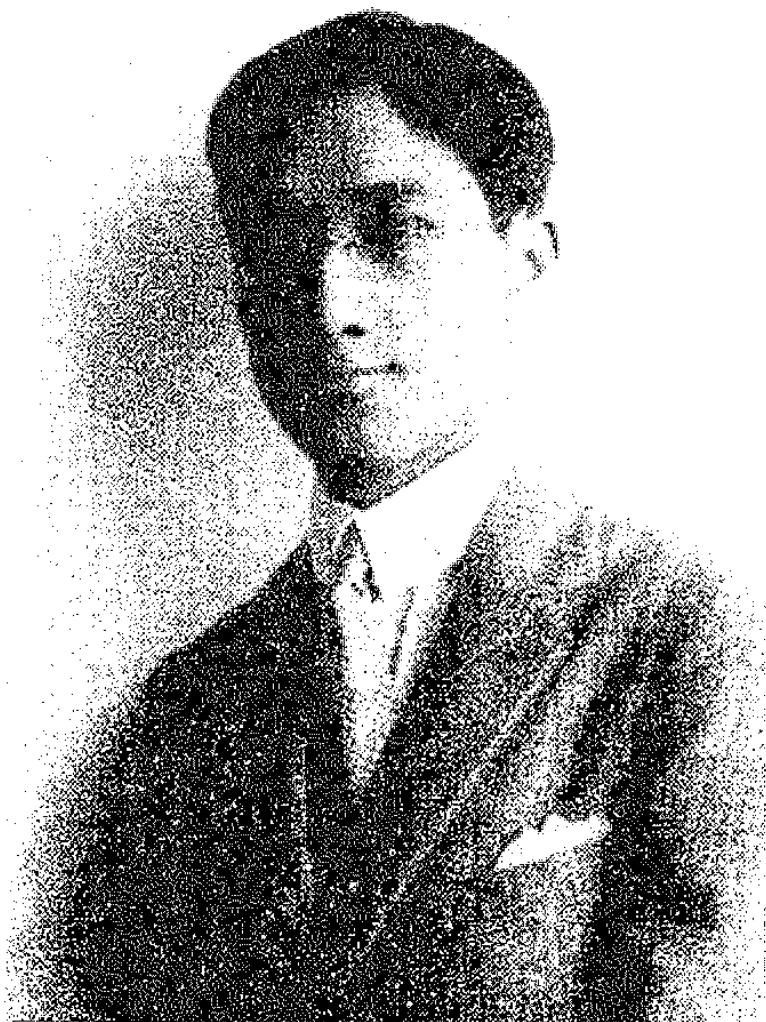
第八篇

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



留在储安平记忆中的徐志摩“就像一架火炉，大家围着他感到有劲”。油画家陈丹青曾以“好看”、“好玩”来解读他心仪的鲁迅，“好玩”这个说法用在徐志摩身上恐怕更为合适。储安平在《悼志摩先生》文中说到，1930年春天，他编《今日》，向徐志摩要稿子，时在北平的志摩来信还惦记着江南的妩媚，“我在西湖时，曾装了一袋桃花寄给他过。”遥望当年，西子湖畔，桃花满天，年轻的储安平用袋子装桃花，寄给徐志摩的情景，

我们只剩下了羡慕的分。



●徐志摩

西湖边的桃花固然令徐志摩心喜，桂花、梅花，乃至红叶、芦花也都是他爱的。他的家乡海宁硖石离西湖那么近，在短短的一生中，他一次次地来饱餐西湖风色，并多次与喜欢的老大哥胡适相约在西湖，1923年9月那次，他还留下了一本名为《西湖记》的日记。当时胡适正在烟霞洞养病。中秋节，他们本来相约一起在烟霞洞赏月，因为他从海宁到杭州太晚了，没有去成。徐志摩在日记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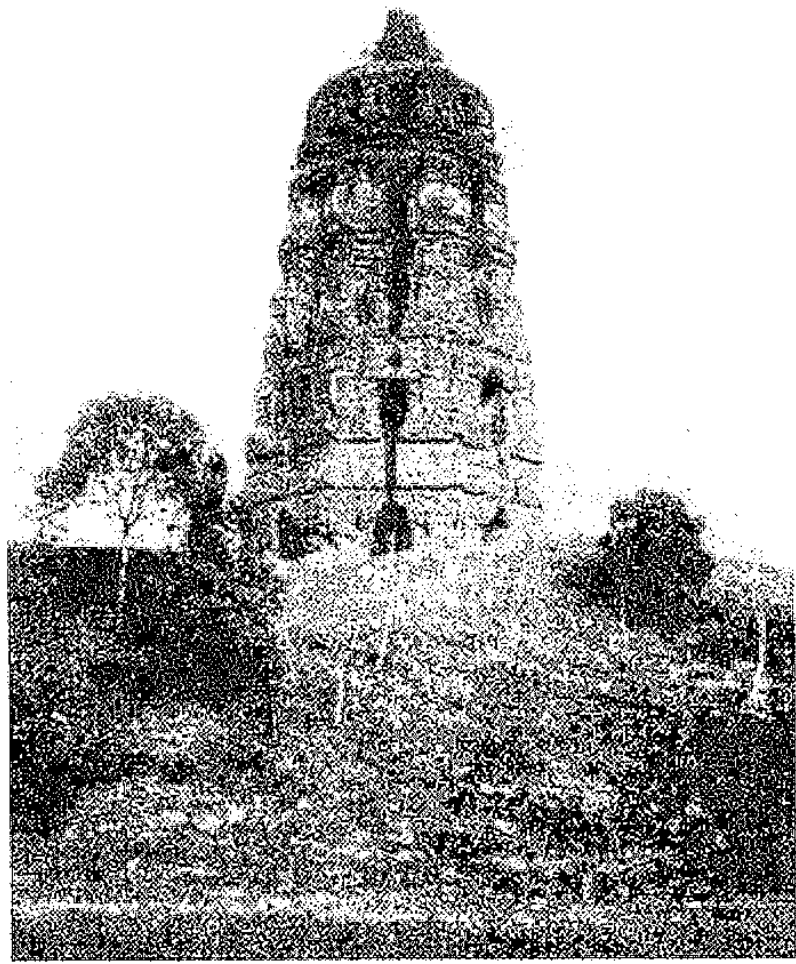
那晚在湖上也玩得很畅，虽则月儿只是若隐若现的。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满天堆紧了乌云，密层层，不见中秋的些微消息。我那时很动了感兴——我想起了去年印度洋上的中秋！一年的差别！我的心酸得比哭更难过。一天的乌云，是的，什么光明的消息都莫有！

我们在清华开了房间以后，立即坐车到楼外楼去，吃得很饱，喝得很畅。……到九点模样，她到底从云阵里奋战了出来，满身挂着胜利霞彩，我在楼窗上靠出去望见湖光渐渐的由黑转青，青中透白，东南角上已经开朗，喜得我大叫起来。我的喜欢不仅为是月出，最得我痛快的，是在于这失望中的满意。……

我们站在白堤上看月望湖，月有三大圈的彩晕，大概这就算是月华的了。

然而，月亮不久又被乌云吞没了。不死心的徐志摩买了许多好吃的东西，雇了船，往湖心而去。“三潭印月上岸买栗子吃，买莲子吃；坐在九曲桥上谈天，讲起湖上的对联，骂了康圣人一顿。”回头听到桥上有一个老翁“涩重的语音听来很熟”，定眼一看正是他老师的老师康有为。一个又一个的“很”字，将他的性格、面容、心情仿佛全都勾了出来。

次日，徐志摩动身去烟霞洞，路上先逛了雷峰塔，感叹其“神秘的庄严的美”，不过他已发现塔里面四根大砖柱已被拆成“倒置圆锥体形”，“看着危险极了”。塔下，“有七八个鹄形鸠面的丐僧”，张开破袈裟，念佛要钱，他却认为颇有诗意。也许那就是我们今天习见的假和尚，也说不定，诗意是没有了。还有人拿着蛇，说是白娘子神话中的“小青蛇”，叫着放



● 雷峰塔



●旧时“楼外楼”

生，让游人出钱。随后，他用杭白作诗一首，由多情的妖魔白娘娘被压在雷峰塔底，感慨在南屏晚钟声里，只剩下残败、凄凉的古塔。

等徐志摩到了烟霞洞，胡适和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他们却游花坞去了，他喝了一碗茶，捡了几片大红叶，匆匆下山，以香蕉、月饼代饭。

9月底，徐志摩约了任鸿隽、陈衡哲伉俪，胡适和他的曹表妹，还有汪精卫、马君武、陶行知（那时还叫陶知行）等名流，到他的故乡看一年一度的钱塘潮。10月1日，他又被胡适他们拉到了杭州。在“楼外楼”吃蟹，他发现“美男子”汪精卫是个大外行。“湖心亭畔荡舟看月。三潭印月闻桂花香。”大约补了中秋夜的遗憾。

10月20日，他又一次和胡适、朱经农等相约在西湖“寻快活”，他们下榻在新新饭店，夜深，二更时分，他和胡适远眺湖、堤和倒影在湖中的堤影，“清绝秀绝美绝，真是理想的美人，随她怎样的姿态，也比拟不得的绝色”。一时动了心，想出去“拿舟玩月”，最后还是辜负了湖光、月色，不曾去偷尝“西子”的梦情。

第二天，他们先是游湖，上了湖心亭，“湖心亭看晚霞看湖光是湖上少

人注意的一个精品——看初秋的芦荻，楼外楼吃蟹，曹女士贪看柳梢头的月，我们把桌子移到窗口，这才是持螯看月了！夕阳里的湖心亭，妙；月光下的湖心亭，更妙。晚霞里的芦雪是金色；月下的芦雪是银色”。胡适和他讨论起莫泊桑对月光的描绘，曹表妹唱起了“婉曼得狠”的《秋香》歌。他说在三潭印月，他不爱九曲、三潭之类，而爱在月光下看雷峰塔静极了的影子——“我见那个，便不要性命。”还有晚上雾霭苍茫中的阮公墩。他用一个“嫩”字来形容中秋的西湖。

那几天，他们还到过西溪、花坞，花坞的竹林、西溪的芦荻，他说是“数大”之美。对于花坞的竹子和那一带的风色，他无不叫绝。但他说与其白天去西溪看芦花，不如月夜泛舟湖心亭看芦花，近便又经济。有一天晚上，他们还爬葛岭，上初阳台。而今物是人非，虽然我常爬宝石山，上初阳台，逛西湖，可是再也找不到胡适之、徐志摩当年的踪迹，更不用说他们当年的感觉了。

1924年4月14日，徐志摩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在西湖游玩了两天，1925年他似乎没来西湖，却接连写了《再不见雷峰》《烟霞洞看桂》等多首诗。1926年2月中旬，一个有风有雪的雪天，他来到杭州，也不忘去灵峰探梅，坐在轿子里，“脚冻如冰，手指也直了”，《梅雪争春》诗所写的就是他的亲历。当天，他和胡适一起去肺病医院看望了郁达夫。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折一枝梅花，寄一封“没字的梅花信”给爱得死去活来的陆小曼。

这年夏天，徐志摩再到西湖，那正是与陆小曼发生婚外恋，难分难舍又遭遇阻力时，他盼望着情人的到来，焦虑，不安，心里升起了许多的凄凉。在“楼外楼”微醉时他尝到了凄凉味，他到满觉陇寻访桂花，村姑告诉他，几



●徐志摩与陆小曼

天的连绵风雨，早桂都完了。触景生情，他的诗中就有了花也憔悴、人也憔悴的意味。在烟霞洞和朋友闲谈，一句“红蓼红蕉都死了，紫薇也叫虫咬了”，竟也使他“怅触”，写了难得的一首旧体诗，其中有“秋雨横斜秋风紧”“有人独立怅空溟”等句子。

他独自去灵隐，直挺挺地躺在石头凳上寻梦，脸上有意盖了陆小曼送他的小红绢，妄想着他们在那里相会。

即使对西湖，他也有满腹的牢骚，雷峰塔倒掉已有两年，“楼外楼”翻新了，原来一楼一底斜对着湖心亭的旧房子已翻新为带屋顶、洋式门面、新漆光亮的三楼，老酒、鱼虾、盐水花生，还有滑齐齐的莼菜依旧，然而再难觅三年前吃蟹的旧踪，和胡适等满座高朋谈天游玩的乐趣。对于揩抹得发白光的旧桌子换成新桌子，他不满；对于能随便聊聊湖上风光、鱼虾行市的老堂倌换成穿着西崽长袍的新人，他不满。他要移一张餐桌搬到楼下马路边，在湖边的水光荡漾中喝酒，竟觉得连小菜都变了。8月9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丑西湖》一文，西湖的“俗化”令他伤心。他写诗哀悼倒掉的雷峰塔是“一座大荒冢”，他诅咒这塔是“镇压”，是“掩埋”，他感叹“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三年前，他来西湖，最喜欢的正是“雷峰塔影”，他的诗《月下雷峰影片》柔和而美丽。风景有时确实就是心境。

等到1927年春天，徐志摩偕陆小曼同到西湖，心境又完全不同。无论是到三潭印月，走九曲桥，吃藕粉，月下游湖，登峰看日出，还是吊雷峰遗迹，白云庵拜月老求签，上烟霞洞吃素餐，抑或龙井、九溪，在他眼里西湖处处都变得可人起来了，即便是在孤山后面发现一个水潭，在他笔下也是——“浮红涨绿，俨然织锦，阳光自林隙来，附丽其上，益增娟媚。”在九溪，“尤可爱者则满山杜鹃花，鲜红照眼，如火如荼”，陆小曼不禁狂喜，急呼“采、采”，爬上山坡，连跌倒也不顾，采了一大束，“插戴满头”。1928年，他和陆小曼又两次来游西湖。

在后人眼中，徐志摩常常只是一个浪漫的诗人，而在熟悉他的朋友看来，比他的诗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比他的散文更重要的，却正是他的那种性格、热情，他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层面，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最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一个人。有些人不喜欢他，认为他“肉麻”，鲁迅甚至骂他是“流氓”。但和他接触过的许多人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叶公超认为“胡适之跟徐志摩完全是两种人。适之自然淳厚、冷静幽默，志摩却是风趣爽快，全然追求‘美与爱与自由’的性格。”胡适的《追悼志摩》一文引用叶公超评价徐志摩的另一些话，说徐志摩真正领略到了人生的趣味，短暂的一生都“在这永不能达到理想的追求中”，“是爱一切生活的人”，“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他那本性的纯真似乎总不容他去追究人家的罪恶。”这确是知人之论，如果不是徐志摩的热心奔走，整天呼朋唤友，还不知道“新月社”会不会聚起那么多欧美留学回来的年轻知识分子，闻一多、余上沅、叶公超等都是一回国就参加了“新月社”。新月书店的诞生，也是他奔走最力。叶公超说过：“组织新月社，编辑《晨报副刊》，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为团体的事，志摩，他是不辞劳苦的。大家都不愿干的事，总是推到他头上去，而他也独有勇气去接受，去敲上锣鼓再说。”所以梁实秋有一句话：“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徐志摩的性格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迅他们办《语丝》，他不识好歹就去投稿，当然登不出来，还被鲁迅在文章里嘲讽了一番。1925年，《晨报》主笔陈博生邀他接编《晨报副刊》，特意设宴，邀请一些知识分子发表改良副刊的办法，张奚若开口便说：“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随后，还写了一篇短文《副刊殃》给《晨报副刊》，其中说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徐志摩一样照登不误，而且配了一段长长的编者按，说张奚若“是

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其身体、品行、意志、说话都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这是徐志摩的本色，他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气质，可以说他是英美教育结出的果子。他于1897年生在浙江海宁，从1918年起，徐志摩就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之后他又先后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剑桥就是他诗中美丽绝伦的“康桥”。剑桥岁月对诗人徐志摩一生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在留下《再别康桥》一诗后，他于1922年8月起程回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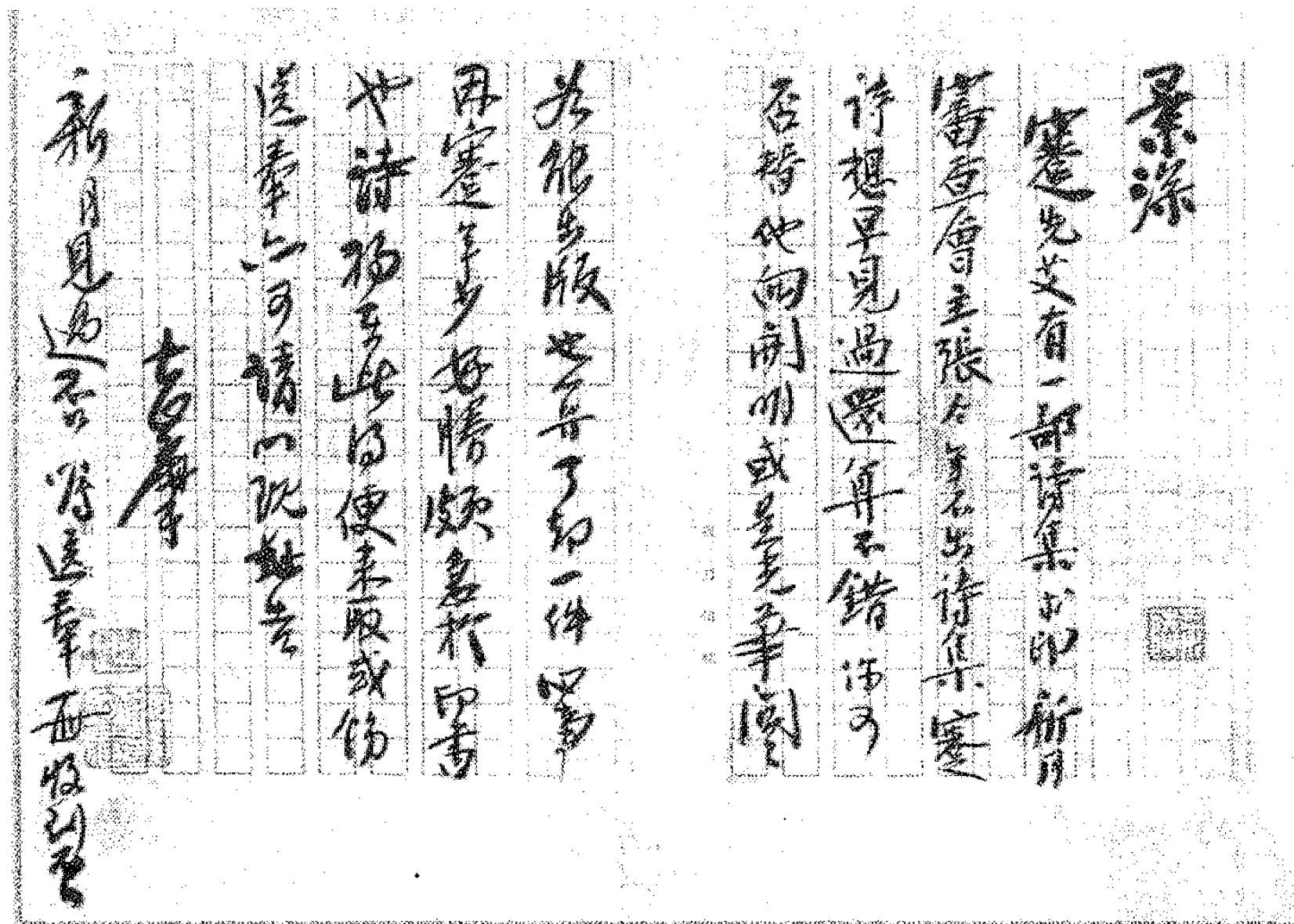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外情，从离婚到结婚乃至婚后，都曾闹得沸沸扬扬，颇遭舆论厚非，也为一些亲友所不理解。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本来想请胡适做证婚人，胡太太气得不得了，当着叶公超的面就骂胡适。再加上胡适7月份就要出国，所以他出面再三请求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做证婚人。为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事，胡太太一天到晚骂胡适。有一次叶公超在胡适家里，她又当面骂胡适，骂《新月》的这些人，用很粗的话骂，骂得他们都不说话。她说：“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胡适好几次和叶公超谈起陆小曼的事，“觉得徐志摩不应该这样放任自己的去追求陆小曼。”

了解徐志摩的人都知道，“其实志摩的生活是浪漫而不颓废，在几年之内他发表了许多著作，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戏剧、有翻译，在语言文字上更独树一帜，是一般人难望其项背的。”（叶公超语）这一点，我们哪怕读一则当年他在《晨报副刊》为青年沈从文作品写的“编者按”就够了：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纤纤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声最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问世,发刊词出自徐志摩的手笔,那时(1928、1929年之际)“新月派”的那批朋友云集上海,几乎每星期都有一次饭局,每次两桌,经常参加的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张滋闾、叶公超,这大约就是《新月》的基本阵营。“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欢喜不置,他从不谈文学,谈的都是吃、穿、头发、玩……”,徐志摩爱神聊,上天下地聊。叶公超记得,1927年之后,徐志摩在光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见面的机会很多。有一次志摩竟和他聊了个通宵,“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运命,买卖金子的亏赢:贩卖钢版皮口袋和头发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新月》月刊的封面……”1923年10月13

●徐志摩手迹



日的徐志摩日记中记着他和胡适的聊天，也是无所不谈，“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

三

《新月》从创刊号到第2卷1期，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三人编辑，从2卷1期到5期，编辑是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5个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新月》曾由学政治学出身的罗隆基主编，发表了许多批评时政、倡导人权的文章，与国民党当局面对面交锋，大致上以这个时期为多。徐志摩和不少朋友对此都有微词，好长时间不给《新月》写稿，罗隆基几次写信向胡适抱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正是这位“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诗人，也曾为《晨报诗镌》的“纪念三一八”专号写下《梅雪争春》：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

在《自剖》一文中，他直接谴责了那一场“屠杀无辜”的“空前的血案”——“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

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像。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他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气氛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

1927年4月20日，上海街头，“四一二”的血腥气还未散尽，他写下了《残春》一诗：

昨天我瓶子里斜插着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边挂；
今儿它们全低了头，变了相：
红的白的尸体倒悬在青条上。

窗外的风雨报告残春的运命，
丧钟似的音响在黑夜里叮咛：
“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
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敛？”

虽然，从他当天的日记，我们看不出这诗和“四一二”有任何的关系。但恰好此刻，“红的白的尸体”、“艳丽的尸体”出现在这位常以“一片云”自许的诗人笔下，究竟还是值得寻味，留待后世研究徐志摩的专家去考证罢。他是一个骨子里的诗人，唯美，唯爱，但他也有愤怒的时候，当然即使愤怒也是那么美，那么诗化。1923年10月23日，他和胡适、朱经农，对着西去的夕阳，在西湖边一家茶楼门外路边摆桌子喝酒，他为金链似的夕晖余影，为湖光中的小船……而醉，“疯癫似的醉了”。饭后他们再到湖心亭，他横卧在湖边的石板上，论世间的不平事，愤怒极了，呼喊、诅咒、顿足都发泄不够。后来，他独自划船，绕湖心亭一周，听着桨破水波声，才勉强压下了无名火。我更喜欢这个入世的、愤怒的徐志摩。他的笔下向来不是只有空灵、美丽、轻盈和飘逸，还有愤怒、反抗、呼喊的另一面，《婴儿》《毒药》等都可以为证。

1923年1月28日，他在《努力周报》第39期发表短文“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就是血性文字，他同意“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说法，批评当时的社会政治走的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他赞美蔡元培不忍同流合污的“不合作主义”，在他的心目中，蔡元培不是“憨大”，不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而是“卑污苟且社会里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他在蔡身上看到的正是理想的火星，他呼吁：“要保全这点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1924年，面对一个“一团漆黑”、“沉闷的时代”，他在写下《毒药》等诅咒诗之后，“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1928年，他痛骂国民党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1929年冬天，他在苏州女中演讲，痛斥当道的“妖魔”——“他们的贪，他们的毒，他们的野心，他们的威灵，他们手擎着全体民族的命运当作一掷孤注。”

满脑子理想主义的徐志摩没能用头颅撞开地狱之门。1931年11月19日，他乘坐的飞机不幸在山东济南附近的党家庄上空撞上了一座山，刹那之间，一代诗人化鹤归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年仅33岁。

面对徐志摩的死，他的朋友们无比沉痛，他们忘不了那个生气勃勃的志摩，忘不了那个浑身有使不完劲的志摩。1931年底，《新月》的“志摩纪念专号”刊出朋友们对他的怀念文章，算是永久的告别。但他的朋友又如何能忘得了他的热忱和活力。叶公超总是想起志摩生前闪烁的眼睛，嘴唇两端的曲线，稍微前倾的头部，想起他的灵敏和同情的幽默，特别是他的风趣，认为他和雪莱一样，一面对自己不满、对人生不满，一面却仍然充满了“勃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志摩与人认识十分钟就像二十年老友，从跑堂、司机、理发师……什么人都是朋友，看起来他好像是从来没有受过挫折和痛苦的人，永远充溢了蓬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因此，没有了他，《新月》也就失去了灵魂；《新月》原本固定每次两桌的饭局，在他死后也就没有了。”

徐志摩自称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他所信仰的“德谟克

拉西”在他看来就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1923年10月28日，徐志摩即将离开西湖，吃蟹，喝酒，大夸冬笋真好吃。他在日记中写下：“一天的繁星，我放平在船上看星。沉沉的宇宙，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又摸住了我的伤痕。星光呀，仁善些，不要张着这样讥讽的眼，倍增我的难受！”他短短的一



●志摩日记封面

生，上下求索，反复折腾，写诗作文，办刊结社开书店，他所求的在根本上就是“灵魂的自由”，这是他生命的理想，他使尽所有的力气生活，想做一个“平常人”，他全身心地追求“美与爱与自由”，去拥抱那天边的一钩新月。在他的生命中，生活本身是高于诗，高于散文和一切艺术、一切学问的。“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其实已经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回答这个问号，他已实现了“他可能的色香”。

春去春又来，今天，就算我们想再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也已无处可寄。一如二十多年前，海峡对岸，一盏孤灯之下，衰迈病弱的叶公超谢世前夕，再次想起永远年轻的志摩时所说的——

“世界上只有他这样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 虞坤林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2. 来凤仪编,《徐志摩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 顾永棣编,《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 《徐志摩全集》,香港文化图书公司,1983年版。
5. 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6. 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第九篇

“应笑书生不自量”：

——“中间势力”代言人张东荪

1943年7月，一个从日本人牢里出来不久的燕京大学教授竟派出私人代表，和十八集团军代表彭德怀签订“七七抗日协定”。

1944年9月，他缺席当选民盟常委。1946年1月他成为出席“政协会议”的38个代表之一。

1946年底到1947年春天，他以“调人”身份，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不停地与蒋介石、司徒雷登等人会晤，斡旋和平。

1949年初，他为攻、守双方所倚重，介入北平和平斡旋，代表傅作义将军出城谈判。他本人在1950年自述生平著书十多册，“实不抵此一行也”。毛泽东也在颐和园的一次会上说：“这（是）张先生的功劳！”

这个“张先生”就是张东荪（1886—1973）。他做过报纸、刊物的主笔、主编，做过大学教授、代理校长，是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华北总支部主委，在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他



●张东荪

文弱的背影。他在《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自序中说：“我自辛亥革命之前一年起，即直接间接多多少少与所有几件政治上的大事都有关系。虽未直接干政治，却从未远离。”他多次有机会做北大校长，乃至做大官，但他对地位、官职从无兴趣。

他说，“至于我自己早已自知是不适宜于党派生活的一个人”。储安平1947年在《观察》周刊发表的《中国的政局》文中说：“张东荪先生也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贡献的还是在思想及言论方面。”同年，熟知他的《时事新报》老同事俞颂华说得更清楚：“只要中国国内和平之局一旦实现，我相信他便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与党派生活，而要完全埋头于研究和著述的文化工作，做一个太平世界的学者。他目前参加政治活动，发表政论，完全出于他对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责任感。照我看来，他的个性，的确不适宜于党派生活，在政治上他也确无丝毫野心与任何企图。……至其报国的重心则仍然是放在教育上与学问的研究工作上。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成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他能立德立言，并且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终能站在时代前锋，为青年学子所敬爱的导师。”“我相信，他在学术研究工作上，在教育与著述上，对于国家的贡献，比较他在政治上、政党上的贡献更大。”

他在民盟的助手叶笃义回忆，他对人事“不感兴趣”，1949年的时代转换之际，在民盟领导层中，除他之外，“其余的人都为自己的安排不满”，而他当了中央政府委员心满意足，把政协委员都让出来了。

他向来主张“教书的要与闻政治”，反对天塌不管，但他同时强调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他认为以公民资格对国事发表意见，并不就是“干政治”。他在20世纪前半叶疾风暴雨中的种种选择，几乎都来自他这种自觉的知识分子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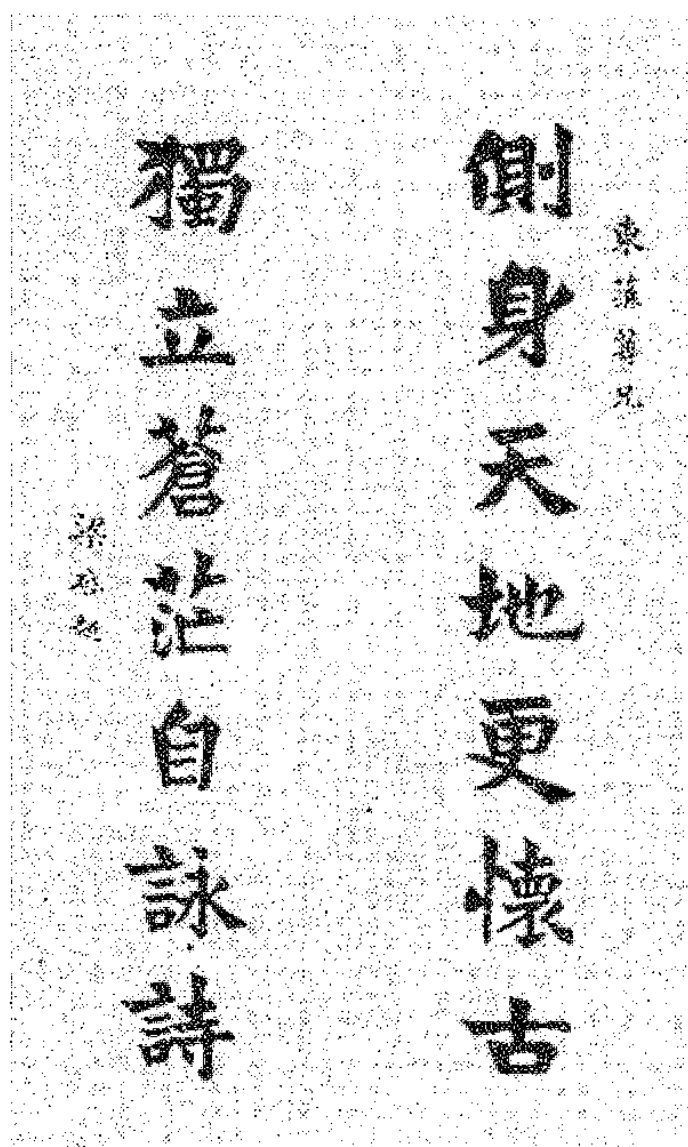
方今社会为嫖赌之风所掩，政治为私欲之毒所中，吾侪几无一席之地可以容身。与其与人角逐，毋宁自辟天地，此学灯一栏之由立也。其旨有三：一曰借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二曰屏门户之见，广商榷之资；三曰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

1918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创办“学灯”副刊，这是张东荪执笔的《学灯宣言》。当年他33岁。小小的“学灯”，在“五四”的浪涛中大放异彩。一灯如炬，照亮过一代青年，与《晨报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合称为“五四”时期的三大副刊，也是当时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平台。

继他之后，多少受到他影响的俞颂华、郭虞裳、李石岑等先后主编这个副刊，关注教育、社会、劳动、妇女、产业组合和其他社会改良问题，力图输入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他们认为有了新的，旧的自然会消亡，这是新陈代谢的道理。为此，他与年轻气锐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发生过一场小规模笔战。

也是在这年12月26日，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前夕，在上海和他、黄溯初作过彻夜长谈，相约把重心转到思想文化上来。1915年12月18日，梁启超南下上海，策划倒袁，他们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从此往来密切，引为同党。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到那一夜的通宵之谈：“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在此之前，围绕在梁启超身边的一批朋友（包括张君勱、张东荪、蒋百里、俞颂华、郭虞裳等20人）已发起一个学术团体“新学会”，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的改造，作为“新中国”的基础。1919年9月，他们以“新学会”名义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由张东荪主编，打出“改造社会”的旗帜，评论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介绍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梁启超



●梁启超赠张东荪对联手迹

从法国回到上海，雄心勃勃，要办报办刊办大学，推动留学，组织学术社团，还要办贸易公司、轮船公司，这是他在欧洲的设想，中心就是文化运动。当年5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由新成立的“共学社”主办、蒋百里主编。其精神与《解放与改造》一脉相承，宣传温和的社会主义，主张脚踏实地的社会改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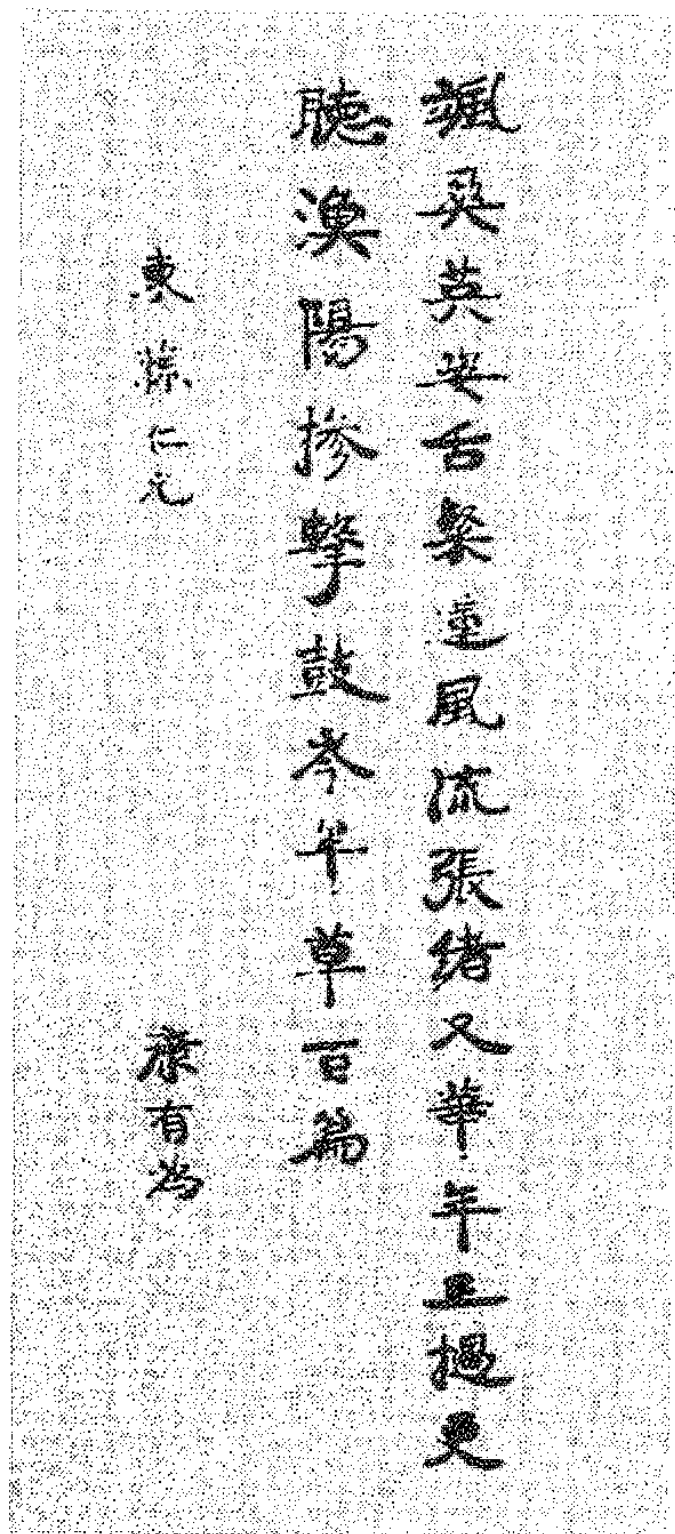
成立于4月的“共学社”，提出了“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目标，核心人物还是梁启超、张君勱、张东荪、蒋百里，但比“新学会”的基础要广泛，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熊希龄、范源濂、张伯苓、严修、林长民、张公权、丁文江等名流都列名董事会，评议会

中则有徐新六、舒新城等人，还有穆藕初、聂云台等实业家的支持，各方面捐助的经费比较充足。除了办刊，“共学社”曾邀请国际大学者来中国讲学，如罗素、泰戈尔及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等。本来还要请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柏格森等，因故未成。当然最大的成绩还是编译新书，1922年出版40多种，总计大约有100多种，引入许多社会学、哲学方面的书籍，包括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不同思潮。

俞颂华在1947年写的《论张东荪》中说：“他办过《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杂志，对于介绍新思想是很有贡献的。在五四运动时代读过他的报与杂志的人，想必还都肯为我这话作证。”因为他转向思想文化的努力，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将他看做是“主张不谈政治”的学界代表之一。1921年初，在湖南的青年毛泽东将梁启超和他称为改良派代表。

张东荪是杭州人，但他的出生地在直隶内邱县，他父亲是当地知县。1893年1月，母亲病故时他只有7岁，父亲带着他和哥哥扶棺回杭州，将他母亲葬在西湖边的丁家山，他家的祖坟地上。《张东荪传》作者左玉河说，他们两兄弟很可能就没有随父亲回北方任所，而是留在杭州读书，比他大12岁的哥哥张尔田担负起了教育弟弟的责任。他的旧学根基就是少年时代打下的。1952年他在自我检讨稿中说：“我从小即读中国旧书。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以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爱好名誉，有时自以为倔犟就是有气节。”在1946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序论中，他说，16岁就对哲学发生兴趣，读到一些佛教书籍，不禁手舞足蹈。（晚清思想史上大放光华的人大多与佛学产生过强烈的共鸣，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无不如此，佛学成为那个过渡时代的显学。不过他们信仰的佛学是入世的、积极的，而非出世的、消极的。）1904年，他获得官费留学日本资格，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哲学。他在留学时期就显示出“救世”的志趣，1906年与蓝公武等同学在东京发起“爱智会”，当年10月创办《教育》杂志，只出了2期。卢梭的《民约论》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喜欢西方哲学，尤其喜欢自由主义，并与中国传统中固有的个人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喜欢自由散漫、独往独来，爱自己随便作主张”。1911年他学成归国，曾在太和殿参加洋殿试，面见尚不懂事的宣统小皇帝，被授予格致科进士。

1911年5月，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第一篇政论性质的文字：《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辛亥革命后，他在新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做过秘书，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接任临时总统，许多人北上参加袁政府工作，他不愿去。“我本身虽始终是一个独立思想者，但却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就是从来不愿在行为方面无故与人立异。”在同时代的人中他很早就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走办报办刊、书生议政的道路。



●康有为赠张东荪对联手迹

1912年4月起，他任上海《大共和日报》编辑，同年11月梁启超创办的《庸言》在天津问世，他成为重要撰稿人，对国会、总统、宪法、教育、财政、道德、行政权和行政裁判等当时最热门的问题几乎都发表了看法。他赞同章士钊等人倡议的“毁党造党”说，提出“在野主义”，认为政党初创，正在“养气时代”，当务之急是养成国民的政治常识和道德，而不是急于掌握政权、进入议会。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党派合组国民党，把南京临时政府任职过的人一律作为党员，他的名字也在其中，但他从未承认过。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他的朋友很多都是该党重要成员，但他没有入党，也向来不参与他们的党的活动。他在思想上倾向于立宪派，这一点是没有可疑的。多年后，他在《理性与民主》的序论中说：“革命派外表上新而内里旧，立宪派外表旧而内里新，两者都是为当时的情势

所支配，只是为时代所产而不能产生时代。但是时代的轮子走得却比他们快”。

1914年1月，他和谷钟秀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以促进政治改良、培育社会道德为宗旨，一共出了9期，到1915年6月停刊。1914年4月，他与丁佛言在北京办《中华杂志》，到1915年1月停刊，共出了13期。这个时期，他主张“多数政治”、“以议代政”、“社会与政治分离”，反对人治，建设“法治国”。他进一步发挥梁启超首先提出的“对抗论”，阐述“对抗论”的价值，实际上就是认同西方的两党制，对抗的两势力应该互相对峙、互相监督，在宪法之下和平竞争、轮流执政，而不得诉诸武力。这是他理想的现代政治模式。1914年春，章士钊提出为政之本在于“有容”（即“不

好同恶异”)的“政本”论,与他的“对抗论”相辅相成,他十分赞赏这一观点,撰文呼应。他认为中国命运的改变,靠的不是万能的政府,而是健全自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靠的是国民的人格。当年有一种说法“深度要算丁佛言,激烈当数张东荪”。其实他的言论很温和,只是不容于当权者罢了。

当古德诺关于中国适合君主制的文章出笼时,他就发表了《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此前,他和梁启超一样,对袁世凯有过幻想,“迫之使人正轨”,也就是幻想把强悍的袁氏带上宪政的轨道。一度他被袁政府通缉,避居租界。所以,他自称“在反袁一幕中对得起自己的良心”。1915年10月,他与李剑农、杨端六等在上海创办《新中华》杂志,以“圣心”的笔名发表了《联邦立国论》等一系列有关联邦制的文章,认为联邦制的精神就是自治与分权,他还计划就具体的省制、中央政制、中央与各省权限的分配等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因为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而中断。

袁氏亡后,出于对地方军阀割据的忧虑,他对联邦制的研究没有继续下去。那个时候他希望孙中山、梁启超合作,到晚年写诗还认为“孙梁应携手,舆论可一新”。1916年初,他发表《国本》一文首倡“贤人政治”,1917年11月,他在《东方杂志》发表3万多字的长文《贤人政治》,这是他思考10年的思想产物,此文标志着他第一次书生议政时代的结束。

三

从1917年初接任上海《时事新报》主笔,到1924年辞职,他一千就是8年,期间他亲自主持时评、论说栏目,点亮了副刊“学灯”,将《时事新报》办成了“议论最真实,消息最灵通,材料最丰富,为人人必读”的大报之一,与北京《晨报》、《国民公报》南北呼应。

1920年,梁启超让他出任中国公学教务长、代理校长(1922年春由张君勱接替)。1924年,他再次到中国公学出任学长,主持大学部,有心办

成一流的“社会科学大学”。俞颂华说，他办中国公学有两大特色：一是毫无党派成见，专门聘请好的教授，二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

1927年，国民党势力抵达上海，张东荪的名字出现在通缉的“学阀”名单上。“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他从此彻底脱离报界，转向哲学研究，先在东南大学、光华大学任教，1930年秋应司徒雷登邀请前往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教授在教学上不受任何拘束，可以放言高论，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俞颂华说他处于当年中国最优越的讲学环境。他在大学讲坛上介绍西方哲学，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著述相继问世。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他说的这句话：“我主张哲学就是政治思想。”

他在《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书中说，“我自知本人是有一个缺点，即

往往欢喜超前来说话。在国民党北伐成功后的时代我即反对一党训政制度。顾当时自英美民主国留学回来的留学生，习于民主气氛，而对此竟不重视。”正是他的这个“缺点”，“九一八”事变不久，受民族危机的刺激，1931年10月，他才会和张君勱发起政治团体“再生社”。1932年初，由他执笔起草《我们所要说的话》及98条政纲，公开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倡导“混合经济”，试图折衷、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也就是将他心目中苏联式的经济平等和英美式的政治民主、思想自由融于一

我们所要说的话

记者

中國處今民族到了今天，前途只有兩條路：一是真正復興，一是真正衰亡。先就衰亡來說，自清末以至現在，表面上好像在那時時刻刻掙扎着以抵抗這衰亡的趨勢，但實際上抵抗的効力却遠不及下流的力量。所以到了今天，從國民經濟上首，從國際地位上首，從政治綱紀上首，從民族道德上首，都未見有高出于四五十年以前。我們因此知道一個大民族有他的悠久歷史，與廣大地域，決不會一旦而致滅亡。但歷史上却不乏這種先例，就是無論你民族如何大，只因為長久不能統一，長久在內戰之中，你就要逐漸為外族所吸收。中國這幾年，可謂毫不振作，毫無覺悟，然仍且把這近二十年的歷史

●张东荪起草《我们所要说的话》手稿

炉。此后，他就是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的。

接着，他们又创办《再生》月刊，并正式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参与组织民主党派。对此，他的解释是，这完全是“为了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他们俩相约：“他日如国民党有一天放弃了一党专政，我们的党便自动宣言解散。”他说，“我对于这个誓言是始终留在心上。”还有一个意图他没有明说，他们想在国、共之外再造一个新势力，即第三种力量。

1935年11月，他和梁实秋、冰心等人另办独立的《自由评论》，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专制、腐败，及其内外政策，主张抗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一文：

所谓取消党治就是取消一党专政。取消一党专政就是同时允许他党存在。这亦就是取消“党外无党”与“党高于一切”的标语。同时亦就是取消“党国”二字。因为党国是“国为党所有”的意思。

他的政治是业余政治，以公民资格问政，他的职业还是哲学教授。到抗战前夕，随着民族危机的迫近，他参与组织了“北方救国会”，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发生重大变化，1936年，他在《自由评论》第10期发表的《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说：

一个向来主张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完全世界革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以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以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

他表示：“我们历来不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而只反对一党专政，以为

一切罪恶皆由此而生。现在共产党提议合作是显然放弃了专政，这真是一件最可庆幸的事了。”（转引自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244—245、246页）

那一刻，他确实为共产党《八一宣言》的联合抗日主张打动了。细究其中的原因，或许与他对苏联经济成就的肯定也不无关系。

早在1919年9月1日，他在《解放与改造》创刊号发表《第三种文明》一文，将人类文明分为三种，一是习惯与迷信的文明（宗教文明），二是自由与竞争的文明（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文明），三是互助与协同的文明（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文明），他主张从第三种文明下工夫。这是他首次公开赞成社会主义。当年12月，他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的长文，不过他信仰的社会主义，不主张从破坏现有制度入手，而是从精神上传播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观、新生活法入手。与陈独秀、李大钊他们的主张不一致。1920年，陈独秀筹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及筹备建党的秘密会议都曾邀请他，不过商谈了几次，观点不同，他就退出了。当年下半年他们之间爆发一场当时影响很大的“社会主义论战”，一方是他和梁启超、蓝公武、蒋百里等人，一方是李达、陈望道、邵力子、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论战持续一年多。

他从来不讲唯心、唯物，但1931年以来，因他公开批评“辩证法的唯物论”而引发了一场“唯物辩证法论战”，论战对手包括叶青、艾思奇、邓拓等人。光是论战双方的文章编辑成书的就有几大本。在这次论战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五种形态”、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问题都提出了尖锐的质疑、非难和批评。

四

卢沟桥事变后，他于1938年8月毅然返回沦陷的北平，借燕京大学这个“孤岛”，为抗日尽心尽力，给共产党根据地输送大学生，购买珍贵

无比的药品和其他物资，提供情报，利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斡旋一些事情。1941年12月8日，“孤岛”沦陷，包括他和许多教授、司徒雷登在内都被日军以“抗日”嫌疑逮捕。狱中他4次自杀未遂，曾与日本看守厮打。1942年6月9日，他被保释出狱。1943年，他以一介书生，派叶笃义为私人代表到山西太行山的十八集团军总部，与副总司令彭德怀签定“七七抗日协定”，那是何等的书生意气。内容共三条，1. 在抗日战争中，十八集团军方面努力向日军进攻。2. 在抗日战争中，张东荪方面努力做好瓦解伪军、伪组织的工作；3. 在抗战胜利后，双方合作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他曾让叶笃义带话给重庆的张君勱：“不要向国民党靠拢，不要向国民党一边倒，要走中间路线。”实际上，他走的是罗斯福所说的“居中而偏左”的路子。从“五四”时代他赞成社会主义、主张“第三种文明”，我们不难找到某种内在的线索。

抗战胜利后，他赞同“联合政府”，倾向与共产党合作。1946年10月，“国民大会”召开前夕，他到南京劝蒋介石缓开“国大”，原本说好个人会谈，结果变成了茶会。蒋虽到场与他握话，并劝他不必回北平，但因人多，不方便交换重要意见。他非常失望，次日即悄然回北平，拒绝出席“国大”，为此不惜与相识40年的老朋友、老搭档张君勱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对于蒋的电催，他以“燕京课忙，不克分身”予以回绝。

1946年12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之后，董必武仍留下在南京，张东荪觉得和平还留有一线机会，他说：“我们便要利用这个机会，先做调人再想办法，以堂堂正正的姿态，不偏于一方，不开罪两边的立场，促进协商团结。作这个斡旋和平的工作，关系国家整个前途，不是闹着玩的事，要完全保持着‘调人的资格’。”（陈尉《革命学者张东荪》，原载1947年6月出版的《现代新闻》第五期）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当事人叶笃义回忆：“张东荪在1947年1月初到上海参加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会后他到南京去见蒋介石，我陪他一道去南京的。……张东荪见蒋介石，蒋说将要改组政府，希望张能参加。张东荪说那样一来，他就失去参加和谈的身份了。张东荪劝蒋先不忙改组政府，而是恢复和谈。蒋介石对这一点不同意。”“张东荪见蒋之后，司徒雷登约张吃午饭。我同他一道前

往。……他劝司徒雷登也对蒋介石做同样劝告。司徒雷登不置可否，说现时劝蒋先不改组政府而恢复和谈，恐不大可能。他说将来和谈时候，希望张再来南京继续合作。”（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42—43页）见蒋时叶笃义没有同去，张东荪后来曾对孙子说，蒋请他吃饭，请他参加政府，他拒绝了，“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将来能参加和谈的身份。”“蒋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转引自左玉河《张东荪传》，369页）

当然，张东荪也和共产党方面保持着接触，他在1952年写的《张东荪检讨材料底稿》中说：“我后来所以见了蒋匪，是想在中共条件基础上恢复和谈，这事曾与董必武先生商量过。”（同上）他“始终认为只有国共和谈是中国的出路”，“谈判断了几次，我还希望能够恢复”，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像法共一样，“在议会中做斗争，所以以为必须由谈判来解决”。因为国民党方面不肯让步，所以，“应要求美国去压他”。他在这时期写的几篇文章，全是为此。（1952年检讨手稿，转引自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335页）

1947年3月8日，也就是3月1日南京政府“令京沪渝等地中共办事人员限期一律撤退”一星期后，民盟“为和谈正式破裂”发表宣言：“不幸今日国共两党，终于正式宣告和平破裂，痛心！痛心！”此前，1946年与1947年之交，他奔走于南京、上海，就是做“调人”，为和平做最后的努力。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正在欧洲访问、倡议和平，有人甚至将张东荪和华莱士相提并论。直到1948年9月5日，他在《中建》半月刊发表《日本投降三周年感言》一文说：“即在政协失败以后，我一个人还奔走沪宁几次，想谋挽回，不外乎忠告国民党把这个幻想收起来罢，拿出真正的良心来以谋合作，因为破裂的结果，我们早知道国民党并不能得到便宜。”（转引自左玉河《张东荪传》，370页）

当时，张东荪的想法就是政治上选择英美式自由民主，经济上采取苏联式计划经济。他自认为不偏不倚，采双方所长，融于一炉。早在1932年，他起草的《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时，这个思路就已形成。1946年6月，他公开提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重申抗战期间提出的——“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

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折衷方案，用意就是想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从而建立“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必须建立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具有中间性的，因为各党所共同承认的纲领必是由于彼此协商，互相让步，而得着一个折衷与调和”。他把自己这套兼顾“文化自由”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理论称为“新民主主义论”（或“新型民主”），与毛泽东的著名提法几乎一致。

1947年4月，他在《观察》周刊发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认为共产党所提出的“现在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和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可说几乎完全相同”。不能忽略的是，他始终强调个人自由，警惕“全体主义”：“政治家往往知道侧重于个人自由不易驱使人民，所以凡是政治家无不欢喜提倡全体的重要性。……他们于是提出全体主义的理论，而高呼‘国家至上’。”

包括张东荪在内许多代表“中间势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选择背后固然有现实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当时他们普遍认为苏联有经济平等，希望能在英美与苏联之间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制度模式。这并不是张东荪等个别人的见解，而是当年盛行的一种思潮，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类似的言论出现在《观察》《时与文》《周报》《时代批评》《大公报》等许多报刊上。计划经济以及可能带来的平等让千百年来怀抱大同梦想的中国人向往之，他们理想中的“联合政府”，与毛泽东提供的“联合政府”方案迅速产生共鸣，决不是偶然的。

“中间势力”，不是指某个具体的政治团体，而是指当时处于国、共之外的社会力量，同样是具体的，不是空洞的，既包括民盟、民建、民进等民主党派的人，也包括更多无党派的人。胡绳晚年《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第一节就是《关于“中间势力”》，“除

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该有一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这本书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胡绳全书》第七卷，45—46页）

毫无疑问，张东荪就是“中间势力”的重要代言人，这有他当时在《观察》《再生》《时与文》《文汇报》等报刊发表的大量言论为证，他正式提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而再地倡导“中间路线”，而且在内战全面爆发前夕为斡旋和平竭尽全力。

五

张东荪至死都为自己参与北平“围城解纽”、“保全人民古物”而欣慰，他不可能看到毛泽东给党内的那些电报指示，胜券在握的一方之所以选中他，就是要让他这个有社会声望的书生在场，亲眼见证他们的“宽宏大量”，打心眼里认定他们是“仁义之师”。那时，他也曾是李宗仁最为看重的“第三方面”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李济深和章伯钧）。

他一生扮演的主要角色还是哲学教授，读书、教书、著书、译书，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书生。他之所以拒绝蒋介石的邀请南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离不开他在北平执教二十九年所收藏的中外书籍”。（谢扶雅《怀念张东荪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26卷第6期）当然，他留下的《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重要著作中，有许多都是他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思考。在40年代后期的《观察》周刊等报刊上，他的名字出现频率很高，包括他在内的知识分子或许都没有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一切，包括自身的命运。“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就是他留下的一声沉重叹息。

1946年，他在60岁那年说：“自问一生是专为思想自由而争，……今

天要争自由自当先从其反面入手，就是必须先
将一切妨碍自由的制度，例如特权阶级与特务
警察等，完全撤废，这是消极方面。至于积极方
面，则尚有待于教育的推进，并不是不受高尚文
化的熏习就配有自由的，因为自由是一个关于全
体的道德问题。”

俞颂华称他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
但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和胡适并不一致。他喜
欢独来独往，特立独行，不愿受任何约束，“铁
的纪律”是他所头痛的。他的立场到后来基本
上属于自由主义偏左（或者说中间偏左）的一翼。
他自我定位是一个“文化自由主义者”。1948年
2月，他在《政治的自由主义与文化的自由主义》
一文中说：“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可以形成一个党，
或名为自由党，或名为民主党。而文化上的自
由主义并不须有固定的内容，只是一种‘态度’，
而不是具体的主张。无论何种学说或思想，只
要由严格的逻辑推出，有充分的事实为证据，
换言之，是由于科学方法而成，则都可为文化的
自由主义者所承认。”

其时，民盟已被国民党解散，他在思想上
发生一些微妙变化并不奇怪，他断言“政治的
自由主义在今天20世纪已是过去了”，“文化的自由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上
学术思想的生命线。中国今后要吸收西方文化，进一步要对于全世界文化
有所贡献，更不能不特别注重这个自由”。文化的自由，首先是一种批评的
精神和容忍的态度，在他看来，没有一个学说与思想是不能批评的，也没
有一个学说与思想是不能容忍的，在文化自由的尺度下，就没有任何定于一
尊的学说与思想。其实，这些观点与胡适并无分歧，可是当1948年11
月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自由主义》的讲演后，他发表《知识分子与

戊子冬北平圍城余在劉后園侯少伯彭岳漁張東荪碧侶議眾
兵以保全人及古物以余為奴方信任使城接洽必此實為不誤
為懼不幸而一言以解事後友人載之有北平解圍余自北平
著冬終冊天不底也一月又因裝版幅面示早錄
東荪白

●张东荪自题“北平解围”

“应笑书生不自量”：

——“中间势力”代言人张东荪

文化的自由》一文，批评胡适将自由主义等同于“平和改良主义”，认为这是“完全忘记了历史”，是对当权者的迁就，精神不独立的表现，而真正的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应该是建立于精神的独立之上的。

张东荪一生都在追求他心目中的精神独立。在他看来，民主不只是政治制度，更是整个的文明，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人问，为什么中国的汉奸特别多？他说唯一的答案，“是由于社会组织使然，即他们的生活根据只是做官，除了做官以外，无法另外得到生活。所以为了做官只得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得去做官。这个情形却与民主的社会根本上相反。”他一生参与那么多重大政治活动，说到底他还是一个论政而不是从政的人，其实出发点无非为了追求这样的民主。

在 20 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大变动中，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坚持独立的思想，以言论影响社会。他说：“人人都有独立自尊的人格，对于任何事情都可有自己的判断，不可欺蒙、亦不可压迫”。正是独立自尊的人格成全了这个“文化自由主义者”，他的作为超越了“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宿命，也有别于古代士人的清议传统。他坚持的社会民主主义、中间偏左只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1965 年，79 岁那年张东荪填了“沁园春”一阙预作 80 自寿，虽说“休回首，似泥中曳尾”，虽说只剩下“有酒聊浇铁石肠”，然而，无论他的“憎命文章”，还是他的平生经历，“虏狱刑还”或“围城劝解”，每一幕都并不像他自己所解嘲的：“应笑书生不自量。”

主要参考书目：

1.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
2. 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3. 葛思恩、俞湘文编，《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 年版。
4. 储安平主编，《观察》周刊（影印本），1946—1948 年，岳麓书社，1999 年。
5. 《胡绳全书》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6. 张东荪，《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2 年版。

7.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8.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观察社,1948年版。
9. 克柔编,《张东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10.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换点》,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12.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1924年9月，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在《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言中说：

“书业在此二十年中，和天灾斗，和祸乱斗，和物价斗，和货币紊乱、交通不便……种种情形斗，却还有十倍的进步。假使各种障碍渐次减除，教育渐次发达，十年、二十年……之后，应该进步到如何程度呢！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

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上把出版和印刷业统称为书业。

张元济在戊戌变法被绞杀之后遭革职，黯然南下，几年后怀抱教育救国的抱负进入商务印书馆。在他手里，中国出版业完成了近代化的过程。他被誉为“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一个“通过知识启蒙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榜样。

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中国出版史上享有盛名的出版机构，都与商务有着很深的渊源，其创办人或主要骨干几乎都出身商务，与商务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和实际关系。陆费逵原来是商务的出版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1912年脱离商务、手创中华书局，迅速成长为几乎可以与商务相颉颃的出版社。1900年进商务的沈知方，从“跑街”到顾问，1912年与陆费逵一起离开商务，共创中华书局，几年之后又离开中华，自创世界书局，与中华、商务形成鼎足之势。开明书店创始人章锡琛在商务做过15年的编辑，曾任《妇女杂志》的主编。屹立在出版史上的中华、世界、开明这些近代出版机构，各有特色，各有可圈可点处，他们和商务在营业上有竞争，在精神上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可以说，商务涵育、培养、锻炼了一代出版家，称之为近代中国出版业的龙头或航母，当之无愧。

第十篇

“昌明教育平生愿”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的故乡浙江海盐地近杭州，他对杭州非常熟悉，从1906年到1937年的30多年间，他几乎年年都要到杭州，有时一年不止一次。或为商务印书馆的各类公务，或为私事，他的日记和往来信札常提及杭州之行或与杭州有关的人事，沪杭道上留下了他风尘仆仆的身影。1909年开设的商务杭州分馆旧址尚存（就是解放路新华书店），可惜老屋已无。除了商务分馆，梅花碑的文华古玩铺、孤山的文澜阁等都曾是他逗留难忘之所。1924年6月，他曾勾留西湖先后6日，在湖边一家清静的旅舍内完成嘉兴（古称槁李）乡邦文献的遴选、整理工作。1933年2月初和12月下旬，他几次来杭州，都是到文澜阁看《四库全书》藏书，校勘商务影印的文渊阁藏本，同行的商务杭州分馆经理俞镜清和徐莲僧、许宝骈等人忘不了，即使在火车上，他也要取出《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清样，用朱笔校订。俞镜清说：“老



●张元济

伯！太辛苦了，在车上还是休息休息吧！”他严肃地回答：“你不知道，不这样赶，是来不及了呀！”“何以说来不及？我已那末老了，快要离开人世了啊！”在杭州阅书的日子，上述三个人协助他翻书，他的阅书之速与精细，令众人叹服。

1889年9月，23岁的张元济第一次到杭州参加乡试，母亲为他准备了两个考篮，一个篮子放的是笔墨、剪刀、糍糊等文具，一个放的是锅、碗、面条和油盐酱醋等。三场考试，吃、住都要在贡院的号舍内，每餐都得自己动手，对他而言，这确实比考试还要难，他将面条放入冷水锅中煮食，煮成了面糊。考毕回家，一时传为笑谈。好在10月9日发榜，他中了第10名举人，与蔡元培、汪康年等同科。1892年，他赴京会试，与蔡元培、汤寿潜、唐文治、叶德辉等同科中进士。如果不是戊戌变法失败，他将会在“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的千年老路上走下去。1898年10月8日，在“戊戌六君子”蒙难后不久，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母亲却安慰他说：“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事实上也正是这一挫折成全了他，使他成为近代转型期的出版业巨人。

回望戊戌年，是张元济一生的创痛，1937年，当陈三立在北平去世，离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殉国已有40年，当年陷于被捕、革职、流放的20多人只剩下他和熊希龄二人。“举目山河迹已陈”，他写下两首七绝《挽诗》。不过半年，熊希龄也在海外谢世，他成为硕果仅存的戊戌亲历者，“回首当年，哀感何极。”1953年5月23日，他在给江苏商界人士李伯涵的信中说：“戊戌变法时机全未成熟，当时顽固势力尚盛，同志诸人知其不可而为，至今思之，真可谓痴心妄想耳。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亦唯有付之浩叹而已！”这几句话可以看作他对自己身历的戊戌变法最后的评价。几天后（5月27日），他在给叶恭绰的信中再次提及戊戌变法，“此事实为清室兴废攸关，不幸女主干政，奸佞盈廷，钩党罗织，酿成奇祸。匆匆已五十余年。昔日同朝之人已无一存。”并寄去了一组诗《戊戌政变杂咏》。这一年他已经87岁高龄。6月7日，叶恭绰读了他的《戊戌政变杂咏》后说：“如读天宝，如录永贞，同深怅惘。”并告诉他，有友人找到了当年徐致靖推荐他和康、梁等五人的那份奏牍，如果他要，可以抄寄。6月17日，他写

信给叶恭绰：“徐学士荐举长素兼及下走，前此从未获睹。被荐之后，以避嫌未敢私得，其荐牍从未获睹。不意尚有存稿，甚愿一观。”“学士眷属早径南下，囊在某报见有投稿，自著一士者，喜谈旧事，想系其家子弟，不知尚在都下否？”三天后（6月20日）他收到叶恭绰寄来的徐致靖《密保维新人才疏》。10月22日，作为戊戌变法唯一的见证人，他在这份《密保维新人才疏》上题跋：“疏中所举五人，（谭嗣同）不幸陷于刑戮，余三子均作古，存者独元济一人而已，世事沧桑，可胜浩叹！”

1898年6月13日，徐致靖在《密保维新人才疏》中保荐张元济等5人，其中说：“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光绪帝朱批：“二十八日预备召见”。张元济在《戊戌政变的回忆》中说，正是由于这一保荐，6月26日（即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他和康有为同时在西苑勤政殿受到光绪帝召见，那一天年轻的光绪帝在接见康有为之后和他谈了3刻钟，光绪帝问及他于1897年奏请创办的通艺学堂，从学生人数到功课设置等，都问得很仔细，他回答有英语、算学等，都是初步。光绪帝说：“外交事关紧要，翻译必须讲求。”又问有无铁路课程，他说没有。光绪帝说印度铁路已修到西藏边界，现在云南交涉事繁，从北京到云南需两三个月路程，外交怎么能不吃亏。他回答，要开铁路，必须赶紧培养人材，不光铁路，矿山、河渠、船厂、机器厂，还有翻译等，都很紧要，应责成大学堂认真造就各项人材。当他表示“皇上现在励精图治，力求改革，国家总有希望”，光绪帝叹息说：“可他们都不能赞成呀。”很多年后他仍记得光绪帝的语音很低，语气极温和，龙椅后窗外隐约似有人影，他也不敢多说。

1916年4月2日到9日，张元济从上海到杭州，探望了当年上折子推荐他的徐致靖老人。4月13日，他回上海后还曾写信给徐。同年12月23日，他写信告诉康有为，想印《戊戌六君子集》，前一天他刚从海盐扫墓、取道杭州回来。1919年，他在商务印书馆排印了徐仁铸的《涵斋遗稿》，分送徐家亲戚友好，他还聘请徐仁镜到商务编中学教科书。直到1949年，徐致靖的外孙许姬传随梅兰芳出席文代会，在旧六国饭店遇到他，问起袁世凯

是否出卖维新派的事，他回答说：“我在戊戌政变中是外围，有些事没有参加。”他所说的确是实情，他所热衷的是教育，被徐推荐也是因为办学，大约戊戌六七月间，他曾劝说康有为乘皇帝诏令各省广设学堂之机，“出京回籍，韬晦一时，免撻众忌。到粤专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康有为没有接受。此后他投身商务印书馆的出发点正是教育。1899年11月，他在上海曾和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笔谈，一致认为“维新以西方作模式，最终是不利的”，“要培养人才，首先必须兴办学校。在形成知识分子伦理道德方面，我们必须首先关心学校里的学生”。谈到康有为时，他说：“康有为这类人总想把他们的主张强加于多数人，但结果正像你说的那样，遭到意想不到的失败。”这一年，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一个文化程度不高却有眼光、有远见的基督徒夏瑞芳订交，当时商务只是一家小规模印刷厂。

1901年10月5日，对办学一直不死心的张元济写信给盛宣怀，建议广设学堂，“中国号称四万万，其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他提出设学堂的目的就是要



●张元济

“使人能稍稍明白”，一改“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的积弊。1903年，他应夏瑞芳之邀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时，就是“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相约（1901年他已成为股东）。1911年8月，他曾被选为中国教育会会长。到1913年9月，他写信给正在组阁的维新同党熊希龄：“无论从何方面着想，终不能不从教育入手。财政固根本问题，而教育则根本中之根本也。”

商务印书馆是个全新的事业，

在一个早就发明了印刷术的古国，要说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业，可以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张元济的介入，成为商务的一个新起点，他从设立编译所、编纂教科书入手，不仅要把商务办成“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的近代出版机构，而且看作是“重要的教育机关”，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当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业务之一。这一年他36岁，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一生事业的开始。他在商务先是主持编译所，几年后担任经理，主持整个商务印书馆，他一生都没有离开商务。1932年，他在写给美国金恩出版公司普林顿（George Plimpton）的信中表示，自己不在政界，“现唯从事补助教育、唤醒国民”，其中不无自豪。他与陈三立同辈，与康、梁、谭、严同为徐致靖推荐给光绪帝的才俊，戊戌之后转向教育、出版，他的事业确实是延伸最久，从晚清起始一直绵延至今。



1936年6月，为庆祝张元济70岁生日，蔡元培、胡适、王云五联名发出《征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启》：“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他兼有学者和事业家的特长。他早年就敝履虚荣，致力文化事业，服劳工所不能服的劳，不计成败，不顾毁誉，三十年如一日；所以能把一个小印刷店提到全国第一个出版家的地位。”相隔20年，1956年10月，张元济90岁时，商务出身的茅盾祝辞中也有这样一句：“从戊戌以后，菊生先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中国于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业。”

从1902年介入商务，张元济几乎把毕生的心血都注入了商务的事业。在他身后，当商务印书馆迎来百岁生日时，曾有一首叫做《千丈之松》的颂歌，歌词是由张元济、茅盾、叶圣陶等人的诗词集句而成的，第一段歌词就是张元济当年为一位同事写的七绝：“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

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第四段又是他的词：“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

张元济初入商务，怀抱的正是“开通民智，教育救国”的志愿。自晚清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商务在他们的努力

下，本着昌明教育、普及文化的宗旨，愣是在动荡的乱世夹缝中创造了一个出版史上的奇迹，严复翻译的学术名著，不懂外语的林纾以生花妙笔转译的外国小说，都曾风靡一个时代，更重要的是他主持乃至亲自编写的那些中小学教科书，启迪、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在建构中国人的知识和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是难以估量的。

商务被看作是“全国的文化总枢”（当时远在四川的实业家卢作孚为义勇军拟定的许多抗日标语中就有一条：“毁坏我们全国的文化总枢——商务印书馆”）。梁漱溟、叶圣陶等都曾回忆起商务教科书和其他读物对他们一生的影响，作家冰心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中深情地回忆：

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来，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学问与知识。

有了商务印书馆，中国的出版业就完成了自己的近代化进程。1930年5月，王云五代表商务访问美国时，《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赞誉商务“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文化事业是跨越时代和国界的，商务受到

尊敬并不偶然。到辛亥革命发生的1911年，商务已出齐初小、高小至中学各年级的各科教科书共375种、801册，完成了连清廷都难以办到的浩大文化工程。至20世纪20年代，商务出版的教科书约占有全国教科书发行量的70%左右。

自晚清以来经历许多重大历史变动，商务始终屹立不倒，保持了勃勃生气。作为商务的保姆，张元济筚路蓝缕，创造了一个“矮人国”里的“巨无霸”。很多对近代历史进程有影响的译作都是商务首先出版的。商务在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的潮流中，率先推出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小学教科书，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虽然比从商务出走、自创中华书局的陆费逵慢了一拍，还是很快

推出了共和国教科书，“五四”新潮澎湃，当世人为“白话还是文言”争论不休时，商务已在大量印行白话文的课本，这个行动实际上给一场激烈的争论悄悄地画上了句号。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压力，商务能急转航舵，显示了与时俱进、自我调整的能力，这里面张元济的作用是主要的。1920年初，商务高层曾商议过要在北京设“第二”编译所，请“五四”风云人物胡适主持，每年经费拨3万元，另由梁启超等组织的“共学社”主持，推出一套“新知识丛书”、中学教科书等，商务拟垫付版税2万元。商务的众多期刊，如《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也都大胆起用新人，进行革新。这些在他1916年到1921年的日记中都留下了痕迹。早在1916年9月6日，他在日记中就记着，那天晚上他约鲍咸昌、高梦旦、李拔可到会议室，商务领导层基本达成共识：“本馆营业，非用新人、知识

由唐子撰序
 中以上各书均由唐子撰
 及因致之二十之年
 公之一二二二
 亦以是书在唐子自一日
 生亦亦以是书在唐子自一日

●王云五手迹

较优者断难与学界、政界接洽。”

1921年，商务曾决意邀请胡适主持商务编译所，虽然胡适最终没有答应，而是另荐了早年的老师王云五，但他在日记中认为：“对几千万少年的知识思想有影响的商务，要比北京大学重要得多。”

从1902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商务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商务在“严译名著”、“林译丛书”之后推出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汉译文学名著丛书”等都为国人打开了眼界。张元济称自己生平宗旨是“喜新厌旧”，其实他“喜新”是真，“厌旧”未必，许多大部头的著名典籍《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续古逸丛书》《涵芬楼秘籍》乃至《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也是在他的主持下或他亲自校订出版的，他从来没有忘记保存古老文化传统的责任，他曾对顾廷龙说：“能于文化消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在他这里，知新与温故实际上是并重的，将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发扬光大，与引入新知一样重要。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点燃“一二八”的战火，商务总厂、著名的东方图书馆都化为一片废墟，那么多珍贵的藏书顷刻变成了灰烬。东北风把纸灰从闸北一直吹到沪西他的家中，张元济不禁泪下。“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这是他万念俱灰时写下的诗句。但他和王云五等人还是很快站了起来。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商务印书馆“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簣。设竟从此湮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他们要为苦难中的民族争一口气，不想给虎视眈眈的日本人看笑话。果然，不出一年商务就重新恢复了昔日的辉煌。

敌人可以炸毁有形的商务大楼、工厂，却炸不掉数十年来在国人心目中建立起来的无形的商务。然而，那么多珍贵的藏书从此永远消失，每一念及，他就“为之心痛”。东方图书馆的前身是涵芬楼，张元济初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时就开始尽力搜罗国内各家散出的藏书、欧美新书，仅地方志就积累了2600多种、25600多册，还有宋、元、明历代的珍贵善本。20年后，到1924年商务出资10多万，建造了一个新式大厦，将涵芬楼藏书全部移入，改名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服务社会，受到中外学者的称誉。“中原文物凋残甚，欲馈贫粮倍苦辛。愿祝化身千万亿，有书分饷读书人。”

这是张元济的心愿。1932年3月5日，他给目录学家、商务编辑姚名达写信，想起以前东方图书馆借书方便，自己不太买书，“而今而后不可得矣，思之又不禁为之泫然。”6月22日，他在给罗家伦的信中说：“商务被毁，固属可惜，最可痛者为东方图书馆……”

自进入商务之后，张元济对官场已了无兴趣。1906年（离戊戌变法8年），清廷下诏为他复职，他于3月18日入京，初在学部，后为外务部储才馆提调，6月14日他就离职南下，前后不足3个月，表面上的原因是他和上司唐绍仪意见不合。1907年9月13日，清廷授他为邮传部左参议，他当即上书坚辞，请求“代奏开缺”。1909年7月31日，清廷批准度支部的奏请，派他和唐文治、张謇为度支部咨议官，他没有赴任。1910年1月28日，清廷命他任币制调查局顾问员，他也未接受。那时，他连许多民间社团的领导人职务也一再辞让。1907年他被选为“全浙教育总会会长”，当即辞了，虽然“浙人浙事于义本不容辞”，但他依然不愿接受。辛亥革命中，汤寿潜任浙江都督，两次请他担任浙江“赴鄂代表”，他都辞谢了，理由是“欲建新事业，必得新人物”，“代表责任重，”“必从事于军政府或向来有功于革命事业者方可胜任。”同年12月8日，因为有人散发传单，指控他受袁世凯指使，运动报馆，造谣说汉阳失守，他在《民立报》刊出《张菊生启事》：“鄙人于丙午复职以后，始终未入官途，何独于危亡颠覆之时转发做官思想？若欲得钱，则取不义之财，孰有如做官之便者。”1919年6月，他连“海盐旅沪同乡会会长”也不接受。1936年8月，他为章太炎写的挽联上联为：“无意求官，问天下英雄能不入彀者有几辈”，这又何尝不是他的自我写照呢。到1953年，他在私人信件中提及自己的从政生涯，说自己“戊戌参与变法，政变后遂遭禁锢。民国后却未入仕。”其中不无自得。

他虽不愿从政，但他对社会的关心从未一日少懈。1903年7月上海租界会审“苏报案”，他前往旁听，章太炎在庭上“侃侃直陈”，他甚感敬佩。1904年，他和张謇、汤寿潜、夏曾佑等连日会议，联名说贴敦请已经是军机大臣的老师瞿鸿禨倡导立宪，派人调查宪法，敦促朝廷年内颁布诏令。后来瞿果然力主派人出洋，促成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19年11月22日瞿在杭州去世后，他曾亲到杭州送葬，第二天巡视商务杭州分馆，当

晚回上海。)

他对《新月》杂志一直关心，胡适1929年发表《人权与约法》等文，向国民党当局开火，他写信给胡适，称誉“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并提醒不要打狗反被疯狗咬。他对罗隆基等人的被捕萦怀于心。1932年3月，他得知胡适等人要在北平办《独立评论》，制造言论，以图改革政治，闻之欣然，在写给丁文江的信中说：“吾辈决不想与国民（党）争权，也不想推翻其天下，但不能不责其必须改过。”他从军政、财政、民政、实业、交通、教育等方面列数国民党的不是，“如此现象，成何国家？”他很看重《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这样的言论努力，1937年2月12日，他还写信给胡适，“《独立评论》至今未曾复版，痛恨无已。”

1932年4月4日，他与黄炎培等30人致电国民党当局，拒绝参加洛阳“国难会议”，要求国民党改革，实行宪政。1933年5月13日，他从杭州回到上海，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建筑公路鄙人认为毫无知识，不顾民力之建设，极不赞成。去岁在庐山曾为蒋君介石痛切言之。”同年9月，他在庐山见到蒋介石，当时国民党当局对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多方责难，屡有“开天窗”之事发生，他希望蒋能允许“开禁”，蒋答应调查。

1937年7月初，上海《大公报》报道涉及官场腐败的纱布投机案，并发表义正词严的评论，5日他写信给《大公报》，表示“钦佩无极”，对全无心肝的贪官把持政局深表愤慨，认为被挖出的小人物吴盛不过一“窃钩之徒”，背后一定有人，他希望“为民喉舌，责无旁贷”的《大公报》能继续揭破事实真相。此信第二天就在《大公报》公开发表。10日，《大公报》刊出胡适7月8日的来信：“张先生是七十一岁的老翁，他对于国事还如此热心，真可以使我们年轻人惭愧，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公民模范。”当月，蔡元培在读了他给《大公报》的信后，也在《杂记》中写道：“此老久不干涉政治问题，近渐渐热心。苏州法院审沈钧儒七人案，张君特赴苏旁听，亦其一端。商务近印其所著《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亦其热情所寄也。”这一时期他亲手编写的《中华民族的人格》、在《大公报》发表的《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等都显示出他深重的忧患意识。

1947年，上海学潮澎湃，国民党当局逮捕许多大学生，他与唐文治、

陈叔通等十老上书市长吴国桢和警备司令宣铁吾，要求释放学生。1948年6月，他再次和唐文治联名写信给吴国桢，为上海交大学生执言。

三

张元济是新旧转型时代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许多旧时读书人的优良品格：不为威武所屈，不为功名利禄所动，有一种天然流露的浩然之气。这样的气节今天很难看到了。1920年6月10日，他发现花红名单上自己的名下有“另加三千元”条，马上约商务创办人之一鲍咸昌谈话，“吾辈在此决非专为钱计，去年已将我三人改为一律，今岁自不应再加，请将所加三千元即行勾去。”鲍说这是高凤池的意见，一定要他接受这次加红，才能将薪水照办（指他的薪水从350元减为200元），而他坚持要求划去加红，薪水则接受董事会规定。

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在《我的父亲张元济》中回忆，父亲常戏称自己是制订规章制度的“专家”。商务的许多规章制度都是他亲笔起草、亲手创建的。他总是身体力行，严以律己，事事处处以自己的行为替商务立下严格的规矩：“凡是公司业务的需要宴请，总在杏花楼、小有天、多一处等餐馆举行，费用由公司支付。”如是私请，都是在家进行，费用自理，公私泾渭分明。曾在商务出过书的周越然回忆，商务的账务很严格，对作者的版税毫不作伪，毫不推宕。遭遇“一二八”劫难，商务停业几个月，他以为版税无着了。哪知商务一复业，不到一个月就将此前没有结清的版税1700多元送到他家。他感慨：“商务之诚实可靠，商务之顾全信用，真可令人佩服！”

1916、1917年间，张元济因体弱请假，要求停减薪水（他1917年2月10日的日记中说，写信要求这个月起领半薪），董事会还是照常支付，他拒绝接受，商务就把钱存在一个单独的账户上，归于他的名下，到1925

年12月止，本息共有银币5158.14元。他坚决不受，全部捐赠给商务扶助同人子女教育基金委员会。

1926年9月，在他退休前夕，他只愿按照普通同人定额接受退休金，不愿董事会从优对待，所以一再议而不决。他的见解是，自己今日多得一钱，同人他日就少得一钱，自己在公司20多年，受薪不薄，略有积蓄，足以自给，如果商务一定要在普通定额外多给他分毫，他就要缴还公司。

商务最初是由一批基督教徒创办的，但张元济认为这毕竟是商业机构，而不是宗教机构，用人进退方面一向都不问是否信基督教，“公司之于人材，不问其教与不教，只问其宜与不宜耳。”

他公正无私，目标只是要“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早在1922年他就因坚持原则，与鲍咸昌发生冲突（因为鲍的儿子在印刷所），9月10日他在给鲍的信中恳切指出：

弟近来主张公司重要职员子弟不宜入公司，宜在外就事养成资格一节，亦无非为公司大局起见。……吾兄手创商务印书馆，勤劳已二十五年，弟亦追随二十年，致今日有此成绩。吾兄极爱公司，弟亦不敢不爱公司，故于公司利害有关之事，不能不言。（今日王莲溪兄来言，亦反对弟之主张。谓鲍某某儿子可以进来，我的儿子亦要进来，凡重要职员的儿子都可以进来，云云。弟即告以人人都有儿子，都要进公司，恐不成话。并驳其为争权利之见。莲兄点头许我。）

当然，长期以来商务几个创办人都是尊重张元济的意见（包括后来王云五的意见）。

1926年5月18日，张元济辞去商务监事时，指出：“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后来，他儿子张树年自美国留学归来，有意到商务服务，他明确拒绝：“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他向儿子分析了进商务的三不利：一是对你不利，你若进商务，必然会有人甚至一帮人吹捧你，你就会失去刻苦锻炼的机会，浮在上面，领取高薪，岂不毁你一生。二是对他自己不利。父子同在一处工作，他就要受到牵制，尤其在人事安排上很难

主持公道，讲话无力。三是对公司不利。你进公司，将会开一极为恶劣的风气，必然有人要求援例。人人都有儿子，大家都把儿子塞进来，这还像什么样企业。他最后说：“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子弟不准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张树年从来没有在商务工作过。

1935年6月，张元济在写给王云五、李拔可等人信中说，当10年前他退居二线之时，本想安度余年，不料大局岌岌可危，不得不继续竭尽全力，“一二八”以后，目睹王云五他们为复兴商务而辛劳操心，他更不忍心旁观。“区区之愿，倘能假我数年，弟终当常为公司办事，但终不能受公司一钱。以此报诸君，并以此报身殉公司之故人，亦即以报始终信我之股东也。”

1937年抗战爆发，商务面临又一次重大考验，他已垂垂老矣，退而不休也有10多年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打响，上海“孤岛”终于沦陷，商务印书馆本部早已迁到后方，上海的商务发行所和各工厂都被查封，书籍被抄走460万册，铅字50多吨，启封时发还的只是一小部分。张元济仍留在那里苦撑危局，商务既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只以印刷一些旧版书籍和古籍勉强维持营业。他自己的家庭境况也日益窘迫，连为数不多的善本书都陆续卖掉了。即使如此，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低头。大约1942年初，两个日本人前来求见张元济，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8个字，拒绝见面。他与汪精卫本有私交，20年代，他去广州，汪曾陪同他拜谒黄花岗烈士墓。1937年他的日记中还提及与汪的交往，但一旦汪与日本人合作，他就坚决不再与汪有任何来往，汪托人送来与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他嗤之以鼻。在一位亲戚的建议下，张元济开始卖字，图章上有“戊戌党锢子遗”字样。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附庸风雅，托一位亲戚送去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从支票的印章发现是傅式说的，立马断然拒绝，退回支票。

如果说在张元济的推动下，商务印书馆开创了中国近代的出版业，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则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石。商务与北大在他们手里还有过很好的合作，他们曾亲手签定过一份《北京大学月刊》的出版合同，时在1919年2月26日，他们俩分别代表商务和北大签字，北大为著作人，商务为发行人。合同第五条规定，“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由发行人代垫，照实用之数，于年终报告著作人。”第八条规定，“销数不满二千部时，所有损耗，由发行人担任。如满一年后，尚销不足数，发行人得将杂志中可以单行者，另印单行本，以冀抵补。但著作人保有版权，适用编译会条件。”第九条规定，“销数满二千部以后，如有余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发行人得十分之四，于年终后，由发行人寄交著作人。”

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指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共同研究学术的机关，要坚守“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收之主义”，这是世界大学的通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也正是发行《北京大学月刊》的初衷。这份出版合同，由他们两人签字，代表了一南一北两家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教育机构的一次携手。根据当时的预算，月刊销路二千册大约可以保本，合同明确规定如果发行不到二千册，就由商务承担亏损，而一旦赢利，却由双方共享，而且由北大拿大头。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合同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从中看出一个支持新思潮的出版家，一个有远见的出版社，是不会把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他们的文化理想超过了商业追求。北大有很多学术著作也都是商务出版的，这是出版家与教育家最佳的结合。晚清之际，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兴旺发达，赫然已是中国出版业的巨无霸。多年后，蔡元培入主北大，才确立北大的学统。

张元济与蔡元培同年，同为浙江人，同科举人，又是同科进士，曾在南洋公学同事，一同创办了《外交报》，自1889年在杭州参加乡试结识以来，他们保持了终生的友情。他们俩的合作也是由来已久，蔡元培曾在商

务服务，虽为时很短，但一直称商务为“本馆”。1912年初，民国新生，百废待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手无分文，几次请求张元济帮助筹措经费，他都尽力而为了。先是当年3月2日，蒋维乔为教育部经费的事登门拜访张元济，代表蔡元培向商务借支。张多方代筹，由商务南京分馆先贷500元，后又函拨200元，未取。从6月27日蔡元培给蒋维乔的信可知，6月26日蔡元培又一次写信向张元济求助，恳请他代筹1000元。原来，蔡元培主持堂堂的教育部，开支不足，入不敷出，辞职时必须偿还所欠下的债务，才能清理自己经手的事项，了无“葛藤”地离开。

“五四”时代，当蔡元培在北大倡导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时，张元济在商务信奉的也是相似的原则。曾公开发表文章严厉批评过商务的北大学生罗家伦留学时遇到经济困难，以及回国之初陷于困境时，商务几次伸出热忱的援手，令罗感动。胡适当时有意编一套“常识丛书”，将拟目送到张的手中，张建议加上一题《过激主义》，虽然他本人从来都不赞同“过激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但在他看来，世人应该了解这一主义的来龙去脉。1932年，陈独秀被判刑入狱后，《东方杂志》照样发表他的文章，把稿酬寄到监狱中。

在提及商务和张元济时，我们常常会说到商务当年拒绝出版《孙文学说》一事。先是“五四”前夕，1919年4月初，孙中山托卢信恭来探询商务的意思，能不能出版《孙文学说》，并交来部分原稿（或由商务出版，或由他们出钱交商务印）。张元济和高梦旦等反复商量，为这事颇费踌躇，这在他4月14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梦意恐有不便。余云不如婉却。当往访信公，并交还原稿。告以政府横暴，言论出版太不自由，敝处难与抗，只可从缓。”同年9月19日，他在日记中说，当天接到卢的来信，批评商务4月间不肯出版《孙文学说》事，“今安福部及大学校均印，何以商务竟不肯印，阻碍伊之学说？”信中还说孙中山大怒，将登告白，遍告全国，并出示了告白文稿。张元济回答：“此告白系孙君自有之权。且本馆出书系有关教育，亦极愿闻过。至当时不肯承印，实因官吏专制太甚，商人不敢与抗，并非反对孙君。”9月26日，他写信给孙中山，解释退回《孙文学说》书稿的原因。孙中山没有发表谴责商务的告白，但他在1920年1月29日

致国民党海外同志信中，严厉抨击商务不仅在营业上有垄断性质，而且“为保皇党之余孽所把持”，所出书籍带有“保皇党气味”，“陈腐不堪读”，而且压制新出版物，“凡属吾党印刷之件，及外界与新思想有关之著作，彼皆拒不代印。”

可见张元济的解释，未能让孙中山释怀。对张元济和商务来说，作出这一选择是无奈的，“在商言商”，要将商务的事业长期持续下去，他们在许多时候也有许多的不得已。何况商务始终抱定教育救国的宗旨，与现实政治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30年代初，胡适组织千家驹等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商务都已排版，出了清样，第二卷也已交稿，也没能出版。鲁迅去世后，因为胡适的推荐，商务曾打算出版《鲁迅全集》，而且得到了国民党中宣部的准印许可，最终也没有出版。今天回过头来，如果我们体谅环境之艰难，也许觉得没有什么好苛责的。但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遗憾。纪念商务创立80周年之时，年迈的茅盾填了一阕《桂枝香》：

“维新大业，数出版前驱，堪称巨擘。世事白云苍狗，风涛激荡。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 《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 《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 张元济，《中华民族的人格》，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 张树年主编，柳和城等编著，《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馆、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长久以来，我总是很喜欢商务印书馆元老高凤池的这番话，银行、报纸、出版，再加上新式工厂、大学，都是最具有近代特征的新生事物。

自1897年第一家银行在上海出现以来，到1927年，历经30年的风雨沧桑，国人自办银行幸存下来的不过18家，包括1907年诞生于杭州的浙江兴业银行（以后总部迁到上海）、1915年开创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及浙江实业银行（前身浙江银行出现于1909年），合称为“南三行”。北方有号称“北四行”的盐业银行（1915年）、金城银行（1917年）、大陆银行（1919年）、中南银行（1921年），与这些银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银行家蒋抑卮、陈光甫、叶揆初、张公权、吴鼎昌、徐新六……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他们的命运、道路有所不同，但都曾做着相同的“金融报国”梦。陈光甫以区区7万元微薄资本起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不到10年的时间，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被外国人誉为“中国的摩根”。他们的创业故事、职业伦理、人格胸怀，包括他们性格上的缺点、人性中的弱点，这一切或大或小都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进程。

自晚清以来，经过第一代银行家筚路蓝缕的努力，和第二代银行家的专业提升，近代金融业逐渐替代了传统的票号、钱庄，静悄悄地改变了国人的日常生活，这是一场无声的金融革命。银行的出现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革新，那是难以估量的。对于银行的重要性，实业家们的体会可能会更深，穆藕初在《藕初五十自述》中说：

“实业虽为社会所需要，然在在赖金融之调剂。纵览各国历史，农工商百业发展之主因，无不以金融机关为入手先著。金融与百业发生之关系，无异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无滞，而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余因之而有组织银行之计划。”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创办多家纺织厂之后，1921年集资在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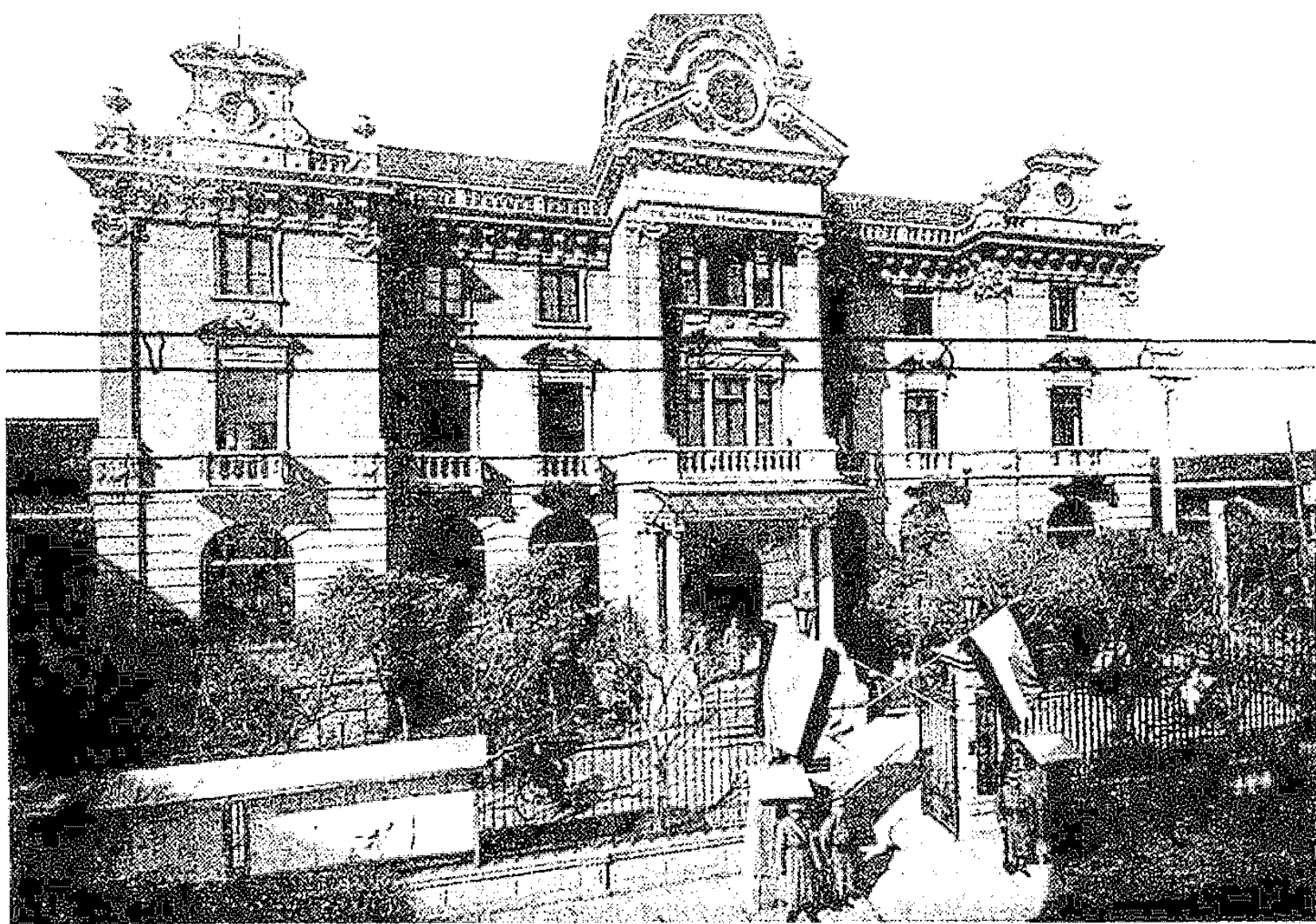
开办了中华劝工银行。他的主要成就还是在实业方面，自1914年留美归国以来，他一步步把实业报国的理想付诸现实。

晚清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办电报局的经元善、在上海白手起家的虞洽卿这些人，已经和盛宣怀等官商不同，到了穆藕初、卢作孚、范旭东、李烛尘、吴蕴初、刘鸿生……这一代实业家即使从政，也脱不了实业家的思维和习惯。穆藕初的纺织企业、范旭东的“永久黄”化工团队、荣氏的面粉与纺织企业、刘鸿生的火柴企业……基本上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起步，在民族浪潮不断高涨的呼声赢得市场。他们的成败悲欢，他们灼热的爱国情怀，他们身上的人格底气，都足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实业家在一个大时代的角色。他们不苟且，不虚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品格在其他大大小小的实业家身上都可以看到。

从根本上说，这些实业家都具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与蝇营狗苟、脑满肠肥的暴发户、大款不可同日而言，那是两种不同的人，不在同一精神层面上。在动荡的乱世，外有外国资本的压力，内有暴力纷争、工潮和国民党的压制。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民族工商业仍得到长足的发展，攀到了相当的高度。

第十一篇

“拨伊铜钱”：一代银行家蒋抑卮



这是浙江兴业银行当年的营业大楼，中西合璧、别具风格，曾经是杭州的标志性建筑，历经八、九十年的风雨考验，仍安如磐石地屹立在十字街头。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在整个中国金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掌舵人蒋抑卮的名声虽然不如陈光甫、张公权、周作民那样显赫，但同属近代的银行家群体。他们在近代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蒋抑卮的口头禅“拨伊铜钱”，也许我们已经久违了。

一 “拨伊铜钱”

1909年2月，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在东京一起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这是周氏兄弟生平第一次的文学努力，此举得到蒋抑卮的支持，先垫出印刷费，否则，鲁迅当时不可能有钱印书。初集印了1000册，二集只印500册，可惜回音空荡，初集在东京群益书店只卖出21本，二集卖出20本，在上海蒋家开的广昌隆绸庄寄售，这本书的命运也是差不多，据说也卖出20册上下。因为收不回本钱再印第三集，于是只好中止。剩下的一部分书就保存在杭州的蒋广昌绸庄和上海的凡将草堂藏书楼。

周作人《知堂回忆录》有一篇就叫《蒋抑卮》，对此有详细追忆，大约1908年初冬，蒋抑卮到日本医病，长住一段时间，夫妇俩一时没租到房子，最初就是鲁迅兄弟把自己租的房子让给他们住。蒋抑卮，名鸿林，“本身是个秀才，很读些古书以及讲时务的新书，思想很是开通”。在日本

期间，白天无事，他经常跑到鲁迅的住处谈天，“因为人颇通达，所以和鲁迅很谈得来”，周作人“那时只是在旁听着罢了”，“他一听译印小说的话，就大为赞成，愿意垫出资本来，助成这件事，于是《域外小说集》的计画便骤然于几日中决定了”。蒋的上代也是绍兴人，似乎他父亲这一代还是的，少年时代因为家贫，经常背着布匹包裹，串门走巷做生意，由此起家，开了绸缎庄，到了蒋抑卮长大后，还开起了银行，已经是浙江兴业



●蒋抑卮



●蒋抑卮与鲁迅等在日本合影

银行的一大股东。蒋抑卮平常有一句口头禅，凡是遇到什么稍有窒碍的事，常说“拨伊铜钱”（绍兴话就是“给他钱”的意思）就行了吧。鲁迅因此给他了个绰号叫“拨伊铜钱”，其中毫无恶意，“只是举出他的一种特殊脾气来，做一个‘表德’罢了。天下事固然并不都是用钱便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他这‘格言’如施用得当，却也能做成一点事情来，这里他只垫出了印刷费二百元之谱，印出两册小说集，不能不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知堂回忆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268页）

蒋抑卮早年赞助的事业还有《浙江潮》，那是1902年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的期刊。他捐款100元作为开办费，当时他在日本留学，结识了鲁迅、许寿裳等人。1904年，他因病回国以后，和鲁迅书信往还不断，1904年8月9日，鲁迅在仙台写信给他，表达他们真挚的友谊，其中有“所聊慰情者，廛我旧友之笔音耳”等语。

从1912年到1928年，鲁迅日记中至少有42处提到蒋抑卮。1915年7月15日，“得蒋抑卮信并明刻《嵇中散集》一卷。”鲁迅当时热衷于收集嵇

康的资料，蒋提供了许多帮助，鲁迅在日记中多有提及。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36年鲁迅去世后，蒋抑卮送去了“文章千古”的挽幛，悼念千古一人的老朋友，并资助出版《鲁迅全集》。

蒋抑卮的“拨伊铜钱”之名不虚，对图书馆等文化事业多有扶助，他的“凡将草堂”藏书楼，收集了大量江南名门望族的族谱，有一些还是明代的抄本或刻本。1939年，张元济、陈叔通、叶揆初等在上海发起合众图书馆。1940年，已在生命最后时光的蒋抑卮还念及此事，捐了5万元股票作为图书馆的创办费，以及97593卷、共34463册图书。他对主持此事的顾廷龙说：“旧书应该归到图书馆，让社会上从事这种学问者利用，一人的搜求是有限的，终是要靠互相通假的，所以图书馆是藏书的归宿。”他明白捐书要及身完成，否则后人将视为财产，不好实践。顾廷龙的回忆证实，蒋抑卮“实为赞助本馆最出力的第一人”。（在他身后，剩下的全部藏书200箱都捐出来了，前后共计捐出古籍5.5万多册，已归入上海图书馆。）

蒋抑卮对教育事业也有赞助，曾以个人名义设立“凡将草堂小学基金”，以其父母名义设立杭州孤儿院教育基金，并一直想捐资设立一个奖励“以研究丝织为专务、著有信誉”的“本国人学术团体”，这一愿望他生前未能完成。“拨伊铜钱”，对于他而言决不是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

二 蒋抑卮其人

蒋抑卮（1875—1940）生在杭州，关于他的家世，其子蒋世承的回忆与周作人有所出入。他们家自高祖时就已从绍兴迁居杭州积善坊巷，从事酒肆业，到他父亲蒋海筹（1845—1934）手里开始与人合伙经营丝绸生意，1858年开办蒋广昌绸庄，1862年后又有了织造作坊，声誉渐起，到1876年后，分号遍及上海、汉口、天津、哈尔滨等地，1908年，已将业务拓展到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一带，积资300万以上，成为杭州丝绸业巨子。



●杭州积善坊蒋抑卮旧居

蒋抑卮是次子，小时应童子试，补钱塘县生员，但他对科举八股这一套没有兴趣，对衙门的应酬往来更是厌恶，因此潜心学业，曾研究过古文字学，读过章太炎的《文始》一文，对汉文字的源头、发展、读音变迁等都有心得。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辛丑条约》的签定对青年蒋抑卮刺激很大，他于1902年10月东渡日本，进入武备学堂，因为体弱，才改学经济，初通金融之道。1904年，他因患耳疾，辍学回国。1908年冬天，他就是因耳疾发作到日本求医的。

浙江兴业银行诞生于1907年，背景是当时的争路权运动。1898年，盛宣怀与英商怡和洋行秘密签定向英借款修建苏杭甬铁路的草约。1905年，美商又取得了浙赣铁路的申办权。消息传来，浙江士绅汤寿潜等人拍案而起，坚决反对，当年7月浙江铁路公司成立，汤寿潜被举为总理，招股筹款，要自建铁路，呈报商部。然朝廷以为“外交首重大信”，表示可以向外商借款，以路作押，准许江浙绅商附股。丧权卖路的消息令群情激愤，保路拒款运动由此而起，“杭州的挑夫、上海的名伶、绍兴的饼师，甚至各佛寺的僧人、教堂的教徒，以及拱宸桥的妓女，莫不争相入股”，浙路股款迅



●蒋抑卮旧居内

速筹集到近 2300 万元，铁路工程也随即开工（到 1909 年 8 月，沪杭全线在嘉兴接轨通车）。如此一笔巨额的铁路股款，杭州的票号、钱庄都难以承受，保管运作成了问题。汤寿潜与蒋抑卮的哥哥蒋玉泉是儿女亲家，得知抑卮从日本回来，依为股肱，听取他的建议，考虑在铁路公司下设立铁路银行。1906 年 10 月，浙路公司在杭州举行股东大会，决议成立独立于公司的银行，汤在会上提议取名“浙江兴业银行”，取“振兴实业”之意，共分 1 万股，每股股金 100 元银元，预计筹资 100 万银元，分四期收齐，每期每股交 1/4

的股金，即 25 元。草拟章程，呈请邮传部、农工商部、度支部核准，正式批准前试营业。

银行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个新鲜玩意儿，第一家银行十年前（1897 年）才在上海出现，即盛宣怀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其中官股为主），唯一的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1908 年改称大清银行，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国银行）迟至 1905 年才在北京出现。上海有过一家民营性质的信成银行，没几年就倒闭了。在中国金融史上，浙江兴业银行属于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

兴业银行筹备之初，很多人对陌生的银行心存顾虑，认股并不踊跃，蒋抑卮说服父亲率先认了一千股，并交足第一期应付的 2.5 万元银圆，这才带动各界，商股得以认足。其中浙江铁路公司 4453 股、商股 5547 股，商股中认购 1 股的有 207 户，50 股以下的 553 股，100 股以下、50 股以上的 17 户，100 股的 15 户，112 股的 1 户，200 股的 1 户。这是一家典型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商业银行，持股多为私人，股权分散。（从 1907、1908 到 1915、1917 年，前后 10 年，浙江兴业银行分四次将股款收齐。）

1907年5月27日，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保佑坊惠民巷口挂牌试营业，10月获得全部批文、执照，并获得钞票发行权。最初发行的面额有1元和5元的。

在当月举行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蒋海筹以大股东身份当选为三董事之一，第一任总司理为胡藻青。从筹办兴业银行到1908年在汉口、上海开设分行，蒋抑卮无不躬身参与，成为掌握实权的人物之一。从1909年起（也有说1908年），他接替父亲为兴业银行董事。蒋家是最大的股东，一般职员都称他为“蒋老板”，他也将兴业看作自家的帐房。但他与胡藻青、叶揆初、项兰生等同事合作得很好，他们处事严谨，以道德学问相砥砺，银行里形成了一种勤俭作风，纪律俨然。他本人算盘极为精明，对业务抓得很紧。这是第一代银行家在筚路蓝缕创建中国近代金融业时作出的表率。

兴业银行从创办之时就确立了稳健的作风，存、放款都很注重自身信誉，要求准备充分，恪守宁可不放、不可滥放的原则，除了为铁路公司提供服务，主要放款对象为浙江的丝绸纺织业，对民族工业的支持从来不遗余力。

三 挤兑风潮

1911年10月11日上午，蒋抑卮在上海得到电报总局的消息：“湖北民军于昨夜12点半在武昌起义，总督瑞澂不知下落。”汉口分行已处于革命旋涡的中心，他马上电询杭州总行，汉口分行资产负债的准确情况，邀请在上海的董事讨论救济之策。当时杭州、上海、汉口三行的资产负债相抵之后，还须准备135万银圆的现款才能应急。救汉口分行就是救整个兴业银行。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先运10万现银去汉口。不料12日夜汉口、汉阳大火，人心浮动，次日汉口各银行、钱庄相继停业，浙兴分行也暂时停业。消息传到杭州变成了“汉口兴业银行倒闭”。本来汉口告急，杭州就惊



●蒋抑卮

慌，谣言更是长了翅膀，迅速扩散，杭州的储户顿时起了恐慌，兑钞提存，纷至沓来。其时，杭州总行发行钞票约60万元，活期存款50万元，各种票据30万元，而库存的现银仅30多万，上海银行就近调去10万现银救急，并急电将存放在同业中的存款全数取回，不计损失。蒋抑卮让他父亲将家中存银，用担子挑到银行去，有意招摇过市，以求达到安定人心的效果。然而收效几无，仅10月14、15日这两天中，杭州总行兑出现银达70多万，库银为之一空，多方求援，得陈叔通、项兰生等帮助，从大清银行

杭州分行、两浙盐运使署借得巨款35元。到10月18日，几乎已将发行的钞票、活期存款全数兑尽，剩下的只是浙江铁路公司的票据。好在营业一天没有停过，兴业创业以来第一场惊心动魄的挤兑风潮终于过去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汉口商民东下上海，手持汉口分行的兴业钞票，要求上海分行兑现，为顾全信用，不能不兑，资产负债之数相抵，缺额近85万元，虽经多方筹措，还是相距甚远。其时，一方面湖南已响应独立，一方面清廷大军南下，前途尚不明朗，上海人心惶惶，金融界尤其如此。信成银行以及另一家银行希望兴业上海分行和它们一同关门，“暂行休业”，蒋抑卮独持异议，表示“必须维持营业，取信于市”。事实上，这一天，他们的库存现银只剩下3万多元了。巡捕房主动来问是否开业，如仍开业，他们可以派巡捕来维持秩序，他毅然决定继续营业，先拿出私产应急，然后到处奔走筹款，结果竟借到巨款。

11月5日，杭州光复，汤寿潜被推为都督，蒋抑卮向汤求援，正好攻打南京的江浙联军要用银元发饷，汤下令全数交给兴业杭州总行运到上海，银子一到，挤兑人潮就散去大半，辛亥革命之际兴业面临的挤兑风潮彻底平息。自武昌起事以来，他每天早晨六七点就到银行，直到深夜12点将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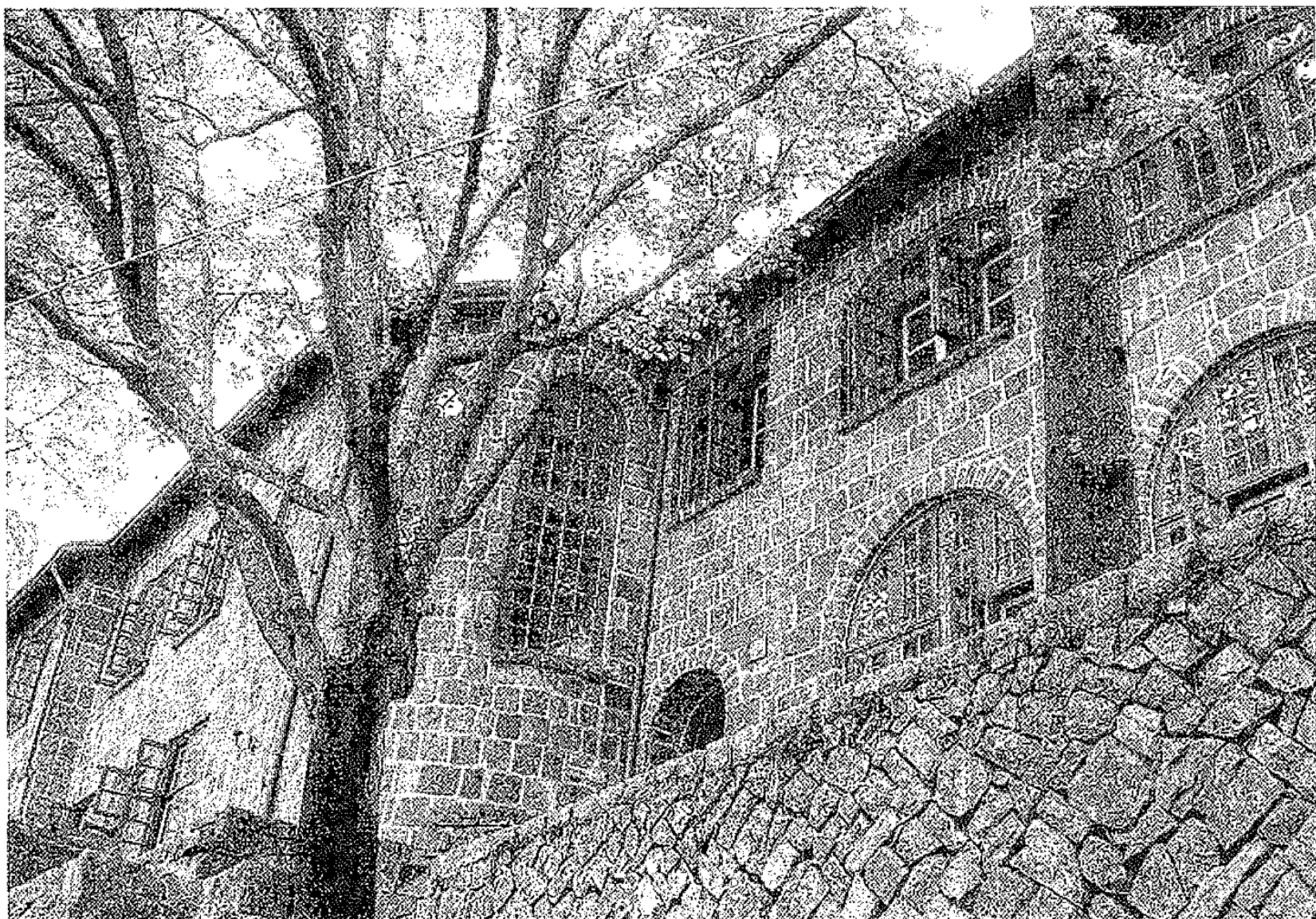
天情况、筹款计划和各方面军事消息报告给杭州总行总理沈新三，然后回家休息，连续二十几天，天天如此，至此他才松了口气。

在时代转型的风浪中，票号全军覆没，不少钱庄、银行也从此倒闭，如上海的信成银行、大通银行等，“暂行休业”不料成了永久休业。以“拨伊铜钱”为口头禅的蒋抑卮，似乎是个天生的银行家，他掌舵的兴业银行之所以应变不乱，在变幻莫测的风暴中顺利地挺了过来，有惊无险，靠的就是他的不避风险、运筹奔走。他从此信誉鹊起，受到金融同行的推重，百姓的信任，但他从不居功，而是称道“浙总行总理沈新三、沪行总理樊时勋诸先生的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擘画于室，奔走于外，而汤寿潜先生调三库之银，全力支持，更是机缘巧合，难得之极”。1940年冬天，事隔数十年，叶揆初在蒋抑卮的追悼会上说：“苟非抑卮先生之毅力热忱，漫天大风大浪，最险之日，安得善渡，本行亦当无复有今日之盛也。”

四 “韬光宪法”

辛亥革命后，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是当地第一家复业的商业银行，蒋抑卮为此不惜拿出私产低押，信誉得以确立。当年股东会上，他作了关于应对辛亥事变的报告，并指出清朝垮台，清商律已废，原有的银行章程已不适应。同时，由于杭州、上海、汉口三行分立，各自为政，权力分散的弊端在辛亥风浪中暴露无遗，人事、经营的关系复杂，整个体制、结构要做适当的调整，也就是需要重新立法，以制度来保障辛苦创立的金融事业继续运转和发展。当时北京有汇兑处，许多浙江籍的京官和妓女经常有款项汇往浙、沪等地，所以蒋认为必须有一个总的领导机构。大家公推蒋抑卮执笔，并广泛征集股东的意见。这个酝酿过程就有好几年。

1915年，蒋抑卮在杭州灵隐寺后面的韬光寺闭门7天，与叶揆初、项兰生、沈新三等草拟银行章程，8月在股东常会上逐条讨论通过，被同人



●莫干山上的皇后饭店（原浙江兴业银行别墅）

戏称为“韬光宪法”。章程规定，以上海为本行，杭州、天津、汉口、北京为支行，股东大会选7人组成董事会，三年一任，可连选连任，董事会实行总办事处制，举3人为办事董事，3人中再举一人为董事长，负责对外，并掌握全行重大事务的裁决权，总办事处设书记长一人，下设各部。蒋抑卮被选为三个办事董事之一，在他的提议下，与北洋政府声气相通、在财经方面有地位的叶揆初（1874—1949，原浙路公司清算处主任）被推举为董事长。此后，几经变化，他们的常务董事、董事长之职一直没有变化，他们精诚合作，积极改革，在大江南北各重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着力扶植民族工商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开创了一个新局面。老银行家孔绶蘅晚年在香港回忆，他1918年在上海看到的兴业银行，重心在董事会，“而重大的发号施政在蒋家，即蒋抑卮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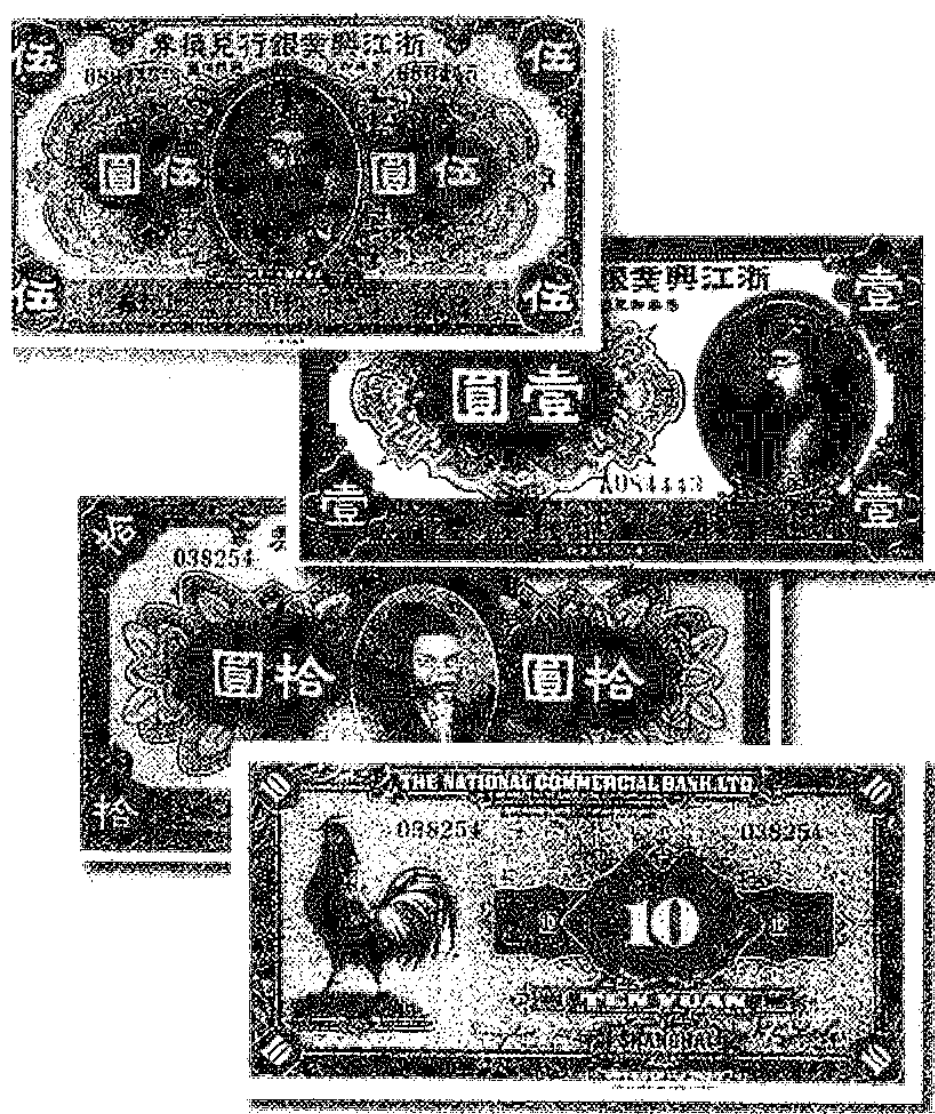
1914年，铁路公司收归国有后，将所有的银行股份4453股出让，委托律师登报投标竞买，因蒋抑卮出价最高，全部为他所认购，加上创行时蒋家原有的1000股，共达到5453股，蒋家持有兴业全部股份的54.43%，

超过 1/2，成为最大的股东。但他一直维持叶揆初的董事长地位，他认为叶为人耿直、胸怀开阔，目光远大，而且学问、阅历、声望、财政经验都在自己之上，由其主持兴业，是兴业之幸。

袁世凯称帝时，挪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存款，导致国库空虚。洪宪帝制失败，京、津、沪等地发生挤兑，1916年5月12日段祺瑞下令停止兑现、存款止付，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当天，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公权为此与叶揆初、蒋抑卮、陈光甫、李馥孙等金融巨子紧急磋商，是否执行这一乱命。“南三行”都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商股股东，有唇齿关系，当然不赞成自毁信用。蒋抑卮认为不能执行这样的乱命，率先表示兴业可以部分资产向外商银行和一般钱庄抵押筹款，予以支持。在兴业和其他商业银行支持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迅速成立，抬出张謇为会长，联合会出面请律师接管上海的中国银行，再由律师聘宋汉章、张公权继续营业。银行照常开门，虽然最初几天挤兑人流如潮水一般，但到19日风潮就已平息。此举对于维持金融信誉，稳定全国金融市场起了重大作用，赢得一片赞誉。蒋抑卮甘冒风险，从大局出发，倡导同业间相互支持，为金融界所称道。宋汉章由此感激，以后兴业向中国银行领用券时，给予比较优惠的条件。

五 “南三行”之首

从1915年到1926年，这10多年军阀此伏彼起的动荡乱世，却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全盛时期，到1926年总资产达到了5459万多元。从1918年到1927年的10年间，浙江兴业银行吸收存款连续5年在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中居于首位，其中1922年存款占全国银行全部存款的4.05%，盐业占3.85%、金城占3.78%，仅次于官方的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在全国11家重要的商业银行中，位居第一。包括浙江兴业银行在内新兴的银行业，



●浙江兴业银行的纸币

已摆脱旧金融业单靠“吃利”的狭隘性，在金融经营收入上开始多样化，涉及房地产、有价证券、外币买卖等。从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创办到1927年的30年间，一共出现过近60家银行，其中40%中途关门，坚持下来的只有18家银行。其中，浙江兴业银行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这三家著名的商业银行被合称为“南三行”，在资金实力上，“南三行”超过了“北四行”，而兴业又居“南三行”之首。

蒋抑卮在浙江、上海乃至全国金融界声誉日隆，深受敬重。1917年到1922年间，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发生官股与商股之争，请他出面调停，最后达成协议，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商股称浙江实业银行，这一方案为双方所乐意接受。1918年前后，他买下杭州的胡雪岩故居，又主持在三元坊（即现在的中山中路清泰街口）筹建兴业银行杭州的新营业大厅，请著名建筑师陈植设计，到1921年落成。

蒋抑卮和浙江兴业银行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重信用，有担当，稳健经营，处变不惊，注意制度建设，等等。同时，他们非常重视员工业务水准的提高，很早就安定学校特设了银行专修科，选择优秀毕业生到兴业，其时离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不久。1920年，他们聘请经济学家马寅初任银行顾问（一度任兴业的金融研究所主任），系统讲述西方经济学，月薪高达400元；1921年，选派两个行员到英美著名银行去实习；1932年创办《兴业邮乘》，交流业务的平台；1935年，请浙江实业银行练习生出身的金融家章乃器讲授银行投资。

蒋抑卮在上海华山路（原来叫海格路）购有西式住宅。在杭州积善坊又造了大住宅，部分建筑材料就是从买下的胡雪岩豪宅拆下来的。1931年之后，他以多病之身，常住莫干山养病。1934年，他在莫干山新建的别墅落成，他就捐赠给了兴业银行，登记时即填作兴业的产业，作为银行员工轮休疗养的地方，不过他有一个条件，自己在山上避暑时，同事不能去住。抗战前，他每年夏天都去山上避暑。他在遗嘱中规定，死后别墅不传子女，只归兴业。（1960年夏天，毛泽东曾在这里睡过一个午觉，因此而名声大噪，身价倍增。别墅现名“皇后饭店”，成了游人必到之处，可有谁还会记得那个“拨伊铜钱”的银行家蒋抑卮？）

浙江兴业银行热衷于引入和培养具有现代金融素质的新人，增添新鲜血液，1921年进入兴业的徐新六从书记长做起，仅仅两年就做了副总经理，1925年升为办事董事、总经理。1890年生在杭州的徐新六，早年就读于杭州养正书塾、上海南洋公学，1908年起留学英国，1914年回国，在北大任教，曾追随梁启超，做过财政部秘书，1918年梁启超带着他、丁文江、蒋百里、张君勱等一时才俊赴欧洲考察。进入兴业后，其出色才干受到叶、

●莫干山别墅



蒋等人赏识，胡适在上海期间，和他是最好的朋友。1927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兴业汉口分行经理辞职而去，蒋抑卮以办事董事身份临时兼汉口分行经理，从1929年4月到1930年3月，正好一年，除了处理日常业务，给董事长写的报告就有131件，还有大量写给总行总经理徐新六的亲笔信，建议、分析、沟通，供总办事处决策。他以办事董事的地位之尊，却始终恪守分行经理对总行总经理应负的职责，一丝不苟，处事之严谨认真，恐怕都是后世难以想象的。（1938年夏天，蒋介石曾内定由徐新六任驻美大使，8月24日他乘坐的飞机不幸在飞往重庆途中被击落。）

六 “我这个状元公还得你这个秀才郎多多扶持呢！”

即使兴业银行鼎盛时期，蒋抑卮也毫不松懈，依然是每天早起，早上班，进门先看银元牌价，和早到的员工互致问候。作为办事董事，行务会议一般都是他以临时主席的身份主持，他总是静心听取意见，对放款对象的信誉、业绩、经营手法总是要求作深入细致的调查，“拨伊铜钱”并不是随随便便的。最后，他根据个人对金融市面运作态势的了解做决策性发言，往往稳健中肯，为大家所钦服。

兴业银行把中心放在支持民族工商业上面，总放款占50%以上，到1925年放款额已达2000万元，1931年4000万，1934年达5800万元。得到支持的民族工商业有600多家，涵盖纺织、医药、丝绸、面粉、造纸、煤矿、印刷、火柴以及化工、钢铁等重工业，如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天津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商务印书馆、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店、穆藕初的纱厂、荣氏家族的面粉厂、南通大生纱厂以及长兴煤矿、北票煤矿等许多著名的民营企业。

从1907年到1922年，兴业银行至少5次给张謇的大生纱厂贷款扶持。1918年，这位年迈的状元实业家专程祝贺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乔迁之

喜，亲笔书写颂词，并半开玩笑地对蒋抑卮说：“我这个状元公还得你这个秀才郎多多扶持呢！”

在兴业放款的 600 多家企业中，有 20 多家在濒临倒闭时得到帮助。1935 年，刘鸿生的企业集团几乎濒临倒闭，到中国银行贷款，受到宋子文的当面嘲弄：“O·S·（刘的英文名字缩写）的股票现在连草纸都不如了。”气得这位“火柴大王”说不出话来，结果靠了兴业银行的支持才得以起死回生。他后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说：“浙江兴业银行才是我们企业自己的银行。”

1934 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准备修建铁路、公路两用的钱塘江大桥，预计借款 550 万元，兴业应铁道部要求出面筹集部分款项，与中国、交通、浙江实业和四明一同组成了筑路银行团，借款 200 万，兴业一家承担 1/2，期限 6 年，并专设办事处，派人配合施工进度拨款。当时他们的想法就是不让外国银行插手，损害路权，或许想起了二三十年前的争路权运动，想到了浙江兴业银行的由来。此举使兴业银行成为“金融支工”的榜样，受到中外交通界的称许。茅以升设计的钱塘江大桥三年后建成通车，70 多年

● 幸存的浙江兴业银行大楼



后还在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蒋抑卮在内，浙江兴业银行的掌舵人物，没有人在 1927 年血泊中浮起的国民党政权中担任要职，这一点同时代的其他银行家就很少做到，“北四行”的吴鼎昌、“南三行”的陈光甫，更不用说张公权等人，先后都踏上从政之路。兴业的兴衰背后我们可以看出它与政治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保持了金融机构的独立性，这一点在江浙财团中尤其难能可贵。蒋介石上台后，向上海各银行摊派严重，引起蒋抑卮们的反感，坚持不让官僚权贵的资本插足兴业，因此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挤压，逐渐走下坡路，1927 年后存款逐年减少，到 1936 年已跌到同行业的第 6 位。1935 年国民党当局将钞票发行权集中到中央、交通、中国三行，勒令其他银行将已发行的钞票及准备金全部上缴。兴业自晚清以来，发行钞票已有近 30 年历史，损失惨重，资本实力一夜间削弱了差不多 1/10。在无情的政治压制下，兴业的黄金时代无可挽回地过去了。等到抗战爆发，许多企业贷款收不回来，兴业银行几乎成了空壳。1940 年 11 月 18 日，蒋抑卮在上海病故，他在这个热爱的世上活了 66 年。世上已无蒋抑卮，作为金融报国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拨伊铜钱”，徜徉在杭州中山中路或积善坊巷，可还有人记得中国第一代银行家的这个口头禅？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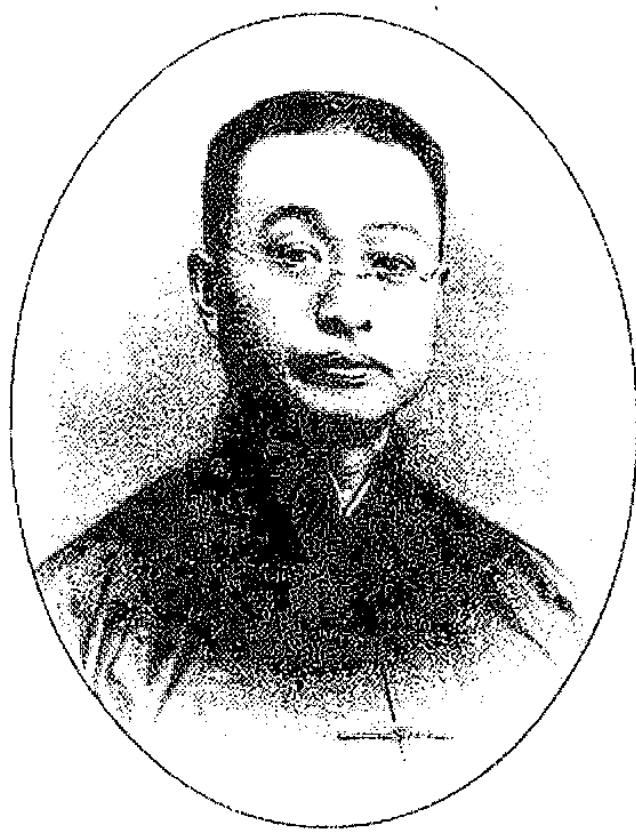
1. 《浙江近代金融业和金融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2. 陈国强主编，《浙江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年版。
3. 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年版。
4. 朱之华编撰，《浙江兴业银行简史》、《浙江兴业银行史料》，《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二），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金融志》编委办公室编，1990 年。
5.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6.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

第十二篇

“棉纱大王”穆藕初筑庐西湖

一 西湖“韬庵”

在西湖灵隐寺后面，北高峰山腰上有个韬光寺。早在唐高宗时，梵僧韬光就在这里凿壁结庐修道。清初建有韬光寺，毁于太平天国战乱，只剩下一个大殿，以后虽经修补，但不成规模，游人过此，常常感叹。韬光寺周围有山地数百亩，从灵隐迂缓而上，竹径潜通，清幽无匹，古木参天，苍劲可人。上可达北高峰，山泉独有，其声潺潺，长年不断，天籁之声足以洗心。冬温夏凉，盛夏之时蚊蝇绝迹，晚凉需要被子，是避暑的好去处。1920年，有“棉纱大王”称誉的穆藕初正处于一生事业的鼎盛时期，有心修复韬光寺，亲自起草《代杭州韬光寺募捐启》：“西湖胜景，中外咸知。离杭城十里许，面临西湖，位于北高峰腰际者有韬光寺，亦西湖著名胜景之一也。”寺背后有相传吕洞宾炼丹的“炼丹台”，“登台俯视，环西湖名胜一览无遗，如三潭印月、雷峰塔及苏堤、钱塘江等历历在目，宛然入画。炼丹台有句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可谓确切不移矣。”他自己捐出2000银元，并希望向社会再募集万元，扩建寺院。他觉得此地可以成为上海商人休息养脑的地



●穆藕初



●通往韬庵的小路

方，比庐山、莫干山更好，而且“并不入外人势力范围之内”。简单一句话透出的是一代实业家的民族情怀。

就在韬光寺旁边，他建有一个算不得奢华的别墅，取名“韬庵”，作为避暑度曲之所。他对昆曲有着特殊的热爱，即使在一个人管理三家纱厂、忙得不可开交时，也坚持每天中午研习曲艺一小时，多年不曾间断。这是他的爱好，但决非一般的娱乐。他联合江浙曲界的名流成立“昆曲保存社”，组织研习昆曲的曲社“粟社”，为创设“昆剧传习所”募集基金而组织过义演，甚至亲自粉墨登台。1920年，他用高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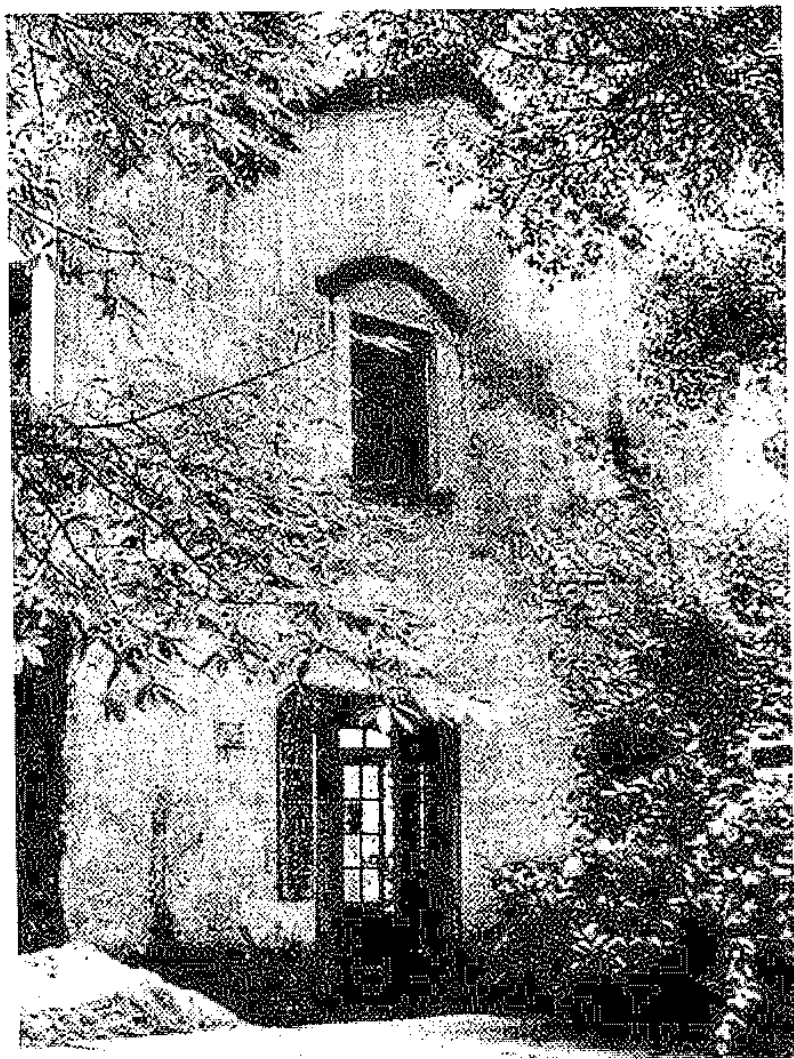
请法商百代公司为昆曲大家、号称“江南曲圣”的俞粟庐灌制唱片，刊行《度曲一隅》一书，目的都是为了保存国宝级的戏曲文化遗产。这一切都可以看出他的文化志趣。

1921年，在他的鼎力资助下，在苏州创办了“昆剧传习所”，正是昆剧面临衰亡的时刻。他以发扬光大昆曲为使命，以文明的新法办学，培养了一代“传”字辈昆曲演员。自清末以来，昆曲日渐衰微，这一剧种的一脉星火得以延续与他的大力提倡绝对分不开。他为保存昆曲艺术付出了巨大心力，中国戏曲史专家周贻白的《辛亥革命前后地方戏曲发展概说》记录了穆藕初的这一贡献。

那时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换汽车到灵隐，然后上山到他的“韬庵”，大约五、六个小时即可到达。1920年的夏天，他第一次邀请曲友到西湖登山雅集，曾陪同父亲俞粟庐前往的俞振飞回忆说：“韬庵地临半山，门前修竹万竿，终朝凉爽，红尘远隔，凭栏清歌，笛声与竹响相和答，翛然尘外，不知世上尚有暑日之炎炎矣！”到抗战之前，他几乎年年夏天都要招集曲

友到“韬庵”避暑，即使1928年从政以后，曲兴有所减退，也没有中断。

穆藕初对西湖情有独钟。1929年6月，他在工商部常务次长任上，被聘为“西湖博览会”高等顾问，为《西湖博览会筹备特刊》题辞“励工惠商”。1930年4月1日，他出席在杭州梅登高桥举行的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当晚，与马寅初、邵元冲等人聚餐。第二天，他们一起游西湖三潭印月，在楼外楼吃中餐，下午还到黄龙洞、紫霞洞游玩。



●今日的韬庵

1937年抗战爆发，“八一三”上海之役，穆藕初不仅参加救护委员会，捐助5000元买裹伤包送往前线，而且担任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给养组主任，为难民救济等奔波操劳，积劳成疾。8月底，他到杭州“韬庵”休养，在这里闲居了一个多月，战局延绵，没有结束的迹象，杭州也不是安全之所，他离杭前往湖州，然后到南京，再转往武汉、重庆，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来。1947年，俞振飞在忆及韬庵的文章中感叹：“劫后湖山，闻韬庵巍然犹在，而山半万竹尽童，风物全非。”今日登北高峰，上韬光寺，目睹早被荒废的韬庵，也许世人早已忘记上海滩上曾风光一时的这位“棉纱大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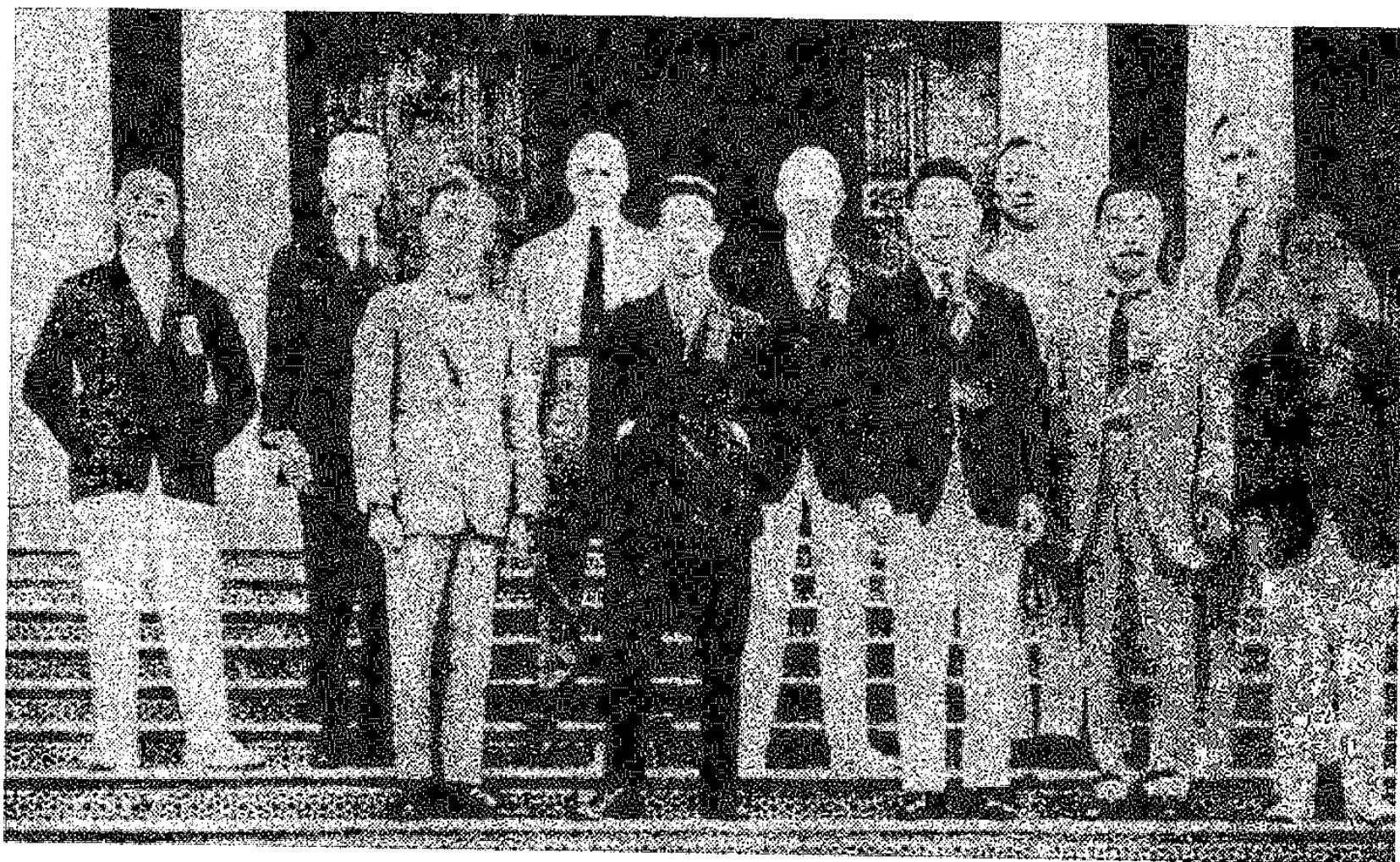
二 “棉纱大王”

穆藕初生于1876年6月18日，原名湘玥，上海浦东人，世代以种棉

花为业。到他父亲这一辈开花行，也曾盛极一时，不过到他少年时代，家道已中落，他只进过私塾，13岁就到一家花行当了学徒，一干就是11年。甲午战败令19岁的少年痛苦无比，决心“求西学”入手，自强自救。他从1897年起上夜校读英文，1900年考入上海海关当办事员，很想出国学习，研究经济学，因为学费无着而难以实现。1902年，他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心“从自强不息中，锻炼出新吾来”。1903年冬天，他调到镇江海关，带去几百种新书，开办“阅书报社”，一时“同志云集”，让清廷神经紧张，暗中查访，被迫解散。1904年夏天，他和黄炎培、马相伯一起组织“沪学会”，不仅有“体育会”、“音乐会”，还有一所招收贫寒子弟的义务小学，一所研究新剧、演出文明新戏的戏剧学校。在1905年抗议美国虐待华工运动中，他组织海关邮政华工集会抗议，受到美籍副税务司的忌恨，愤然辞职，前往龙门师范学校担任英文教员兼学监。因为这些活动，他受到状元实业家张謇的注意和赏识，被任命为江苏铁路公司的苏路警察长，1907年夏天到北方调查路警，到过不少地方，萌生了振兴实业的念头。

1909年，已经34岁的他靠太太典当首饰，再借款1000元，踏上自费留学美国的路途。他在美国进过几家大学，学的都是农业。期间，他虽获

●穆氏率中国代表团参加第一次太平洋商务会议时在檀香山留影



得官费生资格，但生活清苦，常以清水面包过日子。1913年，他在伊利诺伊大学毕业，获农科学士学位，再进得克萨斯农工专科学校，攻读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1914年夏天获得农学硕士学位。

从1914年回国到1920年，他抱定服务社会的大愿，投身实业，短短六七年间，就经办了3家新式的纺织厂（德大、厚生和豫丰），三厂的资本达到500万两银子，有纱锭10万、拈线机11000台、布机600台，创下了一个奇迹。美国人艾萨克·玛可逊评价说：“在自己本身和工业上建设性的进步方面，任何一个美国企业大王能够超出这个记录，都是值得怀疑的。”1920年，他主持创办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长期出任理事长。1921年，他又集资办起中华劝工银行。他引入科学管理，重视产品质量，注意员工福利，经营出色，效果显著，迅速在上海实业界崛起，被誉为“棉纱大王”。

他在美国选择学农工，常以中国人“读了书不种田，种田的不读书”感到忧虑，力倡“种田要读书，读书仍种田”。他不仅自辟了一片穆氏植棉实验场，而且利用专业知识写了《改良植棉浅说》小册子，用最通俗、最浅白的文字，向农民介绍改进种棉的方法，印了数万册，免费送给棉农，在上海附近农村流传很久，造福深远。他率先将科学管理法引入中国企业，他在1914年就翻译了泰罗（Taylor）的《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方法》（Scientific Management），不过当时不为社会所接受，10年中只卖出800册，其中有100册还是他自己买了送人的。他太超前了。

他办厂的成功当然离不开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国际大背景，正是各国列强忙于厮杀，无暇他顾，给了中国新兴纺织业全面崛起的大好机会。1906年生于浙江嵊县的文人胡兰成在《山河岁月》中有一番话：

而且就在那时，城市有了新景气，即纱厂的兴起，照亮了一代人心。纱厂比前此的邮电铁路造船与矿，更能带引起许多新的产业，这些被带引起的新的制造业虽然规模不大，是分散的，又大部分仍用手工，但已是生在现代空气里的了。西洋史上新兴纺织业只为外销，其社会资本又偏流，不能这样快带引起本地一般产业的繁荣，而中国的纱厂则是生在众业里的大朵的花。前此洋布总是要进来不容易，这回却是中国自己开起纱厂，从

内里把市场来翻新了……

穆藕初是有抱负的实业家，更是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中国要实现共和，非普及真正的国民教育不可。他平时生活特别俭朴，布衣素食，衣服破了也难得添新衣。可他是中华职业学校最热心的校董，长期捐款提供经费。有一次捐款，每个校董捐400元，他签了一张800元的支票，帮另一位有困难的朋友代交了一份，并交代不必让其本人知道。他说，如果免费生多，费用不足，还可以去找他。希望具体办事的人要体会黄炎培等创立这个学校的苦心，不要让精神受物质的影响而稍有减色。有几次捐款，他个人的处境极为困难，都是以个人名义向银行借的款。他生平还资助创办位育小学、位育中学。

至于他出巨款捐助优秀学子留学的佳话更是有口皆碑，其中一个助学大手笔是在1920年，他同时帮助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江绍源等6人到欧美留学。《藕初五十自述》中说，那年元旦，他在江苏省教育会和黄炎培、蒋梦麟、余日章等人聚餐，说起钱财应该如何使用，对于国家社会最为有益。大家一致认为那只有用于教育，他很赞同。之后，他决定捐出5万两银子，资助北大毕业生出国，不限省份，不限科目，只要是男生，道德、能力、学问都好，日后可以做各界领袖的就可以。他请北大校长蔡元培主持这件事，请蒋梦麟、胡适等辅助，当年所派的学生都是一时之选，受过“五四”的洗礼，他深感欣慰。北京《晨报》等报纸曾

以“实业家提倡学术之创举”为题做过详细报道。

之后，他还资助过方显廷、张纯明等多人出国留学，前后至少有20多人。方显廷本是厚生纱厂的一名学徒工，少年失学却好学上进，



●穆藕初资助留学的北大学生

在他的资助下，从南洋模范中学一路读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21年到1923年，在方留美之初，他按月汇80美金的生活费。后来他因纱厂事业受挫，无力继续支持，方依靠勤工俭学，终于在1928年初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方归国时旅费无着，也是他设法解决的。方后来成为与何廉、马寅初、刘大钧等齐名的经济学家，与何廉一起创办了著名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1937年6月，方显廷、罗家伦、周炳琳等10位受他资助、学有所成的知名人物集资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金”，作为永久纪念，也是效法他的义举。1940年11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有一则消息：“穆藕初先生奖学金首次得奖者已决定农科一名中大刘有成、理科一名联大杨振宁、经济一名联大周大晶。”



●《晨报》的报道

三 佛教信仰

穆藕初与西湖出家的弘一法师交往很深，《藕初五十自述》中有详细回忆。1898年，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求学时，与他哥哥穆湘瑶同学，由此结识。1904年8月，他们一同在上海创办“沪学会”，还一起参加过抵制美货活动。1923年春，弘一法师在上海太平寺挂单，他就佛教问题请教这位“目光炯炯，气象万千”的高僧：“我知道佛教是出世的，我国衰败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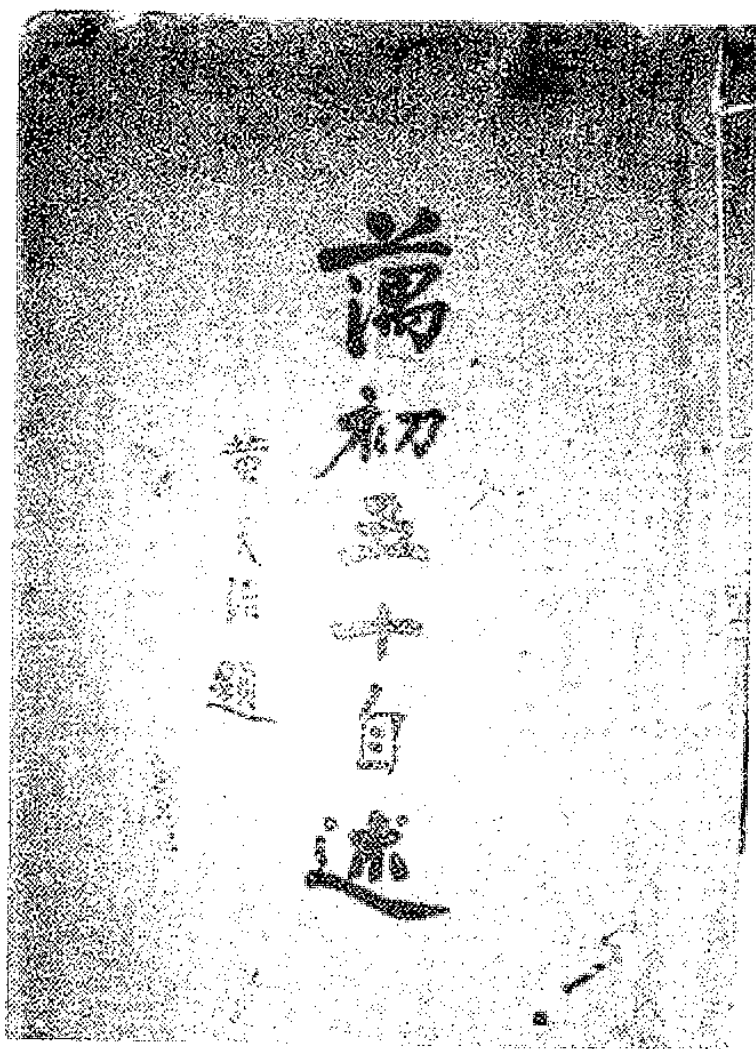
非全力支持恐国将不国，所以我不太赞成出世的佛教。”弘一法师回答说：“居士所见的属于小乘的、自利的。出家人并非属于消极一派，其实积极到万分，试观菩萨的四宏誓愿便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一切新学菩萨，息息以此自励，念念利济众生。救时要道，以此急务。推行佛化，首在感移人心，完成慈愿，永息杀机，并非希望人尽出家。出家须有因缘，而出家人也讲孝悌忠信，也主张尽力建设，造福苍生。”弘一法师的解释让他豁然开朗。

同年5月，他在太虚法师那里也得到了相似的解释，太虚认为，设立工厂，创办实业，赖以维持生计、获得温饱的人那么多，这都是布施的真义，也就是我佛利他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佛是极平常的事，只要人类各尽正当职业，各发真正的善心，譬如做官的，则尽做官本分，以利国利民为职志，不作丝毫利己损人的贪念，时刻怀着自利利他的菩提心，则成佛可操券而待。其他士、农、工、商也都如此。总之，只要能从各自原有职位，脚踏实地做去，各充其菩萨心肠，打得破利害关头，使自己的心毫无牵累，不再做物质的奴仆，则菩提正果自然能成功。

此次问佛之后，使他确信，“佛教自可纠正人心、安慰人心，使人提起

精神，服务社会。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主义，做许多好事于人间。”

他与弘一法师保持着经常的书信往来，对后者多有赞助。1928年12月，他曾与刘质平、经亨颐、夏丏尊、丰子恺等7人共同发起《为弘一法师筑居募款启》，他本人就出资不少，次年，朴素而雅致的“晚晴山房”在上虞白马湖畔建成，弘一在这里一直住到1932年。1929年2月，在他的资助下，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历经一年多创作的《护生画集》第一册顺利出版。弘一法师自认为最重要的佛学著作《四



●藕初五十自述

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也是他捐款 700 元委托中华书局出版的，原稿一直保存在他手里，弘一法师的亲笔遗嘱中提到“此书原稿存在穆藕初居士处”。为了答谢老朋友的帮助，弘一法师多次送他书法作品，其中一幅“视大千界如一诃子”是 1918 年 7 月出家前送他的。有一次，丰子恺偶然在苏州灵岩山佛寺见到弘一法师 1921 年送他的佛经字幅，慨然题词：“藕初居士乃当年沪上巨贾，皈依大师，热心弘法。白马湖晚晴山房之建筑及《护生画初集》之刊行，此人曾慨捐资财，亦难得也。”可惜这一珍贵墨迹已毁于“文革”。

四 “新兴商人派”代表

穆藕初被青年毛泽东称为“新兴商人派”的代表。他从不攀附权势，与盘踞长江下游的军阀孙传芳接触，也只是为故乡江苏的民生执言，其时，孙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辖有江苏、浙江等五省地盘，他写信给孙，再三建言，在满目疮痍的时刻要以建设为重，与民更始，给人民发展事业的机会。他上书其他军阀政客也都是为民执言，为发展实业说话，从不为一己之私。他一再强调“若不从地方自治入手，政治决无清明之望”。他认为商业不振的原因在于政治不良，民国以来政争不息，祸乱相寻，教化不修，商业道德日见堕落。尤其是 1923 年，面对贿选总统的闹剧，他代表的上海新商人力量有过一鸣惊人的表现，在上海成立了“商人政府”。

曹锟在北京发动政变，赶走任期未满的总统黎元洪，以内务总长高凌霄为临时摄政，北洋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各方质疑。“商人政府”就是这个时候在上海出现的。1923 年 6 月 23 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会员大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不承认曹锟政权有代表国家的资格，这在中国历史上乃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事件。上海商界的思路是建立一个民治委员会，由 70 名委员组成，其中一半是由上海总商会的会董担任，商人要直接掌握政权。



●晚年穆藕初

各方舆论对“商人政府”的反应不一。远在广州的毛泽东在7月11日的《向导》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称赞“上海总商会会员代表大会的那些体面商人穆藕初先生们”，“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是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总算是商人们三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表示”。

“商人政府”到8月份就结束了，如同海市蜃楼。但毫无疑问，穆藕初代表的新一代实业家和新兴的知识分子，已经是那个时代的中流砥柱。与那些只会消费各种娱乐、锦衣玉食的官僚、军阀、富翁不同，他们是文明的增量，是引入新因子，添加新东西，而不是单纯的消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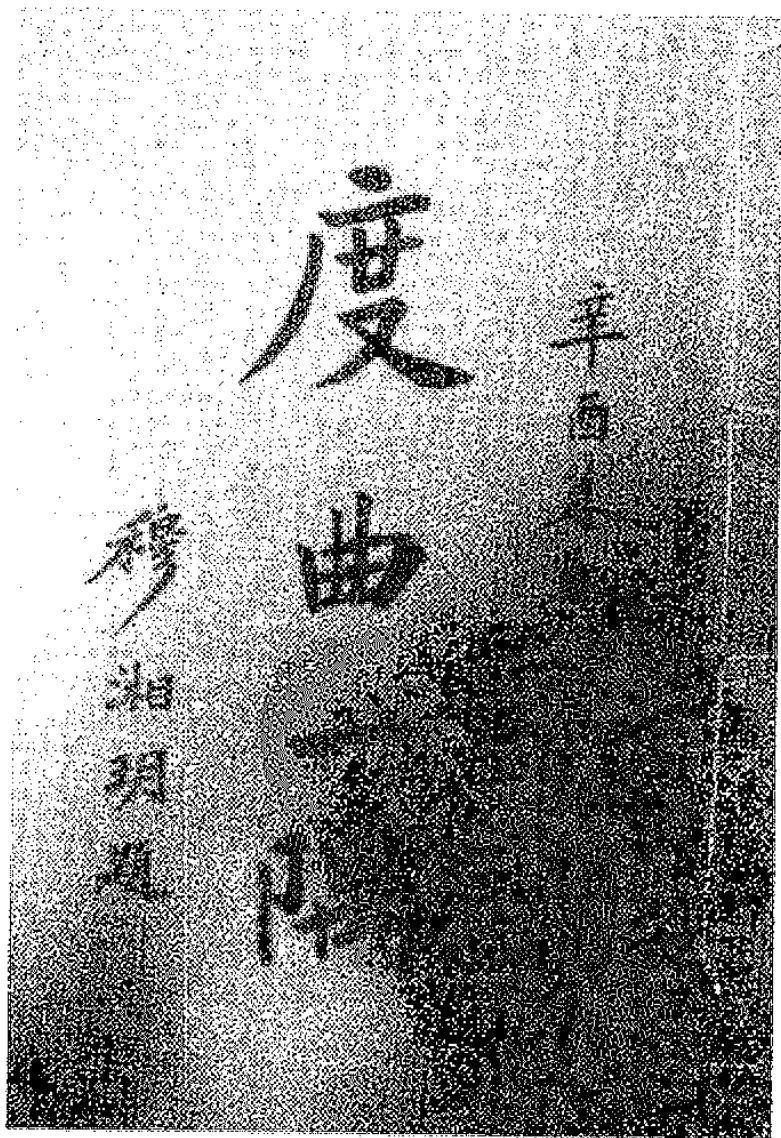
1928年以后，他先后做过国民政府的工商部常务次长、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七七”棉纱机就是他改良发明的。从1928年的“救护伤兵协济会”到1932年支持“一二八”抗战的军需，他对公益的捐助向来不犹豫。他廉洁自持，平时写私人信笺，连公家的邮票、信封都不用。他生平办事，公私款项的界限分得清清楚楚，组织纱厂之初，他就拿定主意，凡是账房、栈房、物料等涉及钱物的部门，一概请股东选派妥当的人来主管，他自己则立于监督地位，可以决定这些人的去留。这种办法十分有效，这是他引以自豪的。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他在上海半淞园发起斗黄头鸟的赛会，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提倡正当的娱乐，其实，有着深远的意义。比赛前，他做了一次演说：“斗黄头，是我们家乡的一种民间娱乐，现在我们重新来提倡这种古旧的娱乐，乃是希望大家在此国难日深的时候，应当摒弃赌博、烟酒、跳舞等不良嗜好，学习黄头鸟的合群、团结和战斗精神，以共赴国难。这次比赛，胜的败的，都可以获得奖品，没有赌博的意味在内。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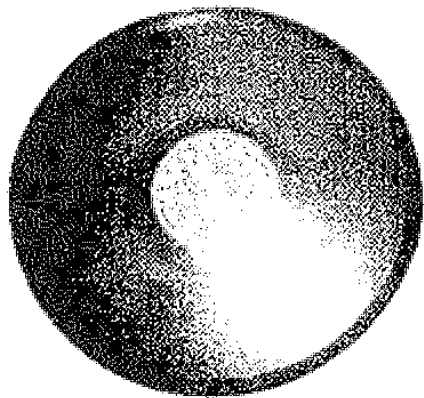
希望你们看一看这种鸟类，当两者交锋的时候，拼命战斗，绝不中途妥协，更不会见到对方气势稍壮，而就退缩不前，喊‘不抵抗’。看了鸟，还应该再来反省反省自己。”

1933年，他在回答《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时，写了一段话：“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30年代初上海各界精英推进宪政民主的活动，他几乎都参与了。这一切在做着“宪政报国”梦的法学家张耀曾的日记中留下了痕迹。1932年4月5日，包括他在内的上海实业、金融等各界名流65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说明不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的理由，提出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等主张。4月10日，穆藕初和黄炎培、张耀曾、张公权、虞洽卿、史量才、刘鸿生、杜月笙等61人再次发出致国难会议的通电，希望政府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废止与此抵触的有关党部决议和法令，开放党禁，不再用公款支付国民党的党务费，实行地方自治，由民选的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筹备宪政，在8个月内公布民主主义宪法。他们发起一个“民宪协进会”来推动宪政，以学者、实业家、自由职业者为主。6月28日，“民宪协进会筹备会”在银行公会举行成立会，到会的约四十人。他不仅参与发起，而且负责筹款。7月6日晚，他约一同发起民宪协进会的张耀曾、熊希龄等人在家里便饭，张耀曾在当天的日记说：“藕初家中西书籍尚不少，可见其尚知好学也。”



●穆藕初的题签



●穆藕初与昆曲

1943年9月19日，67岁的穆藕初在重庆病故，他在《藕初五十自述》自序中曾感慨：“一生事业，几等浮云；半世精神，悉成幻影。”然而17年后，当他谢世时，挽联如云，国共两党，社会各界，众口一词，无不赞誉他的生平事业和人格精神。中央社发布的消息

对他评价很高，《新华日报》9月21日头版发表的悼文说，“穆先生一生奋斗的历史，正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活的历史”，他的去世“是我国民族工业界的一个损失”。其实又何止是民族工业界的损失，他的捐资助学、办学，为保存昆曲所做的努力都同样令人念想。最贴切简明的恐怕还是冯玉祥送的这副挽联：

重农重工，为兴实业树模范；
立言立德，足与后人作典型。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 穆家修、柳和城、穆伟杰编，《穆藕初先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 赵靖主编、叶世昌、穆家修副主编，《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穆藕初著，《藕初五十自述》，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上海书店影印，“民国丛书”第三编之74。

如果说，陈独秀在《新青年》率先打出了“德先生”、“赛先生”两面旗帜，那么，在太平洋彼岸一群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创办的《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才是“赛先生”更有力的代表，他们真正为中国引入了近代科学的观念，并迈出了推动科学研究的坚实步伐。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在《新青年》公开之前，也是在胡适和任鸿隽、杨杏佛、梅光迪这些留美学生之间展开的。

如果说，民主和科学是那个时代追求的中心词，那么《新青年》一群、《科学》一群对于推动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中国科学社”对中国科学和整个文明进程的影响远未受到足够的认识。相比之下，我们对《新青年》一群的了解要多得多，而对《科学》一群则要陌生得多。

“中国科学社”存在的几十年，正是中国科学有了长足长进、汇入世界科学行列的几十年，那个阶段，在各个领域有造就的科学家几乎都与这个社团和这个刊物有或深或浅、或先或后的关系，从1915年创立时的35个社员，到1949年发展到3776人，共举行了26届年会。正是他们将近代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医学、生物学、气象学、物候学、地理学等引入了中国。

在“中国科学社”之外，重要的科学社团还有1913年詹天佑等人创立的“中华工程师学会”，1916年出现的“中华学艺社”（初名“丙辰学社”，1923年改名），1927年成立的“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华学艺社”由留日学生陈启修、王兆荣等人发起，创立之初有130多社员，1933年发展到700多人，办有《学艺》杂志，宗旨为科学救国、文化救国、学术救国。

胡明复、胡刚复、胡敦复三兄弟，和任鸿隽、周仁、秉志、竺可桢等人，就是“科学救国”的典型，他们早年留学美国，热心于办大学、办科学期刊、办科学社、从事科学研究，一无私念，至死不悔。特别是胡明复，只活了37岁，他身上那种无形的气度却让接触过他的人长久怀抱敬意。今天在“后现代”游戏中长大的人已很难理解一个

年轻科学家无私的“科学报国”之志。胡明复长眠在烟霞洞，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中国科学社”的社旗，那是他毕生的事业，也是对他最大的奖赏。他的墓与师复墓相去不远，面对着被冷落、被弃置的相似命运。

第十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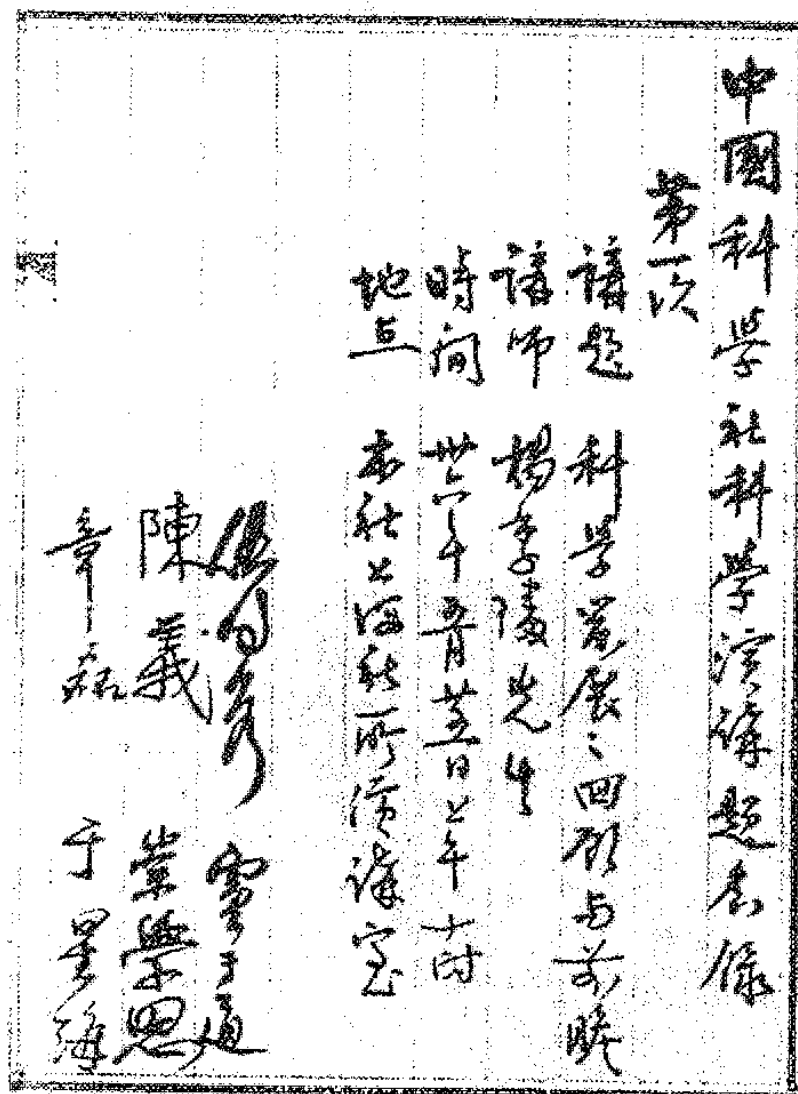
胡氏三兄弟的科学报国梦

——兼说“中国科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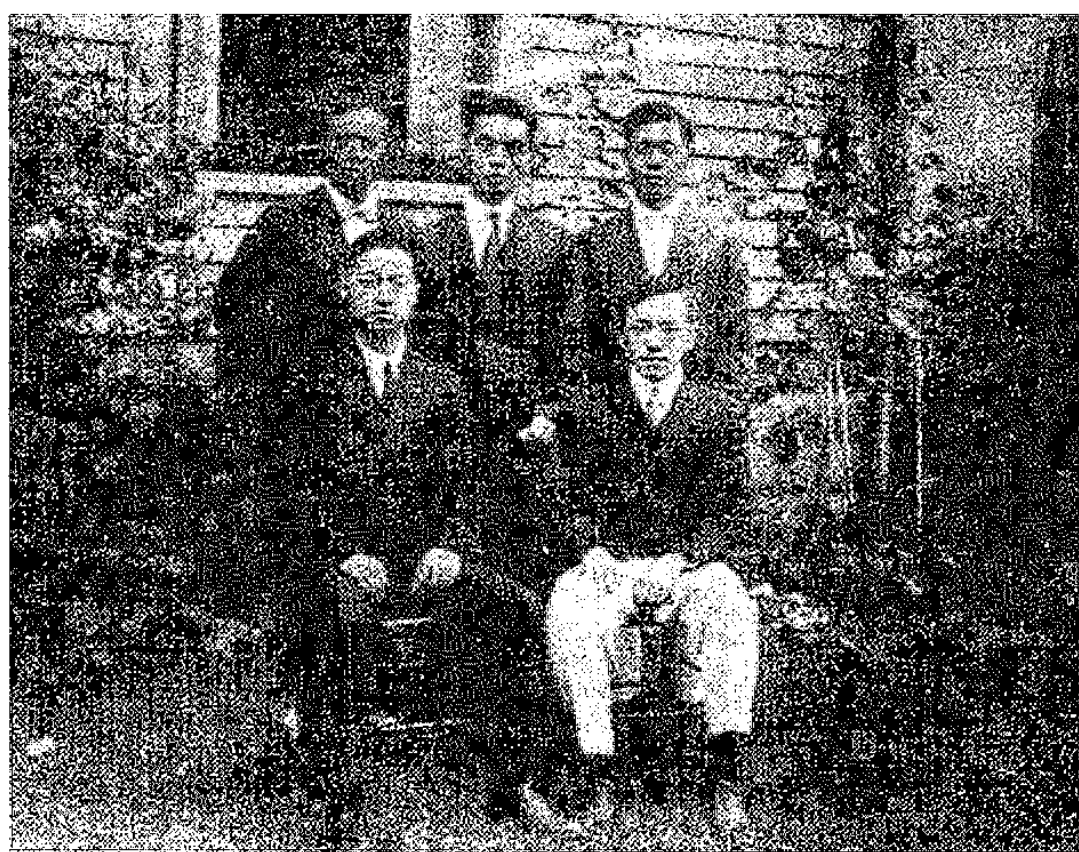


1919年，“中国科学社”在西湖边举行第四次年会，也是回国后的第一次年会，主要发起人之一、青年数学家胡明复（1891—1927）在大会致辞时盛赞西湖之美，他说：“研究科学的人最爱自然，故在美丽的杭州西湖举行科学年会极为相宜。古代诗人来游西湖，歌咏名篇甚多，科学家虽不同于诗人，然科学年会在科学史上实最重要，未始不可为西湖增色也。”那一刻，当他沉醉于西湖的湖光山色之中，憧憬着他所献身的科学事业时，他决不会想到，他身后将永与西湖为伴，美丽的西湖竟是他的埋骨之所。

1927年6月12日，他在故乡江苏无锡农村游泳时遇难，只活了37岁。噩耗传来，教育界、科学界为之震动，“中国科学社”同人无不感到悲恸，不少人失声痛



●中国科学社一次科学演讲的题名录



●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

哭。当年9月4日，“中国科学社”举行第12次年会期间举行胡明复追悼会，任鸿隽说，胡明复和200年前去世的牛顿、100年前去世的法国算学家拉勃拉斯一样都是尽粹科学、至死不倦的一个人，然而胡明复不幸没有得到前两者那样的成就和寿数，

牛顿活了85岁，拉勃拉斯也活有78岁。这一讲话以《悼胡明复》为题发表在1928年6月的《科学》第13卷第6期上，这一期是“胡明复纪念专号”，同时发表胡适、马相伯、严济慈、李俨等人的文章，还有胡明复的遗稿《有周界条件之一次积微分方程式》。

杨杏佛在纪念胡明复时如此评价：“中国科学社”种种无名利可图的工作，累了他整整一生，“服务科学社的热心毅力十余年如一日，惟有意料之外的死，才使他中道脱卸仔肩。诸葛武侯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明复对科学社，足可当此八个大字。”

胡明复英年早凋，除了《科学》杂志，他亲手参与创办的大同大学理数研究会也出版了纪念专册，很多生前友好追忆往事，肯定他短暂而有意义的一生。连刚刚诞生的南京国民政府都发出褒扬令：“该故博士胡明复，尽粹科学，志行卓绝，提倡科学，十年不倦……勒碑礼堂，永留纪念，以示政府提倡科学、爱惜人才之至意。”

1929年，胡明复去世两年后，“中国科学社”同人在他生前热爱的西湖畔，南高峰下烟霞洞旁为他选择了墓址，这是西湖早年名胜之一，晋代就有僧人在此结庵，6年前胡适曾在这里养病数月。7月21日，“中国科学社”为胡明复举行隆重的公葬仪式，灵柩上覆盖着社旗，祭坛设于烟霞洞大厅，杨杏佛、竺可桢、吴有训等社友纷纷从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赶来，有70

多人参加了葬礼。蔡元培亲笔题写墓碑：

中华民国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国科学社葬
胡明复先生于此 蔡元培敬书

这块墓碑在“文革”中遭到破坏，有些字已看不到了，还有明显的水泥补丁。

杨杏佛撰写的墓铭说：

知无涯兮生有涯
愿焚身以创造人类之光明
世方沉醉于富贵毁誉兮
先生独致力于无名
力尽兮心安
死生成败何足论
江流不尽兮山色长青
千秋万岁兮永护佳城

这首墓铭由赵元任谱曲，当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14次年会上传唱。

“中国科学社”是怀抱科学救国梦的一批留学生在美国发起成立的，一个纯粹的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他们出版的《科学》杂志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期刊，提倡科学、传播新知是他们办刊结社的目的，胡明复是最重要的几个中心人物之一，时在



●胡明复墓

1915年。我们不会忘记，这一年正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前身《青年》杂志的年份。他们隔洋相望，遥为呼应，在彼此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想到了一块。



1914年6月10日黄昏，美国康奈尔大学，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周仁、秉志、杨杏佛等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讨论世界走势和中国未来。有人提出，中国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出版一种专门向中国介绍科学的杂志呢？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在场所有人的赞同。他们决定组织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暂时采取公司形式，入社须交股金，作为出版杂志的资本，大家公推胡明复、任鸿隽、杨杏佛三人起草招股章程。章

● 1914年中国科学社创始成员合影



程确定《科学》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决定发行股份票40份，每份美金10元。任鸿隽、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杏佛、胡明复，这9个在《科学》月刊“缘起”签名的人就是科学社发起人。

《科学》初创主要靠几个发起人撰稿，他们分组合作，常常是任鸿隽、胡明复一组；赵元任和杨杏佛一组。接下来的暑假里，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等人就开始为即将创刊的《科学》撰写稿件，仅胡明复一个人就为前三期写了10篇文章，包括创刊号上发表的《万有引力之定律》，第二期发表的《算学于科学上之地位》，以及《近世科学的宇宙观》等，他还负责审稿和编辑工作。据说当时留学生加入科学社非常踊跃，几个月内就有70多人，股金达到500美金，稿件已准备了三期，并全部编辑完毕。1915年1月，有史以来第一份综合性的中文科学期刊《科学》在美国问世，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袁世凯酝酿称帝时。

爱迪生得知《科学》创刊曾感叹“伟大中华民族在觉醒”，李约瑟称许这个杂志可与美国 Science 和英国 Nature 相提并论，称之为科学期刊的 A(American)\B(Britian)\C(China)。在未来的很长时期内，《科学》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之一，到1951年停刊，共发行了35年。

因为有人觉得光是发行一个杂志远远不够，提议改组科学社。1915年春天，科学社董事会征得多数社员的同意，指定胡明复、任鸿隽、邹秉文三人起草新社章。1915年10月25日，他们拟订的社章经表决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国科学社”，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不但是传播新知以促进科学的研究，还要发表研究成果以建立学术的威权。”他们

SCIENCE 科學

本期要目

心理學與物質科學之區別
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
水力與汽力及其比較
中美農業異同論
生物學概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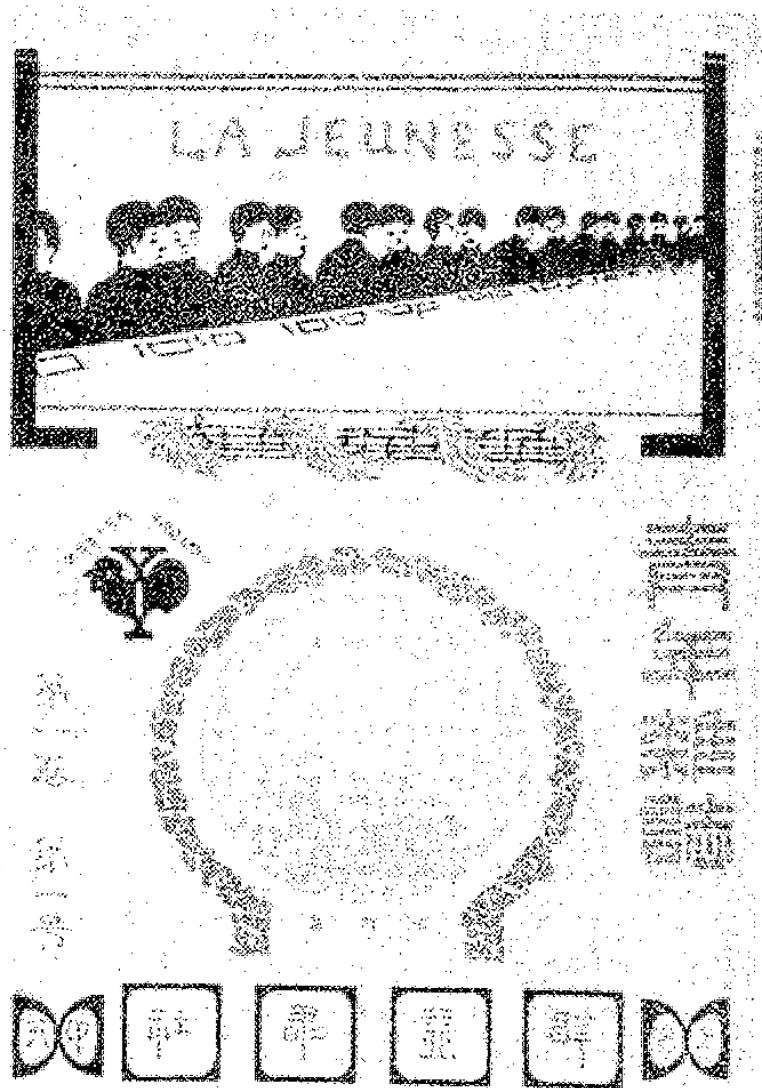
民國四年正月

科學社發行



第一卷 第一期 每冊二角五分

●《科学》创刊号



●《青年》创刊号

选举任鸿隽为社长，赵元任为书记，胡明复为会计，他们三人和秉志、周仁5人组成第一届董事会，杨杏佛为编辑部部长。“中国科学社”的成员也不完全限于学习自然科学的，任鸿隽邀请心仪的才女陈衡哲加入，她回答自己不是学科学的。任鸿隽说：“没关系，我们需要的，是道义上的支持。”

胡明复是《科学》和“中国科学社”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科学》初期的编辑、主要撰稿人，也是“勤劳独著”的经理人之一，历任董事、会计、理事等职。“中国科学社”创

立之初，在组织上，他发表的意见很多，最能得到同人的赞许。几个年轻人自创科学社团，毫无经验可循，全靠自己摸索，直到1916年在美国开第一次年会，社长任鸿隽查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历史，才发现竟有许多不约而同的地方，大家引以欣慰，“由此也可以知道明复的见解和识力了”。他对科学社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他的理财本领，从1914年筹款招股准备出版《科学》起，他就被推为会计，到1915年“中国科学社”成立，1918年迁到国内，直到1925年由过探先接替。科学社经费时常发生困难，幸亏他善于理财，十多年如一日，才使科学社和《科学》杂志能正常运转。“他既是算学家，用钱又非常的谨慎，所以科学社虽自成立以来，同别的学社一样，常常闹经费困难。但从没有受过窘迫，使其事业受一点停顿或间断的影响。”任鸿隽说自己曾留心过，算学家是不作兴算错账的，但是明复若有算错的时候，那吃亏的一定是别人，不是科学社。所以他常常笑说，“明复是一个理想的会计。”

“中国科学社”核心成员分散全国各地，胡明复在上海坚守阵地，长达10年，主持《科学》的编务和科学社的社务。他认为，他们这一代生长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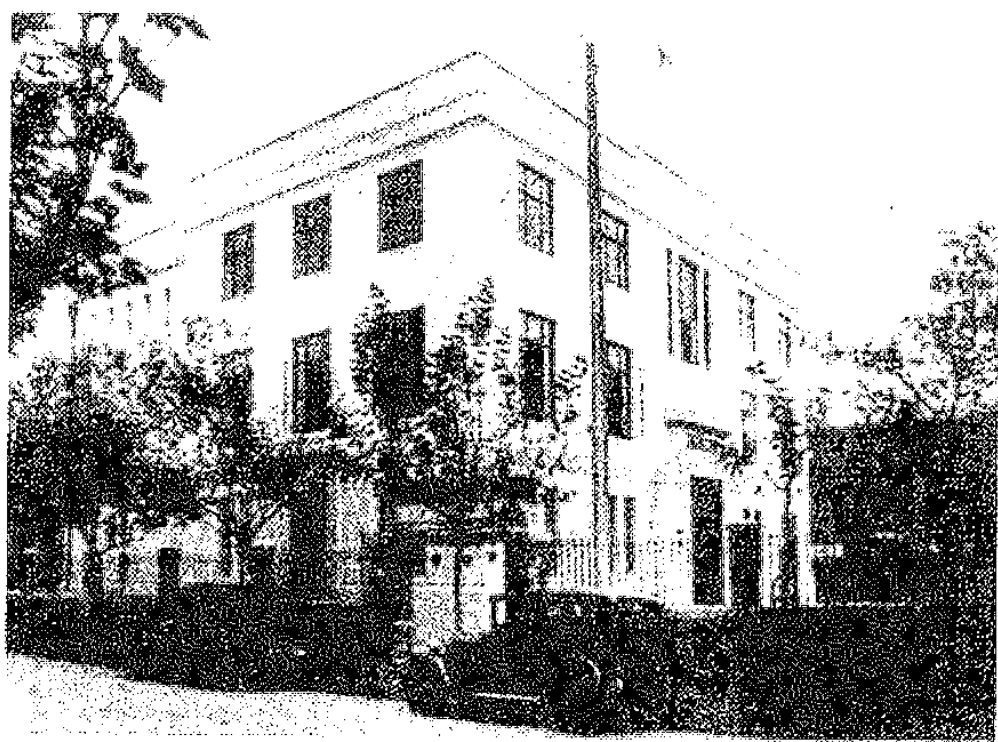
科学落后、苦难深重的中国，为使中国真正摆脱这种状态，需要许多人做奠基性的工作。所以，他经常说：“我们不幸生在现在的中国，只可做点提倡和鼓吹科学研究的劳动。现在科学社的职员社员不过是开路的小工，哪配称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将来能与西方并驾齐驱、造福人类，便是今日努力科学社的一班无名小工的报酬。”为了中国科学社图书馆和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他曾和任鸿隽等社友四处奔走筹款，可惜他生前未能看到这两个机构的成立。

1926年，长期苦于经费匮乏的“中国科学社”得到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的一笔捐款，蔡元培称誉其“富有远见”。1927年，南京政府又拨了40万国库券。从此，它才有了一点较为稳定的经济基础，并利用这些财政援助，迅速扩大了活动范围，包括定期出版科学专题论文集和期刊，从事科学教育的改革和科学名词的标准化，参加国际性的科学会议，经常主办各种科学专题的公开讲座，以及科学图书馆、生物研究所等。1936年3月，身为国立科学最高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发表《中国的中央研究院与科学研究事业》文中，对“这个促进中国科学发展的最著名的私人学社”——“中国科学社”作了很高评价：“这个学社从它创建的那天起，就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经费困难。它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完全在于它的创建者对事业的坚定信心和高尚的献身精神。”

此时，胡明复墓木已拱，他再也听不到这些话了，但他为科学社的创立、发展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同人们始终铭记在心。1929年，科学社建立起一个稍微像样的科学图书馆（1931年落成开放），就取名“明复图书馆”，以纪念这位创始社友。



今天知道胡明复的人已越来越少，胡适在《追想胡明复》一文中说，



●胡明复图书馆

1910年7月，他到北京参加留美官费考试。发榜那天，他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时，天已黑了。他拿了车上的灯，借着微弱的灯光，怀着不安的心情，从榜尾倒着往上，看完一张榜，没有自己的名字，他很失望。看到头，才知道那只是一张“备取”

的榜。他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还是倒着往上看。终于看到了，可仔细一看，却是“胡达”。再往上看，相隔很近，便是“胡适”。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在回去的车上，他心里还在想，“那个胡达不知是谁，乎害我空高兴一场！”后来他们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成了同学，中国同学见了他俩的姓名，都以为胡达、胡适是兄弟，却不知道他们毫无亲属关系。胡适说：“那个胡达便是胡明复。”

1910年秋天，胡明复进入康奈尔大学文学院，和赵元任同班，两人对数学、物理和哲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的成绩在全校也是最好的，1912年，胡适从农学院转入文学院，和他们同班。1913年，他们三人同时被推举为负有盛名的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会员。第二年毕业前夕，胡明复与赵元任又被推举为美国荣誉科学会会员。在1914年的康乃尔大学，正是中国学生大出风头时，在40多个中国学生中，竟有4.5个同时被选为荣誉学会的会员，这已经很难得了，更难得的是其中有两人同时被举为两个荣誉学会的会员。“尤其稀奇的，是明复自来不会说话，少于交际，由此我们晓得这位先生是一个闭户自精的学者了。”胡适记得，当初在远渡重洋的轮船上，在漫长而寂寞的旅途中，那个让他差点空欢喜一场的胡明复总是兴致勃勃地和人讨论算学，不玩牌。

当年秋天，胡明复获得康奈尔大学文理学士学位，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数学，师从美国著名数学家、曾任美国数学会主席的M·博歇教授，

以及 W·F· 奥斯古德教授。他对数学分析尤其是微分和积分方程情有独钟，1917 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具有边界条件的线性积分——微分方程》，受到美国数学界的肯定和赞赏，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以数学为主课、以数学论文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数学家。（在他之后，1919 年姜立夫也以数学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他的妹夫。）他那篇长达 40 多页的论文全文发表在《美国数学会会刊》1918 年 10 月号，这是中国学人在国外发表的第一篇现代数学论文。

1917 年底，胡明复回到上海，从此 10 年没有离开。以他的学问、名望，完全可以到名牌大学去担任重要职务，北大曾再三邀请他。但是强烈的责任心使他不愿离开，一是对科学社的责任，一是对大同学院（后改名大同大学）的责任。科学社从美国搬到上海，一切都是艰难困苦，《科学》杂志的印刷校阅，自他回国起，10 年都是他一个人义务担任，真正做到了 10 年如一日。当年在美国，这批有理想的青年除了组织科学社，曾立志将来回国办一个理想的大学，他们还成立过团体，制定了简单的计划，胡明复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为了办学的事他曾给赵元任写过一封几十页的英文长信，其中有详细的规划。回国后，他想把大同学院作为他理想大学的根基，而多数人主张炉灶重起、另办一个全新的。而他始终对大同学院怀有特别的希望，“这样，一个科学社，一个大同学院，竟把明复钉住在上海整整的十年。”1935 年，在回顾“中国科学社”20 年时，任鸿隽说：“胡明复君以天才绝学，以科学事业故，宁固守沪上，效死而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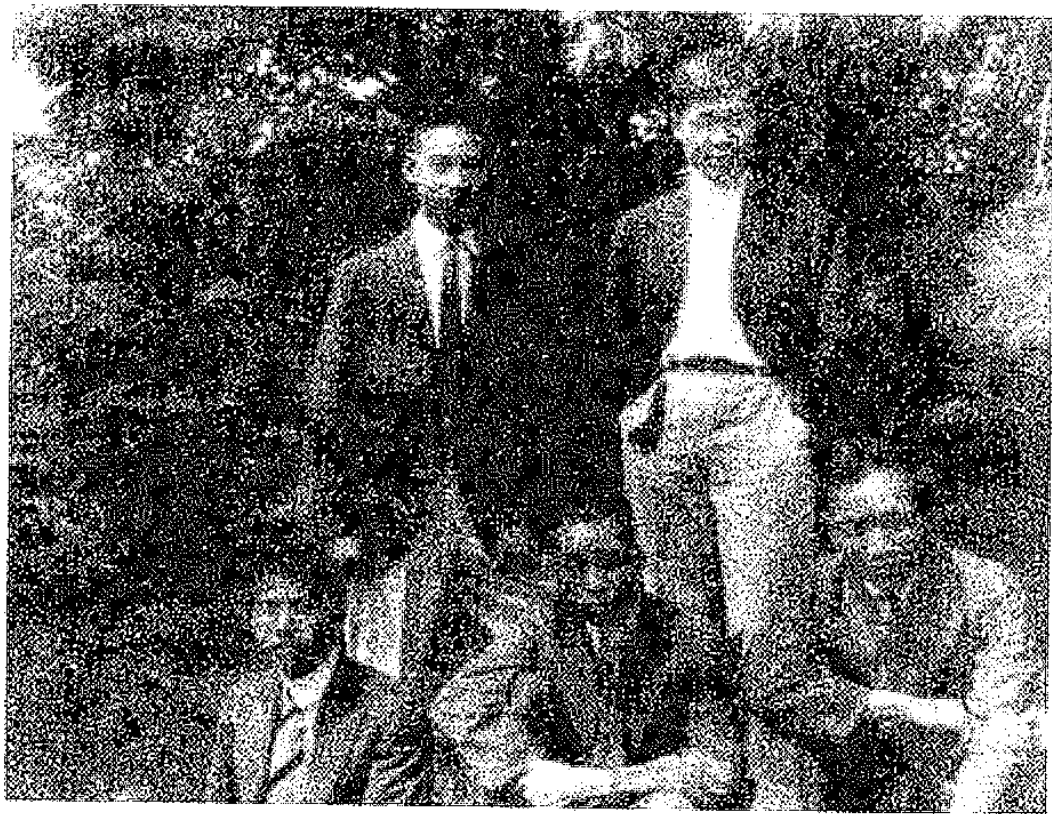
对大同大学，他有满腔的热忱，想把这所小小的大学办成理想的大学，在科学报国梦之外，他内心还有一个教育报国梦，这两个梦常常交织在一起。他在大同大学创办并主持数学系，担任数学教授，用生动、易懂的语言讲述深奥的概念和很难理解的问题。他在教学上也有独到之处，认为学生光读书本不行，必须学会独立思考，养成独立研究的能力。1918 年，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大同大学数理研究会”，他积极指导学生办好自己的学术团体，经常在研究会演讲，介绍科学方法和思想。

大同大学的主持人是他哥哥胡敦复，他在上海的时间很少，将学校的日常事务几乎都交给了他。为了有更多时间、精力处理科学社和大同大学

的事务，他从家中搬出来住。大同大学的事除了教学、人事方面的，还有基建，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有一处校舍就是他亲自绘图设计的，并经常亲临现场监工，处理各种问题。由于大同大学的经费十分拮据，有时连正常的教学都维持不了，他便将自己的积蓄几乎都垫出来了，10年间累计达2万多元。

1918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成立，科学社委托胡明复、姜立夫负责拟定数学（算学）名词，胡明复不仅提出确定数学名词的标准等建议，并与姜立夫、胡敦复等数学家一起审定了初等几何学、平面三角、解析几何、射影几何、代数、函数论等数学分支的名词。1938年出版的《算学名词汇编》序言说：“本篇既脱稿，以胡君明复、姜君立夫对于算学名词夙著精勤，惜胡君早逝，未获观成。”姜立夫、江泽涵等数学家曾多次提到胡明复在数学名词方面的贡献，对他赞誉有加。1924年，胡明复应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王云五之聘，兼任商务的数学函授社主任，他联络上海、南京一批数学教师，与商务几位编辑一起编写了一批普及性的数学书籍，为中国数学传播做了许多可贵的基础性工作。他还编写了微积分、高等分析方面的教材，翻译过《科学大纲》等科学书籍。

任鸿隽眼中的胡明复——“他有沉潜精细的美德，但精神上仍然是极活泼。他辩论事理，极有独到的见解，但同时又能服从他人的意见。因为



●胡明复与任鸿隽等

这样，所以认识的朋友都爱敬他。”胡明复之死对科学界、对科学社都是一大损失，凭他在算学上的造就，如果坚持下去，一定是有贡献的，可惜回国后教书和其他事情把他研究算学的时间占用了。任鸿隽除了为学术惜，更是为社会惜，“我们晓得在现在的

社会中，要找飞扬浮躁的人才，可算是车载斗量，但是要找实心任事，不务虚名的人，却好似凤毛麟角。如明复这样的人，多有几个，不但社会的事业有了希望，还可以潜移默化，收一点移风易俗的效果，也未可知。”然而天不假人，他竟因游泳意外死了。

任鸿隽的惋惜放在今天，也让人深有同感，这个民族缺少的正是胡明复这样“实心任事，不务虚名的人”。在美国留学的时光，胡明复和许多留学生一样，不仅怀抱科学报国的梦想，而且热切关注着祖国的命运，没有把眼光局限于狭隘的专业。早在1912年，他在康奈尔大学，就和胡适等人组织了“中国学生政治研究会”，对租税制度做过研究。胡适回忆：

明复学的是数学物理，但他颇注意于他所专习的科学以外的事情。我住在世界会，常见明复到会里来看杂志；别的科学学生很少来的。

有一件事可以作证。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里，明复和我发起一个政治研究会。那时在革命之后，大家都注意政治问题，故有这个会的组织。第一次组织会在我的房间里开会，会员共十人，议决：（1）每两星期开会一次。（2）每会讨论一个问题，由会员二人轮次预备论文宣读。论文完后，由会员讨论。（3）每会由会员一人轮当主席。（4）会期在星期六下午二时。

第一次论会的论题为“美国议会”，由过探先与我担任。第二次论题为，“租税制度”，由胡明复与尤怀皋担任。我的日记有这一条：十二月念一日，中国学生政治研究会第二次会，论“租税”。胡明复、尤怀皋二君任讲演，甚有兴味。二君所预备演稿俱极精详，费时当不少，其热心可佩也。

胡适还记得，当年自己正热衷于写白话诗，经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问题。忽然有一天收到了胡明复从哈佛寄给他的两首白话打油诗。

第一首是：

纽约城里，
有个胡适，

白话连篇，
成啥样式！

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作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作就是三小时！

开心的胡适也回敬他一首“宝塔诗”。当胡适 1928 年提笔追忆往事时，早已物是人非，他禁不住感叹：“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不但胡适，“中国科学社”的同人更忘不了在烟霞洞与青山为伴的胡明复，他们经常想起当年筚路蓝缕、参与开创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这位老社友。这一点，从竺可桢日记中不难看出。1937 年 3 月 21 日，“中国科学社”在杭州青年会举行社友会，有 22 人参加。会后，竺可桢、胡敦复、胡刚复等 16 人分乘 4 辆车到四眼井，徒步到烟霞洞为胡明复扫墓，并合影留念。1947 年 8 月 10 日，竺可桢带着家人和胡昭复来到烟霞洞，想起了许多往事：“至民国十八年，中国科学社公葬胡明复于此，时杏佛在世，余亦来此参与葬事。至民廿五、六年，尚偕刚复来此。”一个 9 岁左右的小女孩领他们到屋后的胡明复墓前，“初尚有阶梯可寻，继则荒烟蔓草堵塞途径。由女孩之指导，始得至其墓。墓系民十八年七月十二日立，碑系蔡先生笔。碑字虽剥落，犹可辨认。墓郭水门汀亦完好。……明复墓上有屋三楹，窗板均拿下放寺中，以防偷窃云。”同年 8 月 31 日，竺可桢在上海《科学时代》社致辞时，又一次想起胡明复，讲到科学社创办时的困难，“胡明复先生如何

一人苦干，虽中途崩殁，卒能维持至今日。”

四

胡明复兄弟姐妹有9人，多有成就。1907年，他哥哥敦复、姐姐彬复先到美国留学，1909年、1910年，他和弟弟刚复通过庚子赔款留美生，前往美国留学。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胡氏三兄弟被誉为“三胡”。

胡刚复（1892—1966）进入哈佛大学那年只有17岁，第三年开始专攻物理学，1913年获理学士学位，再入哈佛研究院，1915年获硕士学位，1918年获博士学位。期间，他参加了“中国科学社”。他曾和导师杜安教授一起提取放射性镭，研究其在医学上的应用，并在波士顿的亨廷顿肿瘤医院工作。从1914年到1918年，他专心致力于X射线的实验数据的测定，他的博士论文“X射线的研究”及其补充论文，曾在《物理评论》1918年6月号上发表。他是中国第一个从事X射线研究的科学家，在这一领域做了广泛而重要的工作，享有国际声誉。

1918年夏天，胡刚复怀着科学救国梦，谢绝导师的恳切挽留，束装回国。1920年6月出版的《哈佛大学1913级级友会秘书第三次报告书》曾发表他的一封信：

1918年夏我的研究工作暂告完成。我之所以说的暂告完成，是指科学没有止境。当时正值欧战方酣，我深感循实业科研路线报效祖国之责任。而我师杜安教授也希望我留校帮助他从事物理实验工作。但我终于决定离开我愉快逗留过八年多的美国回到自己的祖国担任教师一职了。我国十分贫困，物资缺乏，生产落后，急需振兴实业，由于经费和物资短缺，致使教育事业也难以有效推动。我未曾学过工程，对此一无所知，如今不免后



●胡刚复与束星北等

悔。今后我的一生将面临艰苦的斗争了。

当 26 岁的胡刚复回国之时，中国的大学还没有物理系，也没有物理实验室，普通物理课只是老师宣读英文讲义，学生照本背诵，物理教学还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从此，他致力于物理教学，尤其重视实验室的建设。

1918 年到 1924 年，他任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即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物理系教授，1925 年任东南大学物理系主任，1927 年筹建第四中山大学（以后叫中央大学），任理学院院长。同时，他多年兼任私立上海大同大学理学院院长、工学院院长，还担任过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

他不辞劳苦，长年奔波于上海、南京等地，在国内首开近代物理课，引入最新的物理知识，是“电位”、“熵”等物理名词的最早定名者。他亲手在南京高师、大同大学等多所大学筹办物理系，设立物理实验室，在南通实业家张謇的资助下，他在大同创建了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实验室，设备之先进与丰富，在国内私立大学中绝无仅有。1928 年，他协助蔡元培创办了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1936 年，他应哈佛老同学竺可桢的邀请，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先后做过文理学院、理学院院长，成为竺可桢的得力助手。他们同在哈佛求学，都参加了“中国科学社”，胡回国与华昭复结婚时，男女傣相就是竺可桢与女友张侠魂。竺可桢接任浙大校长前曾和他商量，日记中说：“此事刚复及蔡（元培）先生均赞同。”

作为开创中国物理学教育的一代宗师，胡刚复桃李满天下，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钱临照、何增禄、吴健雄、程开甲、胡济民等都是他的门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就是他自己解私囊资助严济慈出国深造的。

他讲课很有特色，当他偶尔在黑板上推导公式出错时，他会另改思路重新推导，并讲明为什么出现错误，为什么现在又正确了。有时，他会详细讲述一个基本物理概念或理论产生的历史线索、科学大师的创造思路。他是真正把物理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重视实验课，要求学生自行设计、制作或校检、修理仪器部件，使学生手脑并用，将课堂理论和实验结合起来，严格禁止学生伪造实验数据，处处训练学生，使他们具备成为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素养。他在浙大为非物理专业的学生上普通物理课，上课时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谈笑风生，欢迎学生提问，并经常进行反问，启发学生自己找答案，课堂内师生对答，自由活泼，笑声不绝，常常忘记了下课。他对考试命题看得很重，力求出那些学生能融会贯通的试题，每次出题总是要抱一大堆书回家，翻阅到深夜才开始动手。

学生在课外提问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往往旁及学习方法、选课方向、对待学问和生活的态度等，滔滔不绝，讲几小时都不倦。他在浙大的十几年中，每个学期学生选课就是他特别忙的时候，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和理学院每个学生谈话，查阅他们前几个学期的学习成绩，了解其志趣、特长、优缺点和选修此课的原因，并对选课和学习方法进行具体指导。浙大各系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必修课不多，学生可自由选修其他课程。他常常鼓励化学系学生选物理系课程，物理系学生选修数学系的课程，爱好实验的选修化学系、生物系或工学院的无线电等课，确定最佳的选课方案。选课时，他会对学生讲科学发展的新动向，有时还会和学生辩论，往往每个学生的谈话都要一两个小时。

1942年毕业于浙大物理系的许良英回忆：“他平易近人，毫无架子。记得1939年10月学期开始时，我拿着选课单请他签字。他审查我所填的各个项目后，我顺便问他一句：‘听说又要准备迁校了，是否属实？’想不到他一连不断地对我一个人讲了三个多小时，从下午四、五点一直讲到8点左右，吃晚饭的时间都被耽误了，我肚子饿得发慌，也只好耐心听着。天黑了，办公室里没有灯，他依然不倦地娓娓而谈，详尽地告诉我许多有关迁校（计划迁到贵州遵义和湄潭）的具体情况。我只听着，未插一句嘴。我当时是个只顾读书（当然包括大量课外书）、缺乏活动能力的低年级生，

竟会引起他如此亲切的长谈，以后我在路上见到他同一个工人也在长谈什么。可见他对人一律平等，而且健谈。他在浙大，没有教过物理系的课，只偶尔为外系讲普通物理，听说他往往下课了还在讲。以至同学们给他编了这样一个笑话：他讲落体运动，讲了一个学期，这个落体还没有落到地面。当时浙大每个有真才实学的教授，都有独特的风格。”

浙大每星期的纪念周都要请一个教授讲演，规定一小时。学生吴寿松记得，有一次请胡刚复，“胡先生善言谈，往往滔滔不绝，有如梁启超所谓下笔不能自休，所以会场上师生都窃窃私议说今天恐怕吃不上午饭了。果然，胡先生上台讲了五十多分钟才说完了开场白，竺校长就告诉他只剩下五分钟了，胡先生仍侃侃而谈，到正好一小时，竺校长请他停止，胡先生则向我们招手说：请大家等一下，但此时竺校长已采取断然措施，面向会场宣布：散会，以后再找时间请胡先生讲。于是大会一哄而散。”难怪有学生回忆说，竺可桢校长的讲演都有内容，而且能守住时间，不像胡刚复先生，话匣子一开，就滔滔不绝。午饭时间，大家都要走避胡院长，万一被他“抓”住，话匣子一开，中饭都吃不成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浙大成立迁校的“常务委员会”，由胡刚复分工负责研究、设计路线，勘察落脚地。每次迁校前，他都要独自或陪同竺可桢实地勘察、探路，向校务会议提出周密方案。浙大7次搬迁，历经5省，每到一地，就继续上课，创造了一个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其中就有他的苦心焦虑在内。每次设计西迁路线，他总是尽量安排多走水路，并尽量保护仪器图书。在浙大暂留江西泰和期间，他还率领师生为当地筑了一条15里长的防洪长堤。第二年赣江洪水泛滥，大批农田村舍因此免遭水患。当地人为纪念他的功绩，将防洪长堤命名为“刚堤”，或叫“浙大长堤”。

为把浙大理学院办成第一流的理学院，他殚精竭虑，即使经过艰难西迁，他始终认为物理、化学、生物三个学科都是以实验为基础的，教师要做实验，没有好设备和必需的药品，就请不到好教授。千方百计保全原有的各系设备，一有机会他就去重庆教育部、文化基金会等处联系，了解有否购置新仪器和药品的外汇。王葆仁教授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大当化学系主任，就因为浙大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的图书设备

都比较好，代数学教授蒋硕民有一次对竺可桢说：“浙大物理设备、数学图书甚佳，国内无出其右者。”聘请好教授当然是办学的关键，这是胡刚复和竺可桢的共识。在贵州，他不仅让原有的教授安心教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各系还增聘了许多名教授。阵容之强，在当时国内是少有的。虽然生活、实验的条件都很艰苦，但他们仍在桐油盏下创造了许多重要的科学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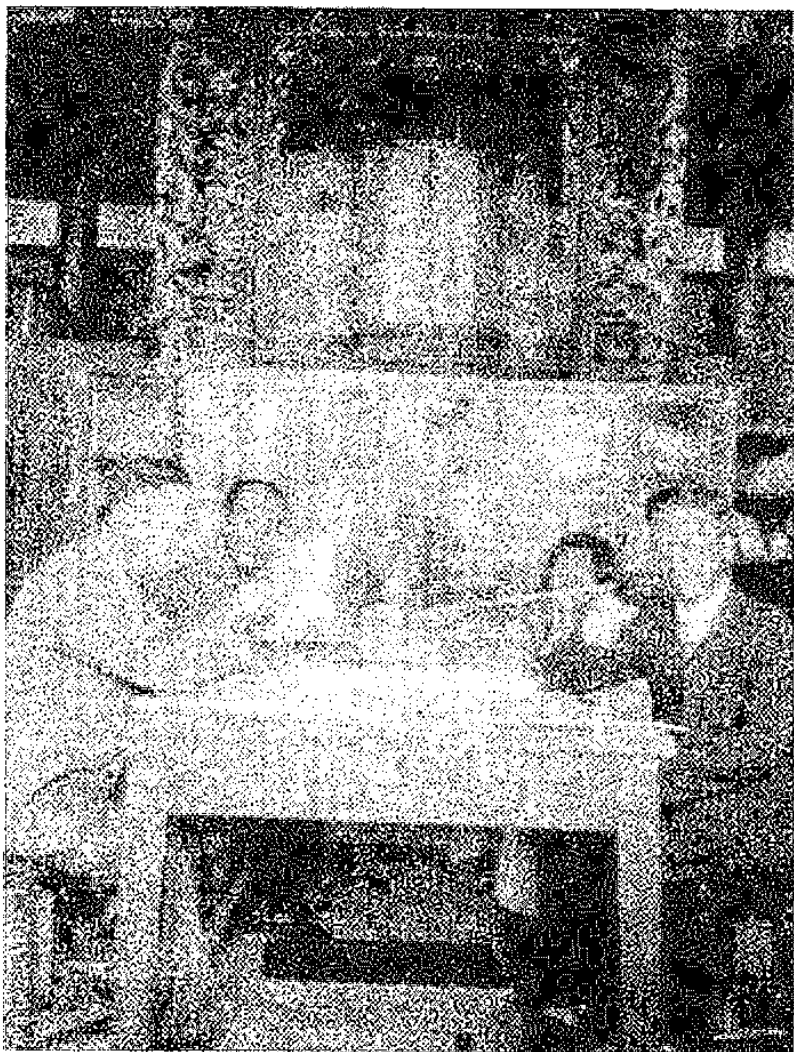
1944年10月，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参观浙大，详细了解了理学院各系的情况后，公开赞美中国的抗战中的浙大、西南联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相媲美。谈家桢回忆：“有些人对胡刚复先生有意见，认为他是才大气粗，但我认为他是竺先生的总参谋，他对浙大的西迁，从考察迁徙地点到搬迁定居，和对理学院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竺先生为‘元帅’，饶有帅才，但是也有不足之处；胡先生是个好参谋，为之拾遗补缺。胡先生缺少竺先生当元帅的领导能力，所以有人不服，唤他为‘胡刚愎’，可他是一个大有功于浙大的好人。”

他爱护学生，每当学生遭到迫害，他总是和竺可桢校长一起设法保护或保释。1942年夏秋之际，他得到国民党当局要对助教解俊民下手的消息，几次劝说解离校，并为其在重庆找好工作。

抗战胜利，浙大迁回杭州，他已年过60，还受命带一批青年科学家到英国去学习微波雷达新技术，1948年11月才回到杭州，1949年国民党当局给他送来飞台湾的机票，他拒绝了。1949年后，他先为上海大同大学校长，后在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任教。1966年3月26日，胡刚复病逝。此前，他曾专程来杭州，目的是去胡明复墓上看看，到浙大、杭大走走，悄悄地来，悄悄地去，没有惊动任何人。

胡刚复在“中国科学社”的贡献之一是参与创建图书馆，任鸿隽曾说过：“一人国门，除随身所带的几本书以外，无书可以参考”。1919年，“中国科学社”就在南京设立图书馆，推他主持。以后，科学社图书馆收藏的国外科技书刊远远超过了当时国内几所著名大学，藏书达到20多万册。

胡氏三兄弟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1922年，“中国科学社”修改社章，将原来的董事会改为理事会，另组一个董事会。在江苏南通举行的第七次年会上通过，选出第一任董事九人，包括蔡元培、马良、张謇、汪精卫、熊希龄、梁启超、严修、范源濂、胡敦复。理事11人，包括竺可桢、胡明复、任鸿隽、丁文江、杨杏佛、赵元任、秉志、胡刚复等人。胡氏三兄弟两个理事、一个董事。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中回忆，科学社的基金管理，向来由董事会的基金监察员蔡元培、范源濂、胡敦复三人担任保管和经理任务（以后添加了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



●胡刚复与竺可桢等

胡敦复（1886—1978）是胡家长兄，他的主要贡献是创办私立大同大学，和编写大、中学数学教材这几个方面。早年他在上海南洋公学、复旦公学求学，深得蔡元培、马相伯的赏识。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各学校挑选15名学生赴美留学，这是留美幼童之后我国首次公派的留美学生，他与大妹胡彬夏都被选中。当年9月，他进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仅用了两年时间就修满规定的学分，于1909年毕业，正好清廷成立游美学务处，他被招回国内，参加留美学生选派

工作，1909、1910、1911年三批他经手录取的学生共180人，其中包括梅贻琦、秉志、胡适、赵元任、竺可桢以及他两个弟弟等，大部分成了有成就的科学家、教育家。1911年4月，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正式开学，他被任命为首任教务长。同年夏天，他与朱香晚、吴在渊等11位清华同事成立“立达学社”，以共同研究学术、兴办学校为宗旨，他被推为社长。不久，他因为主张清华学生多读理工科课程，与美籍教员主张多念英文、美国文学、美国史地的意见发生分歧，上诉到外交部，美国公使出面干涉。他愤然辞职，南下上海。10月，“立达学社”社友集体辞职，南下与他相聚，他们计划由“立达学社”出面办一所属于中国人的大学，不受外国人干涉，学术上独立，定名为“大同”。1912年3月19日，大同学院（1922年改名为大同大学）在上海诞生，他被推为校长，这一天是他26岁生日，开办费是他们自己的228元捐款，租了几间民房做教室，开设了预科和普通科，首期招收的学生不过百人。他们相约在大同教书和办公，不取分文报酬，生计靠他们在外兼课维持，而且自愿将所得报酬的20%捐给大同，以补贴各种经费开支。一年之后，大同学院依靠学费和社员捐薪自建了校舍，并扩大预科，增设英文、数理专修两科及大学文、理、商科，开始向完全大学发展。胡敦复的主要精力放在募集资金上，校务一度仰仗弟弟胡明复主持，胡刚复也出力不少。

大同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毁于炮火，因缺乏西迁经费，胡敦复率领部分师生坚守在“孤岛”。在“立达学社”社友和学校董事会的支持下，经过多年努力，大同又逐渐恢复了元气，到1948年，大同大学部学生人数达2700人，中学部学生2500人，在当时上海公立和私立学校中都占第一位，是1912年创校时学生人数的50倍。

1949年，胡敦复离开大陆（后受聘为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客座教授，1962年退休，1978年12月1日在西雅图逝世），大同大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肢解，所属各院系分别划归复旦、交大、同济、财大等，大同中学幸存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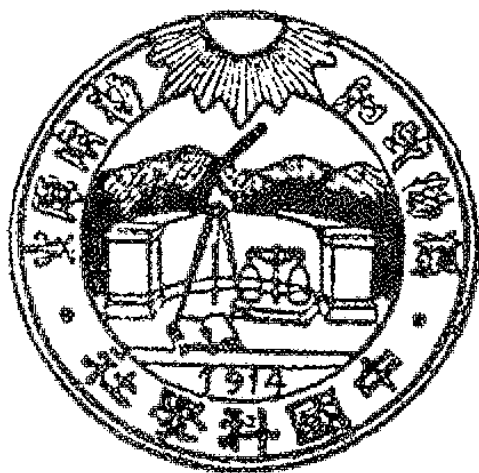
胡敦复赤手空拳办起大同大学，两次担任校长，长期担任校董，前后共计20年（1912—1928，1941—1945）。他被人视为“中国第一流的教育家”。

1925年1月，教育部任命他为国立东南大学校长，他未到任。同年8月，他又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校长。1930年起，他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长达15年，是1941年数学学科仅有的两位部聘教授之一。他讲的微积分课深受学生喜欢，当年的学生汪道涵回忆说，他学识丰富，讲课清晰。

1924年7月9日，任鸿隽写信给胡适，“昨天我向敦复说，趁我们脚力还健的时候，多游览几处名山，不要将来对山灵而兴叹。敦复说，我们年轻的人不应有这种汲汲顾影的思想”。对于胡敦复来说，游览名山真的是太奢侈了。

他除了办学，还致力于推动数学的教学和研究，教科书的建设。他在《近世初等代数学》（与吴在渊合著）序言中说：“自立之道奈何？第一宜讲演，第二宜翻译，第三宜编纂，第四宜著述。”大同学院创立不久，他就成立“大同学院丛书丛刊”编辑部，编辑成员包括胡氏三兄弟和朱香晚、吴在渊等14人，大同所用教材和参考用书，大都由他们自己编写。胡敦复与夫人华桂馨（早期留美生）最早合编了初中算术教科书，之后与吴在渊合编了《算术》一册（1922年）、《几何》二册（1923年）、高中《几何学》一册（1925年），都由中华书局出版。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与荣方舟合编的《平面几何学》、《立体几何学》，他与范会国、顾澄合译的《积分方程式之导引》，作为“大学丛书”之一。

此外，他独立编写了《新中学几何学》等，对于我国早期的大学、中学的数学教材建设都有开拓意义。1918年，“中国科学社”等科学团体发起科学名词审查会，他作为特邀专家，参加数学名词的审定。1932年，国



●中国科学社社徽

立编译馆创立，他被教育部聘为数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1935年，他主持了数学名词的最后审定工作。同年，他与熊庆来等发起成立中国数学会，当选为中国数学会董事会主席。1936年，他主持在北平举行第二次年会，决定1937年在杭州举行第三次年会，因抗战爆发被迫取消，但他仍在上海坚持出版《数学杂志》中

国数学会学报》，想方设法开展数学会的活动。

1921年9月1日，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上说：“现今的时势，观察一国的文明程度，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和其他表面的东西作标准仪，是拿人民智识程度的高低，和社会组织的完否作测量器的。要增进人民的智识和一切生活的程度，唯有注重科学教育。”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也是包括胡氏三兄弟在内的科学社社友的共同见解。1924年7月1日，《申报》发表部分“中国科学社”社员关于美国退还赔款用途的意见书，他们认为这些款项应用于学术上最根本最重要的事业，使教育文化能有永久独立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于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研究，我国最缺乏的就是科学研究，胡氏三兄弟、竺可桢、任鸿隽、杨杏佛等人都在上面签了名。

主要参考书目：

1. 张友余《胡敦复》、张祖贵《胡明复》、解俊明《胡刚复》，《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2、4、6卷，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
2. 任鸿隽著，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 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 朱馥生，《敝帚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
6. 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2005年5月1日来信。

报纸是近代的产物，自《申报》《循环日报》在上海、香港诞生以来，报刊就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扮演起日益重要的角色，《申报》问世是1872年，到1912年转入史量才手里。《大公报》初创于1902年，1926年之后在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手里进一步发扬光大。汪康年、梁启超1897年办《时务报》，陈独秀1915年办《青年》（《新青年》），储安平1946年办《观察》周刊，包括胡适们自办的每一个杂志，不同的时代虽有不同的趋向，但他们言论报国的情怀是相通的。

1926年被军阀张作霖们杀害的邵飘萍，1911年在杭州踏上“新闻报国”路，1918年自办《京报》，他的一生虽短，却有声有色，谱写了百年言论史上的华彩乐章。在他被军阀公开枪杀8年后，《申报》老板史量才在杭州到上海的路上横遭国民党军统特工有预谋、有组织的暗算。辛亥革命之际在上海《天铎报》崭露头角、1927年前在上海主持《商报》笔政的陈布雷告别心爱的报纸，以蒋介石的幕僚而终，在1948年冬天选择自杀，归葬于杭州。

一位朋友在午夜梦回之际阅读百年言论史，想起的却是当代诗人北岛的句子：

“路啊路，飘满了红罂粟。”

他知道那不是罂粟，而是血。其中有邵飘萍的热血，史量才的热血，也有陈布雷熬干的心血。吴宓的那句诗真是好，“终信文章胜甲兵”，尽管子弹可以轻而易举地洞穿血肉之躯，但它击不碎死者和后死者的“文章报国”之志。陈布雷后半生一直为自己未能尽始终坚持在报人的位置上而感叹、后悔、遗憾。

第十四篇 登临吴山

——邵飘萍的不归路

民国元年春节，前所未有的共和新国出现在地平线上，青年邵飘萍登临杭州吴山，“左盼钱江，右顾西湖，一如美人绰约，一如英雄叱咤，可望不可即。”所见所闻更让他百感交集，感到可佩，可敬，可爱，可喜，又可哭，可怜：

可佩的是“国民协济会”的宣讲团，在自己家吃饱了饭，往吴山各处宣讲，“讲的都是共和国最要紧的知识”。听者如堵，几乎把变戏法和西洋镜的生意都夺了过来。

可敬的是“女子策进社”社员的热心，大年初一也到吴山来分发孙中山的演说稿，她们明白多分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知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和政治的阻力就少了一分。

可爱的是“国民协济会”宣讲员张摩诃通慧和尚带来的惠田孤儿院一班学生，他们组织“学生负贩团”，以改良商人的不良习惯、提倡国货为宗旨。那班少年学生个个踊跃活泼，对人恭敬有礼。

当然最可喜的是——“革命一革，把那班大人的绿呢大棺材，同太太、跟班的马弁，



●邵飘萍

都不敢来污辱我吴山。上山觉得便了许多。”

可哭的是几个似士兵非士兵的士兵，不文不武，不死不活，口中都含了讨厌的香烟，在那里同卖香烟的贫苦儿为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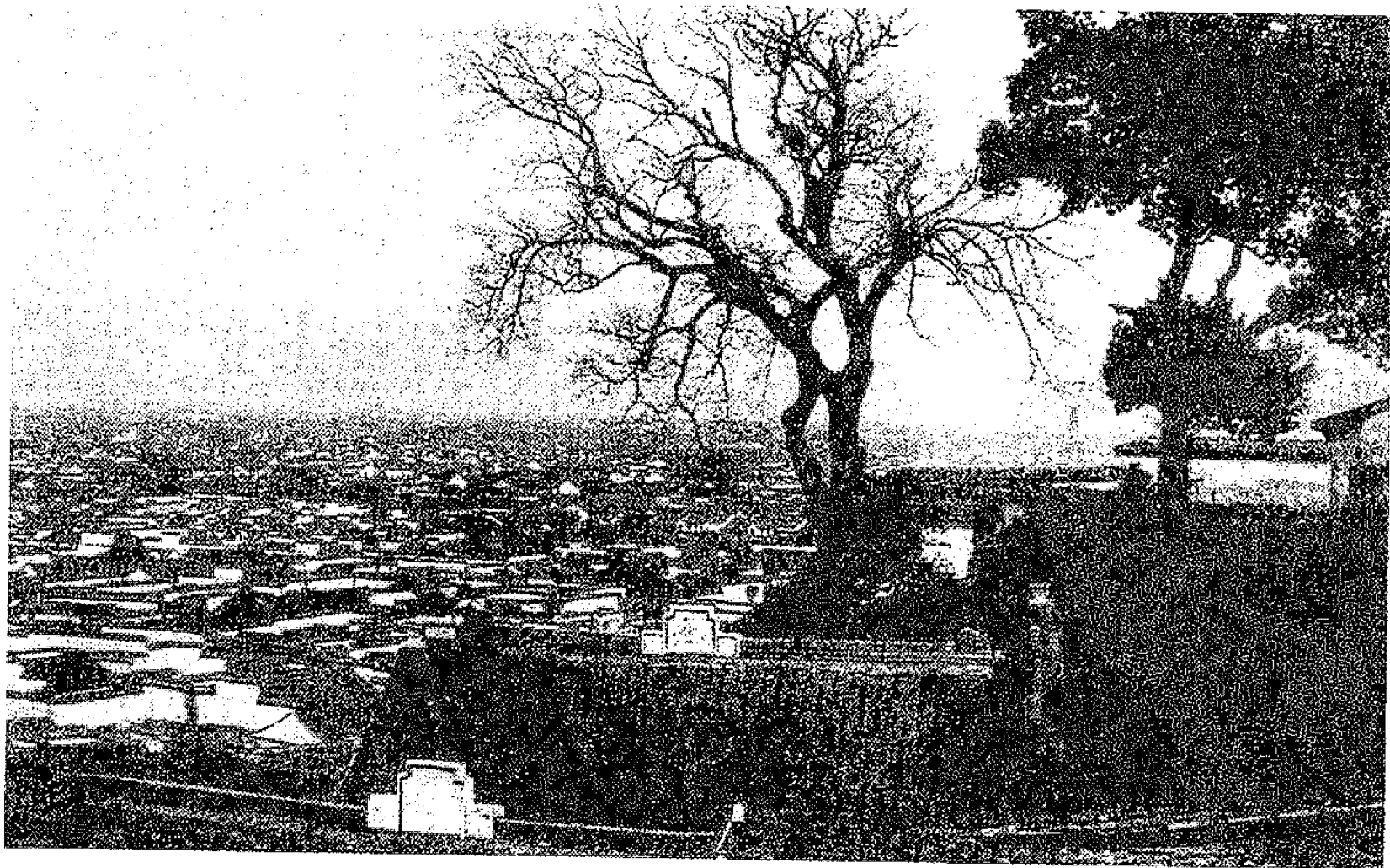
可怜的是吴山上的乞丐，有无手的，无脚的，有手脚、眼睛都无的，其褴褛之衣、憔悴之容与游人中的粉白樱红湖绉，恰好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时的吴山是杭州的一个中心，远比现在热闹，繁华不在西湖之下。飘萍的这则随笔发表在《汉民日报》1912年2月23日，活生生地画出了新旧交替之时的杭州，特别是其中传达出的那种新气象，让我们在近百年后依然有身临其境之感。

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作为一个报人，邵飘萍（那时叫邵振青）最值得我们肯定的就是他敏锐的洞察力，这一点，他初登新闻舞台就显示出来了。1911年12月18日，他在杭州《汉民日报》驳斥严复所谓“人民程度未至，不适于共和”的国情论。1912年1月19日，他在时评中说：

袁氏奸人，多诡计，苟闻其能使清帝退位，即信其赞同乎民军，而北

●旧时吴山俯瞰杭州



上之师缓不进发，且欲认专制魔王为吾国总统，则袁氏将挥北方残虐无理之贼兵，实行以暴易暴之举动。此时共和安在？民国安在？革命成功安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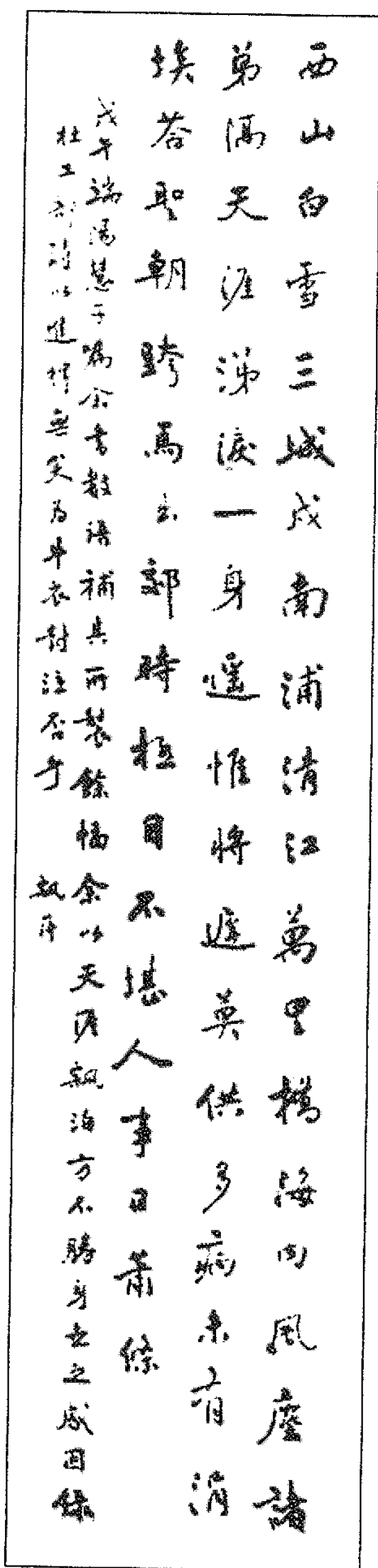
1月22日，他的时评说得更直接——“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到2月24日，大局已定，他说：“昔之病袁，非有仇于袁之个人也，为大局也，袁能顾大局，自可受人民之委任以为总统，然苟袁氏今后之举动有稍负人民之委任者，则振青仍当以秃笔诛之，非谓一为总统即神圣不可侵犯也。”

新生的民国舞台上，到处都是让他愤怒和不平的烂事。但他决心以报为媒，不断地报道事实真相，将假共和变为真共和。从西子湖头出发，他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邵飘萍（1886—1926）生于浙江东阳，在杭州前后只生活了5年多，但这几年对他的一生来说是关键。正是在杭州求学的3年，他确立了新闻报国的志向，在《汉民日报》的2年，则是他在新闻舞台上最初的演练。

1906年，他在金华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梁启超的文章曾让他如痴如醉，他对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入学不久就开始为上海的报馆做“访事员”（通讯员），常写些杭州或金华的通讯稿。他的浙高同学中后来从事新闻事业有成的还有陈布雷、邵元冲，但只有他一人以新闻事业终一生并以身相殉，其他两人都是中途弃文从政。在同学张任天（后来一起办《汉民日报》）记忆中，他在浙高期间，“喜欢写稿，便外出到处采访，连鸦片馆也去。他的文章写得既快又好，我们都很推崇他。”陈布雷回忆录中提起当年的同窗友好邵飘萍，称誉他“才



●邵飘萍手迹

气横溢”。大约 1908 年春天，杭州各公立、私立学校在梅登高桥体育场联合举行运动会，在图画教师包蝶仙的指导下，邵飘萍等编印了一份油印小报，这是他正式办报的一个小小前奏曲，张任天回忆说：“这次运动会，由于我和邵飘萍、陈布雷三人不爱运动，所以都没有参加竞赛项目，但又不甘寂寞。于是三人一合计，就办了个《一日报》。因为运动会只开一天，所以就取了这样一个报名。三人分了工，陈布雷为编辑，我和邵飘萍为访员（记者）。《一日报》为 16 开蜡纸版油印而成，……分发先生、同窗和社会名流，很受大家的欢迎。这是我们三个人办报生涯的开始。”陈布雷也说这是“练习新闻事业之始”。

早在少年时代，邵飘萍就在金华和革命党人、办过《萃新报》的张恭有过接触，他认同光复河山、创立民国的革命，对秋瑾始终怀有敬意，曾与秋瑾通信，而且很可能在杭州求学期间见过秋瑾。1911 年 12 月 31 日，民国诞生的前夜，离秋瑾被害已有 4 年多，他在《汉民日报》发表的随笔中说，当时他翻捡旧物，见到秋瑾昔年写给他的亲笔信，感慨难已：“尝忆接到此书时，距秋女侠之死已半月，初闻之而大惊，继审视邮票上之月日，知为秋女侠被害之前五日所发者，欲寄回书，已无从寄矣。呜呼！”但他对新闻抱有更强烈的兴趣。清末民初的普通社会心理对报纸从业者十分鄙视，被看作“不名誉之职业”，受到官场仇视和社会轻薄。这些邵飘萍当然不会不知道，他在《实际

应用新闻学》中说，社会之所以不重视访员，一半是由于缺乏对新闻事业的重视，一半是由于访员大多数缺乏新闻知识和训练素养，其中有许多

不能自重人格的不健全分子。正是从黄远生和邵飘萍开始，真正提升了新闻记者的地位。



邵飘萍在杭州读书时开始为上海老牌大报《申报》撰写通讯，毕业后回故乡金华任教，仍继续撰写通讯，被聘为“特约通讯员”。1911年11月杭州光复，他应老报人杭辛斋的邀请，出任《汉民日报》主笔，1913年初杭辛斋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由他全面主持《汉民日报》笔政。期间，他为上海《申报》《新闻报》做地方通讯员，1912年1月起兼任《浙江军政府公报》编辑，并被推为全省“报界公会”干事长。

《汉民日报》本是浙江军政府的机关报，提出言论宗旨是“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杭辛斋任经理，日出对开两大张，广告、新闻各占四个版。新闻版先后有公告性质的启事、要件、专电，及时评、专电、译电、要电等新闻、读者来稿、副刊等。其中最受人欢迎的是邵飘萍短小的时评、随笔，他为新生的民国歌与呼，自始即对袁世凯表示强烈的不信任，表现了一个报人的敏锐洞察力。他在短评中对孙中山的让位、袁世凯的狡诈、趋炎附势的议员、当地的权贵都有尖锐批评。1912年3月16日，袁世凯刚下了一个禁绝贿赂令，他马上在《汉民日报》来一句“请自大总统始”。他直斥“交通卿”梁士诒是“卖国之贼”，“民政卿”徐世昌“昏庸无知”。

《汉民日报》是邵飘萍进入新闻界的第一个平台，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已经出手不凡，因笔锋犀利，“为时人所重”。这一点只要看看这些题目就知道了——《正告财政司长》《今日之灾与他日之灾》《省检事长亦应停职》《不知法律之省法院长》《敬告官厅》《请省检事长自请停职》《为天职报被毁敬告检厅》等。从1911年11月5日至1912年11月30日，他在《汉民

日报》发表大约 186 篇文章，大多是短小精悍、笔法老辣的时评，到 1913 年春天宋教仁被刺，舆论环境恶化，他的尖锐评论只能在《申报》发表。

当然，他的批评矛头所向主要还是当地的权贵势力。1912 年 4 月 11 日他就直言：“浙省光复，秩序之安宁为他省所未有。然光复以后，措施无方，百举俱废，财政紊乱，即其一端。府司多滥竽之才，人民有饿死之惨。衙署俱备，不见进行。经费徒耗，国无裨益。前途之危，有岌岌不可终日者。”

他讽刺官吏丑态，“未得委任状以前，东奔西走，到处钻营，政界之消息，亦若甚为留意。及委任状到手，便影子都不见。问之其友，曰：雇长班，凭公馆，接老婆去了。”

1912 年 3 月，浙人与洋人发生莫干山、宝石山风波，邵飘萍批评权贵强占风景名胜之地：“近来以来，各处名胜膏腴之地，类多为豪强所占有。如王省三、盛宣怀、崔永安等，无不各购有广大之地产。”

时任浙江财政司签事的虞廷恺，官虽小，权很重，“种种腐败恶劣行为，久已脍炙人口”，1912 年 5 月 8 日到 12 日，邵飘萍秉笔直书、连写多篇时评予以揭发，毫无顾忌。他甚至讽刺浙江当权者朱瑞和袁世凯是“猪”、“猿”一群。

《汉民日报》时期，他对办报有了一系列清晰的想法，并坚持这些信条：“报纸对于善事，有引导维持之责任；对于恶事，则有监督纠正之责任。或赞扬，或痛骂，皆尽应尽之责任，无丝毫成见于其间。”他后来回忆：“愚初办报之时，系在浙江，当时革命以后，军人势力弥漫政界，凡有攻击彼辈之新闻登载后，每来函请将原稿及访员交出，以便直接加以惩创。”他一概予以驳回，表示一切都由自己负责，“至于原稿及访员姓名，无论何时何地，照例向不示人”。这是他一直引以自豪的事。1912 年 5 月 10 日他提出：“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薪也。”为此他不怕吃官司，不怕当局唆使流氓深夜潜入报馆纵火，不怕街头寻衅，不怕遭刺客暗杀，不怕被捕下狱，并在《汉民日报》短短二年间一一体验。

先是他的《省检事长亦应停职》《不知法律的省法院院长》等时评，因为揭露知法犯法的司法官员受贿、狎妓等丑闻，而被告上法庭。他出庭对质，用铁的事实把对方驳得哑口无言，法院被迫宣布“原告不能成立”，将诉状

退回检察厅。

再是1913年6月12日，原浙江《自由报》（后易名《南强报》）总经理许畏三当上浙江省检察厅厅长后，因《汉民日报》在报道和评论“九花娘聚赌案”“共和春殴斗案”等丑闻时涉及他，悍然派法警拘捕邵飘萍。邵飘萍不仅不逃，而且从容面对审讯。当月15日，《申报》刊登庭讯实况。26日，浙江杭县地方审判厅驳回许畏三以检察长名义提起的公诉。《申报》评论批评许畏三：“《汉民日报》邵振青一案，……是许畏三已居于被害人地位，以被害人资格，自己拿人，自己起诉，是以检察厅长之名义，办自己私人报复之实事，益坐实其滥用职权之罪”。

陈文浩在《我所知道的浙江都督朱瑞》中回忆，“时杭州之《汉民日报》为民党机关报，邵飘萍任编辑，笔锋尤犀利，对于袁世凯政府及朱瑞，极尽嬉笑怒骂，与《之江日报》成对敌，朱瑞颇优容之。”最终朱瑞也容不下他。邵飘萍回忆，从1911年11月至1913年8月，他在《汉民日报》“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逮捕三次，下狱九阅月。”

1913年8月10日，邵飘萍以“扰乱治安”、涉嫌参与讨袁的罪名入狱。被捕之前，杭州《天钟报》《平民报》《浙江民报》等被朱瑞下令查封，《浙报》受到停刊三星期的处分，他还以全省报界公会干事长身份要求当局缩短《浙报》停刊期限。如今他连自己的报纸也保全不了，8月17日，《汉民日报》以“诋毁中央”、“包庇乱党”、“于地方治安有害”等罪名被关闭。

当年12月，他一出狱即离开杭州，不久东渡日本。1922年9月16日，他和胡适吃饭时，说起民国初年在杭州办报、入狱9个月的情形，胡适日记中认为“很有趣味”。



1915年，邵飘萍应上海新闻界之邀回国，以“阿平”等笔名在三家重



●当年的《京报》

要报纸执笔，与西南的护国军遥相呼应，对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大张挞伐，对附逆者、观望彷徨者也绝不放过。对故乡浙江态度暧昧的当权者、议员一样如此。4月16日、17日、21日，他接连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敬告浙江倡议诸公》《休矣屈映光》《敢问浙江参议会诸公》等文。17日，受袁氏重用的朱瑞失踪，摧眉折腰事袁氏的政客屈映光掌权。他在文章中指出，国人既不能容袁，浙人又怎么可能容得下屈氏。5月6日、7日、8日，当浙江独立姗姗来迟，他在《时事新报》又发表《浙军之荣誉》《浙局与政客》等多篇文章。

袁世凯倒台不久，7月31日，邵飘萍出任《申报》驻京特派员。离开上海前，他到近3年前被迫匆忙离开的杭州。此后6年他或在北京办报，或亡命日本，未到过杭州，但一直关心着故乡的一切。1920年12月27日，他在《京报》发表《浙人治浙乎？》，1921年6月24日，他在《京报》发表《浙江省宪之悲观》，热切关注家乡的地方自治。那一年，浙江督军卢永祥等各地军阀政客纷纷打出“以省宪定自治”、“废督裁军”等旗号，6月20、23日，他在《京报》发表一组漫谈：“卢永祥自言以两电促浙人自动之制宪。既曰自动，何以有待于促？此之谓‘督促自动’。”“卢永祥硬学得‘自治分权’四字，居然大演其说，又声明前电乃是‘建议’，绝对不是‘独立’，可见卢氏自命还是中央管辖的督军。”他指出，督军所辖的军队是国军还是省军，如果是国军，那么要以全省的财力来养国军吗？或者将卢和军队送还中央，浙江不给军饷？“自治分权之利害虚实全在此点，若此点不先解决，其余文章，且莫谈罢。”

一年后（1922年6月20日），邵飘萍动身南下杭州，离京前夕，正值

卢永祥高唱“废督”口号，他与浙江旅京的政客界名流孙宝琦、王正廷、汪大燮、王家襄、钱能训、屈映光、沈瑞麟等人聚会，大家一致赞成“废督”。

6月23日，邵飘萍回到阔别6年的杭州，当天《申报》以《邵飘萍由京返浙》为题作了报道。此行他除了采访、了解浙江局势，还有在杭州设立《京报》分馆的计划。此时离他手创《京报》已有4年，正处于新闻事业的颠峰。当天上午，他与浙江省省长沈叔詹会谈，第二天与宪兵司令马懋勋、警务处长夏定侯、稽查处处长吴玉璞以及省议会议长、副议长会谈，并与“废督”后就任“军事善后督办”的浙江头号人物卢永祥会谈。会谈之间，他耿耿于怀的是——“于保持安宁秩序方针之下，仍须渐进以应世界之潮流。”邵飘萍认为，国人对政治本来没有多大兴味，“惟社会经济亦在与政治有关，且如各派暗争以及调兵遣将预备私斗之消息，最足使国民寝食不安，故日内江浙人民奔走呼号，为弭兵之运动。”他们之所以关切时局，因为这与生活息息相关。6月29日，他在《浙事现状与东南局势之前途》文中报道：“愚以东南时局及浙省本乡治安前途之关系，应向各方面探询意见，报告读者，并以供政府与夫政局中号称实力派者之参考。”7月2日、5日，他又在《京报》发表《浙江善后期中之东南要讯》《浙军队工人化之可能与乐观》。

此次回杭，邵飘萍对杭州的市政、交通等多有肯定，但对“土娼之多”“彩票之多”，他认为是“浙省文明中之罪恶”，彩票“更属可惊”，“其吸收劳动男女一角二角小洋之方法，可谓水银灌地无孔不入，恶毒甚于洪水猛兽。”邵飘萍当面向浙江省长“力陈其害，宜速禁止”，表示“此事从社会方面观察，其重要不亚于废督裁兵”。杭州之行，令他不无欣喜的是与老友杭辛斋有过一番小聚。尽管行色匆匆，他还是冒雨去了西湖，见岳王坟焕然一新，湖滨旅舍林立，他在文章中还提到西湖积泥多草，急须疏浚，当时湖中养了数万食草鱼。

邵飘萍结束南行、返回北京后，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理颜惠庆即约请他畅谈南行观感，他将谈话内容刊登在《京报》上，说这次南归，“纯系个人私事，非如政客之有所活动”。1922年6月之后，邵飘萍再也没有到过杭

州，但他的目光仍不时关注着故乡土地上的哀乐忧患，《京报》上也有他亲自执笔的文章，1924年12月16日有《浙江之事如何》，1925年2月4日、5日有《江浙人民与善后会议》《我以浙人评浙孙勘电》等文。无疑，他也有和常人一样的乡土情结。作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报人之一，他的目光从来也没有为地域所限，即使在杭州办报时，他关注的仍是整个国家的命运，新生的共和制度是否能名副其实。到《京报》时代他的关怀重点不但是中国的内政，而且对外交、国际事务、各种世界思潮都有极大的兴趣。一代报人，视野之开阔，对新闻事业的诚挚，职业水准的精湛，完全可以与国际上同时的第一流报人相媲美。胡适在日记中如此赞许：“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现在北京日报界中没有他的敌手。”

四

邵飘萍常说自己什么嗜好也没有，只对新闻有非常趣味，愿意终生从事这个事业。1926年4月26日凌晨，他以身殉报，在北京天桥，被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军阀下令杀害，罪名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

有人说他被害前是秘密共产党员，有罗章龙晚年的证明。但他本人在《京报三年之回顾》中说：“愚个人既素无党派关系，更不欲以特殊势力为报纸之后盾。根基薄弱，而言论尚较自由。盖《京报》创刊之志趣，非有政治之目的，惟以愚个人既乐从事于新闻之业，欲以《京报》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1924年11月12日，他在《京报》发表的《以修正宪法解决时局》也说：“此十三年中，无论何党何派之首领及其重要分子皆曾与为平等友谊之周旋。因在今日我国情形之下，新闻记者一旦加入党派之中，每足以致职务上行动之不活泼，故至今未与何党何派成立如何深切之关系。且自始立志欲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故亦绝对未就政府机关之何种官吏。”（转引自散木《乱世飘萍》，448页）他最后公开

发表的绝笔《飘萍启事》声明：“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预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

从朋友、亲人的回忆来看，他并未参加过党派。老朋友包天笑说：“邵飘萍最初就是一个喜欢搞政治的人，但他从来不与谈我谈及政治。他有他的许多朋友，可是是什么团体，都未见他加入。”“他虽然不是共产党而与共产党联络的，时人称之为‘亲共’，这也难于否认。因为飘萍当时交游既广泛，思想又激进，不知不觉的他们就目为‘同路人’了。”新闻史家方汉奇在《邵飘萍是共产党员》文中说：“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也不认为他是共产党员”，“1982年4月我去访问她的时候，曾经郑重地和她探讨这个问题，她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不是！”老报人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认定：“邵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只因敢于揭露军阀的罪恶，便被套上一顶红帽子而死于非命。”

邵飘萍对新闻的见解也可以从侧面印证。他在《新闻学总论》中提出新闻事业负有指导教育（包括政府）的责任，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具有特殊性质，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信仰上要独立，组织上、经济上都要独立，才能不受政治势力、经济势力的控制，如果说报馆有股东，“社会中人人皆属股东”，应以“社会中大多数人为后盾，不啻皆实际缴纳资本之股东也”。他认为记者是独立的“无冕之王”，应该“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保持“第三者”的地位，客观的态度，“决不从事于实际的何种运动”。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独立创办《京报》，秉持的就是这些理念。

1919年8月，离“五四”运动不久，《京报》因为屡屡发表新闻、评论，



●京报副刊

揭穿当权的安福系对日借款等“祸国阴谋”而遭查封。包天笑回忆，邵飘萍曾亲口对他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他办《京报》时也给上海《时报》《申报》发电讯，但上海的各大报那时“都是持保守主义的”，“狄楚青胆小，认他是一位冒险人物；史量才竟说他要垄断上海新闻”。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1920年安福系垮台，他才返回北京，9月17日恢复《京报》。1923年11月24日，在80多家报纸、通讯社记者参加发起的“北京新闻记者公会”成立大会上，他被公推为大会主席。12月7日，他在《京报》发表《北京报界之宜自警惕》一文，慨然指出北京的报纸、通讯社虽多，“而有确实基础与言论之能勉成自由独立者，仍居少数。”

自从1911年献身报业以来，邵飘萍饱经“穷饿、羈囚、逋逃、沦落、兄弟妻子离散”等人间苦痛，他当然不是白璧无瑕，没有任何可非议之处。比如他日常生活讲究排场，客厅陈设豪华，连香烟都是特制的（上有“振青”字样），出入乘小汽车，而且是赌场、青楼的常客（这其中有跑新闻的工作需要）。他出手豪阔，一掷千金，这样的开支单靠办报所得难以应付，所以接受军阀、权贵“馈赠”是不能避免的。有史料表明，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邵飘萍的《京报》和林白水的《社会日报》都属于“超等者”的6家，每月可得津贴至少300元。（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06页）当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回忆：“邵飘萍与段派没有什么关系，但因为他是当时的名记者，大家都怕他，也不能不应酬，经常的津贴是没有的，记得两次送给他成笔的钱，数目相当大，每次总达好几千吧，究竟多少，现在已记不清了。”（《李思浩生前谈从政始末》，《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二辑）不过他拿了钱照样不买账，这是军阀最不能容忍的。

当时在北京办《世界晚报》《大同晚报》的龚德柏在回忆录中说：邵飘萍办《京报》，“段祺瑞当权时，因敲诈未遂，攻击政府，被段把京报封闭，并通缉邵飘萍……段派倒台，……恢复京报。平日无钱不要。冯玉祥、阎锡山，对于新闻记者，号称一毛不拔。但邵飘萍却有方法向他们要钱，公

然如愿以偿。”

1924年3月底，顾维钧任外交部长，王正廷以“中俄交涉督办”的名义与俄国加拉罕办理中俄复交问题，双方达成协议后，公布条约草案，顾不承认。

“京报大骂顾维钧。顾维钧派人与邵飘萍交涉，一次给人五千元，并将邵每月所得外交部津贴六百元，增加至一千元。次日京报即一百八十度转变论调，由攻击顾维钧，改变攻击王正廷，使世人大为惊奇……

在段祺瑞时代，与京报复刊之后短期间，邵对于报纸，尚属努力，故该报时有特别消息与社论，尚为世人所注意。其后堕落日甚一日，除抽鸦片烟外，嫖赌玩乐，无所不来，故用度日大，要钱更厉害……

他曾屡次向奉天军阀张作霖要钱，均获如意。十四年冬郭松龄倒张作霖之戈，邵又受郭之金钱，大骂张作霖。张派人向他说，我们屡次帮你的忙，你为什么那样反对我们。他回答：你们是帮邵飘萍的，现在攻击你们的是京报，不是邵飘萍。张作霖听了此话，非常生气，遂决意必杀邵飘萍而后已。”（《龚德柏回忆录》上册，107—108页）

张学良接见北京报界营救邵飘萍的13个代表时说：“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但此事难以挽回。张作霖宣布邵飘萍的罪状是“宣传赤化”，胡政之发表的悼文认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直呼“大冤”。龚德柏回忆自己在《大同晚报》上曾发表这样的社论：“奉方之愚不可及。你们以为宣传赤化是大罪，而不知反而成全邵飘萍，使他成了名人。邵飘萍这样的人，应该列举他敲诈不遂，挑拨政潮之种种事实，归结起来，判他一百个死刑，执行一个死刑，使他永世不能翻身才对。宣布他赤化，那才是愚蠢哩”。当天下午，他在中央公园遇见从前在国务院招待新闻记者、深知邵飘萍的人说：“在奉军下，一文不给他，他非穷死不可，何必枪毙。枪毙反是他的造化。”（同上，152页）张学良面对北京报界代表的再三恳请，也曾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转引散木书，34—35页）

龚德柏说：“邵飘萍、林白水这两个人，是鼎鼎大名被枪毙的新闻记者。有些不知道内容的人，还崇拜他们，以为他们为言论自由而死，而不



●邵飘萍手书

知他们是为金钱而死。”（《龚德柏回忆录》上册，110页）

这种说法诚然不能完全采信。作为邵飘萍的朋友，胡政之在1926年5月9日的《国闻周报》写下《哀飘萍》，其中说：“飘萍文采斐然，才气焕发，采访新闻，实具天才。”同时，他也不回避飘萍的缺点：“飘萍自视不同寻常，故居恒开罪于同业之机会甚多。……要其人行止不检，醉心虚荣，学养不纯，定识缺乏，以过人之聪明，居万恶之社会，操危险之职业，营逾分之生活，罹危致死，不外乎此。吾人为报界惜此奇才，又甚愿同业取为殷鉴，勿轻与人共恩怨，更勿忘俭以养廉之古训也。”（《胡政之文集》下册，1130、1130—1131页）

邵飘萍之死终究是以身殉报，为言论自由而死，胡政之称之为民国十五年来“中国新闻界空前之惨事”。

1912年3月14日，邵飘萍曾在《汉民日报》撰文：“春气渐暖，柳芽桃蕊争媚湖山，又来雪影几痕，便添出好诗无数，但雪中鸿雁，嗷嗷无声，吾辈快活，他们越苦，言念及此，不禁为之凄然。”4月10日，袁世凯的代表张某来杭，他在时评中感叹：“若曰苏堤垂柳，大好湖山。张先生所见之而欣然慰者，正吾人对之而凄然欲涕者耳。呜呼！”他执笔之时在意的总是民生忧患、制度健全。他常念叨“阳光一缕，抵得万句共和”。如何使新生的民国变得名副其实，这是他十五年报业生涯中一刻也不敢忘怀的。我写下此文时，西湖边梅花已谢，桃花、玉兰花开得正盛，登临吴山或孤山，漫步西湖，面对同样的“苏堤垂柳，大好湖山”，人们想起的大概多是苏小小，是古往今来文采风流的文人墨客，是奢靡显赫、享尽人间荣华的帝王将相，不知道还有几个人能想起新闻史上曾光焰万丈的邵飘萍？

主要参考书目：

1. 方汉奇主编，《邵飘萍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
2.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3. 《李思浩生前谈从政始末》，《文史资料选辑》1978 年第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合订本。
4. 散木，《乱世飘萍》，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 年版。
5.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6. 龚德柏著，《龚德柏回忆录——铁笔论政书生色》上册，龙文出版社，2001 年版。
7. 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第十五篇

“纸头敌不过弹头”

——史量才为守护“报格”而死

1901年，20出头的松江秀才史量才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西湖畔金沙港的杭州蚕学馆（浙江理工大学前身）求学。这是杭州太守林启创办的一所新式职业学堂，1898年春天在关帝庙旧址上开学，与求是书院、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并称为四大新式学堂，史量才有幸成为第二届学生。1903年秋天，他在蚕学馆毕业，与30亩弥漫绿意的桑园依依告别。少年量才在西湖呼吸到新学的空气，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杭州成为他人生的新起点，他在西湖留下了自己年轻瘦削的身影。包括他自己在内没有人会料到，他以后将踏上一条陌生的新闻报国之路，更没想到杭州的青山将是他的埋骨

之所，西子湖畔还会留下一处“秋水山庄”，让后人空对着昔日琴声笑语的庭院，重温他当年留下的诗句：“案上横琴温旧课，卷帘人对牡丹开。”

史量才最初的理想是教育救国，有志于办学，1902年他从杭州放寒假回家，就在家乡江苏松江泗泾镇倡议办一个新式小学堂。虽然困难重重，但在他的热情奔走下，“私立养正初级学堂”居然诞生了，其时杭州有一家“养正书塾”（今天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毕业后，他先到上海王氏育才学堂担任理化教员，1904年就



●史量才

赤手空拳开创了“上海女子蚕桑学校”，因为经费匮乏，他继续在其他学校兼课。辛亥革命前，他在被誉为“知识阶级宠儿”的《时报》做兼职编辑，然后又做了专职编辑，开始接触近代报业。他曾热心参与一波接一波的立宪运动、保路运动等，1905年，张謇、黄炎培等名流在上海成立“江苏学务总会”，他成为其中的骨干。《时报》的“息楼”那时几乎是个上海新闻界、教育界、商界精英高谈阔论的中心，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他就是座上客之一。青年史量才这个时候开始初露头角，显示出实际的才干，受到状元实业家、江南立宪派领袖张謇等人的赏识，“量才”的名字还是张謇给他改的。他和陈英士等革命党人也有来往，上海独立后他一度受命主持清理上海海关并任松江盐务局主任。

史量才生命中最大的变化发生在1912年秋天。9月23日，在张謇、赵凤昌等人的支持下，他以12万元的代价，从席子眉、席子佩兄弟手里买下老牌报纸《申报》，10月20日正式办理移交，他出任《申报》总理。英商创办于1872年、已有40年历史的《申报》从此迈入一个新阶段，他也从此走上一条新闻报国的道路，这一年他32岁。黄炎培曾这样说，史量才“独着眼社会事业，以为一国之兴，文化实其基础；而策进文化以新闻为先锋”。胡政之称他为“新闻界中之敏腕家，而热心家也”。正是在他手里，老《申报》才得以发扬光大，成为望平街上撼不动的“巨无霸”，举国舆论的重镇之一，创造出《申报》的黄金时代。名垂新闻史的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人都曾是《申报》的记者、编辑。

1912年史量才接办《申报》之初，日发行量不过7千份，5年后（1917年）达到2万份，此后稳步上升，1920年是3万份，1925年突破10万份，1926年突破14万份，1932年超过了15万份。从袁世凯当政到蒋介石浮出水面，《申报》以独立的民间报纸角色，做天下之公器，史量才力图把这份报纸办成后人眼中的“史记”，留下真实可信、永远无愧的记录。他的作为不仅受到读者和知识界的肯定，也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1921年双十节前夕，大半生从事新闻事业的美国总统哈定特地致电《申报》祝贺。同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每日邮报》主办人北岩爵士访问申报馆，高度评价《申报》——“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馆、敝报

差足与选……”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申报》确实无愧于这样的赞誉,无论面对皇袍加身的袁世凯,还是大小飞扬跋扈的军阀,乃至国民党政权,史量才和《申报》都没有低眉顺眼过。1927年后,他拒绝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所派员进驻报馆。1932年,国民党中宣部提出要派员进驻报馆,他如此回敬:“《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津贴,倘若政府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将《申报》停刊。”他还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申报》从无政府派员指导,照样深入人心,以致人们将报纸称为“申报纸”。他起用青年黎烈文改革《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发表鲁迅、陶行知等人的大量杂文、评论,国民党当局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换掉黎烈文,他的回答是:“《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他当面对吴醒亚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

据说,蒋介石与史量才之间有过这样一番对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是徐铸成《报海旧闻》中的说法。

另一个不同版本来自黄炎培《八十年来》的回忆。有一天,蒋介石召

●史量才和蒋介石等人的合影



史量才和他去南京，本来谈得很融洽，不料临别时，史握着蒋的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他记得这是停邮风波前的事。

第三个版本是，有一次，在南京国民党要人款待史量才的盛宴上，席间有人故意宣传当道的威力，说有雄兵千万，足以安内攘外。史不以为然，嘲弄说：“我只能在报言报，约略估计，有数千万读报者拥护。”合座为之默然。这是冯亚雄的回忆。

1931年11月8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将17位上海各界领袖召到南京，《申报》的报道称：“蒋主席为征询民众对和平、外交、建设各项问题意见，特派黄仁霖来沪邀各界领袖赴京。”黄炎培这一天的日记说：

上海被邀到者连余凡十七人，十时蒋到，谈至十二时半。

午餐于励志社。……

夜，蒋邀餐于其家，餐毕长谈……

在《申报》禁邮事件之前，黄炎培、史量才同到南京见蒋长谈唯有这一次，对话应该就在此时。被邀的17人来自报界、银行界、实业界、出版界、教育界，虞洽卿、王晓籁、张公权、刘鸿生、穆藕初、陈光甫、王云五、黄炎培、徐新六、钱新之、林康侯都在其中。蒋介石和17人合影时，站在前排中间的赫然是史量才，与蒋并列。几天后，黄炎培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记着：“夜，自宁回沪诸人会餐于量才家，商大局。到者洽卿、晓籁、康侯、新之、公权、光甫、鸿生、藕初等。”（日记整理者在“自宁回沪”后加了逗号，显然有误，此前8日的日记明白地写着他自己“夜车回沪”。）

枪和笔之间的这一次对话惊心动魄，手握申、新两大报纸、负一国舆论重望的史量才，没有理由不自信，但他没有察觉到他将犯了枪杆子的大忌，从此将成为权势者眼中的钉子。很多年以后，连杭州一位叫丁云川的老人听说这番对话，都要发出如此的感叹：“有骨气啊，可惜纸头敌不过弹头。”



●《申报月刊》上的蒋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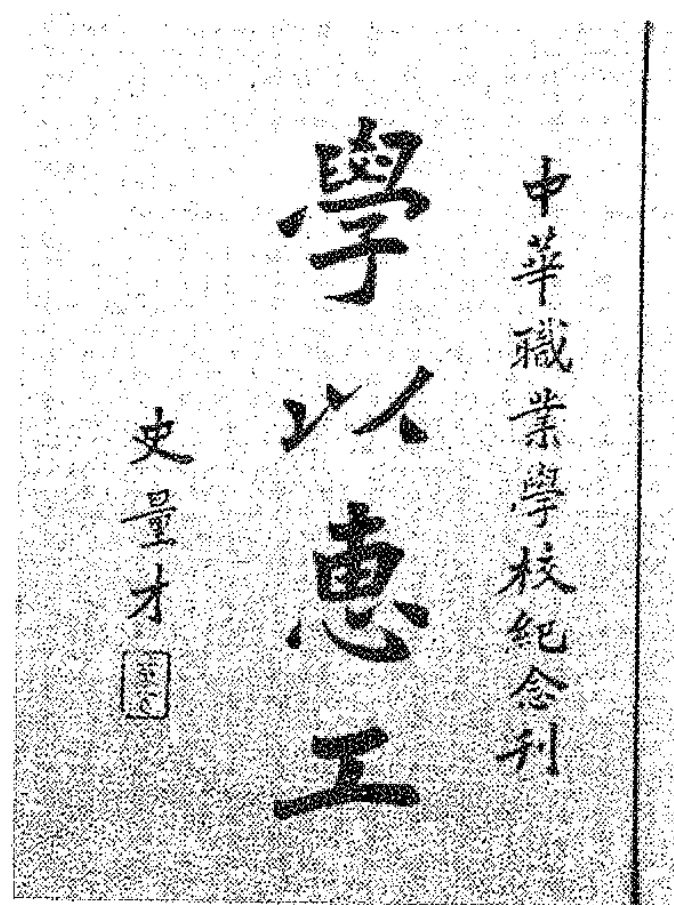
当然，蒋介石和国民党权贵们对史量才与《申报》的不满也是逐渐累积起来的。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一度下野。离开南京前夕，蒋秘密下令枪决了著名的“第三党”领袖邓演达。20天后，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在悲愤交加之中起草宣言，直斥国民党不再是革命集团，蒋介石专制独裁。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公会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12月20日，《申报》和上海各日报（除《民国日报》外）几乎

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宋庆龄的这个宣言，蒋介石在奉化溪口的恼怒可想而知。

“九一八”事变以来，面对山河破碎，危机日近，史量才以上海头面人物的身份积极介入各种重大的社会事务，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敬重。1932年1月18日，上海银行家、实业家们为了与南京政权博弈而成立的壬申俱乐部，他被推为理事长。1月31日，在“一二八”事变中诞生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推他为会长，6月改为上海市地方协会时，他继续推为会长，国民党在上海搞临时参议会，也以他为会长。可以说，他成了上海当时不可替代的中心人物，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影响、声望与日俱增。对于“一二八”地方糜烂时的挺出，他说过：“事已至此，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年近花甲，行将就木，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耳！”

与此同时，《申报》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明确提出“不徘徊、不推诿、不畏缩”，“努力于应负之责任”，从新闻、评论到副刊，《申报》都站在了“时代前面”。1932年6月到7月，《申报》连续发表三篇时评“论剿匪与造匪”，尖锐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

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7月，《申报》接连发表有关中央大学学潮的报道和评论，披露教育部长、原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3万多元水灾捐款的丑闻，因此被告发到蒋介石那里，导致“禁止邮递”的惩罚。这是国民党当局对史量才的一次严重警告，目的就是要逼他就范，但史量才没有弯下腰来。35天后经过交涉、折冲，在不损害报纸独立性的根本前提下，他做了一些人事上的妥协，得以恢复邮递。为此，他写下这样一副对联：



●史量才手书

物不变更则质不纯；人不涉难则志不明。

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在杭州返回上海的路上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有组织的暗杀，地点在海宁翁家埠。龚德柏回忆录说：

在史量才被刺前一日，史曾托人向某方面疏通好了，允不执行，并即电告在杭之执行人员，暂缓执行。但该执行人于先一晚饮酒大醉，当晚未能译电，次早亦匆匆就道，赴京杭国道途中，等候史之汽车经过。亦未暇看电报。待其执行回来再看电报，而史已死，无法挽救了。这是一说。

又据与执行人员有关者告我，执行人员于就道时，始接电报，认为执行命令事大，看电报事小，故将来电置之衣袋内，即乘车而去。待其执行回来再行译电时，已无法挽救了。（《龚德柏回忆录——铁笔论政书生色》上册，龙文出版社，2001年版，228页）

一代报业巨子遇害的消息传出，一时舆论大哗，全国上下震动，有人



●《申报月刊》的悼念史量才特辑

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法律是什么？枪杆是什么？人民的生命是不受保障的，这不单是报界的悲剧啊！”蒋介石下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督饰军警，悬赏缉拿”，悬赏1万元。最后，找到了一些线索的鲁涤平却在1935年3月15日不明不白地死了。

死本寻常，忍一刹那痛苦，有舆论在，有事绩在，亦复何憾；

生逢多难，综三十年贡献，为国家惜，为社会惜，敢哭其私！

这是他的挚友、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当年11月15日写下的挽联。

艰难时大可有为，漫说西子湖边雌伏；
谨厚者亦复至此，如闻天津桥上鹃声。

这是法学家、时在上海开业做律师（曾代理史身后析产案）的张耀曾写成而未送出的挽联，因为担心“不免伤时”。史量才生前，他们因推动宪政、抗日等公共事务有过数面之缘，他私下在日记中称史“尚为读书人”，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呜呼！以旷代之逸才，遭飞来之横祸。……秋水庄寒，一别千古。天耶？人耶？莫测其故。

这是实业家穆藕初笔下的《史量才像赞》。

12月1日，杜重远写信给远在重庆的卢作孚：“此次史公量才之死，弟受若大影响。沪方狠难找一相当中心人物。”

有关，等等。但这些都没有可靠的证据。曾在《申报》做过3个多月编辑、因被解聘对史量才不满的报人龚德柏说，“因《申报》被共党利用，成为反政府政策的急先锋，而触怒某方面，致史量才丧失其生命。”他认为，主要是《申报》激烈的抗日言论与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冲突，史量才“聘请假日本通、真共党傀儡陈彬龢主张抗日，终于送掉史量才的命”。（《龚德柏回忆录》上册，229、232页）

军统特工沈醉说：“我所了解的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再加上他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于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169页）

1931年12月，中共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从上海秘密抵达江西苏区，1932年2月中旬，上海的报纸上出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经用过的化名）。3月4日，上海地下党组织以重金“聘请”《申报》法律顾问、外国律师巴和，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在《申报》“临时专刊”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表示周曾用“伍豪”的别名投稿，报载所谓“伍豪”等243人脱党启事，“实与渠无关”。这个声明在《申报》发表前，国民党有关方面曾警告史量才《申报》不应刊登，他断然拒绝：“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然而，迄今我们还没有看到史支持中共地下党经费的史料依据。1934年10月5日，离他遇害不久，将要去杭州休养前，史量才曾对俞颂华等说自己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俞颂华《忆史先生》，原载1934年12月5日《申报月刊》第3卷第12号“追悼史总经理特辑”）上海英文《泰晤士报》发表的评论称他“从未与闻政治党派之事务”。

但他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倒是事实。史量才与宋庆龄关系密切，“一二八”事变时，他曾应宋的要求给十九路军募集巨款，他们一同创立了伤兵医院。民权保障同盟是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的，现在有人考证说同盟有共产国际的背景，内幕很复杂，尽管如此，在

国民党统治下要求保障民权的正面意义还是否定不了的。《新闻报》记者陆诒回忆1932年12月29日第一次见到史量才，就是在民权保障同盟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史量才即席发言，“……严正抗议当年因《申报》报道‘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邮递达三月（按：应为35天）之久，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

此后，他又在好几次民权保障同盟的集会上遇见史量才，“每谈到保卫言论自由时，他必慷慨发言，坚决反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

另一位在场的《新闻报》记者顾执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最令我对之产生深刻的印象和刺激者，莫如《申报》主人史量才的发言。”

正当54岁盛年、身体健康的史量才以言罹祸，他的死为那个时代的言论空间写下了一个弥漫着血腥气的注脚。人们普遍相信他是为报纸而死的，他曾说，“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夕阳西沉，史量才被杀整整18年后，黄炎培重游杭州，徘徊在西子湖边，昔日史氏的别墅“秋水山庄”依然，而斯人已歿。黄氏情难自已，赋诗一首：

一例西泠掩夕曛，
伊人秋水伴秋坟。

当年壮语成奇祸，
缟素词坛十万军。

我所知道的“秋水山庄”，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属于“新新饭店”的一部分，平时总是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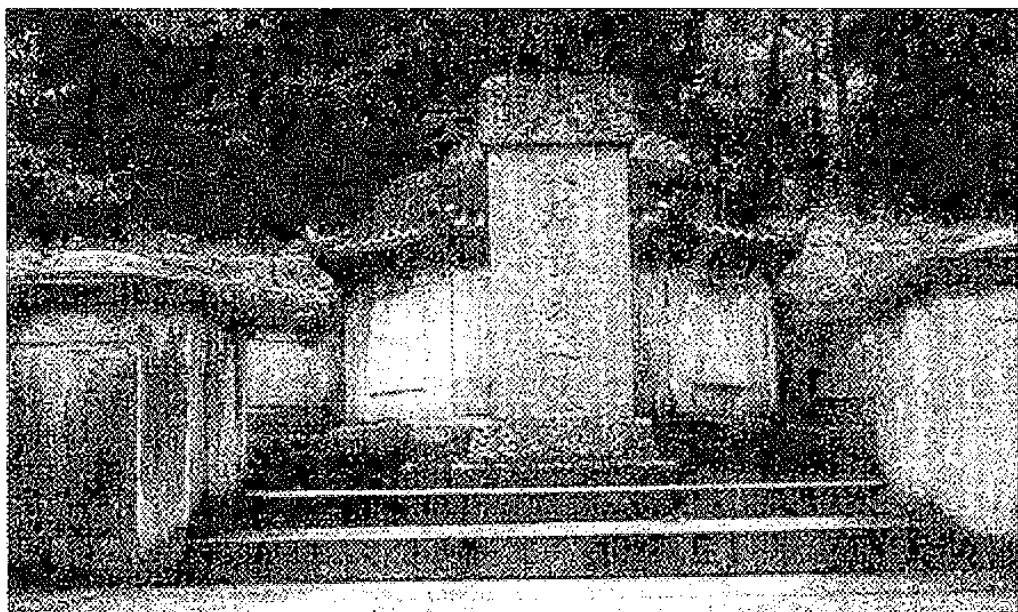


●秋水山庄

禁闭。我虽然经常从大门口经过，却都是过其门而不得入。“山中岁月无今古，世外风烟空往来”，单是从它处于葛岭脚下、面临西湖——风景独好的位置，我们也不难想见史量才当年和心爱的二夫人沈秋水（原名沈慧芝，据说她出身青楼，以重金倾囊襄助他买下《申报》）那一段美好的神仙眷侣生涯。他喜欢早年求学的杭州，《申报》专门办有杭州专刊。在忙碌之余他总会想到西湖边来休息一些时光，他唯一的儿子当时也在杭州的之江大学就读，他还是这所教会大学的校董、捐款人之一。可惜好景不长，1934年11月13日，“秋水山庄”琴弦折断，琴声戛然而止，沪杭道上训练有素的枪声击穿了如歌的岁月，从此，对沈秋水而言，“秋水山庄”的晨昏月夕、花前月下的生活都成了人间绝唱。失去史量才之后，一座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秋水山庄”不过是一个空空的庭院，花草最好，西湖的月色最美，对她也了无意义，据说她再也没有回来住过。

2004年春天，我曾和相识、不相识的一批男男女女穿过弯曲泥泞的山路，去寻找史量才之墓。当时正是杨梅熟时，有杨梅被风雨打落在地上，路边还有诱人的野草莓，我们一行或捡、或摘。史量才墓在幽静的山坳，枕山面涧，庄严、气派、整洁，墓碑上“史量才之墓”几个大字铁划银钩、笔触有力，背后的墓志铭为章太炎撰、陈陶遗书、沈恩孚刻。一位叫钱九斤的村民当年只是一个小孩，从造墓到下葬都看到过，他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墓（听说花了3万5千块银圆），第一次目睹如此隆重的葬礼，他就跟着在墓前跪拜，谁知史夫人（不知道是不是沈秋水）给了他一块银圆，其

他的小孩看见他得了银圆，也纷纷去拜，每人得了一块银圆。就是这位小孩六、七十年后给热衷寻访名人墓地的丁云川带路，那是2001年的春天，通往史量才之墓只是砍柴人走的小路，而且被青草掩埋，隐约还有什么动物的脚印。



● 史量才之墓

夕阳西下，当丁云川站在墓前鞠躬时心里生出了一些感慨：“钱九斤一辈子大概没有看过几张报纸，可是他记住了史量才；一个农村老人和一个报界巨子，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命运中居然有一个重合点。”（《丁布衣寻墓记》，载《杭州日报》2005年1月11日）

其实，哪怕“史量才之墓”已无处可寻，哪怕没有了“秋水山庄”，后世的人们也将长久地铭记史量才留下的名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那年春天，细雨迷濛中，我们一行曾在史量才长眠了近70年的墓前大声地喊出这12个字，伴随着青山的回音，空谷的回音，松涛的回音。

主要参考书（篇）目：

1. 庞荣棣，《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庞荣棣，《申报魂——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图文珍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
3. 《黄炎培日记》第4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4. 冯亚雄，《〈申报〉与史量才》，《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5. 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真相》，《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
6. 沈醉，《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7. 《龚德柏回忆录——铁笔论政书生色》上册，龙文出版社，2001年版。
8. 《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9.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10. 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 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12. 《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
13. 《丁布衣寻墓记》，《杭州日报》2005年1月11日。
14. 庞荣棣《史量才事迹补》，《江宁春秋》第十辑，江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1991年印。

第十六篇

陈布雷为何“悔之晚矣”？

1934年冬天，陈布雷刚在浙江省教育厅长位置上卸任，在西湖小莲庄休养。一天夜晚，杭州《东南日报》记者黄萍荪来访，问及当年他在上海《天铎报》写的文章哪篇最具代表性，他的回答是一篇写于辛亥革命之际的社论，题为《钱镠弩，鸱夷血，呜呼寂寂！》。第二天，他给记者抄送了这篇20多年前的旧文，一共不过千字，却情文并茂，殷殷以民族大义、利害关系，敦促浙江新军迅速起来响应武昌起义，几乎是公开的策反。以后，黄萍荪曾当面向这位尊敬的新闻界前辈提问：“当时写这样的文章，是要担很大的风险的，你不怕像邹容一样结果吗？”陈布雷轻轻地抚了一下脖子，笑着回答：“它不是长得好好的吗？老实说，当记者总是徘徊于拼命与保命两条路线上的，执其两端是不可能的。诚然，早于我的太炎先生之入狱，邹容吾小弟之瘐死，邵飘萍、林白水的被杀，都属于拼命一类的，但形势的推动，血气的腾涌，实为主导，可不慎乎！”

浙江是陈布雷的故乡，1890年他出生在浙江慈溪西乡官桥（现在属于余姚），原名训恩。1906年起他经过考试插班进入浙江高等学堂。初到杭州，他曾在族人经营的张同泰药铺住过，这家百年老店历经无数的风雨沧桑，如今还在离我家不远的中山北路上开门营业。在浙高，他和邵飘萍、邵元冲、祝文白、郑晓沧等同学趣味相投，他们经常到国文老师沈士远那里借阅《复报》《民报》《新世纪》等清廷查禁的刊物，他对老师说：“这些报刊上的政论文章，流畅有力，说理透彻，论事气壮，是从八股与古时议论文中解放出来的新文体，清新可诵，感人至深。”地理老师张宗祥对他们也有影响。

在浙高，有些由日本籍教师教的课，不用课本，讲义由学生自编。陈布雷曾担任过生理学讲义的编辑、誊印、装订工作。他以后回忆：“这样将听、记、写、编四者合一，实为新闻记者所必备。教师讲，学生记，写出来，编成书，再刻钢板，印成讲义，其过程无异报纸的采编、发排与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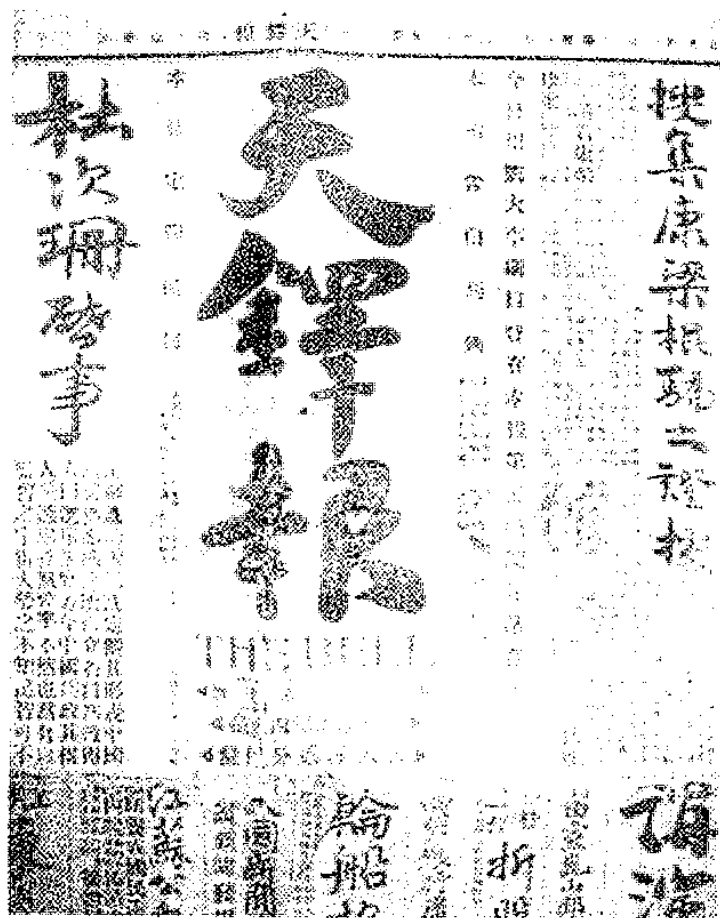


●张同泰

1908年春天，杭州各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有3千学生参加，在图画老师包蝶仙的指导下，陈布雷、邵飘萍这几个后来在中国新闻史上放过光焰的人物办起了一份油印小报，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早的报纸。他自述：“从编印油印讲义到编印油印新闻纸，算是我第一次从事采、编、印、发合一的新闻工作。”

陈布雷真正的报业生涯开始于辛亥年，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那年春天他浙高尚未毕业，路经上海，暂住《天铎报》，主笔戴天仇要回乡结婚，请他代写评论。因为他此前给《天铎报》投过稿，戴天仇知道他文笔犀利，中英文都佳。因此缘故，当年秋天，他于浙高毕业，即应《天铎报》之聘担任撰述，每天撰写两则短论，每10天写3篇社论。由于他平日看的旧小说多，评论中喜欢引用《水浒传》中的典故，很受读者喜爱。这年他只有22岁。同事要他起一个笔名，他就署名“布雷”，并解释说，这是他在浙高读书时同学对他的戏称，当时他面颊圆满，同学就叫他为“面包孩儿”，面包的英文为Bread，译音“布雷”（他记得最早是邵飘萍这么叫的）。同学汪德光说他好撰文字投报馆，以“布鼓”自拟，署名“布雷”也很有趣。从此他就以这个笔名闻名于世，本名“训恩”反而被湮没了。九指头陀有诗赠他：“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

陈布雷初入报界就结识了时为《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一度交往密切。



●天铎报

当时上海报纸少见国际时事评论，只有对国际局势洞察幽微的宋教仁，常在《民立报》发表这方面的评论。他也常在《天铎报》撰文呼应。

武昌枪响，陈布雷欣喜无比，他早在故乡慈溪就组织过反清的“覆满同志社”，推崇秋瑾是“女中英豪”。革命初起，前路未卜，《天铎报》总编李怀霜主张慎重，不敢称起义者为“义军”，当时各报也是称“逆军”的多，陈布雷认为不可附和他们，就称为“革军”，并在报上连续发表《谈鄂》系列评论，一共10

篇，传诵一时，“布雷”之名溢于沪杭一带。《天铎报》发行量达到4000份，几乎可以与《神州日报》《民立报》《时报》《新闻报》并列。

陈布雷的堂哥在革命浪潮中成为宁波军政府的财政部长，将他召回故乡，但他马上返回上海：“我志在做记者，还是让我回沪从事新闻工作吧。”

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告友邦人士书》，稿子是用英文写的，王宠惠带到上海，想在报纸上发表，一时找不到翻译，交陈布雷试译一段。他的古文典雅、准确。王认为不失原意。于是这篇《告友邦人士书》成了《天铎报》的独家新闻。《民立报》的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乃为《天铎报》抢去先登，可惜可惜。”

年轻的陈布雷借助《天铎报》这个平台，为新生的民国鼓与呼，在题为《新国民不可不知》的短评中他说：“今日之中国，不贵有细针密缕之法律家，而贵有雄才大略之政治家。”在《袁世凯听者》文中，他直斥“袁世凯尔，真无耻小人哉”。此时，戴天仇自办《民权报》、叶楚傖等办《太平洋报》、邵元冲等办《民国新闻》，纷纷约他襄助，《申报》也请他担任撰译，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报纸应转向鼓吹建设，而不是像革命时期那样致力于批评。家中亲人也不希望他以记者为职业，他在《天铎报》前后工作5个月，然后回故乡宁波效实中学任教，直到1920年

才重回上海新闻界。不过他从来没有忘记新闻事业，除了给上海《申报》当特约译述员，一度还兼任宁波《四明日报》的撰述。

1920年，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参加《韦氏大字典》的编译，正值《商报》创刊，他再次踏入报界，任《商报》编辑主任，负责撰写评论，每周5篇，星期天再写一篇短评。《商报》是一家商业报纸，有商业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思想的栏目，以及副刊“商余”等，最引人注目的却是陈布雷执笔的那些时评。他的文章议论透辟、文笔犀利，深得读者喜欢，被张季鸾叹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1921年12月18日，他在《靳内阁总辞职》评论中尖锐指出：“故此仆彼起，无非鸡虫得失之争，于国事何关？于人民何益？”在12月20日发表的《翻云覆雨之政局》中，他进一步说：“中国者，民国也。国既以民为主，而人民对此纷纷扰扰之政局，竟始终不相闻问，帝制之酝酿、复辟之鼓动、安福之捣乱，国人之中未尝不有早已窥见其微者，乃一般之国民袖手旁观而不问也。……故中国之坏，坏在人民坐观成败，而未尝出其自身固有之能力，由自己防卫而进于自己建设，徒抱消极的态度相与俯仰一世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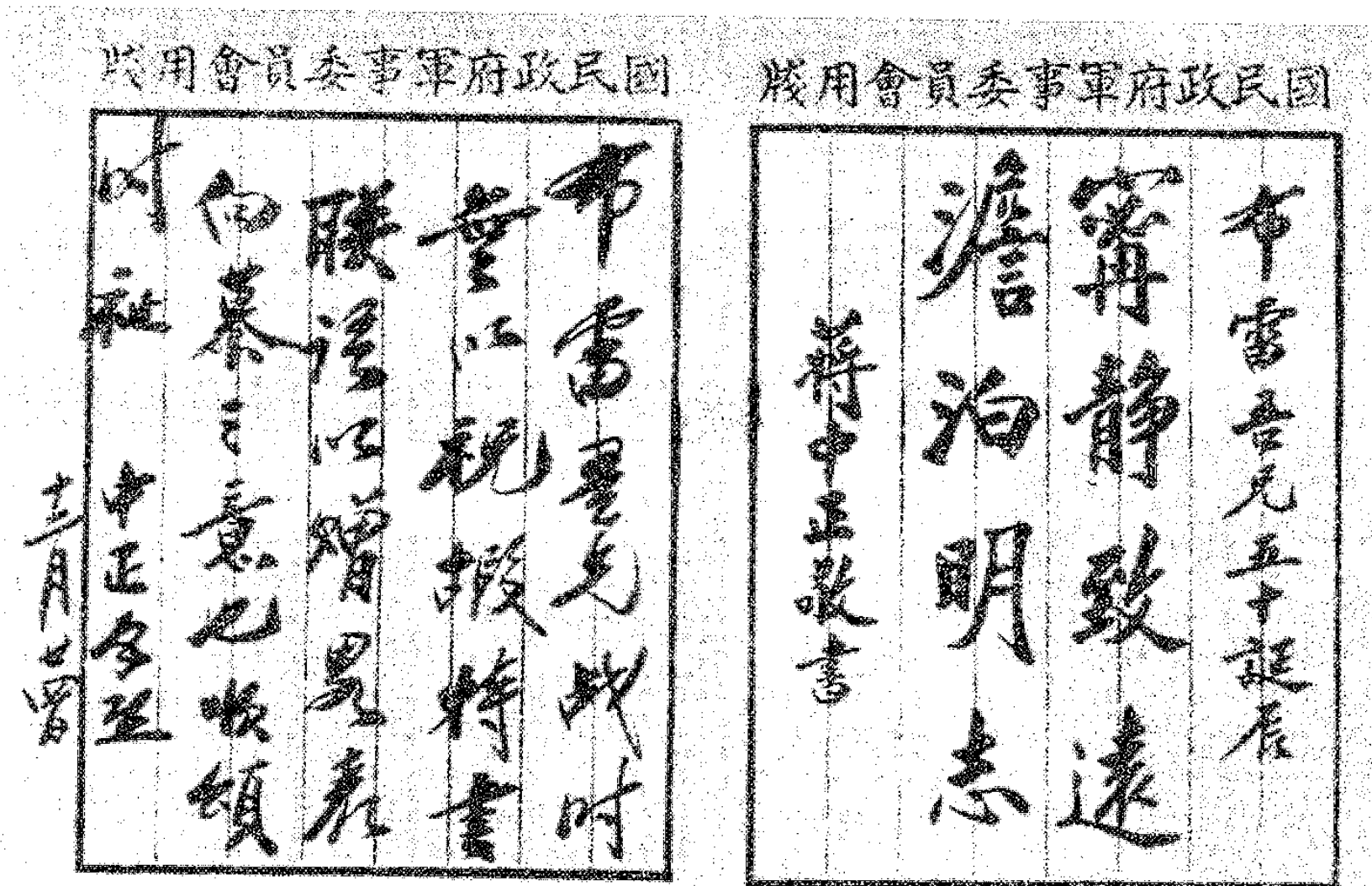
1923年，《商报》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开始使用“畏垒”的笔名，熟悉他的芝翁回忆：“他在编辑部里撰写时评，连续不断吸香烟、喝浓茶、吃馒头，这三件东西下了肚，他的掷地有金石声的文章也跟着完成了。有人因他直言不讳，怕惹上麻烦，而劝他不妨用曲笔，他说：‘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他不惮军阀的强势，对于当时发生的大事，如曹锟贿选、孙传芳由福建举兵进入浙江等，都曾发表旗帜鲜明的反对文章。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上海《时事新报》评论说：“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他马上在《商报》发表评论《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予以驳斥。目击英国巡捕在上海杀害中国工人的惨剧，他热血沸腾，他在五卅运动中的文章议论之所以能深得人心，就是因为有感情，有见解。他自述：“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与公展每日注视事态发展，间或亲至各团体访问消息，交换意见，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共产党主办的《向导》曾转载他的《商报》评论，肖楚女等共产党人给他写信，希望他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力

量。但这与他联合各阶级的力量推倒军阀、争回主权的全民革命思想有距离，因此他没有回复。胡政之主办《国闻周报》，请他每周写一篇时评，月酬金 50 元，他倒是答应了。

他的时评渐渐成熟，自信心也加强，于政治之外，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以及工商等问题，受到一般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喜欢。期间，他因为言论得罪租界当局，曾被传讯、罚款。《商报》的发行量达到 1 万数千份。郭沫若推崇这一时期的陈布雷，“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叶恭绰对陈布雷也很推许：“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寥寥不多得，其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这句话传到他的耳朵中，他在病中不胜惶恐、也不胜安慰：“余自以为文字识解，在南不及张一苇，在北不及颜旨微、陈博生，而叶君推重如此，可为愧悚也。”张一苇就是后来《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1922 年，他们对于中日山东问题直接交涉案观点不同，有过一场笔战，却彼此倾慕，并从此订交，终生不渝。

1926 年元旦，当《商报》创刊五周年，布雷执笔写下《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时，只有 36 岁，已誉满报界，他满怀信心以新闻事业终一生。然

●蒋介石赠陈布雷



而，《商报》很快就走到了它的尽头，虽然发行 1.2 万份，却因经济拮据，几次易主，这时已转到以亲孙传芳的傅筱庵为靠山的方椒伯之手。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商报》以大字号标题详细报道，报社一些董事认为开罪军阀吴佩孚，很是惊慌，傅筱庵派人来审查新闻和言论。陈布雷正好请病假，他抱病出来，“一切由我负责，如要另外派人，等我病愈后面商，此时派任何人来编辑部，使报纸解体，我就概不负责了。”

此前，蒋介石曾托邵力子给他送来签名的戎装照，表示仰慕之意，自称“弟蒋中正”。1926 年冬天，蒋又托人邀请他去南昌，再次表达了盼望见面的诚意。陈布雷的南昌之行，成为他报业生涯的结束，也是他整个幕僚生涯的序曲。

1927 年是陈布雷生命的分界线，从此他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 22 年，当然这 22 年实际上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 1927 年到 1934 年，他不愿当官，只是有时替蒋介石写写文章而已。他曾对熟人说：“我最初并没有想到丢掉自己的本行，所以只是有事就去南京住几天，经常还是住在上海，搞自己的新闻事业。”他辞谢了总司令部秘书长的任命之后，蒋曾问他愿意担任什么职务？他回答自己的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蒋的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所以，这一阶段的前期，他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笔政，撰写了大量评论，1929 年之后才脱离报界，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陶希圣在《记陈布雷先生》文中说：

他每次进南京，中枢就有一篇重要文告发表，而政局即为之转移。

他守口如瓶，持身谦抑。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说过任何文告草拟的经过与政治背景，甚至从来没有透露过任何文告是他执笔。但是他每次有由杭州到南京之行，政界与新闻界人士立刻推测政局将有变动与发展。看吧！大文章就要出来了吧！

第二阶段从 1934 年到 1948 年，他历任第二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教育部次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等一系列职务，官位并不显赫，却是蒋身边的红人，号称蒋的“文胆”。蒋深知他

的谨慎、廉洁和自持，对他向来尊重，他的进言都是从善意出发，蒋也多有采纳。1945年10月22日，他在重庆对杨玉清说：“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鲁迅全集》能在1938年顺利出版就与他和邵力子不无关系，鲁迅旧日学生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等人通融，邵不仅尽快做了审核，而且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鲁迅去世8年后，在重庆举行纪念活动，1944年10月19日的唐纵日记说，“晚上丙种会报，对于鲁迅纪念会事，（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归与（陈）布雷先生谈，布雷先生认为不应由中央社发布此项消息。布雷先生乃一极端慎重之人，所见亦远！”

在为蒋介石代笔捉刀的20多年中，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隐痛一直苦苦地折磨着陈布雷。用他自己的话说，笔在他的手中，说的却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他无一日不想着退出，终于退不出。这当中包含着他对蒋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他一直身体不大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瘦瘦的，看上去就是病怏怏的。在重庆，宋美龄每天给他送一磅牛奶补充营养。对此，他感激于心。学生时代的他“面孔是圆圆的、胖胖的，像个面包”，他在杭州对记者黄萍荪说：“我的瘦下来是从事新闻工作后，因熬

夜而渐起的。”

1931年，他在南京，“意常不乐，每思引退，重作记者，或教书自给”，所以连房子也不想租，而住在旅馆里。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提到重返新闻界，去做他的记者，当然，实际上做不到了。他身上有浓重的“士为知己者死”、“从一而终”思想，抗战时期，他在写给《大公报》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这种内心的挣扎、痛苦最终导致他在大厦将倾时选择自杀。



●陈布雷

陶希圣在回忆文章中说，陈布雷起草的每篇文告，意思都是蒋介石的，蒋对于文告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为此布雷“竭尽了脑力和精力”，不仅要保密，还有字斟句酌的细密。当然，在山河破碎的抗战时期，他代蒋起草的文告中也有他的得意之笔，其中蕴涵着他自己的爱国之情，所以文字淋漓，笔墨酣畅，如《抗战建国纲领》《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胜利须赖久之奋斗告全国军民书》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作，也成了抗战的历史文献，他特别得意的是1938年7月在武汉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

……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黄帝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我中华民族消灭的……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拼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如果我们今天还不下“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的生存”的决心，就要蹈从前以苟安心理来鼓励侵略疯狂的覆辙。

全文6000字，由5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同时海内外许多报纸都在头条刊出。此文和张子纓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郭沫若起草的《抗战周年告日本国民书》被誉为“三联璧”。他在回忆录中说，此文蒋介石没有口授大意，并且引录了张季鸾的评价：“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相反，那些强逼、硬编出来的文字，比如《西安半月记》，不知戳断了多少毛笔，熬断了几许青丝，文章更是干枯，不堪卒读。1937年春天，蒋要他写一本《西安半月记》，他本来随蒋住在奉化溪口，却怎么也写不下去，蒋于是让他到杭州去写。在里西湖新新旅馆包了一个房间，在这里，他常常难以下笔，心情烦躁，经常将笔头戳断，掷笔长叹。他在日记中说：“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待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与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

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终日面对西湖，美丽的湖光山色却怎么也驱不走他心中的难言隐痛。

1941年，郭沫若50岁生日时，陈布雷在贺信中说：“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贺诗中也有“文士心情脉脉通”之语，确是语出真诚，不是客套。郭沫若的答谢诗中也有“湖海当年豪气在，如椽大笔走蛇龙”的句子。然而，陈布雷身上的豪气早已消磨殆尽，再也没有笔走龙蛇、大显身手的机会了。

他后半生的痛苦和矛盾，内心的复杂、挣扎不断地流露出来。1946年3月，他写信给外甥翁泽永说：“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不只是书记生罢了。”他回到新闻界的冲动从来没有终止过，1940年，他在《商报》时代认识的晚辈程沧波离开国民党《中央日报》，到监察院做官，他在“九一”记者节那天写长信给程，为重庆少了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而惋惜。1947年，程辞去江苏监察使，专办《新闻报》，他又专门写信道贺：“兄今真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矣！”程固然成不了真正独立、自由的记者，但他内心对记者生涯的向往是真诚的。程回忆，1939年11月，在重庆为陈布雷庆祝50生日，饭后有人提议陪他雀战一番，自他离开记者生活后，就极少有此娱乐。银行家钱新之提议，由张季鸾、邵力子、程沧波陪他，戏称“四位记者打麻雀”，推老记者于右任观战，打了八圈，再喝咖啡谈天。那天晚上，陈布雷的神情“真是和谐而愉快”，多年未见他那样“轻松而活跃”。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陈布雷追忆往事，季鸾曾一度北上短暂离开新闻界，他很着急，写信劝说：“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季鸾回信说：“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最后，季鸾以言论报国终其身，而陈布雷没能做到，所以他说自己“愧负死友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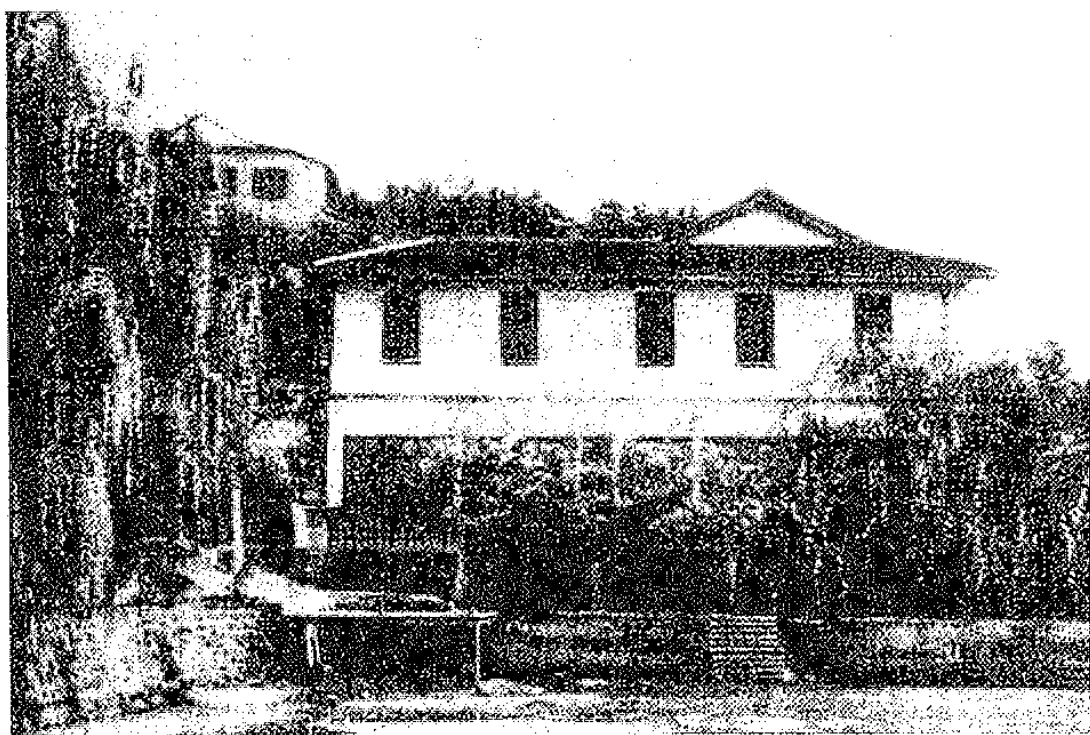
陈布雷对王芸生说：“其实，我开始是从事新闻记者生涯，现在也未忘情于此。”直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前夕，他还感慨无限地对沙孟海说：“我只想搞新闻事业，或者搞教育，从政非我所愿啊！”总之，他时时不忘重理

旧业。1949年1月,《陈布雷回忆录》手稿本在上海影印出版,他的妻子在“前记”中说得很清楚:“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夙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及中日战起,感于国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轻弃帆楫?乃屏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战胜利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乃时时引咎自责。……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然而,他重返新闻界的愿望终究只是一个梦而已。

1947年6月,陈布雷在南京对《文汇报》的徐铸成说:“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但是,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到了1948年,他就没有这样乐观了。他在回答宁波同乡、立

●陈布雷与家人





●陈布雷在杭州住过的地方

法委员毛翼虎时，用缓慢低沉的语气说：“‘势力’两字要分开来，势是形势、力是力量。论‘力量’，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形势’这个词。”毛认为陈布雷已看到了总的“趋势”。在他身后仅仅几个月，

南京城头就插上了红旗。一个一心向往着文章报国的读书人却做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幕僚，并最终为之殉葬，这是大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和邵飘萍被枪杀、史量才被暗杀一起贯穿了动荡不宁的乱世中国。言论报国的代价是那么沉重，然而舍弃言论事业、做了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不轻，他常在家人和挚友面前感叹，“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是人生最苦恼的事。”所以他总想着有一天辞官。临死前不久，他还感叹：“我搞了大半辈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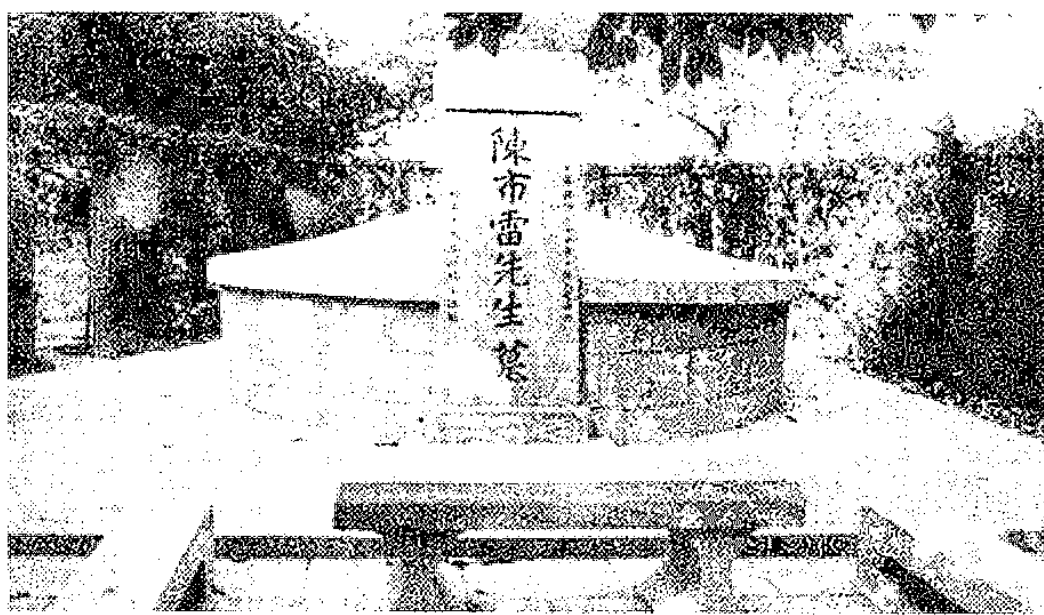
陈布雷在杭州度过了年轻的求学时代，曾两次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1932年到1934年，他在杭州度过了相对轻松愉快的一段日子，暑假里子女来杭，他会带他们出游，看电影。西湖的山水是他所熟悉的，他曾产生过退隐西湖的念头，对妻子表示：“宋代的臣子老了，可以退休，到那青山绿水的去处领一座寺院，颐养晚年。我颇想到杭州置买一块田地，不管价钱多高，为我退隐先作一点实际准备。”抗战胜利后，一生清廉的陈布雷用多年的一点积蓄，在杭州九溪十八涧徐村买了一小块地。也许他做梦都不曾想到过，自己退隐不成，这里倒成了永远的归宿之地。

1948年10月下旬，陈布雷的儿子陈过出国前夕，向父亲告辞，只见父亲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他哀叹着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

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11月12夜，“油尽灯枯”的陈布雷在南京黯然自杀前夕，留下了10封遗书，将公事、私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对于是否公布这些遗书，国民党高层曾有争论。11月17日，司法院长居正的日记中说，上午在陈布雷先生治丧委员会讨论遗言应否发表时，反对发表的以为他的自杀给蒋带来不良影响，留到相当时机再说。当晚中央常会讨论，也有主张不发表的。因为邵力子力主发表，如不发表他就要退出治丧委员会。结果决定发表。

他在留给夫人王允默的遗书中嘱咐：“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窆，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王允默当着宋美龄的面谢绝了蒋介石举行国葬之议，但她也没有遵照草草葬于南京的遗愿。她说：“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故乡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转引自王泰栋著《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25—26页）

浙大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说，当年11月19日下午2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海到达杭州，家属一二十人在车站公祭，然后步行执紼到四明公所，接受各团体的公祭。12月10日上午10点，竺可桢带着胡刚复、郑晓沧等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涧徐村参加陈布雷的葬礼，他们到时灵柩已将入穴，浙江省主席陈仪主祭，礼毕即散。这一天，天气阴霾，冬雨霏霏，穿着蓝布长衫的蒋经国在送葬的行列中，默默步行。陈布雷生前已觉察到了“势力”的消长和变化，他的“势力”论可谓一语中的，但除了选择自



●陈布雷之墓

杀，他已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死对他也许是一种解放。1949年4月23日，仅仅几个月后南京易帜，当时，蒋介石正在他的墓前凭吊，长江天险被突破的电报送达。5月3日拂晓，解放军的先头部队经九溪十八涧附近进入杭州，山河变色。这一切，与长眠在杭州萝卜山下的陈布雷都已没有关系，随他下葬的只有一支派克金笔、一本《圣经》。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 《陈布雷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版。
2. 《陈布雷回忆录》，廿世纪出版社，1949年版影印本，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二编之84。
3.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 程沧波，《沧波文选》，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版。
5. 《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6.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
7. 王泰栋著，《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遥想当年，西子湖头，暗夜微光，新学初兴，新任杭州知府的福建人林启一下子办出了三所新学堂，绵延至今，就是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杭州高级中学。然而，西湖孤山上的“林社”今天几乎已无人知晓，同是杭州太守，因为苏堤、白堤，健忘的人们记住了苏东坡、白居易，还加上留下杨公堤的杨孟瑛，而办学的林启却被遗忘了。

以一本《新青年》创造了一个时代的陈独秀早年就读于求是书院，邵飘萍、陈布雷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三人都是校友，后两人还是同学。《申报》掌门人史量才毕业于杭州蚕学馆。养正书塾后来就是著名的浙江一师、杭州高级中学，曹聚仁、丰子恺、施复亮、徐志摩等人都在这里走出。

从1897年林启办求是书院，到“别了，司徒雷登”，教育的影响何止百年，其功业足以藐视西湖边古往今来数不清的英雄美人、达官贵人。司徒雷登不是中国人，但他生在中国，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全部献给了中国，我在意的不是传教士的司徒，不是驻华大使的司徒，而是教育家的司徒、创立燕京大学的司徒，所以我把他归入教育报国的行列中。他们当中，毫无疑问包括了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经亨颐，最后的北大精神守护者马寅初……还有力倡平民教育的陶行知、晏阳初，推行职业教育的黄炎培。

在推动文明转型的进程中，恐怕没有比教育更根本、更具有决定性的了，从19世纪末的漫漫长夜中，张伯苓在天津初创南开，林启在杭州兴办三校，教育救国梦在几代教育家心中萦回不去。不仅蔡元培、竺可桢、司徒雷登、经亨颐、陶行知等广为人知的教育家，就是张元济办出版，也是旨在教育救国。卢作孚、穆藕初这些实业家，他们或年轻时做过教育报国梦，或始终没有放弃对教育的关怀。史量才在杭州求学时做的也是教育梦，虽然后来踏上了新闻报国路。张东荪当年办“学灯”传播新思潮，谈得最多的就是教育。在晚清的维新梦中，最后薪火不绝的也是京师大学堂、求是书院、南洋公学这些新式

学校。

教育是播撒文明种子最基本的手段，教育毁了，一切都毁了。我们读都德的《最后一课》，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异族入侵往往首先从改变教科书、国语入手。最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多少民族灾难，包括8年抗日战争在内，都未能毁掉多少知识分子抱持的炽热的教育报国梦，这当中甚至包括了司徒雷登兄弟这样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服务在中国的外国人在内。他们在血缘上不是中国人，但他们的中国心又何尝有什么两样？

从1916年到1922年，司徒雷登的弟弟司徒华林牧师曾任之江大学校长。在燕京大学的耀眼光环之下，之江的成就也许算不得什么。但之江在1952年消失之前，已是拥有3个学院、15个系、上千师生的综合性大学。它在晚清中国的大变动中诞生，在辛亥革命之后得到迅速发展，任凭钱塘江的惊涛拍岸，多少风风雨雨，军阀混战的血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都未能摧毁它。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英年早夭的朱生豪，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固体力学家徐次达，语言学家、敦煌学家蒋礼鸿，教育家林汉达，作家胡山源、施蛰存、琦君……都是从这里走出的，作家郁达夫、明史专家吴晗曾是之江预科的学生。

近代中国已基本上形成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多元并存的格局，各类大学都有了自己杰出的代表，国立大学中的北京大学等，私立大学中的南开大学等，教会大学中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大学，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讲课自由，却是不言而喻的，都体现了追求真理、追求知识的精神，共同构成了一个推动现代文明的学统。

经亨颐、竺可桢的心血凝铸成了两所百年名校永远的魂魄，魂兮归来，“与时俱进”和“求是”的教育理念中包含了人的教育的全部内容。浩淼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没了，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学没了，这是历史深刻的伤痛。我常常问，如果说种瓜得瓜，那么几代知识分子缔造的学统，他们播下的种子还留在大地的深处吗？

第十七篇 “我们的校长”

——经亨颐与浙一师风潮

曹聚仁晚年在《我与我的世界》中回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求学生涯时，深情地写下了“我们的校长”这个标题，他说：“‘一师’先后，有过许多校长，可是，我们说到的‘我们的校长’，只是指经子渊（亨颐）先生而言，跟其他校长毫无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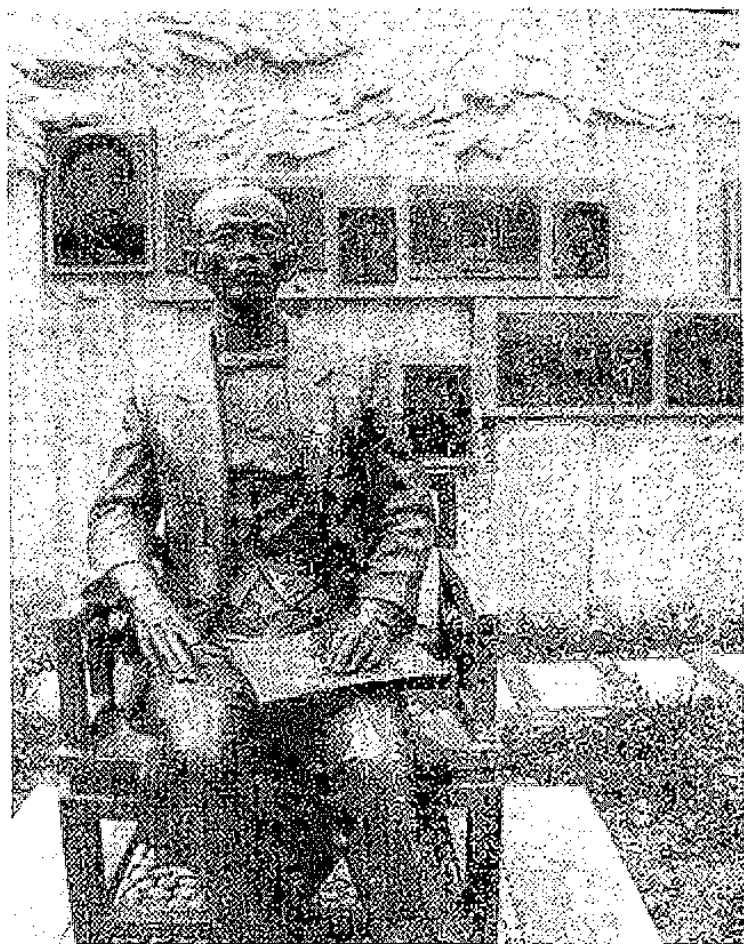
1920年初，正在寒假中，这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校长突然被调职，改任浙江省教育厅视学，从而引发了震动一时的“浙江一师风潮”。当时，曹聚仁以全体学生的名义，用不无稚嫩的白话文给校长写了一封信，表达他们内心的惊惶和期望：

自从你去了以后，我们连日的呼号叫嚣，好像同小孩子失了慈爱的母亲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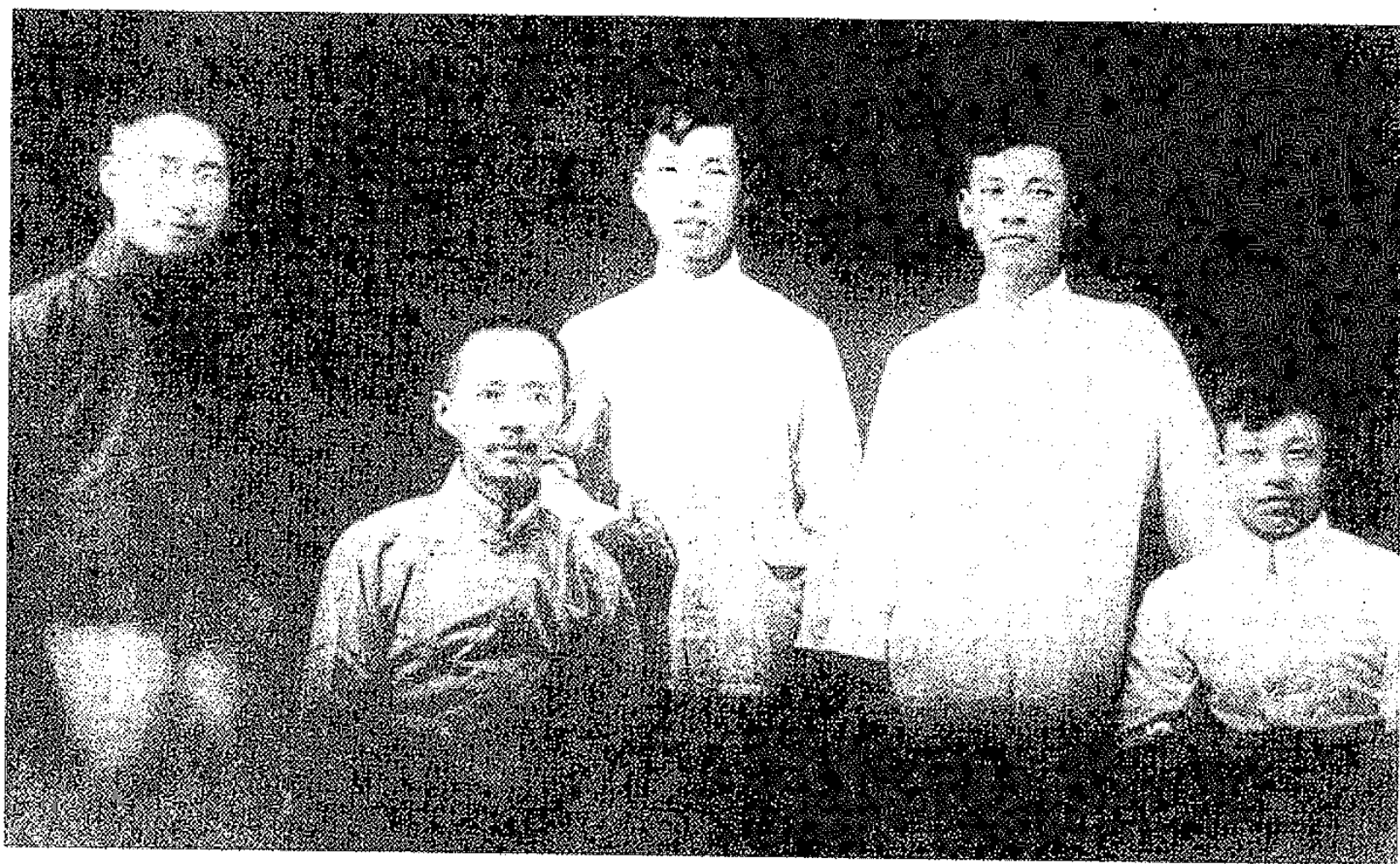
回想从前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你：“这是什么？这为什么？这究竟怎样？”你总常常恳切地指导我们，慰贴地爱护我们，并且以身作则用自治自励的精神勸勉我们，我们多少有趣！……

经先生啊！你不单是我们的校长，简直是我们慈爱的母亲！……

救救孩子们呀！



●经亨颐塑像



●经亨颐与一师学生

救救孩子们呀！

第二天，经亨颐同样用白话文给学生回信：

诸弟：

我昨天接到你们底信，一字一泪，使我黯然伤心，说不出话来！“母亲”一语，实在当不起。你们把这句话表示无限感情，我就用这句话来比仿，声诉我底苦衷。这母亲是可怜的，是黑暗家庭里三代尊亲晚婆压力以下底媳妇。还有许多三姑六婆搬弄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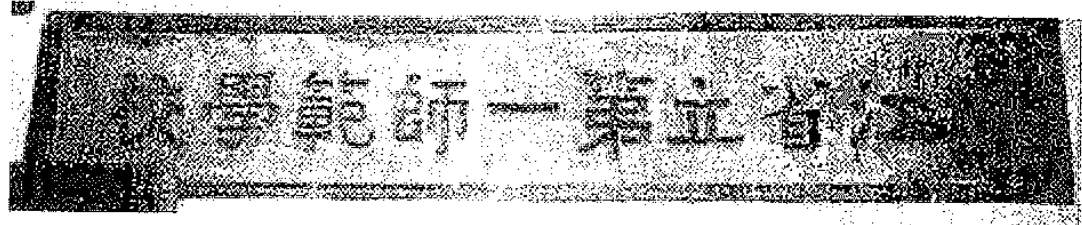
他感慨自己在一个官立学校、以一个委任校长的身份，在周围这样的空气下，大胆地做革新事业，这是他的“错”。经亨颐到底有什么错？他为什么受到当局的嫉恨，非欲去之而后快？我们从《全体教职员挽留经校长宣言》上大致上可以看出来：

本校自从成立以后，向来取与时俱进的方针。其间或兴或替，一切措

施都由经校长和教职员等共同研究，随时改进；总要把事情弄到推行无碍，才觉得大家安心，所以本校十几年来，可以说是时时有改革精神，时时过改革生活的。不过以前的改革，和校外没有什么影响罢了！到了去年秋季开学以前，经校长和教职员等，都觉得时代精神大大地改变了；本校底组织上，教授上，管理训练上，都应该大大地改革一番，去顺应世界底潮流。所以开学以后，就有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和改组学科制底几种改革事业。

这几项改革今天看来也许没有什么，但放在当时无疑都是创新，是大胆的改革。其他的改革，比如选举产生议决全校大事的评议会，实行经济公开等。自从1912年以来，经亨颐担任浙一师（前身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已近10年，他是浙江上虞人，1903年到日本留学，1907年回国担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他在教育上一贯有主张、有见解，曾提出著名的“人格教育”，但如果没有“五四”新浪潮的冲击，也许就不会有他在浙一师的大胆革新了。1919年5月12日，受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杭州学生也走上街头。作为校长，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六时余，先到校，学生尚未发，略授以保守秩序，切勿妄举。即至教育厅，……分别与军警接洽，免致误会。九时，全城中等以上学生三千余人，自公众运动场出发，先过教育会，气甚壮，余出助呼万岁，直至下午三时始回原处，秩序甚好。”今天我们路经杭州高级中学（浙一师是其前身之一）门口，可以看到一块石碑，上面记录着它当年的辉煌。

浙一师成为江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培养了大批有理想、有追求的学生，如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曹聚仁、魏金枝、施存统、宣中华等，都是与这位校长分不开的。他们后来走上各不相同的道路，其中都带有一师的痕迹，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标记，他们有幸赶上那个时代，接受新文化的洗礼。范寿康评价，经亨颐担任校长时，“不引用私人，不染指公帑，聘良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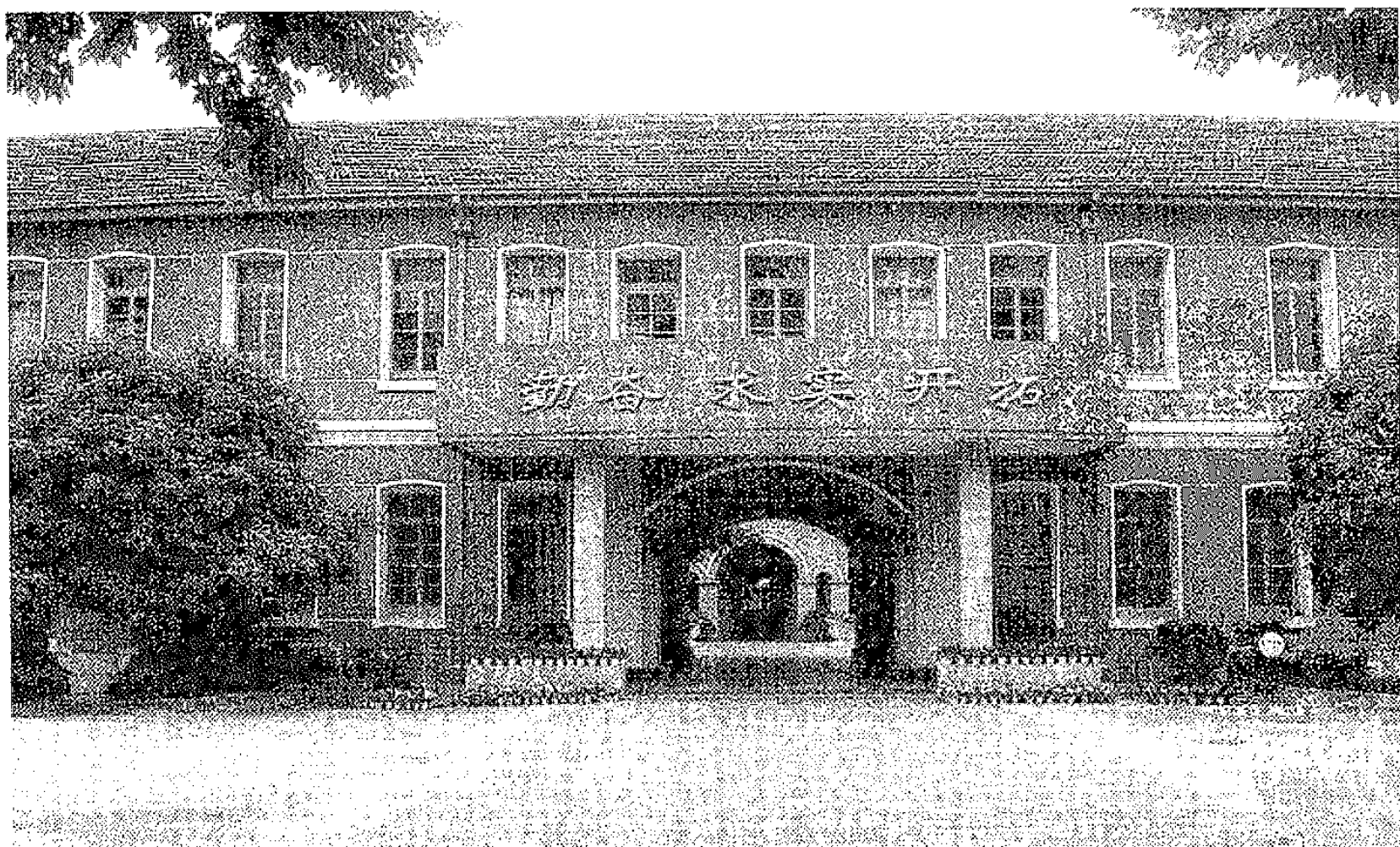


●浙一师旧校额

久其任，以勤慎诚恕四字为校训，砥砺诸生，成效卓著。……先生主持教育，一本平生所谓‘人格教育’之主张，以身作则，刚正不阿，精神大公，思想开朗，注重感化与启发，反对保守与压制。对于学生因材施教，辅导其自动、自由、自治与自律，不加硬性拘束。对于课程，主张全面发展，自文学、艺术、科学、数学以至体育、运动，无不注重。举凡陶铸个人身心各方面之知、德、体、美、群五育，无所不包，而目标则在于培养正直、坚强、学识兼备之人才，为国家服务。”对于学生的请求，只要理由充足，他总是应允，学生刘质平耽于音乐，音乐以外的功课，大都不及格，学校照样发给毕业文凭，刘后来成了音乐家。

在“五四”大潮中，经亨颐决心在浙一师进行教育革新，从1919年下半年起付诸实施，主要集中在上面提到的四个方面，职员专任制对外界没有多少冲击力，学科制在他手里还没来得及推行，最有争议、最后惹祸的是学生自治和改文言为白话文。学生自治的大纲在专任职员会议上议决，《试行自治制》在1919年10月16日正式宣布，暂时定出了九条自治大纲，第一条将学校事务分成学生自治和学校行政二部。第四条规定学校对于学生行为不妨碍学校行政的，一概不干预。第八条明确学生的自治范围，

●幸存的浙一师旧校舍



包括有关学生健康、研究学术、发表思想、涵养德性、衣食住、课外作业、社会服务、校内整洁、同学行为的惩处和劝诫、储蓄和贩卖、课外出入等事项。目的就是要学生养成自动的能力、自律的习惯、互助的精神。实行自治的细则完全由学生开会研究。自治会很快成立起来，并有效地开展工作。

经亨颐亲自为学生作自治歌：

不知人生，哪知自治？自然淘汰误至斯。

禽兽草木无理性，山川风月无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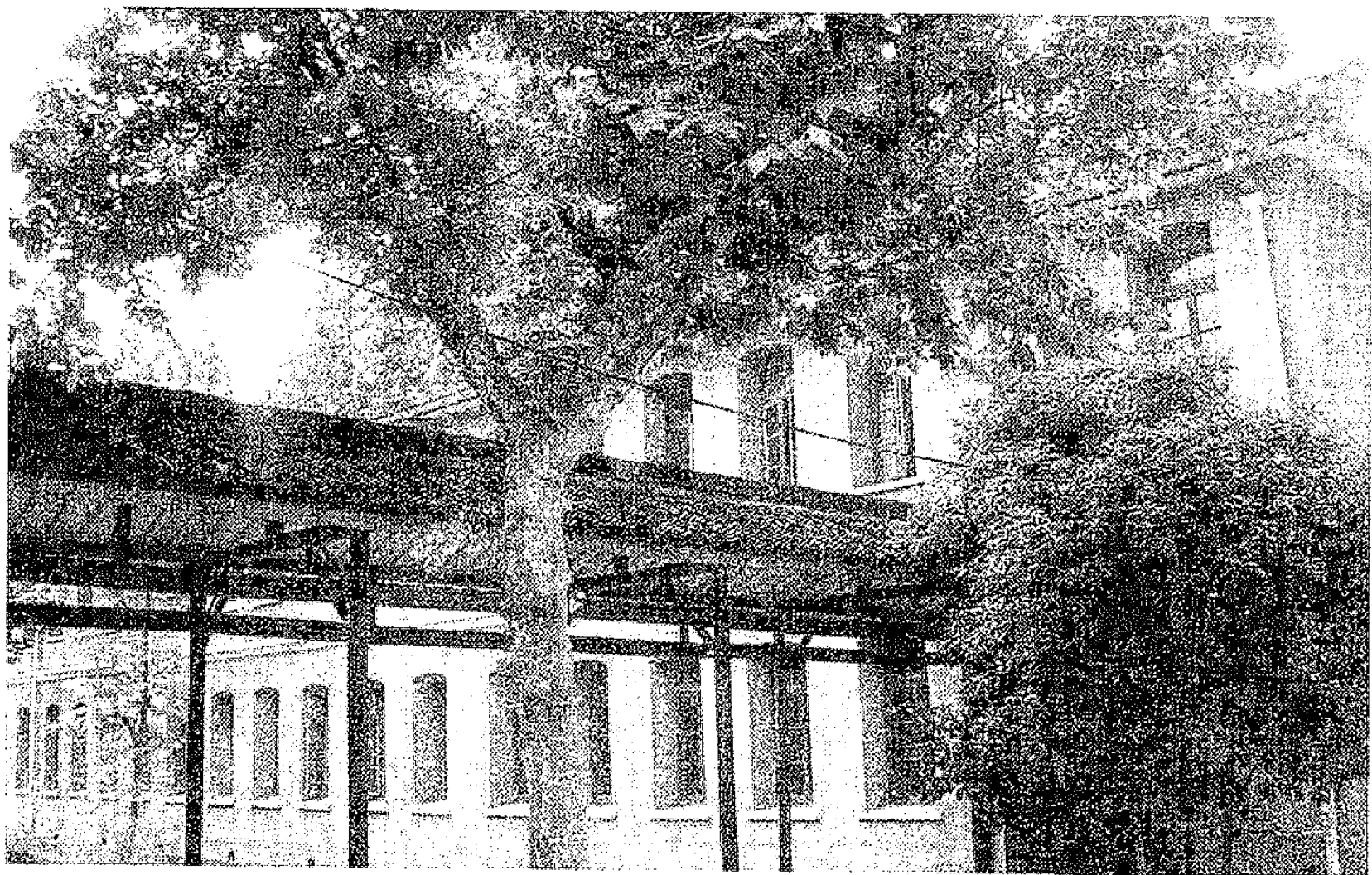
教育为何治何为？理性意志各自制。

当年11月16日，在欢庆首届学生自治会成立的大会上，全校师生高唱“自治歌”，还演出胡适的《终身大事》、陈望道和夏丏尊的《严肃》等剧目，热闹了一天。此外，学校还出现了书报贩卖部，《星期评论》《教育潮》《建设》《少年中国》《新青年》《新潮》《建设》等新刊物都有不少的销量。这是学生汪寿华1919年9月17日的日记：

看《新青年》，对于皮耳七先生所主张的“实验主义”，我很赞成的。

……再看《新青年》和《星期评论》。

最有成绩的是白话文的推行，当时教授白话文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国文教授会议上暂定了国文教授法大纲，依照人生问题、家族问题、贞操问题、文学问题等16个问题，分门别类选辑了100多篇文章，主要是当时新刊物上发表的，鲁迅、陈独秀、胡适的文章都有，其中就有《狂人日记》。蔡元培看了他们自选的国语教材说：“这种教材选得不成系统，不过备学生底参考，也未始不可的。”编这样的教材，目的是要学生用批评的眼光，取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叫学生轻信、盲从。比起死板僵化的文言文教学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正如教授法大纲说的，形式上“使学生能够了解用现代语或接近现代语，如各日报杂志和各学科教科书所用的文言——所发表的文



●浙一师校园一角

章，而且能够看得敏捷、正确、贯通。使学生能够用现代语——或口讲或写在纸上，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要自由、明白、普遍、迅速。”实质上就是要使学生了解人生真义和社会现象。

汪寿华于1919年9月16日的日记中记着，陈望道老师在语文课上说：“文字的本质，完全是发表自己的意思，使人家了解。既然文字的本质如此，所以不能不从容易方面做去。为什么？因文字容易，个个人自然能够晓得我的意思。他如用典古的文字，必定要有我的程度，或高于我的程度，才能了解。”“既然知道文字不宜拘古，当应世界潮流，所以当改革。那么改革的方法，能不能够讲呢。现在有三种方法，大家研究研究。”这三种方法是，一是改为白话文，二是使用标点，三是改“直行”为“横行”，理由是写的时候便利，看的时候便利，经济上便利。正是在经亨颐的主持下，教师才有可能进行这样大胆的改革和探索。

当山雨欲来，浙江省教育厅查办员查问时，经亨颐一一作出了回答：关于职员专任，“现在我们中国学校的流弊，都是校长专权的缘故。做教员的至多对于教课负责，不是对于学校负责。兼着好几处教课，更没有时间

可以研究。本校实行这件事，各位教员是有大大的志愿和大大的牺牲。现在预算并没有增加，就照原预算分配，各员每月只有七十元，比较从前有几位要减少若干元，教课以外的职务反要加增，并且确能负责任。……每星期开例会一次，遇有研究的问题还要连日开会讨论。所以我对于职员，是认定‘集思广益’四字做去。”

关于学生自治，“本校为什么实行自治？是从毕业生方面感触而来的。我办这师范学校总算已经十年以上，平时注意毕业生的状况，为什么这样没有创造的精神，觉得是他们在学校几年我们害了他们的。觉悟已经迟了，忏悔还来得及。从前也曾经说教育的目的，是要养成自律；还有一句话，叫做一定要经过相当的他律。但在校的期内，完全是他律，自律叫他从哪里来呢？教育学的‘训练论’当中，明明有‘指导’和‘陶冶’两句话。试问不使学生自治，这两句话究竟是有何意义？要待学生有自治的能力才能自治，试问一天不使他自治，待到几时才有自治的能力？”

学生自治不是因为学生已经具备了自治能力，而是一种开始，一种训练。自治的时间不长，但在有些方面已显示出效果。比如禁烟，以前学校用了多少办法、多少手段都没有能解决的；通过自治解决了，比如学生管理食堂也大有改进；比如请假制度也落实得更好了。

关于改革国文教授，他认为中国文学不改革，教育是万万不能普及的，作为师范校长，不是单单要制造出几个学生，设法普及教育才是根本。“想来想去，国文教授，当然是第一个研究的问题。……我为了聘国文教员，不新不旧，有新有旧，宗旨变换好几次了。批评师范毕业生，多是说国文程度不够。我想这短短的五年期间，要养成从前‘进士’、‘翰林’的一种文章和不中用的诗词歌赋，无从着手的经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学生，实在看错了人生。所以我决



●经亨颐题石

定“国文应当为教育所支配，不应当国文支配教育”的宗旨，非提倡国语改文言为白话不可。我们师范学校，无非为普及教育，不是“国故”专攻。文言和白话，也不必管他，有些思想，可以写得出来，那就得了。”注音字母是国语的福音，当然也要教授，他说只有在提倡白话之后才可以讲教育，要讲教育，就要改革以往的国文教授。

关于学科制，乃是针对学年制提出来的。他认为学年制的缺点是“轻视青年的光阴，束缚学生的能力；尊重办事的程序，演成划一的流弊。有一门成绩不及格，就要叫他留级一年，其余及格的学科，也要罚他重习一年，而且不到班仍要扣分”。学科制的办法就是破坏学年制，以学科为单位，每学科又分成几个学分，分几年修完学分，修了几个单位，就算毕业。当时已在研究具体的实施办法。

早在革新之前，浙一师的语文课就已部分采用白话，他认为“北京大学之暗潮次及吾浙，亦本校之光也”。有教师因为反对白话文而辞职时，他反而认为“下学年国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须及早物色相当者任之”。这是1919年4月间的事，暑假中，他就不断为聘请新教师奔走，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加上原来在校的夏丏尊，分别担任四个年级的国文老师，被称为“四大金刚”，都是倡导白话文的。

从力倡“人格教育”到革新一师之举，对经亨颐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人格教育不是空疏的道德说教，本质上是公民教育，是相对于职业教育提出来的，正如曹聚仁回忆，“我们在一师读书，每一年级，每一班组，每一星期，总有一小时‘修养’课程由经师自己来讲授；这是他和我们接触的机会。他所谓‘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要陶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他所挂的教育目标是‘人格教育’，和当时上海江苏教育会派黄任之先生等所提倡的‘职业教育’正相对峙。他要把我们个个都教育成健全的公民；他也用了刘劭《人物志》所说的‘淡’字来说明人生的极则，是一碗清水；一碗清水，才可以作种种应用。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他所聘请的教师，学问品行方面，对学生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他所标立的教育方针，也颇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我后来看了他的自述，才知道他最深于人生哲

学的研究。他认为一切道德观念伦理关系，决没有一成不变的。因此，他对于五四运动的思想革命，不仅正面来接受，还加以积极的推动。究竟是因为他接受了新思想而为旧社会所痛恶呢？还是他的正义感，和省议会相冲突呢？也许两者都有一点在；因此，当代表反动势力的齐耀珊省长、夏敬观教育厅长，和浙江旧势力大结合，给他一个总攻击时，经师是昂然站着，一点也不退怯的！”

在曹聚仁的记忆中，“我们的校长”——“个子高高的，说话慢吞吞的，和我这个小不点儿的学生，恰好相映成趣。这样的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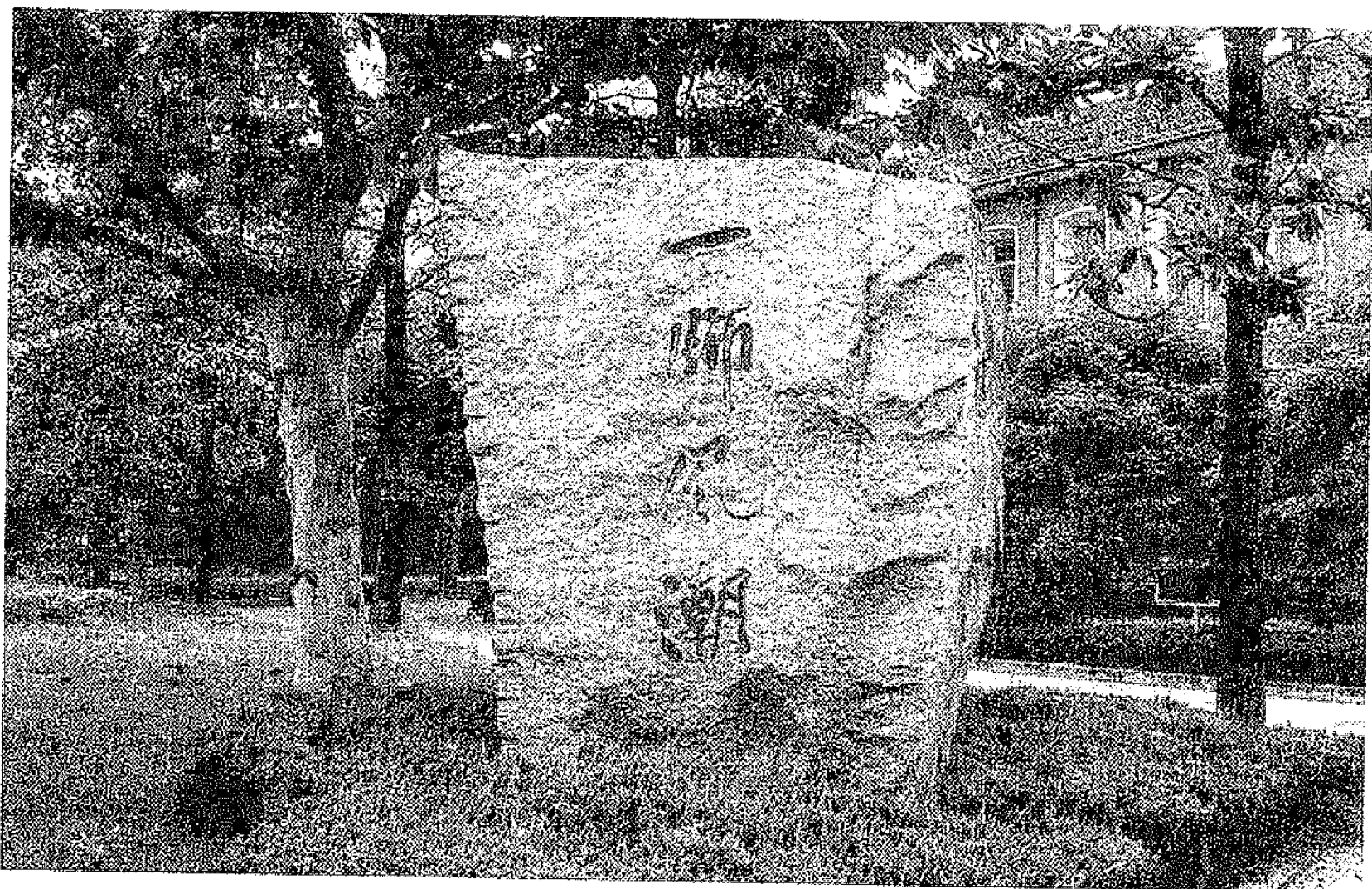
●经亨颐

长，望之俨然，我从心底怕了他。”“经校长是勇于负责办事的人，他一生正直，依着自己的理想去做，不十分计较利害得失的，因而有‘经毒头’的绰号。他不爱权位，不治生产，然而他并不是一个遁世隐逸的人。”

当曹聚仁进入浙江第一师范求学时，经亨颐已做了多年的校长，他在日记中常常提到自己给学生上修养课，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他逐渐领悟到了教育的真谛，他所在意的是普及教育，养成人格健全的公民，从人格教育的理念到教育实践中的革新，都是向着教育普及这个目标靠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是一个现代型的教育家，他尝试的时间虽短，他亲身在这个岗位上不过一个学期，但刹那就是永恒。他的思考和努力已载入中国教育史，也融入了文明转型的史册中。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学生的个性得到了张扬，他们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他们的精神状态是饱满而热情的，他们确实容易受到各类思潮影响，但他们独立思考的空间其实更大了。《浙江新潮》等学生刊物的出现，学生施存统惊世骇俗的《非孝》一文的发表，这一切都不是经亨颐意料之中的。那段时期，他到山西参加会议，发生这些事他并不知道，再说他并不干预学生的课外生活。

但面对来自官厅的压力，他坦然表示，刊物他清楚，学生是浙一师的



● “一师风潮”纪念石

学生，他就要负责任。同时，有一个叫凌荣宝的学生，一个人办了一份叫《独见》的杂志，以“独见”的笔名发表文章，反对新文化、新价值，与施存统们针锋相对，共办了10期。

其实，这只不过是守旧势力的借口，关键是要将他从浙江教育界的领导位置上拉下来，除了一师校长，他还是影响很大的浙江教育会会长，办有《教育潮》，早就让一些人眼红得不得了。《非孝》一出，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有人攻击他“在校刊行《浙江新潮》，提倡过激主义，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种种邪说，冀以破坏数千年来社会之秩序，洪水猛兽，流毒无穷。……”还有人攻击他“贻害青年，灭伦伤化”。经亨颐知道，他的革新事业走不下去了，对此他是明智的，但他还是尽了最大的可能来保全浙江一师的革新事业，而毫不在意个人的去留。他在回答学生时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

浙江一师风潮的最后结局虽并不尽如人意，但在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抗议声中，官厅做出了一定让步，南开教务长姜伯韩继任校长后，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经亨颐时代的做法。虽然“四大金刚”走了，但白话文的教师换

成了新锐的北大毕业生朱自清、俞平伯们，学科制得到了推行。这大约也是让他感到欣慰的。经亨颐不是一个留恋位置的人，他拒绝接受调任教育厅视学的命令，并立即离开杭州，决不苟且，尽管他那么喜欢生活、工作了十几年的杭州。因为忙，他很少有时间游玩，但日记中还是不时留下了对西湖之美的赞叹。1919年3月23日，一个烟雨迷离的星期天，他路过苏堤，感叹“桃花艳湿，新柳如滴，风景不可遇”。同年9月19日夜，他泛舟西湖，日记中说：“湖平如镜，灯影如林，长在杭州，此景亦不多（见）。”

主要参考书目：

1. 经纬鹰编，《经亨颐诗文书画精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2.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浙江一师风潮》，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 《杭州第一中学校庆七十五周年纪念册》，1983年印。
4. 阮毅成，《三句不离本杭》，杭州出版社，2001年版。
5.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第十八篇 “书傻子”校长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

从1936年到1949年，竺可桢做了13年浙江大学校长，其中有8年在流亡途中，还有半年出国，实际在杭州的时间不超过4年。他的故乡浙江上虞东关，离杭州不远，青少年时代出门求学他曾路经杭州，但第一次见到西湖已经是1919年，一年前他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回国。1948年2月8日，他生平第一次到西湖边的孤山探梅，日记中说：

余第一次到西湖是在民国八年夏天，在宋庄过夏三个月，把西湖统走到了，但从未记得有林和靖墓和放鹤亭，也许年久忘了。以前光绪卅三、四年虽曾经过杭州，均由西兴过江，直至拱辰桥坐轮赴沪，不至西湖也。



●竺可桢

就是1919年的这次杭州之行，青年竺可桢在1920年写出了科学论文《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认为西湖“可以断定是一个泻湖”，西湖最初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湾儿，后来钱塘江带下来的泥土淤积沉淀，慢慢把湾口塞住，变成一个泻湖。他推断西湖形成“至少在一万二千年以前”，“如果没有宋、元、明、清历代的开浚修葺，不但里湖早已受了淘汰，就是外湖恐怕也要为淤泥所充塞了。换言之，西湖若没有人工的浚掘，一定要受天然的淘汰。现在我们尚能徜徉湖中，领略

胜景，亦是人定胜天的一个证据了”。至于“杭州附近的冲积平原，不过是钱塘江所成的一个三角洲”。此前1916年10月，他在美国留学时，曾在《科学》杂志发表过一篇论文《钱塘江怒潮》，对“世界之奇观”浙江潮作出科学解释。

1936年4月下旬，竺可桢初到杭州，5月18日正式宣誓接掌浙大，千头万绪，为经费、为校舍、为图书设备、为聘教授而苦心焦虑，除了偶尔参与集体活动，他几乎无暇顾及西湖的湖山之美，日记中留下的记录很少。当年11月22日是个星期天，浙大教职员“康乐社”组织登山比赛，爬西湖边的葛岭，共有男女老幼60人参加，第1名是物理系的王淦昌教授，登顶只用了8分钟。竺可桢是第13名，他给所有人发奖品，第1名得到郑晓沧翻译的《小男儿》，其他人是“飞机”、泥菩萨等不一。1937年1月27日，他在日记中讲到苏东坡疏浚西湖，400年后又成了桑田，苏堤以西，高者为田，低者为荡，阡陌纵横，船也过不去，到明代的杨孟璞才恢复宋时西湖。这一天他的日记中还错把“接天莲叶无穷碧”当成了苏东坡的诗。2月14日他到超山探梅，3月7日，他又带社会学家陶孟和前往，“抵宋梅亭则梅已盛开，较之二星期间大不相同，下星期则全部将落矣。”3月21日，“中国科学社”在杭州开社友会，他们16人徒步到烟霞洞，为胡明复扫墓。

浙大的13年，竺可桢没有因校务繁忙而完全中止科学研究，其中也有与杭州有关的论文、讲稿，1936年11月2日、3日，他连日早起写成了《杭州的气候》讲演稿，对杭州的气温、雨量、风、霜等都有细致的考察。1948年9月20日，他写过《中秋月与浙江潮》一文。他对物候、气象的观察几乎天天记在日记中，如今读来更觉亲切而珍贵：1936年11月18日，“近来浙大校长官舍墙上自爬墙虎已落叶（青者未落），枣树叶全落，柿子、梧桐尚未落叶。”即使游玩，他也带着研究的眼光。同年9月13日登玉皇山时，他在山半、山顶分别测量高度，下山经过满觉陇，见桂花未开，他推测“迟一周则香气满谷矣”。1937年4月14日，他从南京回来，“抵杭州则桃花均落，偶有开者极少。金枪花全落，小绣球盛开，墙上爬山虎叶已出。”

1945年10月18日，抗战胜利后，竺可桢由遵义重回阔别8年的杭州，

第二天他来到西湖边，经白堤、断桥到了平湖秋月。他终日为浙大回迁事务而奔走，无心风景之胜。虽然湖山依旧，但浙大校舍已被日寇糟蹋得面目全非，华家池的浙大农学院4层洋楼本是30年代杭州最好的建筑之一，气派壮观，如今是一堆荒草石砾（被趁火打劫的本地不良百姓拆毁，拆下的玻璃钢条卖给了日本人）。校本部的图书馆也只剩下了一个空空的框架，宽敞整洁的办公厅成了一个摇摇欲坠的空架子，大礼堂仅存屋顶和柱栋。当时拍下的一组照片“浙大校舍劫后景况”就是真实的历史见证。11月11日，他返回贵州前一天，在昔日的校长办公室中徒步，8年了，当年他亲手种的一雌一雄两棵罗汉松竟都安然无恙，墙角的桃树，他以为必死，哪知也是硕果犹存，一枣一柿一梅也如故。“低迴往复，恋恋不舍”。

1946年6月，浙大终于迁回杭州，他才松了一口气。7月20日，他和同事、友人在“楼外楼”吃饭，在三楼上看苏堤、阮公墩，景致极佳，一年前在遵义时还没料到有今日，“谈笑甚欢”。8月15日，他路过苏堤，“六桥杨柳依然如故，但桃花尽去，而路面不修，故不及九年前之易走，惟风景仍佳丽耳”。是日，他在飞来峰下喝茶，再到孤山下的“楼外楼”吃饭，又在三楼看苏堤、阮公墩，日记中说“至足乐也”。

1948年1月2日是个晴天，他带着一家人到灵隐，经云林寺到韬光寺，上北高峰，45分钟到山顶。1949年1月28日是他在杭州的最后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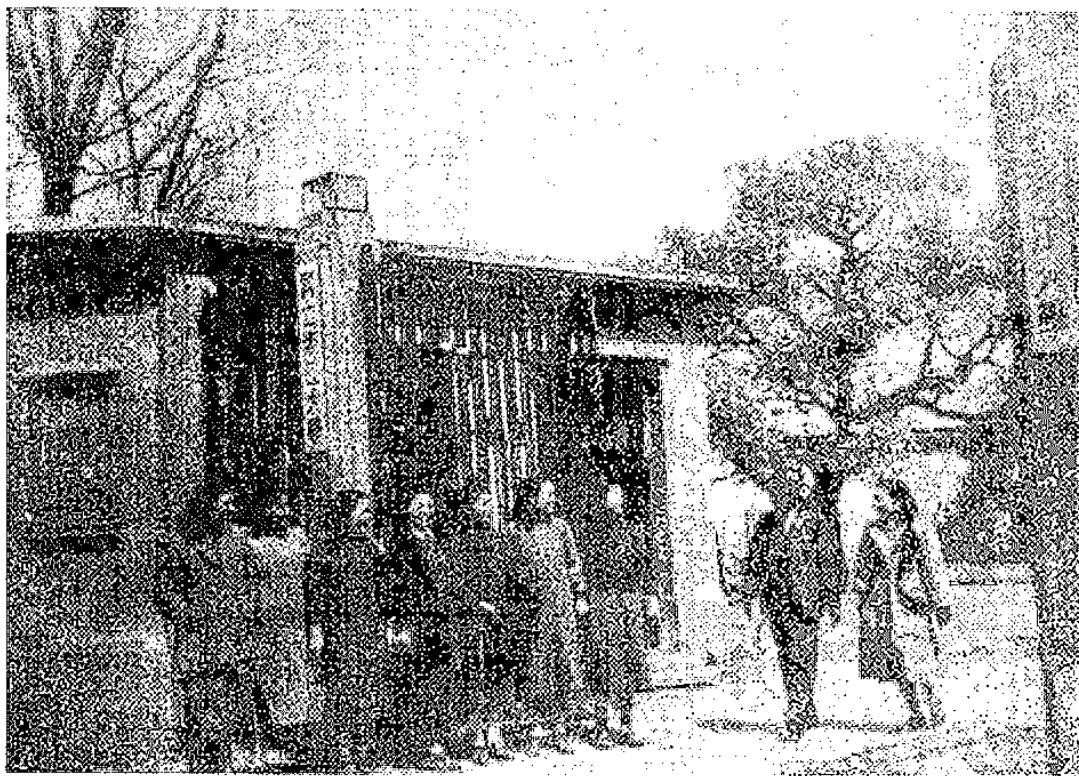
●林启

除夕，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指日可待，他在日记中写下：“今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而政府则和战未决，兵临城下，读宋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薰风吹得游人醉，莫把杭州作汴州’，不竟感慨系之。”此刻，他还没有想到，仅仅3个月后他就要在大雨中告别杭州。他在答应出任浙大校长之前，通过陈布雷等人向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条件中有一条，他只愿意做半年（至多一年）。却因为抗战爆发，浙大处于危

难之中，受责任心的驱使，加上他与浙大师生与日俱增、难以割舍的感情等因素，一拖就拖了13年。期间他多次求去而不得，到1948年1月31日，他已决心辞职，面对浙大教授会代表的挽留，他说自己在校12年，已是忧患余生，“抗战时期日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之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

1949年4月24日，时局风雨飘摇，竺可桢主持召开浙江大学校务会，为应付环境，亟须加强“安全委员会”的组织，讨论决定取名为“浙大应变执行会”。因为这一天“林社”要公祭晚清杭州太守林启，所以他先离席，匆匆赶去孤山，到了放鹤亭，祭典正好开始。1897年5月21日，兼讲“中西实学”的求是书院（即浙江大学前身）在杭州普慈寺开学，成为中国最早的四所新式高等学堂之一。蒋伯器、蒋百里、蒋梦麟、陈独秀、陈仪等都是求是书院的学生，邵飘萍、陈布雷、邵元冲等是浙江高等学堂的学生。热心办学的林启在杭州只有短短4年，却创办了3所新式学堂，其他两所为1898年办的蚕学馆，开了职业教育的先河；1899年办的养正书塾开中等教育的先河。有了这3所开风气的学校，林太守就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所以竺可桢在风雨仓皇之际仍不忘赶去“林社”祭奠。

此前，竺可桢在1945年11月9日的日记中说，当年毕业于求是书院、又做过浙江高等学堂校长的邵裴子告诉他，人们都说求是书院是林太守所办，其实是浙江巡抚廖寿丰创立的，林办的是养正书塾，不是求是书院，一个是省立，一个是县立。现存创办求是书院的奏折确是廖寿丰上的，上面有光绪



●竺可桢夫妇在浙大校门口

帝的亲笔朱批，但毫无疑问林启是求是书院最重要的创办人，折子中写明“即委太守林启为总办”，从制定章程到聘请教师、招收学生等，林启无不躬亲其事，而且亲自兼任过国文教学。（当然“颇重储才崇实”的廖寿丰也功不可没。）1947年10月7日的竺可桢日记认定“求是书院”为林启所创，校舍设在普慈寺，是因为杭籍大臣王文韶的媳妇“与寺僧通奸”，寺院被没收为官产。这是林启1896年上任伊始查办的，他提请巡抚廖寿丰以充公的寺屋办新学，因此有了“求是书院”。竺可桢还讲到求是的校风一开始就含有牺牲精神，“求是书院成立在戊戌变政以前，是时科举未废，入院者多为有志之士。辛亥革命，江北总督参谋长史寿白提兵攻取南京，与克服浙江之总司令周赤忱，皆求是学生，但功成后皆寂然无闻。即先后主持学校之人如陈仲恕（求是）、邵裴子（高等）、吴雷川（高等）、许潜夫皆彬彬君子，一介不苟，至垂老而两袖清风。此浙大之校风为可贵也。”

自1901到1903年，求是书院先后易名为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到1928年易名为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一生的事业，一是气象学、物候学等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二就是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奇迹般地把浙大办成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被李约瑟誉为“东方之剑桥”。他接任浙大之初，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学系，在颠沛流离的抗战岁月中竟成长为拥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学系的大学，还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等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由512名增至2171名，荟萃了陈建功、苏步



●求是书院匾

青、王淦昌、束星北、胡刚复、何增禄、谈家桢、蔡邦华、卢守耕、赵九章、吴耕民、夏鼐、张荫麟、张其昀、谭其骧、费巩、梅光迪等在各学科享有声誉的教授。抗战胜利后，他还雄心勃勃，想把浙大

办成有 5000 名学生的大学。

1936 年 2 月 25 日，竺可桢在接受浙大校长的任命前夕，也曾有过犹豫与忧虑，日记中说，他个人的困难之一在于“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不屑为之”。然而经再三考虑，如果自己明哲保身，不去浙大，浙大必将陷入国民党党部之手，“而党之为人操纵已无疑义”。陈训慈在《竺可桢出长浙大由来及其他》文中回忆：“我则确记竺师母当日对我们几位同学说：‘你们的老师说是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高等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云云。”其时，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浙大学潮汹涌，前任校长郭任远不得人心被学生赶走，蒋介石急于找一个专业上有成就、社会上有声望的浙江籍学人接掌浙大，竺可桢被多人提名。他提出三个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人校长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蒋介石曾予以首肯。

他一向认为“对于教育与政治总以为不应过于接近”，在浙大的 13 年中，他无时不以保持与发扬求是学风、不分党派门户、维持学术标准的浙大传统为荣。在 1938 年西迁途中，他在广西宜山确立“求是”为校训，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向来学风笃实，另一方面他对“求是”的解释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赋予“求是”以牺牲精神。他在浙大 13 年，浙大整体学术水平大大提高，学风踏实，教师、学生在学术上有成就的很多，基本上都没有走当官这条路，其中与竺可桢的影响和“求是”学风的熏陶不无关系。叶笃正从西南联大毕业、考到浙大读研究生，就是认为联大校风比



●浙大西迁途中

较“浮夸”，浙大“实实在在”，这是他个人当时的体会。

自称“书傻子”、不屑也不善搞中国式人际关系的竺可桢之所以办大学成功，归根结底无非这样几条：

一是他始终相信“大学因为能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他在浙大13年，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采英美之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里头，“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研究”，教师、学生有研究的自由、读书的自由，即探索真理的自由。同时，他主张通才教育和技术教育并重，尤其重视基础学科，“大学一二年级中，工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虽然彼此不可偏废，仍宜互相切磋，不限系院……”1936年，他甫一上任，第一次主持召开校务会议时，就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避免学生过早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基础，最后决议成立一个公共科目课程分配委员会。为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他经常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选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学科或爱好的学科。1945年9月23日，他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中说：“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知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1946年7月25日，在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会议讨论《大学组织法》时，他主张加入通才教育，最终没有通过，他在日记中深感遗憾。

二是他一向认定“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也就是力主独立办学，超越党派纷争之外，他公开提出“大学是超政治的，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即青年团亦只能作为一种服务团体，如青年会然。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由，但不应作政治活动”。有一次他调阅三青团浙大区团部档案，亲眼看到他们给上司的报告中三次提及浙大的“环境不适于青年团”。1938年、1939年，他几次拒绝加入国民党，到1940年前后，他成了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国立大学校长。1940年8月，他

不顾压力，聘请不是国民党党员的费巩出任浙大训导长，教育部规定这一职务必须党员才能担任。以后他虽被迫填写过加入国民党的志愿书，甚至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从未付过党费，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的会议。

国民党强硬势力攻击浙大是“共匪之租界”，其实竺可桢一样不赞同学生“左”倾，他在日记中多次说，“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不能有活动”，“学生信仰可以自由，但不能作政党之活动”，“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在学校闹党派，则不特于抗战无益，学校亦不成其学校，故本人主张政党须一律退出学校”。1947年6月17日，他出国半年一回来面对的又是汹涌的学潮，他批评学生自治会所出的《快报》《求是学报》“均相当左倾”。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杀害后，他在11月10日的校务会议上说得明白：“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于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

1948年2月14日，他当面批评学生自治会代表，“自治会对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腕太玩弄”，“过去自治会所出之《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都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12月13日下午，他亲自去看浙江校园里学生自办的“费巩壁报”，其中有赞美张学良、杨虎城的文章，他感叹说：“大致说来，可谓一致反对政府之言论，无怪乎外间攻击浙大为共匪张目之中心矣。”

1949年5月，他离开浙大后，浙大校园的壁报上还在批评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



●今日的求是书院

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岁月轮回，这对他是褒还是贬呢？

三是他自始认定“教授是大学的灵魂”。1948年6月12日，他对学生说：“大学应以教授为重。”早在1936年4月25日，他上任之初就在演讲中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浙大学生谢觉民追忆，竺可桢以人品、学识和诚恳的态度请到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好教授，“他们有品格，有学问，但有时不免也有脾气”，牛津出身的费巩“最会骂人，在教务会议上，他公开指摘竺师，说‘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意思是他习政治的，有知人之明，竺师也只是含笑不语，可见他的容人之量。”（从费巩日记可以看出他一度对竺可桢很不满，但竺可桢照样请无党派的费巩当训导长，并在费巩出事后全力营救。）

1948年评出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浙大教授有4人，仅次于北大、清华。曾在浙大任教的生物学家谈家桢一再推崇近代中国办大学成功的校长只有蔡元培和竺可桢，“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的束缚而广罗人才，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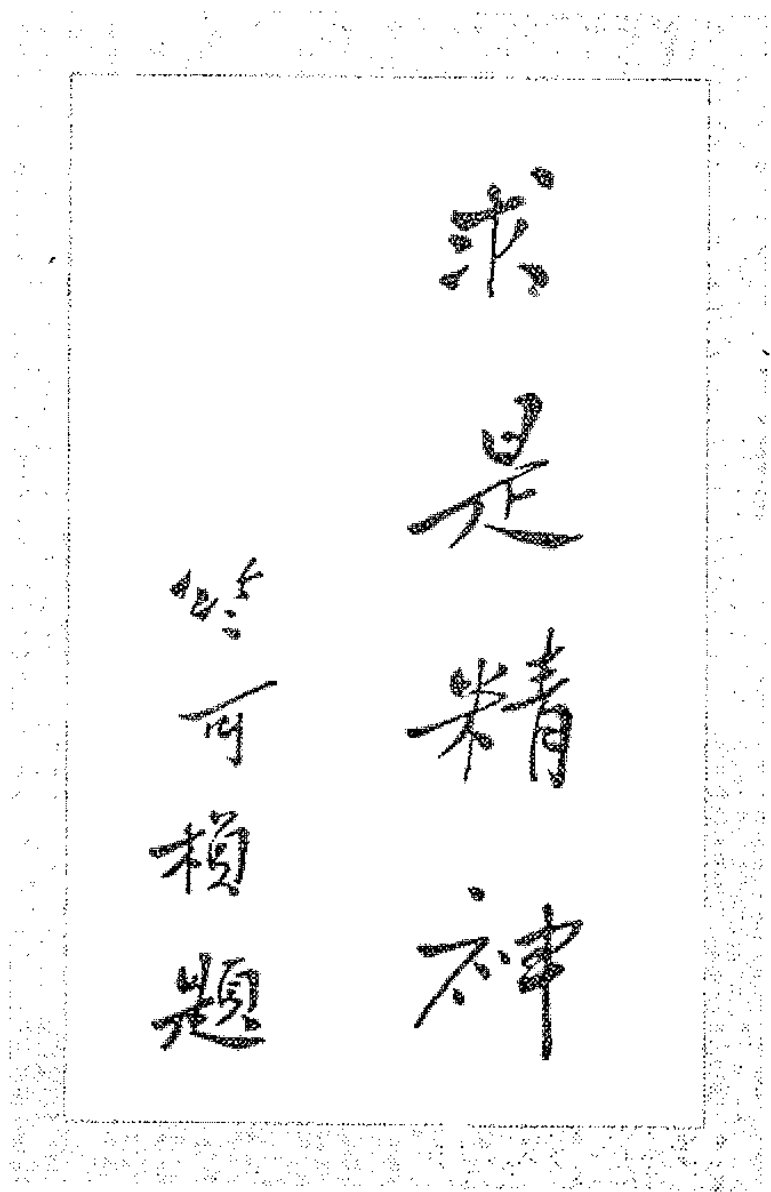
1945年2月，浙大政治学教授费巩在重庆“失踪”。从知道消息的那一天起，竺可桢就感到这是“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政府机构”干的，深为费巩的性命担忧，不停地奔走于各个机构、部门之间，尽了一切可能尽的力。他的日记中有关费巩的记载至少有78处之多，可谓牵肠挂肚，多年难以释怀。不仅费巩，他对其他教师也是如此，外文系教授张君川、讲师冯斐等都是受到他的保护才幸免牢狱之苦。在竺可桢13年大学校长生涯中，心理学教授黄翼，文学院院长梅光迪，教务长、物理学家张绍忠，历史学教授张荫麟等先后病故，他都关怀备至，对他们的遗属尽心照顾。

到1949年，他在浙大的最后几个月，他几乎成了一架要款机器，不断地给教育部、行政院发电、写信，不停地奔波于上海、南京和杭州之间，叩开包括代总统李宗仁在内的国民党政要之门。1月29日是他在浙大的最后一个春节，校园内，“学生等颇热烈庆祝，而教员则忙于谋生，食不饱、

衣不暖，故可谓毫无兴致也……”他本人忧心忡忡，整天为师生的柴米油盐而发愁。

教授治校是他 13 年来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浙大校风就是万事公开，实事求是，师生合作。1945 年 9 月 17 日，他在演讲《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时说：“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教授治校主要体现在全体教员每年一次选举教授代表，可以连选连任，参加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即使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也未中断，竺可桢日记记下了选举的详细情况。

四是他相信学生，力主学生自治。“爱校如家，爱生如子”，是浙大学生对他的评价。40 年代末浙大史地系毕业的女生王来棣 80 岁时回忆起老校长，“在我的脑子里，他同学生的关系像父亲一样”，“可敬”、“尊重”。他的老友、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曾对人说，在竺可桢眼中，“浙大学生个个都是好人品和有学问的。”无论学潮如何汹涌，他都坚定地认为“大多数学生乃系善良的也”（1948 年 1 月 5 日日记）。1948 年 4 月 1 日，他在浙大 51 周年纪念会上郑重地说：“办大学教育者必得有基本信仰，就是大多数学生，可以由经验和教训使人于理智所承认为正轨的途径的。”1947 年 8 月，浙江省主席沈成章当面指责“浙大乃共产党大本营”，认为浙大处理学潮过宽，开除的学生太少。他坦然回答：“学校处理学潮，不能用武，始终认大部分学生系优良子弟。学校须以德服人。目前要点在于组织教授，扶植善良，潜心读书，不为政潮所左右。”每次国民党当局要他开除学生，他总是从爱护学生的立场出发，从不考虑政治立场，他对陈布雷说过：“年轻人欲批评亦未可厚非，若批评政府



●竺可桢手书浙大校训“求是精神”

者皆目为共产，则不啻为丛驱雀也。”

1947年5月25日，他远在美国旧金山，从报纸上得知浙大还在罢课之中，在日记中写下“真使人焦急”5个字。后来他对1947年4月到1948年4月的罢课作过统计：“共罢课55天，其中例假1天，星期日6天。”一年中罢课的时间竟达8星期之多，也即是上课时间的四分之一。他虽理解青年学生“多不满现状”，“关心国是也是应该的”，但他认为时时罢课，学业损失太大，他更不赞成“以罢课作为要挟的一种工具”。他希望大学教育能让每个学生养成“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这样才能不被“传统的不合理的习惯所拘束”，不被“一时的情感所冲动”，不被“社会不健全潮流所转移，或者受少数人的利用”。

每次学生被捕他总要去狱中看望，每次学生开庭他都要到庭听审。滕维藻、潘家苏、王蕙、邵全声、吴大信、李雅卿等学生（有些是中共地下党员）都曾遭国民党当局拘捕，在他的奔走营救下，才得以重获自由并完成学业，他不问他们的政治信仰甚至党派情况。对于营救无效、不幸遇难的学生何友谅、于子三，他引为终生遗憾，他是罕有的一个会为学生下泪的大学校长。

他主张教授治校的同时，也主张学生自治，学生“应当在自治会里练习服务人类、大公无私、为大众谋福利的精神”（1940年12月2日日记）。但他并不一味认同、纵容学生自治会的行为，对学生墙报激进的反政府倾向，他一再苦口婆心地提出劝告和批评。当11月27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密电要他解散浙大学生自治会时，他在行政会议上只是决定劝学生复课，只字不提解散自治会一事。

浙大的成功靠的就是竺可桢坚守的这些信条，同样不能忽略的还有他的身体力行，公私分明的自律，包括一些很不起眼的细节。当年杭州庆春街370号东清巷口有一家“恒昇源”文具纸品店，承印浙大的部分办公用纸，有些文教用品也在那里采办。离浙大只有五、六百米，竺可桢常到那里买笔墨、信笺，有时夫妻同行。时间久了，店里的人都认得他。有一次恰好被老板陈鉴永遇上，老板说：“竺校长，这儿正巧有贵校印好的信笺，您不

妨拿去用吧。”他回答：“那是公笺，我写的是私人信件，还是应该自己买。”这是那家纸品店老板的儿子陈鸿仪告诉我的，1939年出生的他忘不了少时熟悉的老浙大：

节假日我也常和小学的同学去那儿玩。校园里面有河有桥，有树有花草，虽没有徐志摩笔下的“康桥”令人神往，但其幽雅、安静，绝对是学子的天堂，也是我们小朋友的乐园。现在回忆起来还很有滋味，怀念不已。遗憾的是人亡物非，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又令人不胜感伤。



●年轻时的竺可桢

一个没有了竺可桢的浙大不再是昔日的浙大，迁出了杭州大学路旧址的浙大也不再是竺可桢熟悉的那个浙大。如今楼堂馆所齐全、硬件设施优良的新校区据说也矗立着竺可桢校长的铜像，大概只是一种点缀和装饰，与竺可桢无关，“求是创新”的新校训与竺可桢确立的“求是”校训内涵也不可同日而语。60年前，竺可桢在风雨仓皇中离开杭州，在某种意义上，即意味着老浙大的终结。虽然，在大学路上，浙大校长简朴的办公室外，历经8年抗战烽火幸存下来的一雌一雄两棵罗汉松，还有一桃一枣一柿一梅，如今早已无处可寻，但可敬、可爱、可亲的“书傻子”校长，永远活在老浙大学生的记忆里。在1942年毕业于浙大物理系的许良英眼中，竺可桢校长虽然个子矮小，演讲时总是要把脚踏起来，不大会说话，常说“这个这个”，而且绍兴方言口音很重，但他的淳朴，不摆架子，平和，随和，都让学生感到亲切，“他绝对不会说假话”，更赢得了学生的信任。

主要参考材料：

1. 《竺可桢全集》第1—1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到2006年版。
2. 毛正棠执笔，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编著，《竺可桢传》上册，1982年。
3. 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 《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电教新闻中心编《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 2007年8月，对王来棣先生和许良英先生的采访笔记。
7. 2007年10月，陈鸿仪先生给我的电子邮件。

第十九篇

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

——司徒雷登与我比邻而居

我家对面就是“司徒雷登故居”，边上还有一个司徒雷登父母这一辈开始传教的“天水堂”。常有上我家来的朋友，说我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知道司徒其名大概都是从毛泽东 1949 年发表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开始的。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对司徒其人其事所知甚少，乃至完全是隔膜的。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他的讲演原文本来有一段是关于司徒的，可惜收入教科书时被删节了，一直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闻一多在“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和“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中间，本来还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



●司徒雷登故居

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比较完整的演讲记录稿发表在1946年8月2日的《民主周刊》第3卷第19期（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当年7月15日闻一多演讲那天，正是司徒雷登受命于危难之时。闻一多说得没错，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本人更是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是中美友好的象征，在20世纪中叶之前，他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在华的外国人，他一生的命运也和中国紧紧连在一起。他在遗嘱中要求将骨灰安葬在中国。他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开篇就说：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

1876年6月24日（清光绪二年），司徒雷登生在杭州，就是我居住的这条耶稣弄堂，地处武林门外，父母都是虔诚的牧师，在他出生前的两年定居杭州。那时武林门一带是城市的边缘，不像现在这样繁华，周围就是农村，“处于遭受太平天国严重破坏的中心，是杭州市一个最贫穷的地区。就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几幢传教士的住宅。传教士‘住宅’所在的小巷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耶稣弄’。”周围乡村的美丽景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水堂”成为他儿时的摇篮，也是他成年后踏上传教生涯的第一站。他在这里前后生活了14年之久。

他父母除了向城市贫苦阶层和乡下的农民传播福音，还热衷于办学，父亲办了一所男子中学，母亲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成为后来杭州有

名的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前身之一。司徒雷登和弟弟们一起在“耶稣弄”度过的童年时光，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也抹不去——



●天水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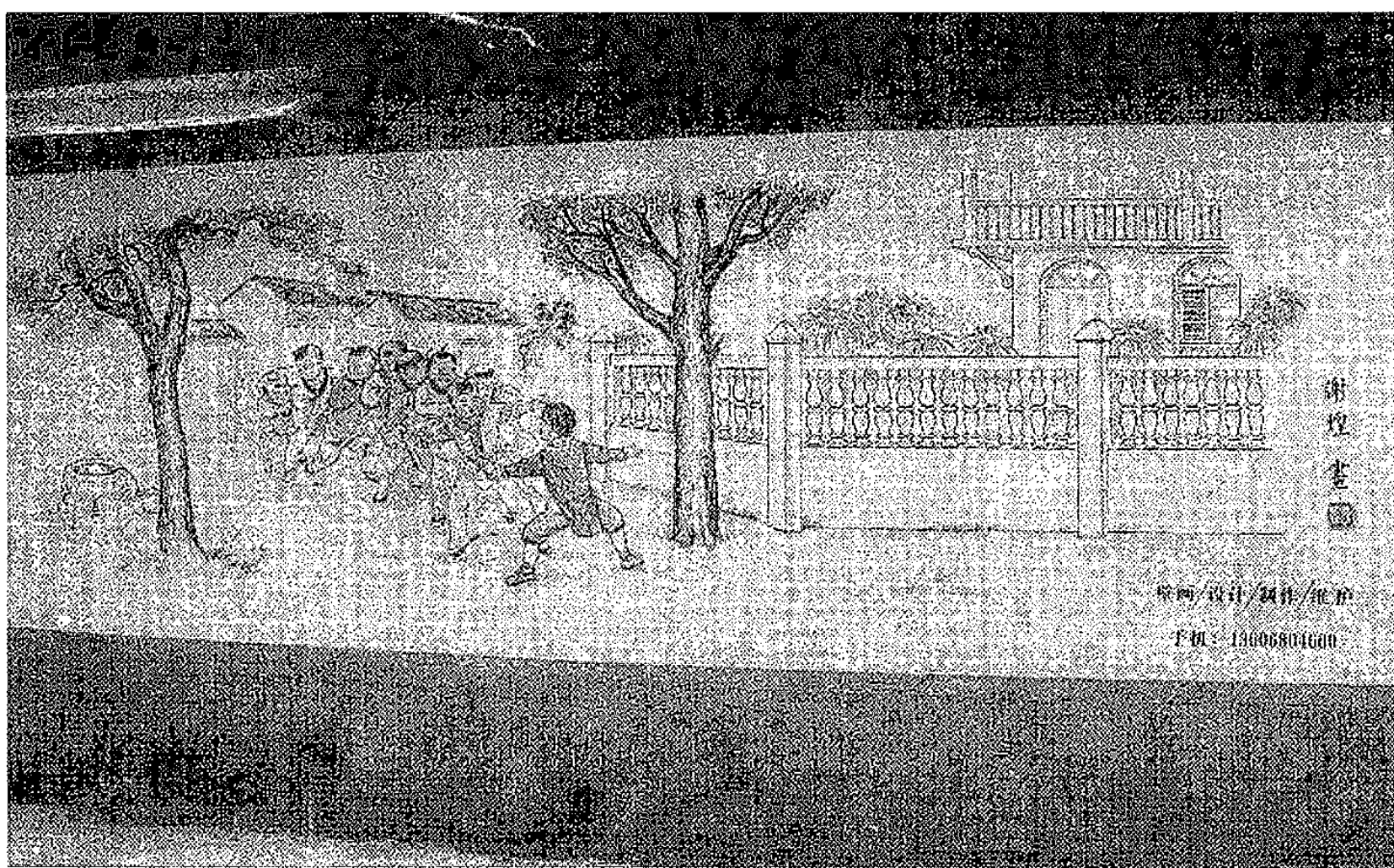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

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在那里搞一些原始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

他幼时在培德学校上学，学校里也有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同他们讲中国话并为他们所喜爱的中国小朋友。“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独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

他小时候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水果，为婚礼而精心安排的宴席尤其让他难忘。当然，新年里吃年夜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都在他脑海中留下了“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他有时候还会跟着父亲到街头或庙会上去传播福音。（现在，弄堂附近的墙上还有一幅彩色壁画，少年司徒正在跟杭州的小朋友一起玩耍。）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他 11 岁那年（1887 年），他随着休假的父母回到美国。1904 年冬天，在神学院毕业之后，28 岁的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回到杭州，踏上他儿时熟悉的这块土地。尽管离开杭州 18 年，他幼年时学到的方言几乎全忘光了，但他还是很快适应、学会了杭州话。他说：“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



●百井坊巷内有关司徒雷登的壁画，因拆迁即将消失

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好像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他开始在杭州附近的许多乡村传教，为贫苦农民的孩子开办免费的圣经学习班，“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我在杭州及其附近度过的那些岁月是极其宝贵的。当时，我除了同家里人以及偶尔同住在城里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有所交往之外，同当地人相处得也十分亲密，讲的、听的全是他们的本地话。”

1906年2月，他唯一的儿子也在杭州出生。

在1908年2月发表的《传教士与中国人民》一文中，他袒露自己近三年来在中国传教的感受，在批评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丑恶、不诚实、贪婪和缺乏道德”的弊病后，他也对他们的忍耐力表示赞赏。他认为传教的事业几乎是“创造一个国家”，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也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他应邀前往金陵神学院任教。

在杭州传教的三年半，他终生难忘，“我在杭州的那些年间所结交的朋友，主要是布道团的雇员，如传道士和教师。他们忠诚可信，办事稳妥，只是有些阿谀奉承的习气，在下属人员中算是比较好的。……我同教会中

的这些成员虽然经常友好交往，互谦互让，但意气相投的并不多。我有时还同农民一道用午餐，他们在稻田里或在桑园里干完一上午的活后，饥肠难熬，一餐要吃五大碗米饭，而我只能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有助于我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偶尔还带来明显的好处。”

他永远忘不了清朝官僚的排场，“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有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让他感到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官吏的夫人是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基督徒，她是曾国藩的女儿，后来她在83岁那年造访燕京大学，回到杭州，还给他送了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她有17个孙儿、孙女曾在这所久负盛名的学府学习。谁又能料想，这个当年在杭州街头独步的美国青年传教士会成为“燕京大学之父”。

1909年，司徒雷登的大弟因猎枪走火意外身亡，埋葬在西湖畔九里松的外国坟山。1913年秋天，他73岁的父亲去世，他回杭州奔丧，将父亲安葬在大弟的墓旁。杭州的教友还集资在众安桥建“湖山堂”纪念他在中国传道40年的父亲。1925年1月，他83岁的老母病故，与他父亲合葬在西湖畔。

司徒一生的事业在中国，他是个传教士、神学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他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段：一是传播基督教，从杭州到金陵神学院，前后大约15年；二是创办燕京大学，从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时不足3年，他以一个失败的大使黯然别了他深爱的第二故土。



●九里松的传教士墓塔

从此，没能再回来看一眼杭州、北京、南京，看看他出生并度过幼小时光的老屋，看看他父母在西湖九里松的墓园，看看他度过一生最宝贵岁月的未名湖、燕园，看看临去时的南京中山陵……

司徒在燕京大学的二、三十年是燕京的黄金岁月，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达到了他生命的颠峰状态，他被誉为“燕园之父”当之无愧。到晚年老病之时，他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看着窗外飘零的落叶，脑子中浮出的仍是燕园未名湖畔一丝丝、一缕缕的绿意，燕京大学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实现了的梦想”。司徒60岁生日时，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辞说，在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莱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我的一位朋友说司徒雷登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我很同意这个判断。司徒对这所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举其大者：

如果不是他筚路蓝缕、到处奔走筹款，燕京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象的。1918年12月当他受命之时，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20多人，其中中国籍的2人，许多外籍教师压根就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从1919起他不止10次到美国募捐，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在美国募捐到大约250万美金，成为燕京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他在中国的军阀、政要和社会名流之间募捐。随着时局的变化，1934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拨款6万元，而且从“庚子赔款”退款中每年再增拨1.5万元，燕京成为当时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20所私立大学之一。不过，即使国民政府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也只占到燕京每年经费来源的十分之一。

燕京之所以成为当年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固然离不开司徒雷登长袖善舞的募捐本事，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确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摆脱了教会大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他在聘请教授时，只问有没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也不管学术流派。他力图要把燕京办成经得起任何考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说白了，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



●燕京大学西校门

从学科的建立与健全，无不显示出燕京的传承与创新能力。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就是1922年在这里诞生的；培养了一代社会学专业人才。新闻系也令举国瞩目，1945年9月在密苏里军舰日本投降仪式现场的三个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朱启平那篇通讯《落日》已成为传世之作。司徒曾说：“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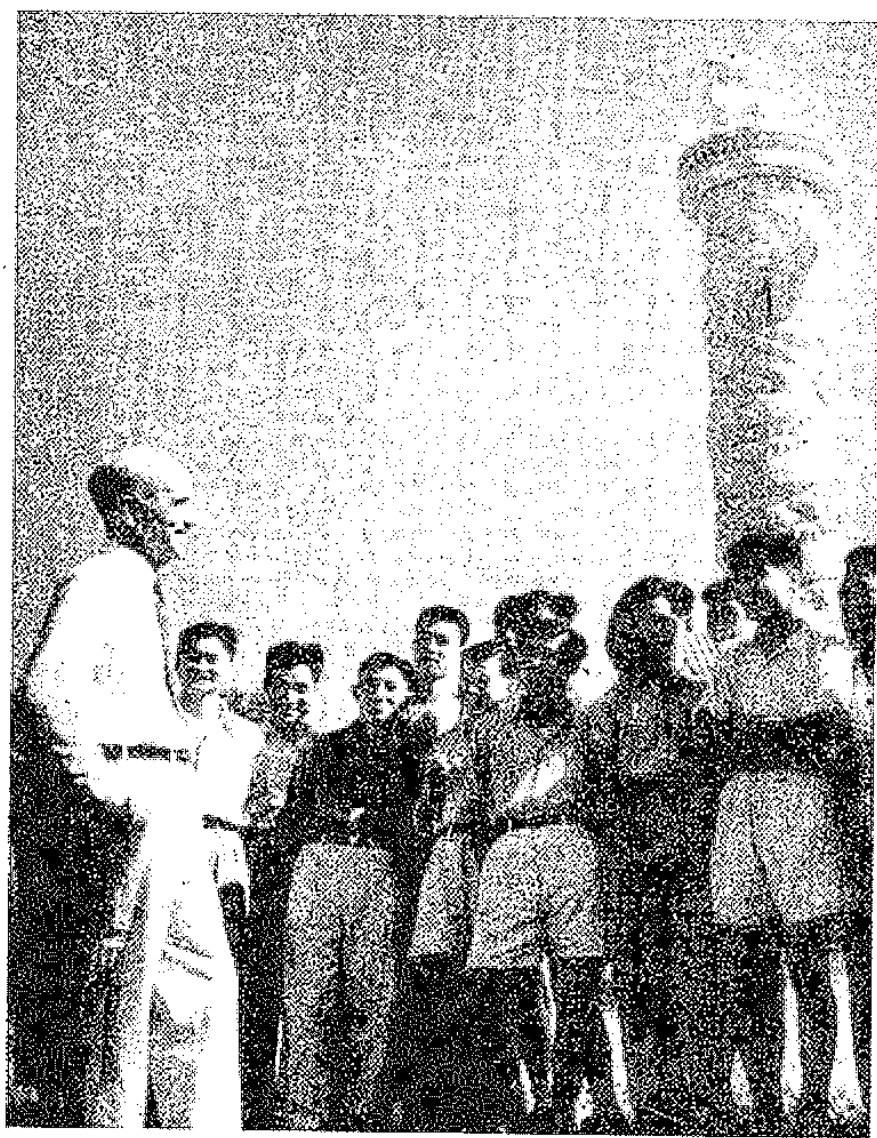
燕京汇集了教育家陆志韦、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宗教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等人，文学系更是名家济济，有周作人、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开“社会主义”课，在课堂上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这一来，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司徒说：“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独立报人俞颂华 1947 年在评价长期担任燕京哲学系教授的张东荪时说过：“他在燕大讲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不仅在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即使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但校长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中国化”是司徒始终如一的办学目标，但在他心里，“中国化”并不排斥“国际化”，作为教会大学，燕京校园里弥漫的却是世界主义而不是宗教的氛围，比如与世界许多大学都有交换教师、学生的制度，比如男女同校授课等。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各取所长，融会中西，这就是司徒平常所说的“燕大精神”。每个学生都能体会到当年燕京求学生活的温馨气息：校园曾经是那么的美，黄沙地曾经遍种花生。当秋天开学时，花生熟了，一些女生会挖些花生，用洗脸盆盛来煮熟，围成一团，快乐地剥花生吃。那种独特的余香数十年后都还残留在某些女生的齿颊。

当 1937 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选择留下的燕京大学成了北中国一个



●司徒雷登与燕大学子在一起

小小的自由“孤岛”，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堡垒，在张东荪、陆志韦、夏仁德、林迈可这些教授的背后，如果没有司徒强有力的支持，燕园这个堡垒决不可能支撑 4 年之久，他们为抗日后方输送人才和急需的战时物资。日本宪兵要进校园搜查，被他以美国“治外法权”的理由断然拒绝，燕京学生在校外被捕，他总是伸手救助，决不坐视。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包括他和洪业、张东荪等教授，还有 30 多个学生被捕。在身陷囚牢的 3 年 8 个月

中，他决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始终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因此赢得中国和世界的普遍敬重，声望如日中天。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和几个同事将《圣经》中的这两句话熔铸在一起，确立为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这一校训植根深远，成为衡量每个学生的尺度，造就了几代学子，影响至大。在他看来，学生才是学校的主体。

20 世纪末，两位耄耋之年、相见恨晚的老人开始书信往来，交流思想，谈及各自母校的校训。1998 年 3 月 4 日，1940 年考入燕京大学的李慎之先生在信中说：“你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1938 年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师从王淦昌、束星北等），长期研究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史，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许良英先生对概念、逻辑尤其敏感，他在 3 月 6 日的回信中说：

“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前半句我能理解，后半句我不理解，‘自

以 得 因
服 自 真
務 由 理

校 訓

吳 雷 川

燕 大 校 歌
YENCHING UNIVERSITY
SCHOOL SONG

T. C. Chao
Allegro

Arr. by B. W.

雄 哉 壯 哉 燕 京 大 學 輪 奐 美 且
Lift we high a- ni- ted voice- es, joy- ful- ly we

崇 人 文 奮 萃 中 外 交 乎
sing: Loud in praise of Al- ma Ma- ter

聲 譽 滿 寰 中 燕 京 燕 京 事 業
Glo- ri- ous Yen- Ching Lured from ev- ery part of

浩 瀚 規 模 更 恢 宏 人 才
Chi- na, Here to old Peking Wo- re

發 出 服 務 同 聲 為 國 效 忠
one our Col- lege ben- ef- or, Hail O Hail, Yen- Ching

● 燕大校歌

由’与‘服务’有什么关系呢？望解释一下。

我的母校浙江大学（我是1942年毕业，当时在贵州）的校训也与真理有关。只有两个字：‘求是’。”

3月11日，李慎之回信：“‘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是相连贯的。你明白必须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不（仅）是要服务于人类，比如科学家宣扬真理，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

相隔多少年后，燕京学子唱起当年的校歌：“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仍常常禁不住哽咽。这是一所成功大学的精神魅力所在，是教育在人心中播下的种子。

1947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南京举行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举行露天酒会招待各国代表，见到从杭州来的阮毅成（时任浙江省民政厅长，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他说：“我双亲的坟，均葬在杭州，不久要去扫墓，请先代我查看一下现状，如需要修理，我会负担费用。”不久，他来到杭州，当地政要及社会各界给予了空前的欢迎，有数十个社会团体、学校派代表到机场迎接、献花、赠致敬书。他先到西湖九里松扫墓凭吊、献花圈，看守坟场的老人告诉他，自己已看了十几年的坟场。杭州沦陷时，日本人曾在这里养马，地上有些小洞，就是马蹄的痕迹。



●司徒凭吊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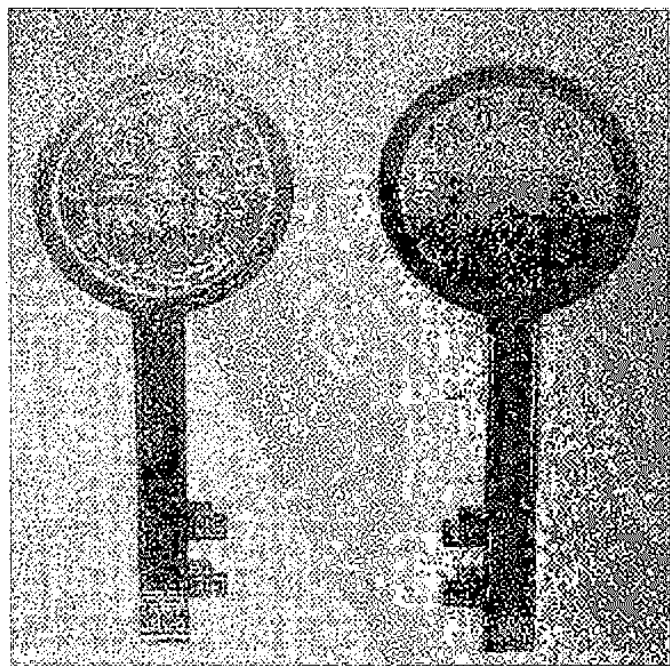
接着，他到耶稣弄堂看了故居，附近小学的数百名学生手持彩旗欢呼，昔日的朋友邻居聚在门口相迎。年逾古稀的他走进他出生的那个老屋，在熟悉的院子里和当年的同伴笑叙儿时的

情景。这是他最后一次重回故居，这个幼时觉得很大的院子此时陌生又熟悉，“在我成年后再回到那里，想起童年时代所记得的宽敞而又充满神秘的庭院时，那儿似乎显得狭小而又不起眼了。”然后，他又到“湖山堂”作礼拜。

杭州各界在西湖边的大华饭店举行盛大的欢迎餐会，他激动地指着周围的标语说，杭州是他的第二故乡写得最恰当，回忆幼时在杭州西湖各处“耍子”（游玩），龙井、虎跑、天竺、灵隐都去过，南北高峰、城隍山、玉皇山都爬过。这次重回杭州，他看到西湖和钱江大桥，倍感愉快。他说自己在杭州生养长大，来杭州就是回家乡。杭州的丝、茶、绸缎、扇子、剪刀等都驰名中外，希望朝着工业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其他事业也力求发达。

他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时不时夹几句杭州话。杭州各民众团体、特别是商会送了他很多土特产。之江大学、燕京大学的校友邀请他坐船游览西湖，他遥指着雷峰塔的方向说，自己儿时“耍子”过的雷峰塔，可惜现在已看不到“雷峰夕照”了。最后一幕是授予司徒雷登“杭州市荣誉公民”的仪式，在基督教青年会举行，杭州市长周象贤将证书及一把纯金制作的钥匙郑重地交给他。他说，自己是个普通的杭州佬，给他“荣誉公民”称号，感觉格外的光荣高兴，明天就要返回南京，乘此机会向乡亲们告别。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说：

值此时势艰难之际，杭州市长邀请我到我的出生地杭州市作了访问，那是一段饶有兴味和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受到了官方的接待。他们按惯例设宴招待了我。更有甚者，政府、市民和教育机构，以及许多老朋友都给我以热忱的欢迎。我并不把这些看作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对美国人民的深厚真挚的情谊。我相信，这种友谊不会因中美官方关系之间有一段误解和疏远而遭到破坏。访问结束时，杭州市长授予我以该市荣誉市



●杭州市荣誉公民金钥匙



●别了，司徒雷登

民称号，使我深为感动。

当1949年来临时，国民党败局已定，身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早就打算在四月初到杭州去过清明节”，可就在他起程前的一两天，国共和平谈判到了破裂边缘，共产党人向李宗仁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5天内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就将打过长江。局势急转直下，司徒雷登取消了杭州之行，从此与他的第二故乡失之交臂。当年8月，他最后告别深深热爱的中国。1962年，他在谢世前完成了《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其中多处深情地回忆起他在杭州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

主要参考书目：

1. [美]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2. 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4. 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司徒雷登百日日记（复印件），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
6. 许良英先生与李慎之先生通信复印件（未刊），许良英先生提供。

后 记

我深知，对中国人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中国人缺乏宗教，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可是，中国人不缺乏道德的坚守，不缺少人生意义的寻求，在其他国度或其他民族，用宗教提供的这一切，在我们这里是由历史提供的。换言之，当人家求助于宗教的时候，我们只有历史。我们不相信灵魂不朽，却把立言、立功、立德称为三不朽，就是相信是人类自身的历史中能够获得不朽。在我们的精神版图中没有末日审判，却有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头上有一个公正的上帝，却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没有天堂、地狱的概念，却有历史中的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绵延不绝的史家传统，保存了最完整的历史记载，秉笔直书成为后人尊敬的传统，包含道德褒贬的春秋笔法，为国人长期所认可。一句话，历史裁判承担着道德裁判的功能。支持文天祥从容赴死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晚年有诗：“青史凭谁定是非？”刘少奇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是善良的、弱势的、边缘的一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逆趋利避害的本能行事的唯一寄托；是不幸的、含冤的、坚持良知选择的人们全部的希望所在；也是令无比显赫的强势者不能不有所忌惮的无形威慑——“要上书（历史）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越是身处逆境、绝境，我们对历史就越会依赖。

有人说极权统治是历史的大敌，因为极权统治总是要系统地、精心地改写历史，“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过程就是用谎言淹没真实，用胜

利者的语言重写历史的过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里达到了最可怕的登峰造极。这已经不是历史，只剩下恐惧的颤栗，对权势的屈从和棍棒下的呻吟。颠倒历史是可怕的，戏说历史是可鄙的。历史不容戏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历史，就是瓦解历史的道德功能、宗教功能，瓦解历史裁判权。历史不容遗忘，昆德拉有一句话说：“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诚如胡平先生说的：“消解历史的神圣性导致人们只是‘活在当下’，以眼前的利害为生活的唯一准绳，因此它有利于权势者而有害于反抗者有害于大众，有利于恶而有害于善。对于缺少宗教的中国人，如果历史不再神圣，那么还有什么神圣？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失去神圣，那将是怎样的人生？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

然而到了近代，历史承担的已不是单纯的道德功能。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一文，批评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端：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是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导致两病，能铺叙不能别裁，能因袭不能创作。他大声地喊出“史界革命”的口号，认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自蒋廷黻、陈恭禄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栋，各种解释系统让人应接不暇，半个世纪来最强化的主流说法是胡绳的“三大战争、三大运动”说，此外有陈旭麓的“新陈代谢说”，唐德刚的“二百年出三峡”说，李慎之先生临终前不久，在写给他同时代的朋友许良英先生的长信中，有意改写中国近代史，并提出新的架构，他的第一个切入点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可惜天不假年，大纲还未完成他就撒手而去了。

20多年前，我在一本报告文学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其中一个说法一直在我的脑子中萦回不去：环绕人民英雄纪念碑的12幅浮雕起自虎门硝烟、金田起义，到大军渡江而终，这个圆圈中有武昌起义，有“五四”学生游行，没有戊戌变法，当然更没有晚清立宪运动，那些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基本上没能进入这个圆圈。正是圆圈内和圆圈外，如同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历史。如果站在文明的角度，一系列由暴

力和以暴易暴的思路所构成的战争、动乱、革命提供的大体上是历史的背景，它们对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在许多时候往往为零，有时甚至是负数。许多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如果放在文明史中来看只能是反角或陪衬，这不是历史的无情，恰恰是历史的公正，否则一部文明史岂不成了“何不食肉糜”的人儿主宰的历史？文明与反文明的力量之间的较量是永远不会中止的，人类正是在不断摆脱野蛮的控制而前行的。近代以来，这激荡的一百多年，对于重塑文明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往往不是军阀、枭雄、有权势者，而是那些以汗水、智慧乃至生命的代价推动文明转型的人们。虽然在历史教科书上常常找不到他们的名字，没有他们的位置，仿佛他们不曾存在过似的，似乎历史就是强者、赢者、胜利者的历史。在西湖这个平台上，他们的生命曾经那么绚烂，他们的笑容曾经那么自信，他们的脚步曾经那么稳健，他们的目光曾经那么清澈，他们看到过希望，创造过希望，他们的身上落满了阳光。

事实上，站立在华表柱头的从来是那些曾日夜为文明进步而苦心焦虑、不避斧钺的人。那些阻碍了这一进程的人无论多么显赫、显赫多久，终究逃脱不了被时间钉在历史墙壁上的下场。一百多年前，“苏报案”发时，浙江余杭人章太炎就有这种历史的自觉，他长歌过市，吟出“风吹枷锁满城香”的诗句，他从容地面对法庭与囹圄。比他晚了半个多世纪，在海峡对岸，浙江湖州人雷震因“自由中国案”锒铛入狱。在写给儿女的信中，他也有这样的自觉：“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努力工作，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

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数千年来，老中国的命运，百多年来，先辈们引入新文明的努力，常常令我哽咽无语。收入这本书中的文章，从2005年7月开始动笔（部分篇目曾先后在《西湖》月刊的专栏和其他报刊发表过），到2006年夏天之后搁下。这一搁就是整整两年，直到2008年夏天才重新拿起来修改。又是一年过去了，今年夏天以来，我又陆续对部分篇目做了修改，最终定稿。4年的时间就这样无情地在眼前流过，但我知道，历史的河流永不止息，我的思考和寻找也不会停止。

感谢尊敬的许良英先生十几年来对我的教诲与帮助，感谢蒋抑卮孙子

蒋彦明先生、任鸿隽后人任尔宁先生以及研究杭州老房子的仲向平先生提供了珍贵的图片，感谢陈鸿仪先生、庞荣棣女士为我提供的材料。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有你们与我同在，无论冬天有多么寒冷，我的心中也始终有春天。

2009年12月19日于杭州

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没有这样那样的传统,何谓传统?传统总是从一个人、一些人、从某个时间开始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这些人出现了,我们的出版业就有了传统;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出现了,我们的大学就有了传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出现了,报业就有了传统;蒋抑卮、陈光甫出现了,金融业就有了传统。

百年中国,多少悲壮剧,前人创造了历史,却有多少被遗忘。傅国涌勤奋博学,百年寻梦,追寻传统,笔底波澜,为后人找回财富,激人奋进。

——钟沛璋 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东方》杂志总编辑

傅国涌的文章有内容,有观点,视野开阔,文字晓畅。有些地方用墨不多却意味深长。

——章诒和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傅国涌在尘封的史料中勤奋爬梳,揭示了近代中国不少历史真相,以新的视角给读者新的启发,实现了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

——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傅国涌的文字之所以可信,在于他的理性、道义和人格力量处于同一条直线上。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上架建议:社科·文史

ISBN 978-7-5399-3738-0



9 787539 937380 >

定价: 34.80元